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3卷 第3期 | (总第9期) | 2019年9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3卷 第3期 | (总第9期) | 2019年9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尔曼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瑞米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Rame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电 话: 0731-88873041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9月28日

定 价: 28.00 元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整体设计: 周基东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 2019*q* 16* 160*zh*P*¥ 28.00* 3000* 14* 2019-9

目次

洪堡研究

- 001 寄语 奥特马尔·埃特
- 002 岛屿、群岛和群岛写作——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古巴岛, 安的列斯群岛》 奥特马尔·埃特
- 012 洪堡密码——关于创建 19 世纪环球旅行者的混合数字学术版本 托比亚斯·克拉夫特

犹太文化研究

- 024 犹太—基督宗教强烈的道德意识自何而来? 阮炜
- 035 《旧约》与希伯来精神的书写 唐立新
- 045 黑人、犹太人、城市人——评索尔·贝娄中晚期城市小说中的种族问题 张甜

文学研究

- 056 重返“自然”——A. S. 拜厄特《巴别塔》中的语言与科学 姚成贺
- 065 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后殖民创伤研究 黄然
- 079 民族主义时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边缘人——亨利·劳森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研究 张加生 林宝琪

翻译研究

- 089 儿童文学翻译中互动性的语域再现——以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三个中译本为例 陈雪梅
- 101 《黄帝内经·素问》四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接受 徐冰 张莹
- 113 论曹译莎剧的演出适应性 刘云雁

语言学研究

- 125 元思辨理论框架构建与培养原则 张莎
- 136 美国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对外语教育发展的影响 罗辉
- 145 广播情感热线节目中咨询人批评应对的面子管理研究 彭卓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3卷 第3期 | (总第9期) | 2019年9月 |

Contents

- 002 **Ottmar Ette** About Islands, Archipelagos, and Archipelagic Writing: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 012 **Tobias Kraft** The Humboldt Code: On Creating a Hybrid Digital Scholarly Edition of a 19th Century Globetrotter
- 024 **Wei Ruan** Where Does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s Powerful Moral Consciousness Come from?
- 035 **Lixin Ta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Hebraism
- 045 **Tian Zhang** Blacks, Jews, City People: Racial Issues in Saul Bellow's Mid- and Late Urban Fictions
- 056 **Chenghe Yao** Return to "Nature": Language and Science in A. S. Byatt's *Babel Tower*
- 065 **Ran Huang** Post-Colonial Trauma in Ruth Praver Jhabvala's Later Indian Fiction
- 079 **Jiasheng Zhang, Baoqi Lin** Marginal Men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Perio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in Henry Lawson's Works
- 089 **Xuemei Che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gister Feature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Rudyard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
- 101 **Bing Xu, Ying Zhang**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Readers' Reception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 113 **Yunyan Liu** On the Theatrical Quality of Cao Yu's Translation of *Romeo and Juliet*
- 125 **Sha Zhang**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Framework and Education Principles
- 136 **Hui Luo** Implicit Foreign Languages Polic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145 **Zhuo Peng** A Study of Face Management in Consultants' Responses to Criticism in Emotional Phone-in Radio Programs

FLC

洪堡研究

寄语

◎ 奥特马尔·埃特

1769年9月14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诞生于柏林。当我们这个专栏面世时，世界各地都在庆祝这位十八、十九世纪最为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的250周年诞辰，不仅有洪堡论坛，还有数不清的会议、工作坊、演讲，当然还有纪念专栏。

洪堡是科学家、作家、旅行家，还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全球化的理论家。他曾在普鲁士和法国居住，用德语和法语写作，他的足迹遍布美洲大陆和中亚。他曾穿越俄罗斯帝国到达中国边境，在他以法语发表的三卷本《中亚》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描述。

洪堡的一生分为三个三十年。从1769到1799年的这头三十年，他同兄长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一起生活在柏林，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研习范围覆盖了植物学、历史、化学、地理、文字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母亲过世后，他决心要见识欧洲之外的世界，当他第一次离开欧洲时，已经是一位在德国和法国颇有名气的学者和科学家了。第二阶段始自1799年，洪堡用了五年时间穿越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等地。旅程结束之前，他在美国做了短暂停留，期间数次同时任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会面。尔后20年间，他在巴黎著书立说。在这期间，他不仅开创了诸如植物地理学、美洲土著文化历史等学科，还创造了后来被人称为“洪堡式科学”的跨学科概念，以及后来被称为“洪堡式写作”的写作方式。这个阶段的末期，他回到柏林，针对大众开讲，使得女性也可以学习科学。洪堡的最后一个三十年始于1829年，他接受俄罗斯沙皇的邀请前往俄国，开始对中亚的研究。

洪堡的著作包括十数本专著，三十卷本关于拉丁美洲的论述和不计其数的科学论文。此外，还有逾5万封信简，以及成千上万页尚待整理出版和研究的手稿。

本专栏中的两篇文章都是研究项目“旅行中的洪堡——移动的科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波茨坦大学联合柏林国家图书馆、柏林工业大学和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图书馆共同资助的项目，始于2015年，预计耗时18年。它重点关注编辑洪堡的美洲和亚洲的旅行日志手稿，以纸质和电子的形式发表。

岛屿、群岛和群岛写作

——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

◎ 奥特马尔·埃特

任海燕 译

内容提要: 手稿《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可以视为洪堡整个群岛文本的标题，这是一个结构上极度开放的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文化和自然的探险家是如何搭建起写作乃至思维模型的。他的这个微型文本以多重关联和多逻辑共存的方式将加勒比世界中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囊括其中。同洪堡的古巴地图及《古巴岛政治随笔》一道，这篇手稿奠定了洪堡在19世纪古巴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 古巴文学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01-10

作者单位: 波茨坦大学罗曼语言和比较文学系，德国 波茨坦 14469

Title: About Islands, Archipelagos, and Archipelagic Writing: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Abstra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manuscript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can be read as the title of an entire archipelago of texts. Its radically open design is intriguing and gives us a sense of the ways in which this explorer of culture and nature modelled his writing but even more his thinking. His text miniatures encompas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mplexity of the Island World of the Caribbean in a relational and polylogical way. In combination with his Cuban maps and the *Essai politique sur l'île de Cuba*, this manuscript gives Humboldt a prominent place in Cuba's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Cuban literature

Author: Ottmar Ette, Chair Professor, Romance Languag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otsdam University, Potsdam, Germany.

一、岛屿文本和岛屿图景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一位古巴作家,至少,他的文字读起来像。洪堡的写作开启了长达整整一个世纪成果丰硕的古巴文学创作,它以流放和频繁的跨地域流动为特征,构成了一种居无定所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在19世纪末的卡萨尔(Julián del Casal)、马蒂(José Martí)和博雷罗(Juana Borrero)的作品中达到顶峰。

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古巴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卡彭蒂埃(Alejo Carpentier)的选择:他以洪堡在其著名的旅行报告《历史关系》(*Relation historique*)第28章中进入哈瓦那港的一段描写作为开场白,以文学的方式宣告对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爱。洪堡的这章关于美洲的报告于1814年11月至1831年4月间在巴黎以法语发表,虽然只是片段,《历史关系》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依然将它收入其中,并且于1826年以《古巴岛政治随笔》(*Essai politique sur l'île de Cuba*)为名单独印刷发行。洪堡于1800年12月19日首次抵达哈瓦那港,这位普鲁士作家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一蔚为壮观的场景:

从港口看过去,哈瓦那风景如画,最是宜人,在那里可以欣赏到赤道以北的美洲海岸景色。这个地方聚集了各个国家的旅行者,与南半球的另外两个港口相比,它没有瓜亚基尔河岸的茂密的植被,也没有里约热内卢礁石嶙峋的海岸边所具有的粗犷和庄严,但是它非常优雅,在这样一个热带地区,呈现出经过文明打磨的美妙自然,不仅有植物的高大壮丽,还充满着热带地区所特有的有序的活力。沉浸在美好感受中的欧洲人忘记了安的列斯群岛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他试图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感受多样性,思考港口东部有如明珠般嵌入岩石的城堡,以及被村庄和农场环绕的盆地内部,还有高耸入云的棕榈树。这是一个掩映在如森林般繁密的桅杆和船帆之下的城市。(*Relation historique* 348)

这是洪堡第一次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哈瓦那港,他四下造访,试图勾勒出这个汇集了全球运动之地的轮廓。他以精准的叙述,呈现了一幅“理论景观”(landscape of theory)^[1],将自然和人文,岛屿和世界,半球和跨大洋的各个维度连接起来。由运动催生的科学——洪堡式跨学科科学——以新的面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由此,新的关系,全球范围内新的互动出现了:欧洲和美洲之间,热带和温带、北半球和南半球、大陆和海洋、欧洲人和安的列斯群岛人、城市和乡村、树木和船的桅杆之间,甚至于安的列斯群岛上的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互动变化虽然有些隐蔽,也变得可见。当卡彭蒂埃以洪堡这段诗意且诗学性的描述开场,并称之为替这座“支柱之城”做的文学—科学的素描时,他很清楚自己的意图。

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不一样,洪堡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全球化理论家,他很清楚一个事实,即古巴是一个全球性的岛屿,与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菲律宾岛跨群岛相连。古巴诗人、

散文家马蒂可能算得上加速全球化第三阶段中最为出色的思想家了。在他看来,考察全球范围内的关联性在何种程度上使被殖民中的古巴暴露于极端压力意味着从这种关联性中探究其文化理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从全球范围内看,在加速全球化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阶段^[2],古巴历来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是不同阶段各个主要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

自1492年以来,古巴岛就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全球化运动空间。这一点从加勒比早期制图史中的古巴岛地图中已经可见一斑。1528年,意大利人第一次单独绘制了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但那不过是他们自由想象的产物。来自帕多瓦的威尼斯人博尔多内(Benedetto Bordone)在他著名的岛屿地图集中,将它想象成鳄鱼形状的大岛,这与当地实际的自然景观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早时期对该岛内部的图形描绘总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的风景。然而,这位微型画家及制图师极为成功地将古巴岛描绘成为一个在全球性的连接网络中的一个移动的空间,它不久将成为跨大西洋航运的路线交汇点,还会成为跨太平洋的交汇点。在《贝内戴托·博尔多内的书,书中理性分析了世界上所有的岛屿》(*Libro di Benedetto Bordone nel qual si ragiona de tutte l'Isole del mondo*)中,关于岛屿的书变成了想象力的产物,投射出在权力作用之下该岛获得了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博尔多内所绘制的包含了古巴岛的世界地图同单幅地图之间的差异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古巴的岛屿图就在世界的网络之中。

早在1500年,在一位名叫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的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古巴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就已经非常突出。这是一幅非常有名的地图,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在这幅地图中,安的列斯群岛中没有任何一个岛屿的轮廓绘制得像古巴岛那么精细,而古巴在墨西哥湾出口的关键性地位已经确立。这位著名的西班牙水手和制图师使我们意识到在世界地图之网中,在欧洲之外,古巴所拥有的独特地位是在加速全球化的各个不同阶段都足以决定安的列斯群岛命运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德拉科萨绘制的古巴岛地图已然是一幅在跨大西洋区域内,描绘欧洲、非洲和正在兴起的“新世界”之间的张力和运动的地图。

德拉科萨绘制这幅地图300年之后,洪堡携邦普朗(Aimé Bonpland)来到了哈瓦那港,这个港口在洪堡绘制的地图中始终拥有特殊地位。他后来在《新大陆时位区域地理和物理地图集》(*Atlas géographique et physique des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中加入了两幅古巴岛地图作为其美洲游记的一部分,这些长方形的插图乍看起来似乎将古巴岛从加勒比海诸群岛和大陆海岸线抽离出来,进行单独描绘。这与前文提到的于1826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的《古巴岛政治随笔》相符。如单独发行的《政治随笔》一般,这两幅单独的地图表明这位普鲁士作家和学者将这个岛理解为原国家实体(proto-national entity),并试图从全球的格局来阐释它的重要性。对他而言,岛屿文本和岛屿图象之间的互动最为密切,他们代表着当时就科学问题展开的最为深入的思考。

如果将《地理和物理地图集》中收录的两幅古巴地图与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的《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的定居点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一部了不

起的殖民百科全书,1770年首版面世之后成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畅销书——中的地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差异巨大。1820年和1826年的洪堡地图显示出技术表现力、精确程度、天文测量、位置信息,以及绘制可视化制图时对于细节的忠实再现等方面的质性飞跃。1826年那幅地图还有明显的修订和大量改进的痕迹,这显示出洪堡在绘图的过程中不断更新选用最新的数据。地图基于奴隶分布记录了重要的种植园的所在,在邻国圣多明戈(海地)发生的革命之后,地方寡头正是通过这些种植园在世界市场上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

因此,对于洪堡而言,对地图的修订和更新不仅仅是大大提升所描绘山脉走向的精准度,增补缺失的条目,或者修正错误条目,更不仅仅是通过参考其他资料、外国的测量和报告对天文计算的数字进行细微修正。绘制地图成为以最为复杂的方式再现岛屿的途径,古巴岛利用哈瓦那的主要港口以跨群岛(transarchipelagic)、跨地域(transareal)的方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多重联系的实体,而岛屿图象需要与岛屿文本相匹配。

所有这些涉及的维度已经能够从莱特纳(Ulrike Leitner)在克拉科夫(Krakow)的雅盖隆图书馆(Jagiellonian Library)的洪堡手稿集中发现了。这些手稿以《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之名首次在数字网络上发布,是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资助的学术项目“数字洪堡”(Edition Humboldt Digital)系列的一部分。这份共37页的手稿的标题——它显然来自洪堡——表明,对于洪堡来说,对古巴岛的考察不能脱离群岛的语境,更不能无视它同世界的联系。

二、文本—群岛和文本—分形

洪堡和邦普朗在安的列斯群岛中的这个最大的岛屿上逗留了两次,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古巴岛在他们这次美洲热带探险(1799—1804)中的特殊意义。第一次旅行始于1800年12月19日,即文本开头提到的进入哈瓦那港口,终于1801年3月15日,总共不到三个月时间。如果说与古巴的第一次接触同南美洲北部海岸和加拉加斯(Caracas),尤其是同奥里诺科(Orinoco)和亚马孙水系的旅程有关,那么始于1804年3月19日,终于4月29日的第二次停留,则是整个探索之旅的尾声。在这次为期六周的逗留之后,他们只在费城和华盛顿短暂停留(这使洪堡可以避开西班牙人保护他的材料和文件),然后便返回了欧洲。

本文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手稿《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的初稿写就于洪堡在古巴岛的第二次逗留期间。此时,洪堡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之旅》(Reise in die Äquinoktial-Gegenden)中的基本观点已经初步成形,他将手稿按顺序整理好,压缩为数页文字,并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一切同古巴和安的列斯群岛相关的信息,以备将来发表之用。如果对洪堡的美洲旅行日志里这部分条目进行细查,可以发现这位普鲁士的文化和自然的研究者在此后几十年里,坚持不断地往手稿中增加新内容,添加注释,进行更新或者是修订,其结果便是这些手稿不再仅

仅只是旅行日志，而是呈现出开放式的结构，其影响远远超出了1804年这个短暂的时间跨度。

如同洪堡自己指出的，这支德法研究团队将两次停留置于不同的语境中，使得对第一次停留的印象（这一印象可以在《美洲旅行日志》[*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的其他地方得到印证）同第二次的截然不同。对于这两位探险者而言，在经历了奥里诺科之旅的各种艰苦之后，第一次逗留时期的哈瓦那可能代表着令人愉悦的城市空间，那里有着各种可能的知性挑战，而第二次逗留则发生在他们在新西班牙的首都墨西哥城做了长期停留之后，因而哈瓦那显得更具地方气息，缺乏出色的科研机构，甚至有些狭隘。洪堡不无憎恶地指出，那里所有的谈话都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在哈瓦那，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大问题，即用更少的黑人在一天内制作最多的糖面包。”（*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 142r）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洪堡丧失了对这个位于美洲热带地区的岛屿的兴趣。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仔细分析《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的句法和结构，不难发现它与《美洲旅行日志》的大体构架存在契合之处。如同旅行手稿的其他部分一样，它既不遵循时间顺序，也不遵循历史顺序；既不是科学性的，也不是学科性的；既不是一以贯之地按照主题也不是按照内容的相关性进行架构。另一方面，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得让人吃惊的材料显然并非真的混乱，因为细读之下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虽然不得不承认，洪堡本人并没有一直遵循这些规律。就具体的文类而言，它既不是个人化的日志，也不是文学性的游记；既不是关于古巴岛的历史描述，也不是基于某些学科的散文；既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一系列事实和材料的简单堆积。相反，《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包含了前面提到的所有内容，并且远不止于此。这个文本无法被简约成为其中的任意一种，它具有的极度开放的结构令人着迷。

在这个文本中，洪堡不仅分析了岛屿，他还以岛屿的方式写作。这意味着他——同在《美洲旅行日志》的其他部分所做的一样——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的文本域（text-realm），他们非连续性地排列着，缺乏包罗万象的连续性。洪堡的写作是在一种特殊的非连续性中进行的，文本中这些独立的、“破碎的”、相互间彼此分离的部分像群岛中的各个岛屿一样，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在一起。这种相关性或者称为多样连接性体现出“洪堡式写作”（Humboldtian writing）非线性和不连贯的突出特点。同他笔下其他的文本——岛屿一样，鉴于《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分为好几个部分，洪堡为它取的标题可以被视作整个文本——群岛的标题。

就像《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并不是一个不完整的碎片也不是某个更为宏大作品的一部分，文本——群岛也不是碎片或者碎片的集合。恰恰相反，它本身呈现了一个基于相似关系，可以不断扩展的写作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不是某个文本的碎片，而是一个分形：它基于多重关系和自我相似性，为我们提供了洪堡的书写模型乃至思维模型。这种思维模型深深地基于相关性，并不指向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链，而是指向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多种逻辑的场域，完全符合洪堡思想中最为根本的原则“一切都是互动”（*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 27r, 2-27v）。在这项工作或这种思维方式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而自成一体的：洪堡有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出于分析的目的进行拆解，但是即使在这样一

个时刻,其分析也仍然包含着对于整体性的认知。

洪堡的写作模型以一种文本共存 (co-textual) 的方式 (即观照到《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编织群岛文本,同时还要将特定时期的历史、政治或者经济发展等语境 (contextual) 因素编织进来。这个动态的系统同时还适用于在《美洲旅行日志》之内和之外来阐释《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同洪堡的其他文本之间的文本内的 (intratextual) 关联,以及文本间的 (intertextual) 的关联,这些关联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将洪堡的写作同其他作家的作品、数据和发现连结起来。显然,洪堡这篇从 1804 年开始写作的旅行文献同他在古巴的第一次停留时所搭建的框架内创作的文本形成互动,同时又吸纳了洪堡在他其他的旅行手稿中的文本——岛屿。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洪堡在此处就奴隶和奴隶制所做的观察必须放置于他那九卷本的旅行日志所构成的文本——岛屿的语境中考量,在这九卷的标题中常常会出现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奴隶”一词。

即使文本的标题——直接以法语来称呼这个岛屿——似乎代表着单语种主义 (monolingualism),即使《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法语写就,但同他的其他旅行日志一样,洪堡还使用了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由此可见,洪堡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语种主义 (multilingualism),他会不停地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这与他同威廉·冯·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共有的信念相关,他们都主张这个世界不能以某个单一的视角来分析和理解。知识扎根于语言,经由语言传达,因而受语言影响,并非中立。洪堡的群岛写作显然带有多语种主义的色彩,在当下由英语主导的学术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其中便包括非英语图书馆的消失——我们正逐渐丧失这种能力。洪堡的写作,同他的世界意识一样,乃是基于语言之间的不断交流,他的手稿用德语、西班牙语或是英语的段落清楚地再现了这种交流。

宙斯克 (Michael Zeuske) 在为第一版《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提到了洪堡笔下这个相当复杂的文本中涉及的奴隶经济和奴隶贸易的重要性^[3]。当洪堡到达“新世界”库马内——现在的委内瑞拉——时,他就留意到多种形式的奴隶制:既有对美洲土著的奴役和为抓捕奴隶而展开的突袭,也有美洲人对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的奴役、谋杀、强奸和残酷虐待。在整个穿越美洲热带地区的旅行中,一定数量的文本——岛屿显示出高超的观察技巧和反思能力,以及从群岛的角度在《美洲旅行日志》中不断地分析“第一奴隶制”和“第二奴隶制”。洪堡的手稿从半球和加勒比这两个角度,提供了一幅内容丰富的跨大西洋野蛮行为图景。

邦普朗和洪堡第二次访问古巴之初,在世界范围内,奴隶制正在经历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变化。继洪堡提到的英国工业革命和他所仰慕的法国政治革命之后,是美国的反殖革命和独立战争,再有是开始于 1791 年终于 1804 年 1 月 1 日海地宣告独立的海地革命。洪堡的记叙开始于 1804 年他前往美国做短暂停留之前的几个星期。同欧洲的那两重革命相比,美洲的革命对他的影响更深,他的立场乃是建立在美国的反殖革命和直到 1804 年前还是法属圣多明戈的反奴役斗争之上的。终其一生,洪堡在奴隶问题上的态度饱受诟病,尽管他生前曾提

出强烈抗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美国还有人将他描绘成奴隶制度的拥护者，而这都是因为思拉舍将洪堡对于奴隶制的批评悉数“翻译”成了支持。几年前，《古巴岛政治随笔》的新版英译本面世，直到这时，思拉舍对于洪堡言论的诋毁性翻译才得到纠正。我们只能希望，这些误译能永久地从文本中剔除出去^[4]。这个案例说明，对于科学来说，如果不依赖外语原文而仅仅只是凭借英译本，将会多么危险又短视。洪堡的跨语言科学是应对这种状况的一剂完美解药。

在海地成功发动了奴隶起义之后，当所有同奴隶经济、奴隶贸易和奴隶走私有关的人都被裹挟进一场以燎原之势蔓延的歇斯底里之时，洪堡发展了他多年来对奴隶制，尤其是第二奴隶制时期的看法，他仔细分析了数字数据——其中既有他采集的也有他收集的——以及当地寡头和外国寡头们的辩护性话语和实践行为。他的外交才能使他得以出入西班牙殖民社会的最高阶层，这同时还是信息更新最为及时的一群人。

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朋友无疑与海地革命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并不妨碍他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即便是存在于美洲土著居民的领地中的，都是令人反感的，都需要终结。在《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中，正如标题所示，洪堡不仅仅分析了古巴大规模奴隶制的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巨变，还从比较的视角探究奴隶制的多重关联，将安的列斯群岛和整个跨大西洋地区的迁徙空间纳入他的思考之中。由于圣多明戈的革命，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获得了特殊的意义。然而，他以同样全面的方式集中分析天主教君主制帝国或大英帝国的奴隶制立法中细枝末节的法规，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分析法国殖民帝国奴隶制度的基本律法。

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洪堡的态度并不激进，他更倾向于通过一步一步的改良，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一次又一次进入视野的不光是奴隶们带来的贸易机遇和大规模奴隶制背后那些可怕的（同时也是获利巨大的）权力拥有者和机构，同时还有古巴以及整个安的列斯群岛上奴隶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条件。洪堡的研究涉及了被奴役的非洲人的不人道的住宿和衣着，还有不断“现代化”的生活习惯和食物，而这一切无不着眼于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给每个黑人价值 1/2 厄罗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运来的风干腌肉，还有加勒比地区常见的蔬菜、白薯（旋花科）和玉米，1 厄罗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运过来的腌肉 = 10-12 里亚尔。最后，如果缺少什么，就给他们咸鱼，当地人认为这是不详的东西。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130v)

从类似段落中不难看出，洪堡的研究兴趣不仅止于在世界经济背景下大规模奴隶制的不人道做法，以及当时已经争论已久的奴隶制的盈利能力问题——在洪堡看来，其巨大利润空间是毋庸置疑的——他对奴隶们切实的生活条件感兴趣。由于同古巴的蔗糖寡头之间的私交，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由是，《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呈现了洪堡曾经分析并谴责过的一幅关于大规模奴隶制的鲜活图景。当然，洪堡是现实的，他认为废除奴隶制并非一

朝一夕之事。事实也是如此,在南北美洲有些地方,奴隶制一直持续到1888年,之后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如果政府即刻还黑人以自由很危险,他们至少可以改善黑人的处境,使他们不那么不快乐。无作为是一种犯罪”(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141v)。对于洪堡而言,面对奴隶制却什么都不做,这是一种犯罪。

三、微型——模型——分形

《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远不止为洪堡后来单独出版的《古巴岛政治随笔》提供了一系列事实和素材,这个文本一群岛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复杂语境的微型化再现,它作为一种简短的书写,以非连续的方式呈现了洪堡与加勒比岛屿世界的关联。如取自文本的摘录所示,这里采用的简略书写的形式并非像普通的素材那样是一串附加了注释的摘要清单。相反,从《美洲旅行日志》的框架体系来看,它通常包含了刻意使用的语言元素,赋予整个文本很高的认识论价值。即便只是在进行微型作品创作,洪堡依然是一位真正的作家。

对于洪堡而言,数字数据和统计构成了分析和思维系统的参照点,这个系统始终要求考量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毫无疑问,古巴岛是从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的,但是洪堡特有的网络化思维模式使他坚信,想要真正把握和了解这个岛屿的具体状况,必须将它同时纳入到安的列斯群岛内和跨越群岛的各种关联之中。

只有在“奴隶”(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134r)的标题之下,当洪堡将以法语就圣多明戈革命展开的思考同来自帕雷尼奥(Francisco de Arango y Parreño)——洪堡眼中非常重要的奴隶问题专家——在西班牙帝国的立法问题上的西班牙语引文混合在一起,或者是加入了用英语写成的就巴巴多斯或百慕大的奴隶制立法问题的引文,才有了洪堡意义上,通过语言、文化、法律、社会或政治多样性呈现的加勒比区域的统一性。如同心脏收缩和舒张的双向运动一样,逐个对待和整体观照令人信服地关联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在这种关联性中,岛屿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和合法性并不能使其获得区别对待。相反,这被视为多样性的复杂表现(例如,在基于奴隶制的种植园社会内的多样性等)。洪堡刻意选择不以单个的殖民帝国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的法律制度,各异的历史发展过程,或者不同的语言区域。他的话语和他的群岛写作均是从关系和多重逻辑的角度来把握问题的复杂性。

通过简略的形式将写作微型化,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其目的并非意在简化,而是最大限度呈现复杂性。与此同时,作为背景的生活和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变得清晰。没有谁能更为恰到好处地再现对圣多明戈白色恐怖的野蛮镇压:“我听说:先生,您是个混蛋,是慈善家。黑人在枪决之前要接受200-300次鞭刑,每次枪决人数是50-80名。恐怖主义在1803年笼罩着殖民地。罗尚博将军就因为某位居民没能缴纳6000比索的税而将他枪决了。”(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141v)

如此一来,《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不仅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型,更形成了关于古巴岛的思维模型,更有甚者,形成了关于安的列斯群岛岛屿的思维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地质、植被分布、史学、文化理论、气候、贸易地理、全球历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方面面,还包括奴隶制和军事战略等特有的内容。这些不同方面像群岛中的各个岛屿一般,不断插入到文本中,并立即转化为多重联结的不同维度:一切都是交互的。这个微型政论文集的政治维度将政治学和政治纳入了它自身的多重联结之中。

洪堡式科学的相互关联性从科学的角度搭建了一个理解加勒比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那些想要了解古巴的人不应该只是关注古巴,而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关于圣多明戈、海地、牙买加、马提尼克、巴巴多斯、波多黎各、瓜德罗普岛、百慕大、安提瓜、库拉索岛的洞见。因此,古巴专家显然不是只关注古巴的人。洪堡已经透过文本的标题《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以极富个人特色的压缩性写作风格将这一点表露无遗。

多元逻辑意味着在关联性网络中理解加勒比海,要求能洞察到开放式结构中的各个元素之间的互动,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的不可能是关于某个特定空间的静态历史。在洪堡即将结束美洲之旅时写成的这个文本中,洪堡式科学的构架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空间的历史,而是运动的历史,将世间运动的万物以动态的方式联结起来,从岌岌可危的地质和火山到植物的迁移,以及在权力因素作用下,在以跨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框架内,变身为无所不包的利益驱使对象而被迫迁徙的人群。在洪堡的《美洲旅行日志》中,不仅地质或生态似乎岌岌可危,经济剧变也迫在眉睫。当时恰逢洪堡和邦普朗在古巴做第二次停留,圣多明戈的革命成功,洪堡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同加勒比地区的整体状况,同环加勒比的大陆海岸,包括美国的情况——在这个即将前往美国的时刻,洪堡并未忘记考察美国的人口和奴隶数量的增长情况——都有关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位于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其奴隶经济基础受到了动摇。

总的来说,《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不仅提供了一种群岛风格的写作,这个微型化文本通过多重逻辑和多重连通性,为本文探讨的加勒比地区提供了跨区域的新模式。更有甚者,在这个模型中,洪堡在接下来数十年内将继续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解的分形初现端倪。作为洪堡式科学的分形,这个模型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科学的和文学的创作,他们同当今世界提出的新挑战依然相关。

注释 [Notes]

[1] 理论景观是埃特教授在《罗兰·巴特,理论景观》(Roland Barthes. *Landschaften der Theorie*)一书中提出的批评概念,它既突出了作为整体的理论,也强调读者可以像走在景观中一样拥有移步换景式的独特体验。相关的论述还可以参见 Ottmar Ette, "Europa transarchipelisch denken. Entwürfe für eine neue Landschaft der Theorie (und Praxis)." *Lendemains*, vol. 39, no. 154-155, 2014, pp. 228-42.

[2] 关于这些阶段的问题,参见 Ottmar Ette, *TransArea: A Literary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ed by Mark W. Person. Walter de Gruyter, 2016.

- [3] 参见 Michael Zeusk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ie Sklavereien in den Amerikas und das »Tagebuch Havanna 1804«”.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ay 10, 2017, edition-humboldt.de/v1/H0012105.
- [4] 也可参见 Vera M. Kutzinski, and Ottmar Ette, “Inventories and Inventions: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Cuban Landscapes.” *Political Essay on the Island of Cuba. A Critical Edition*, by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 of Chicago P, 2011, pp. vii-xxiii.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Vol. III*.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ed index by Hanno Beck. Brockhaus, 1970.
- . *Tagebücher der Amerikanischen Reise*. May 10, 2017, 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779884841&PHYSID=PHYS_0295&DMDID=DMDLOG_0001.
- . *Isle de Cube, Antilles en général*. Edited by Ulrike Leitner, et al.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0 May 2017, edition-humboldt.de/v1/H0002922.

◇责任编辑：马妮娅

洪堡密码

——关于创建 19 世纪环球旅行者的混合数字学术版本

◎ 托比亚斯·克拉夫特

马纳克 译

内容提要: 亚历山大·冯·洪堡是普鲁士旅行家、博物学家、多产作家和来自柏林的国际科学名人。在他诞辰 250 周年之际,洪堡对人类与自然的内在依存性的理解仍然是宝贵的知识遗产,不断激发对他作品和行动的新解读。洪堡的九本手写旅行日志《美洲之旅》是这一遗产最好的例证。本文考察了这些日记手稿的购买过程及《洪堡集》系列的出版。混合(数字、印刷)版《洪堡集》为洪堡的旅行日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版本,其中包括洪堡在美国、欧亚半球的旅行日志,以及他许多未发表的论文和手稿选,大部分不为公众所知。在介绍了该版本的语料库之后,本文重点说明了《洪堡集》采用的互补编辑方式,该方式结合了读者友好型的书籍版本的优势与基于精心数据管护的数字全文和扫描版本的优势。

关键词: 亚历山大·冯·洪堡 旅游文学 数字学术版 数字人文学科 TEI-XML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12-12

作者单位: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 德国 柏林 10117

Title: The Humboldt Code: On Creating a Hybrid Digital Scholarly Edition of a 19th Century Globetrotter

Abstract: Most people know something abou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he Prussian traveler, naturalist, prolific author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celebrity from Berlin. Today, in the year of his 250th anniversary, it is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Humbold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kind and nature in its intrinsic interdependency that continues to motivate new readings of his works and actions. Humboldt's nine hand-written travel journals of his journey to the American Tropics are among the most famous testimonies to this herit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cent history of their acquisition and presents the publication series *edition humboldt*. The hybrid (digital, print) *edition humboldt* prepares critical scholarly editions of Humboldt's travel journals both to the American as well as to the Eurasian hemisphere together with a selection of Humboldt's unpublished papers and manuscripts, to the most part unknown to the public. After presenting the edition's corpus, the paper shows the ways, in which the complementary approach of *edition humboldt*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a reader-friendly book edition with those of a digital full-text and facsimile edition based on a carefully curated data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ravel literature, digital scholarly editions, digital humanities, TEI-XML

Author: Tobias Kraft,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erlin, German.

大多数人对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有所了解,他是普鲁士旅行家、博物学家、多产作家以及来自柏林的国际科学名人。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无论是 1804 年穿越美洲之后的那些年,还是 1827 年后的柏林岁月,这一年他有名的“宇宙讲座”大大促进了公众对科学是城市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的认识^[1]。即便到了今天,这些称呼仍是正确的。随着一直以来的洪堡复兴,到 2019 年,在他诞辰 250 周年之际,德国和世界各地的学院、大学、博物馆、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都在纪念他和他的作品。人们称他为“全球主义的幻想家”^[2]，“一个痴迷的网络人,一个胆大妄为的营销天才”^[3]、德国和拉丁美洲文化遗产的共同象征^[4]。

作为德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洪堡作品在文化政治领域受到热捧也得益于 2019—2020 年柏林洪堡论坛开幕式的高度推动,该论坛预计将在“文化对话”原则的指导下,秉着洪堡的兄弟威廉和亚历山大的精神进行。

一、“洪堡美洲旅行日志”的购买

这些日记是洪堡理解科学与世界、人类与自然的内在相互依存性的知识遗产,并将继续激发对他的作品和行为的新解读。“洪堡美洲旅行日志”就是这一遗产最著名的见证之一。2013 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SBB)受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委托,为公共部门收购了九本宝贵的日记。在德国联邦国家文化基金会的组织协调下,公众和众多私人捐助者组成的财团负责资金筹措。七位数的价格,让洪堡的旅行笔记从私人拥有的文化对象转变为德国文化遗产的伟大见证^[5]。报纸对这场“世纪之击”(伍尔夫)赞不绝口。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规定了共同出资购买的一个前提:皮革包裹的九卷手稿将被完全数字化并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还包括已经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克拉科夫的洪堡大量论文和手稿。柏林承担了手稿的修复、数字化和数字索引的工作,并在元数据目录卡里奥佩(Kalliope)和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中提供了数千个新条目^[6]。2014 年,波茨坦大学开始了一项关于旅行日志的“谱系、年代学和认识论”的重大研究项目,并已于 2017 年结项^[7]。

二、《洪堡集》与洪堡手稿的未来之旅

文化艺术品“洪堡的美国旅行日志”的图像和元数据数字化现已完成。这些文件的数字版本在开放许可证(CC BY-NC-SA 3.0)^[8]下可供全世界使用。然而,这只是将来洪堡手稿遗产数字化利用的第一步。接下来,手稿本身的索引——随笔、反思和旅行记录、笔记、表格和测量数据,最后是草图和图纸——才刚刚开始。2015 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BBAW)的研究项目“旅行的洪堡——移动中的科学”(AvH-R)^[9]已开始着手这项任务。与德国学院联盟发起的所有长期研究项目一样^[10],AvH-R 有足够的时间来精心开展这项庞杂

的工作。位于御林广场的学院办公室的柏林研究人员和数字人文主义者团队将对手稿进行总计 18 年（2015—2032）的研究。

AvH-R 的概念框架和总体研究课题由术语“旅程”（journey）来界定，它既是理论概念，也是科学实践和具体的历史参考。更准确地说，“旅程”指的是对洪堡作品的各种层次的阅读和解释，因此可以理解为：

a) 一个洪堡经验科学模型的关键词，“在看到物体的时候”（a la vue meme des objets）（Humboldt and Bonpland, *Essai VII*）；

b) 一个洪堡知识传记中主要部分的时间顺序框架；

c) 一个认识论密码，用于对“移动中”（on the move）的研究和写作（Ette, “Dem” 8-13）；

d) 一个参考点，用于举例说明洪堡学术产出中的手稿、叙事和研究之间复杂的互文和中间关系；

e) 一个文化历史同义词，用于在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自然和文化的研究实践，其核心是经验主义、田野研究和可靠的测量技术（Michael Dettelbach）。

自项目开始以来，AvH-R 一直专注于准备并不断精心制作以《洪堡集》为题的系列混合学术版。它一开始就在重新思考学术出版领域中界定数字出版物的可能性、限制和方式的框架。混合意味着将制作共 16 卷的印刷版（《洪堡集》印刷版）和转录和批评评论手稿的在线版（《洪堡集》数字版）。

该版本的语料库包括美洲旅行日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航行日记（1829 年），共 12 册手稿，其中有 2500 多个手写作品集将被解读。该项目团队的重要学术工作和研究活动涵盖了旅行日志周边的通信和文件，大量未发表的洪堡手稿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来自柏林国家图书馆和克拉科夫的亚戈龙斯克图书馆，大多数是第一次编辑。该版本的语料库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文本形式，从手写笔记和工作文件到文学和科学论文、航船厨房证明、图纸和草图、备忘录、阅读摘录，以及关于“洪堡科学”的广阔知识范围的通信信件^[11]。它们不仅是一个人的知识传记的见证，而且也为 19 世纪现代欧洲科学和认知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深刻的洞察。洪堡的多方面文件与科学史、文学和文化、地球和生物科学、地理和人类学，以及标本发现的历史数据记录和历史经济与气候影响研究测量领域有关。

三、语料库第一部分：美洲旅行日志

由于其名气和内容，洪堡的“美洲旅行日志”可以被认为是《洪堡集》的焦点。它涵盖了洪堡美洲探险所有阶段（1799 年 5 月 6 日—1804 年 3 月 8 日）的记录，其中包括在新格拉纳达的西班牙裔美洲总督王国、秘鲁和新西班牙，古巴的蔗糖和咖啡岛，以及美国等地的停留。此外，还有 1799 年之前的旅行记录（例如去德累斯顿、维也纳、萨尔茨堡）及他返回后的大约 1805 年前往罗马的旅行记录。

稍微浏览手稿就会发现通用术语“旅程”(travel journey)并不能充分描述这些著名的手稿。有时,文本按照探险行程的时间顺序排列。然而,更多时候是放弃、重写、更正、补充和扩展,频繁通过索引和交叉引用来尝试创建顺序,但往往失败的,不仅在探险期间,而且在五十年之后直到我们今天所知的日记的最终成形版本都是如此(Erdmann, Weber 67)。框架的独特性表明,日记不仅仅是洪堡的笔记本,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他写作的重要试验场。它们是洪堡的交叉研究和知识的科学模型范式,这些模型在日记本身的功能差异中已经很明显,将“诸如研究书籍、测量图表、速写本、日志、旅行和政治日记”等多种功能联合起来(Lenz 80, transl. TK)。

不同于洪堡的其他作品,它们代表着洪堡思想的活力,艾特(Ottmar Ette)为此创造了“移动中的科学”的概念,并成了AvH-R项目名称。

“在洪堡的旅行日志中,一切都在移动——从亚洲移民而来的土著文化、从欧洲入侵美洲的伊比利亚征服者、从非洲被绑架来的奴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冒险的船长和水手、定居在美洲丛林中的欧洲动物、长期以来在欧洲种植的美洲农作物[……]美洲旅行日志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意识视角,一个早已连接并继续连接的世界意识,一个用移动或移动中才能被充分理解的世界”(Ette, “Wissen” 22, transl. T.K.)。

四、旅行日志比较

尽管他很少将自己与物品或手稿捆绑在一起,但洪堡在1853年写给天文学家恩克(Johann Franz Encke)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拥有6—8个大本旅行日志(由我在现场亲手写成),包含数千个数字,其中一些未发表。我不能决定是否要烧毁它们,它们是勤奋工作和美好意愿的记忆。”(Humboldt and Encke 436, transl. T. K.)。

洪堡知道他日记的认知、象征和个人价值。他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来发表他的两次半球航行的成果,从1805—1807年的《论植物的地理位置》(*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开始,到1843年的2卷本《中央亚细亚》(*Asie centrale*)结束。洪堡的美洲和俄罗斯—西伯利亚日记构成了这个里程碑式创作中的连接元素。

早在洪堡广受欢迎的热带风景读物《大自然的肖像》(*Ansichten der Natur*)的第一版和其著名的三卷本旅行叙事《历史记载》(*Relation historique*)中,就有很多素材直接来自“美洲旅行日志”,这也是作者自己经常喜欢向读者指出的背景细节。

整个旅行途中,从圣费尔南多到内格罗河畔圣卡洛斯(委内瑞拉)再到玻利瓦尔城,我迫使自己逐日记录那些在我看来值得一记的事,不论是在船上颠簸,或是风餐露宿。一路上暴雨如注,多得惊人的蚊虫在奥里诺科河和卡西基亚雷运河河岸成群肆虐,这些遭遇令我的记录工作连连受挫。我只好延后尽快补上记录。接下来

的篇章便是节选自我的日志。一切都以众人所见的角度描写，再渺小的事物因其真实（我几乎敢说是其独一无二的特性）都能引人入胜。为避免无意义的赘述，偶尔我在日志里加入了一些自己对先前描述过的事物所产生的想法。百川奔腾穿越崇山峻岭，大自然越是显得威严无比，人越是要在画板上留下其简约纯粹的主要风貌，有时仅仅只是寥寥数笔草图。（Humboldt and Bonpland, *Voyage* 211-12）^[12]

事实上，洪堡的旅行日志遍布他的美洲作品：他旅行期间收集的美洲天文地理定位和气压高度测量数据以及他的仪器描述都可以在《天文观测集》（*Recueil d'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中找到。在他的关于美洲景观地图集和中美洲文化的名作《科迪雷斯的景色》（*Vues des Cordillères*）中，以及他关于墨西哥的政治地理学，《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论文》（*Essai 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Espagne*）一书中主要是洪堡从他大量的日记条目中整理和转化而来的关于民族和社会经济的观察与判断。

同理，他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日记亦是如此。这些日记构成了两卷本《亚洲片段》（*Fragmens asiatiques*）的基础，从俄罗斯—西伯利亚探险返回仅三年后，洪堡就匆匆出版了这本书。十多年后，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央亚细亚》，这是他在亚洲地理、气候学和地球磁学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其中俄罗斯—西伯利亚旅行日志是主要素材来源（Honigmann 74-76）。在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大量论文手稿（Humboldt, *Notizen*）显示，洪堡为旅行同伴普鲁士地理学家和矿物学家罗斯（Gustav Rose）详细摘录了自己的旅行日志。摘录大概发生在1836年，为罗斯的关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航行的报告提供了有用的数据（Rose）。

甚至除美洲和亚洲的旅行作品之外，洪堡的日记也出现在他的印刷作品中，即《较小的字体》（*Kleinere Schriften*）及所有五卷的《宇宙》（*Cosmos*），这其中就有火山作用、天文观测或化学实验的摘录（Faak 25-27）。

美洲和俄罗斯—西伯利亚日记之间的第二个平行点触及它们向洪堡的文本读者呈现的作为对象的存在。洪堡会定期使用他的日记从审美的视角管理他的读者期望，表明他即将在印刷文本中引用他日记里的措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被证明是“文学假动作”（Suckow 8）。洪堡认为他的日记有助于他已发表作品的论证，因为提及（假设的）自我引用使他能够指出下一段的真实内容，并顺便回忆一下旅程中的冒险事件。作为已发表文本的基本事实，日记的频繁使用也表明旅行手稿本身已经发展成一种媒介存在。

除了相似之处外，还必须讨论两套旅行日志之间的明显差异。他们就像他们见证的旅程一样有着明显不同（Ette, “Alexander” 21-23）。1796年母亲伊丽莎白去世后，洪堡继承了遗产，以他自己的资金资助了“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洪堡通过美洲热带地区的行程仅仅遵循他的个人和科学意图，包括整个旅程的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不是线性的或有计划的（Leitner 281-302）。

五、语料库第二部分：俄罗斯—西伯利亚旅行日志

三十年后对他的旅行我们也不可以说：《俄罗斯—西伯利亚旅程》（1829 年 4 月 12 日至 12 月 28 日）是由尼古拉斯一世的资助和控制下进行的。旅行许可伴随着不可用书面形式批评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统治的责任。旅行期间，洪堡经常受到官方公共接待的仪轨约束，并且由于他自己的工作日程，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来灵活的做出旅行安排或情境变化。旅程本身遵循严格的时间表，给定路线上几乎没有留下迂回的时间和路线空间。在八个月内至少走了 19,000 公里，从柏林经过柯尼斯堡、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和彼尔姆，穿过乌拉尔和阿尔泰山脉到达中国边境，从那里他独自一人通过米斯克斯、奥伦堡和里海的阿斯特拉罕，最后再次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返回柏林（52）。洪堡的回旋余地也因分工的细化而受到限制，原来计划与他同行的矿物学家罗斯及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应该在旅行中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并撰写旅程报告。

由于这些原因，日记的主题就窄多了，洪堡选择的标题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1. “1829 年西伯利亚旅行日志片段”；
2. “西伯利亚之旅期间的天文观测”；
3. “地磁观测”。

虽然《片段》主要是各个旅行站点的注释和综合研究数据，包括经济学、地理学、人种学和政治学的简短条目，以及行程和各种旅行遭遇，《天文观测》（第 2 卷）基本上包含了来自第 1 卷的摘录，主要是天文和地磁测量系列和转换。最后，第 3 卷主要致力于地磁研究，并对较长时期（1806—1836）的几个欧洲城市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比较。第 2 卷和第 3 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制作，因为洪堡的笔记和数据应他的要求，先由他的助手奥尔特曼（Jabbo Oltmann），再由柏林天文台主任、洪堡的朋友兼同事弗兰兹（Johann Franz Encke）重新计算和审核（Honigmann 73）。

六、语料库第三部分：主要议题

除了洪堡旅行日志的双重语料库之外，学术混合版系列《洪堡集》还准备了一系列精心挑选的手稿、未发表的论文，以及与洪堡科学研究课题相关的信函。该系列分五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植物地理和生物科学”关注洪堡的生物科学研究，主要是他的植物地理学记录、研究和通信。与该主题相关文献的学术版在 2017—2019 年 20 年间出了多个版本，作为《洪堡集数字版》（*Edition Humboldt Digital*）的一部分，目前正在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行印刷版。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文件显示了洪堡计划第二次修订他的名著《论植物的地理位置》，洪堡希望在 19 世纪 20 年代完成。该卷的编辑凯斯勒（Ulrich Päßler）写道：“该学科的工作是洪堡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它们包含了对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算法、景观类型、植物迁移条

件及植物气候条件适应的反思。”(Päßler, “Dokumente” web)

第二个主题“科学旅行”集中于记录和用于规划的信件、执行和评估他自己的研究进程,以及对其他探险家的支持,如斯雷汀特维特兄弟(Schlagintweit brothers)、马提乌斯(Carl Philipp Martius)和巴乌萨(Felipe Bauzá)。

第三个主题“地球科学”侧重于发表关于他的政治地理写作的初步研究,以及关于地质学和矿物学、自然地理学和古生物学问题的信件选。

第四个专题重点涉及天文学、制图学、计量学、测量仪器和洪堡的发现史研究;也就是与理解他的晚期作品《批评研究》和《宇宙》有很大关系的文本。

最后的第五个主题集中在洪堡的人类学和文化历史研究上。为此,该项目将评估和编辑洪堡研究全球行星意识史、北美洲和中美洲语言和文化历史、美洲古代考古学,土著人民的迁徙和文化史及奴隶制等主题。

七、数据建模与混合数字学术编辑

《洪堡集》的语料库以XML(可扩展标记语言)编码,XML是一种灵活的标记语言,是一种开放且独立于平台的电子标准,特别适用于文本和文本数据的长期可用性和归档。此外,一个特定的XML标准(TEI-XML P5)已经在数字学术编辑中普遍运用,国际联盟TEI(文本编码规范)负责这些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TEI一直在为各种文本和文档类型的结构和语义标记开发统一的程序。TEI-XML由世界各地的文本学者创建和使用,不仅可以正确捕获任何类型文本中的字符序列,还可以在相同数据集里整合文本结构、文本现象和上下文信息(Schöch 332-37)。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机器可读标记语言之一,TEI-XML非常适合数据交换和后期使用(互操作性),并且由于其结构简单,也相对容易检查统一标记。

对结构进行简单的形式验证(通过XML),同时统一标记方式(通过TEI),为人文学项目构建可靠的文本和文本数据提供了很高的方法上的一致性。这使得《洪堡集数字版》等项目不仅可以作为单独版本被理解和使用,而且还可作为日益全球化的数字版本语料库的一部分,具有形式上和方法上的可比较标准。在单个文档的层面上,TEI-XML标记允许记录文本批判分析和情境化评论文本,以及构成的所有相关方面,并将其作为代码记录和存储在单个文档中。这种信息的可视化可以产生各种输出格式,以《洪堡集》为例,有一种可下载的XML源代码,一种HTML在线版本和一种印刷版本。按照AvH-R的概念,所有三种输出格式都是同一版本的补充。

《洪堡集》(印刷版)

《洪堡集》的印刷版明确强调易读性和连贯性。重点是文本连续性和编辑们的批评性评论,而不是所有单个文本现象的文献学细节记录。例如,《美洲旅行日志》的文本形式和话语顺序的

复杂性也意味着印刷版试图重构特定的文本顺序和年表。由于重构日记的时间顺序而产生的所有省略和文本连接将在印刷版中以符号标记，并可参阅在线版的完整文本。将读者文本（印刷）和批判性研究文本（在线）的相关联的方法类似地也适用于主题语料库的文本选择（参见“语料库第三部分”）。印刷版的突出特点并不是手稿和通信的完整性，而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展示个别文件和信件，并辅之以特定研究领域专家的研究贡献，对手头新编辑的内容进行了评论。

《洪堡集》（在线）

虽然印刷版主要针对洪堡感兴趣，希望进行线性阅读和集中文本研究的普通大众，但在线版本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工具，针对文本文献学批评和数据处理的需求进行了优化。《洪堡集数字版》通过以下指导原则实现这一目标：

1) 《洪堡集数字版》可以在线免费获得，没有访问限制。该版本的多个数据集不仅因其具有形式性（TEI-XML代码）可以转移到其他结构化数据集，而且还因其明确的知识共享许可（CC BY-SA 4.0），为实现开放访问和开放科学的目标，能在后续使用的不同场景中进一步适应研究的需要^[13]。

2) 该版本的材料呈现非常灵活：在线界面允许查看文本转录和扫描件，以及针对在线阅读优化的文本视图，还可以随时切换文本的不同演示文稿视图。扫描件和文本转录以页面精度相互链接，从而使文本的可读性优先于尽可能全面地模仿原稿的确切字体。因此，在理念上，该版本遵循面向文本而非面向文档的编码原则。

3) 《洪堡集数字版》使用现有的洪堡研究资源，并将其视为数据展示和整合平台。这首先包括（先前印刷的）名称索引数据和（以前用作HTML的）时间表研究数据的整合。为了建立地点、人员和机构名称索引的建立，1973年至2016年间出版的洪堡研究的25个印刷版的索引全部整合到新版本的数据库中（图1）。



▲图1 使用人员条目示例的逆向数字化示意图

4) 网络版以不断累积的方式运行,并将其自身视为半成品出版物。印刷版的出版主要标志着整个编辑项目的各个部分的完成,但添加到在线版本的每个新文本或数据集都整合到已有数字数据和参考系统网络中。数字版本的每次更新都会创建该版本的 XML 数据库的全新完整版本。根据 FAIR 数据原则(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版本的所有先前版本会以网站和可下载的 XML 文件的形式始终可以在线获取。每个文档的版本历史记录通过永久链接列表来处理,包括视觉标记,以防对手头的特定文档进行更改。因此,数据集一旦创建就不会丢失,而是会进行版本控制,归档,从而可以长期使用。作为数据和文本资源,数字版本的各个部分通过永久链接可供永久参考。

采用互补方式编辑的《洪堡集》,将对读者友好的印刷版本的优势与基于精心数据管护的数字全文和扫描版本的优势相结合。除了较长文本的集中研究优势之外,在线版还提供了互补的技术和方法框架,为研究洪堡的工作和长期研究活动提供了学术上可靠的保障。此外,数字出版物使洪堡的作品可超出文本层面的作用,成为可重复使用的数据集。因此,《洪堡集》的编辑方式不仅确保了洪堡的两次大型半球探险日记首次完整出版,而且还提供了从未所特有的丰富的柏林和克拉科夫的洪堡论文和相关论文的档案。柏林—勃兰登科学与人文学院的洪堡研究为这项努力打开了新视野——无论是印刷还是数字形式。

注释 [Notes]

- [1] 最新的研究和努力为洪堡的这些著名公共讲座的内容和范围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础,带来了新的视角,参见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Henriette Kohlrausch, *Die Kosmos-Vorlesung an der Berliner Sing-Akademie*.
- [2] 参见 avhumboldt250.de/en/.
- [3] 参见 humboldt-heute.de/en/stories/the-humboldt-code.
- [4] 参见 humboldtylasamericas.org 和 twitter.com/hashtag/humboldtylasamericas.
- [5] “融资联盟”的细节参见 www.kulturstiftung.de/der-stiftung-preussischer-kulturbesitz/.
- [6] 有关该项目的一般性介绍,包括首次遇到大量材料时可访问的资源,参见 humboldt.staatsbibliothek-berlin.de/?lang=en.
- [7] 对于本组的研究结果和活动参见 www.uni-potsdam.de/humboldtart/.
- [8] CC BY-NC-SA 3.0 表示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License. 细节参见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deed.en.
- [9] 该项目原来的德文标题是“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 Reisen - Wissenschaft aus der Bewegung.”
- [10] AvH-R 是德国科学院和人文学院联盟学院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目前支持旗下的八个学院的在德国 196 个地点的 140 个长期基础研究项目,主要是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参见 www.akademienunion.de/en/research/the-academies-programme/ 和 agate.academy/diagrams-visualizations.html#c61.
- [11] “洪堡科学”(Humboldtian Science)一词由费伊(Susan Faye Cannon)首次采用,并一直被国际研究团体用于研究洪堡遗产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科学史。这个术语后来被仔细审查以获得更高的精确度(Dettelbach 287-304),并且最近在理论上扩展到用于表达连接亚历山大和威廉两兄弟的知识遗产的概念矩阵(Ette, “Languages about Languages” 47-62)。
- [12] “从圣费尔南多到内格罗河畔的圣卡洛斯,再到安哥斯特拉镇,整个航程中我迫使自己每天写作,有时在船上,有时在我们晚上下船的地方,写一些我觉得值得观察的现象。暴雨、以及奥里诺科河和卡西基亚雷河两岸空气

中充满的大量的蚊子，偶尔这个工作也会中断，几天后我会用笔记补好。以下页面是我日记的摘录。无论我们所描述的物体是什么，这些物体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具有一种真理的性质。我几乎都谈到了个性，它让最不重要的事物也有了吸引力。”（Humboldt and Bonpland, *Personal Narrative* 418-19）。

[13] CC BY-SA 4.0 表示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ShareAlike 4.0-License. 详情参见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en.

[14] 参见 edition-humboldt.de/register/index.xql?l=en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annon, Susan Faye. *Science in Culture: The Early Victorian Period*. Dawson, 1978.
- Dettelbach, Michael. "Humboldtian Science."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ited by Nicholas Jardine, et al., Cambridge UP, 1996, pp. 287-304.
- Erdmann, Dominik, and Jutta Weber. "Nachlassgeschichten: Bemerkungen zu Humboldt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in der Berliner Staatsbibliothek und der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Krakau."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Humboldt-Studien*, XVI, no. 31, 2015, pp. 58-77. doi:10.18443/223.
- Ette, Ottma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Briefe aus Russland - Wissenschaft im Zeichen ihres Erlebens." *Briefe aus Russland 1829*, edited by Eberhard Knobloch, et al., Akademie Verlag, 2009, pp. 13-36. Beiträge zur Alexander-von-Humboldt-Forschung 30.
- . "Wissen aus der Bewegung: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merikanische Reisetagebücher kommen in die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Arsprototo - Das Magazin der Kulturstiftung der Länder*, no. 1, 2014, pp. 20-27.
- . "Dem Leben auf der Spur: Das Akademievorhab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uf Reisen - Wissenschaft aus der Bewegung« ediert Humboldts transdisziplinäre Aufzeichnungen." *Die Akademie am Gendarmenmarkt*, 2015 / 2016, 2015, pp. 8-13.
- . "Languages about Languages: Two Brothers and One Humboldtian Science."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Humboldt-Studien*, vol. 19, no. 36, 2018, pp. 47-62. doi:10.18443/270.
- Faak, Margot. "Einleitung." *Lateinamerika am Vorabend der Unabhängigkeitsrevolution: Eine Anthologie von Impressionen und Urteilen aus seinen Reisetagebüchern*. 2nd, revised edition, Akademie Verlag, 2003, pp. 21-50. Beiträge zur Alexander-von-Humboldt-Forschung 5.
- Honigmann, Pet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Journale seiner russisch-sibirischen Reise 1829."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Humboldt-Studien*, vol. 15, no. 28, 2014, pp. 68-77. doi:10.18443/192.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Notizen sehr mannigfachen Inhalts*. 161 Bl., □1836□,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Handschriftenabteilung, Nachl. Alexander von Humboldt, gr. Kasten 4, Nr. 50a, Bl. 1-157. [kalliope-verbund.info / DE-611- HS- 1023603](http://kalliope-verbund.info/DE-611-HS-1023603).
- . *Briefe aus Russland 1829*. Edited by Eberhard Knobloch, et al., Akademie Verlag, 2009. Beiträge zur Alexander-von-Humboldt-Forschung 30.
- .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Edited by Ulrich Päßler, J. B. Metzler, 2019. *Edition Humboldt* print, III.1.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nd Aimé Bonpland. *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 accompagné d'un tableau physique des régions équinoxiales: Fondé sur des mesures exécutées, depuis le dixième degré de latitude boréale jusqu'au dixième degré de latitude australe, pendant les années 1799, 1800 1801, 1802 et 1803*. Avec un planche, Schoell, Cotta, 1805. Voyage de Humboldt et Bonpland Partie 5.
- .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During the Years 1799-1804: With Maps, Plans & c., Written in French by Alexander de Humboldt,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Helen Maria Williams*. Vol. IV,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9. 7 vols.
- . *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fait en 1799, 1800, 1801, 1802, 1803 et 1804. Relation Historique. Tome second.*, J. Smith et Gide Fils, 1819□-1821□. 3 vols. Voyage de Humboldt et Bonpland, Première Partie.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nd Johann Franz Encke. *Briefwechsel*. Edited by Oliver Schwarz and Ingo Schwarz. Akademie Verlag, 2013. Beiträge zur Alexander-von-Humboldt-Forschung 37.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and Henriette Kohlrausch. *Die Kosmos-Vorlesung an der Berliner Sing-Akademie*. Edited by Christian Kassung and Christian Thomas. Insel Verlag, 2019. insel taschenbuch 4719.
- Leitner, Ulrike. "Abreisen und Ankommen." *Literatur leben: Festschrift für Ottmar Ette*, edited by Albrecht Buschmann, et al., Vervuert-Iberoamericana, 2016, pp. 281-302.
- Lenz, Markus Alexander. "Bewegte Systematik.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Amerikanische Reisetagebücher“ als Problemfelder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und historischen Epistemologie." *HiN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Humboldt-Studien*, vol. 16, no. 31, 2015, pp. 78-104. doi:10.18443/224.
- Michael Dettelbach. "The Face of Nature: Precise Measurement, Mapping, and Sensibility in the Work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30, no. 4, 1999, pp. 473-504. doi:10.1016/S1369-8486(99)00011-4.
- Päßler, Ulrich. "Dokumente zur Neuausgabe der Ideen zu einer Geographie der Pflanzen: Einführung."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7, edition-humboldt.de / v4/H0016420.
- . "Themenschwerpunkt Pflanzengeographie und Biowissenschaften."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7-2019, edition-humboldt.de / X0000002.
- Rebok, Sandra. "Humboldt-Ausstellungen." *Alexander von Humboldt-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edited by Ottmar Ette, J. B. Metzler, 2018, pp. 285-89.
- Rose, Gustav. *Mineralogisch-geognostische Reise nach dem Ural, dem Altai und dem Kaspischen Meere*. Mit Kupfern, Karten und Holzschnitten, Sander, 1837. 2 vols. Erster Band. Reise nach dem nördlichen Ural und dem Altai.
- Schöch, Christof. "Ein digitales Textformat für die Literaturwissenschaften: Die Richtlinien der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und ihr Einsatz bei Textkonstitution und Textanalyse." *Romanische Studien*, vol. 2, no. 4, 2016, pp. 325-64. www.romanischestudien.de / index.php/ rst/ article/ view/ 58.
- Schwarz, Ingo, editor.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hronologie: Basierend au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hronologische Übersicht über wichtige Daten seines Lebens. Bearbeitet von Kurt-R. Biermann, Ilse Jahn und Fritz G. Lange'." *Edition humboldt Digital*, edited by Ottmar Ett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nce 2016, edition-humboldt.de / X0000001.
- Suckow, Christian. *Ein vergessenes Konvolut: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Fragmente des Sibirischen Reise-Journals 1829."*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Berliner Manuskripte zur Alexander-von-Humboldt-Forschung 33.
- Wulff, Matthias. "Ein Jahrhundertcoup: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Reisetagebücher werden der Öffentlichkeit gezeigt." *Die Welt kompakt*, 5 Mar. 2014, Online Edition, www.welt.de / print/ welt_kompakt/ berlin/ article125437593/ Ein-Jahrhundertcoup.html.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犹太文化研究

犹太—基督宗教强烈的道德意识自何而来？

◎ 阮炜

内容提要：为何犹太—基督宗教的道德意识具有比古希腊罗马众多宗教和“哲学”明显更为强烈的道德意识？本文试图从比较宗教和比较文明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认为古代犹太人独特的一神论信仰固然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但也有文明、人口和社会—宗教方面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以色列先知激烈的道德规劝和社会抗议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从根本上决定犹太—基督宗教的一神论信仰和强烈道德意识的因素，还得到古以色列人所在的地理—自然环境中去寻找。

关键词：犹太—基督宗教 道德意识 古以色列人 地理—自然环境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19）03-0024-1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Where Does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s Powerful Moral Consciousness Come from?

Abstract: Why does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 have such a mor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conspicuously more powerful than that of the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which had prevailed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arguing that, although the unique monotheistic faith of the ancient Jews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actor, there can be found for it civilizational, demographic and socio-religious explanations. Apart from these, the vehement moral exhortations and social protests of the Israeli prophets also played a key role. Yet, the ultimate cause that determined the monotheistic faith and the powerful mo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ancient Israelis were in.

Keywords: Judeo-Christian, Moral Consciousness, ancient Israelis, natural environment

Author: Wei Ruan,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在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持续发展之后,及至西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轴心时代”及稍后几个世纪,各大文明区域不约而同出现了蔚为大观的理性化运动。如我们所知,理性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种比先前强烈得多的道德意识的兴起,而这一现象又无不与西亚地中海世界、华夏和南亚诸文明中“高级宗教”^[1]的兴起紧密相联。这里的问题是:为何比之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犹太—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维度明显更为宏大深厚?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得犹太—基督宗教的道德意识明显更强?

一、唯一神信仰与既有精神形态比较

首先可能得到犹太—基督宗教的核心信仰即唯一神信仰(赫塔多140-45)^[2]中寻找原因。没有这种信仰,犹太—基督宗教强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激情绝非可能,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那么何为唯一神信仰?此问题看似简单,似乎不值得问,不值得答,但要有个透彻的理解,须将先前盛行已久的宗教与之作个对比。如我们所知,希腊罗马旧世界神灵泛滥,数不胜数。不仅如此,希腊罗马诸神还有凡人常见的毛病如卑鄙小气、恣意妄为,甚至嗜杀成性;人神之间并无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不仅祭司、占卜师等可以是人神中保,某些神或“精灵”也可充当神人中介。柏拉图就认为,“精灵往来于天地之间,传递和解释消息,把我们的崇拜和祈祷送上天,把天上的应答和诫命传到地上[……]他们沟通天地,把整个乾坤联为一体,成为预言、祭仪、咒语、占卜和算命的媒介”(203A)。事实上,在旧宗教、旧文明中,神圣与世俗并非截然两分:保卫城邦功勋卓著者、奥林匹亚赛会冠军等杰出个人可以荣升为神;反过来看,诸神虽然高踞奥林帕斯山,却能随时下到凡界,甚至现身于公民大会或议事会。

凡此种种,全然不同于唯一神信仰。历史地看,严格的唯一神信仰是在“巴比伦之囚”结束,犹太人重返家园之后才最终成型的,至西元纪年开始后,犹太人“以一种似乎远远超越希腊罗马世界先前任何所知的强烈和团结一致,展示了对上帝主权和独一无二性的关切”(赫塔多156)。耶和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唯一的神,他至大至上,超越时间空间,是宇宙万物的究极原因和最终归宿(Berger 115)。他虽然要求献祭,却不像旧宗教的神祇那样倚赖献祭。更重要的是,他完全不受占卜或巫术的影响。与希腊罗马拈花惹草的宙斯/朱庇特不同的是,他竟然没有伴侣或配偶!他甚至在独自孤寂中创造了世界万物!这又与苏美尔、巴比伦、印度和希腊罗马诸神在创世活动中的男欢女爱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向以色列人提出了具体而极严苛的道德要求(114-16):除了信奉独一无二的上帝,还必须孝敬父母,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偷盗,不得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得贪恋他人房屋、妻子、奴婢、牛驴等(《出埃及记》20:1-17;《利未记》19:1-37)^[3]。这又与道德意识薄弱,不知自律和羞耻为何物的希腊诸神根本不同。

也应看到,“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太人严格的唯一神信仰和强烈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转向”时代及之后的希腊哲学也不大相同。所谓“哲学”只是一小撮“爱智者”、智术师或道德家的手中玩物,跟大众了无干系,而唯一神信仰是一些很容易普及到大众中的精神信念和行为原则,

不仅体现在人人所信奉的教义和戒律中，也体现在人人所亲身实践的社会生活中。这意味着，犹太—基督宗教式的理性化路径与纯粹“哲学”式的理性化路径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采用犹太—基督宗教式的理性化方略，不会出现希腊罗马社会常见的精英与群众的对立，而希腊罗马社会之所以没能实现深度社会整合和有效政治统一，精英脱离群众负有极大责任。既然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蒙享理性化运动（这里主要指苏格拉底式的“伦理转向”）的阳光雨露，大多数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水平何以得到提升？

从长久维系共同体生命于不坠的角度看，唯一神信仰比之希腊罗马旧宗教及哲学，显然是一种更有效的精神样式。但与其说严格唯一神信仰是古以色列人的发明，不如说是特殊地缘自然条件下理性化运动的产物。各大文明早期历史上都发生过诸多的神祇逐渐减少为几个主要神祇，甚至出现了向一神教转型的趋势。例如在华夏世界，殷商时就开出了至高至大的“上帝”，东周时代仍有至高无上人格化的“天”；同样地，印度早期历史上也有过众多的自然神，如太阳神苏里亚、雷神因陀罗、暴风神摩鲁特等，只有因陀罗最终从众多神祇中脱颖而出，成为主神（姚卫群 20-21）；即使在神祇多如牛毛的古风时代希腊，也出现了向唯一神信仰演进的趋势。赫西俄德《神谱》中尽管神祇众多，但只有宙斯是众神之父，而“哲学”兴起后更有了被柏拉图包装成“理念”的唯一神。

二、新宗教之道德意识与旧宗教及哲学比较

因了严格的唯一神信仰，犹太—基督宗教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意识。为了更好认识这一点，不妨先看看之前希腊罗马世界的情形。由于散裂的地缘格局和航海生活方式，晚至前5世纪，希腊世界依然盛行重祭祀轻道德的旧宗教，这包括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诸神祭礼和秘仪。由于旧宗教中的怪力乱神太多，原本并非突显的道德元素被压抑或处于未开发状态，希腊社会因而精神品质低下，长期处于精神饥渴状态。此时希腊神祇众多，但无论旧神新神，还是从域外引进之神，在生死的大问题上统统不能给人提供慰藉，而阴森泥泞的冥府更使人沮丧和恐惧（Price 159-60）。罗马宗教的表现比希腊宗教更加糟糕。如所周知，罗马帝国很大程度是以传统诸神崇拜宗教来维系的；为讨好民众，统治者往往公开处决犯人，方式竟可以是在竞技场举行祭拜仪式后让猛兽撕碎犯人，或将其钉十字架或烧死，而被处决者往往是拒绝礼拜国家诸神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塔西陀 15: 44；克莱门 24）。

更严重的是，希腊罗马旧宗教无信仰、无信条、无戒律可言，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处在十分边缘的位置，而恰当的仪式或祭祀程序却至为重要，甚至被视为在战争中取胜的关键。这与犹太—基督宗教相比，何止天壤！不仅如此，旧宗教的祭祀还总是与特定期待相勾连，祭拜某一神祇即祈求他或她帮助祭拜者实现某一愿望，若所祈求者未能应验，就被认为不灵，可对之责骂羞辱，并以不再祭拜相威胁。这就不啻是跟神祇讨价还价做生意。如此这般，怎么可能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伦理道德方面，希腊罗马哲学表现如何呢？当然优于旧宗教。希腊哲人中虽然早就出现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道德觉醒，但哲学的智识追求毕竟太强，其道德自觉太弱，这多少解释了为何希腊罗马哲学没有能成犹太—基督宗教那样的大气候。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作为古典伦理学说集大成者，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到希腊人所有美德，如“勇敢”“公正”“自制”“智慧”之主要美德与“慷慨”“温和”“诚实”“友善”“有耻”等次要美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1181a；《优台谟伦理学》1220b·35-1221a·15），可谓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却唯独没有提“仁爱”，而“仁爱”作为一种美德，在同时期重要的伦理宗教中，无不位于所有美德之首。

希腊罗马宗教和哲学既然有缺陷，这对犹太—基督宗教便是发展的机会，最后竟使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皈依了基督教。因为，虽然不能摆脱贫穷、饥寒、病痛的磨难与死亡的威胁，但永恒大能的神终究会眷顾基督徒的，甚至派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被钉十字架死去以赎救世人，使其最终能来到神的国度，永远与神在一起。因为神的国度就是天国，一个没有苦难和死亡，而只有无尽福乐的永生之地。如此这般，人世间的苦难死亡就不再可怕了。更重要的是，比之希腊罗马宗教和哲学，犹太—基督宗教有积极的灵性生活和高迈的道德诉求，因为它有信仰、有信条、有教义、有戒律。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宗教强调公义、仁慈，是一种不仅针对精英，更诉诸普罗大众的精神样式。

这就解释了为何面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旧宗教及哲学，基督教教会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使西亚地中海世界的个人、部落乃至民族统统皈依，甚至使延续一千余年的古典文明转型成一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全新文明。尤需注意的是，基督教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其明确的伦理道德诉求，满足了人心深处的灵性之需，也在于它前所未有的严密组织，能够藉此开展广泛的慈善活动，从而拥有在大众中普及其信条、教义和道德教诲的能力。正是犹太—基督宗教首次以戒律和教义的形式号召信徒：爱邻人、爱敌人。这是希腊罗马旧宗教和哲学所根本没法想象的。

三、新宗教崛起的文明史及人口原因

这里必得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取代希腊罗马旧宗教和哲学的，是犹太—基督宗教这种新型的宗教和哲学，而非古代世界的其他重要宗教，如两河流域的原生宗教，或历史悠久且有深厚物质文明基础的埃及宗教，甚或琐罗亚斯德教？

首先应看到，及至“轴心时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上古宗教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衰落；琐罗亚斯德教兴起于较为边缘的伊朗高原，后来虽传播到文明中心两河流域，却因其激进主义的信条——如上帝与魔鬼、尘世与天国、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和冲突等——而未能更为广大的世界扎下根来。恰成对照的是，犹太人和西亚北非其他民族如腓尼基人等的宗教却是新来乍到，正处在迅速成长阶段，汲汲于吸纳古老文明的养分，生命力非常旺盛。

后来明显比其他宗教更为成功的犹太—基督宗教尽管融入了琐罗亚斯德教元素，却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神论宗教，波斯人上帝与魔鬼、尘世与天国对立的二元论思想虽然渗入其教义之中，却并非处于核心位置。后来在西亚地中海世界胜出，再后来使整个欧洲皈依的基督教，便是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犹太教小教派即以拿撒勒的耶稣为基督或救世主的小教派中生长出来的。

由于犹太人在其历史早期居于两河流域，后来迁徙到巴勒斯坦地方，但仍与两河流域联系密切，不断吸收其宗教思想和先进文化。这解释了为何《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大洪水神话等故事的原型，早就流传于两河流域；也解释了为何《出埃及记》中摩西出身低贱、襁褓时几乎被杀的故事，与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以弃婴之卑，终成一代雄主的故事十分相近；同样也解释了为何摩西从耶和華领受“十诫”的故事与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手中领受十诫的故事，不仅内容相同，连背景也相似。也需注意，早在基督教出现在希腊罗马社会之前，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便已渗入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中了。在“巴比伦之囚”之前，犹太人对“天堂”“地狱”“天使”“魔鬼”“复活”等并不熟悉，只是在此之后，尤其是波斯人将他们从迦勒底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以后，这些概念才融入其共同体意识中，后来在基督教里更获得十分显著的地位。

事实上，犹太宗教及文明于西元纪元前几个世纪勃兴之时，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旧宗教旧文明已衰落。但犹太—基督宗教不断从既有宗教和文化中汲取养分，只是希腊罗马文明被犹太—基督宗教文明所取代的宏大故事的一个方面。此故事的另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就是犹太人的Diaspora即“散播”或散居现象。由于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王国所灭，前595年、前586年南国犹大又被新巴比伦王国打败并灭亡，犹太人开始了长达两三千年的散居过程。及至亚历山大崛起，发动征服西亚和北非的战争时，犹太人早已散布到整个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时代及之后马其顿—希腊帝国统治时期和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小亚半岛西部到伊朗高原波斯的首都，从尼罗河三角洲到第一瀑布甚至更远处，处处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

在两河流域、叙利亚北部和埃及，犹太人人口尤其密集。犹太人广为迁播到西亚地中海世界各处，最初可能是迫不得已，后来则更多是出于自愿。在罗马帝国前期即西元前31年至西元235年，整个帝国内只有一个民族人口数量明显增长了，此即犹太人。犹太人于西元66年至70年在巴勒斯坦、132至135年也在巴勒斯坦，以及115年至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发动的三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统统归于失败。按理说起义失败，一定有大量犹太人战死或被困死、饿死，对犹太民族的成长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但令人惊讶的是，犹太人在三次起义以后往外散播的规模和范围竟大大超过先前（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348-49）。渐渐地，在埃及的犹太人数量超过了巴勒斯坦，最后竟至于后者被视为前者一块属地。此时埃及已成为犹太民族进一步扩散、犹太—基督宗教最终崛起的最重要基地（Bickerman 234；朱威烈、金应忠 144）。

以上大致交待了希腊罗马宗教、哲学被希伯来型宗教、哲学即犹太—基督宗教所取代的

人口原因。没有犹太人和后来基督徒在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广泛分布，基督教要战胜希腊罗马的旧宗教及哲学，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仅仅犹太人、基督徒的广泛分布，恐怕还不足以解释为何最终是犹太—基督宗教而非其他精神形态（如某哲学流派、综合了波斯和印度宗教的密特拉崇拜，以及信徒众多的诸密仪等）胜出。犹太人虽已散播到天南地北，但无论何处仍是少数，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在基督教兴起的最初几个世纪，犹太人—基督徒总是遭受罗马当局迫害和屠杀^[4]。这就需要到其他方面找原因了。

四、先知在道德意识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如果说犹太—基督宗教的核心规定性是唯一神信仰，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炽烈的道德激情，那么使这种核心规定性和突出特征最终成型并稳定下来的，便是历史上的先知。先知是古代西亚尤其是巴勒斯坦的一种独特现象。与希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巴勒斯坦乃至更广阔的叙利亚世界，轴心时代理性化运动的最重要表征并非“哲学”，该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并非一些着迷于万物起源的哲人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或喜欢论辩诘问的“爱智者”“智术师”如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而是有着坚定的信仰、炽热的道德激情，全副生命致力于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造的先知。

与先前的“知识分子”相似，先知也信神，只不过其所信之神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这与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再宣称受心中“精灵”指引，道德家尼西阿斯出征时总是带着随军卜师事事杀牲问卜，有何不同？以色列先知的的神不仅是独一无二的神，而且是一个超验之神，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之神，一个创造了世界，为宇宙万物究极原因和最终归宿的至上神。这个神与旧宗教诸神差别实在是太大。故毫不奇怪，先知们不屑于神喻、占卜，而希腊人对此却深信不疑。以色列先知的唯一神信仰与希腊罗马社会笃信的神喻、占卜、巫术等的差别，何止天壤！

先知强烈的道德意识有何具体表现？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贞不渝。对以色列社会而言，先知是精神导师或领袖，更是身体力行的道德家、坚持原则的政治改革家和不惧打压的政治抗议者。他们义无反顾地与背叛耶和华的统治者作斗争，坚决拒斥异教神灵，苦口婆心地呼吁同胞摒弃偶像崇拜，坚定其唯一真神的信仰，同时永远以身作则，以严格的道德约束自己。

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列王时代，以利亚便是这么一个先知。以色列部族虽然自摩西时代起便已有一主神耶和华，但因习惯势力的存在，人们对耶和华的事奉并非忠贞不移，巴力神崇拜的香火依然旺盛。巴力神是迦南的一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的神灵，不仅被视为天神，也被当作土地神来祭拜，是否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全有赖其青睐。因此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甚至不惜献祭亲生儿女来讨好他。更严重的是，这种祭拜仪式往往伴以欢宴狂饮、污秽淫乱。在以利亚看来，这必触怒耶和华，以色列人必失去其眷顾（《列王纪上》14:23-24）。耶和华崇

拜既遭到旁门左道的干扰，不难想见，共同体的团结和生存发展将受到极大危害。正当道德颓朽、人心沉沦之时，以利亚应运而起。他以对耶和华的无比敬畏和炽烈激情，对误入歧途的同胞作狮子吼，竭力将其拽回正道（《列王纪上》16: 29-19: 21；《列王纪下》1: 1-2: 25；Roth 48）。

接下来一位有影响的先知，是阿摩司。他是第一位有史可稽的先知，虽是南国犹大的牧人，却主要活动于西元前9世纪下半叶的北国以色列，主要向以色列人宣传自己的预言。此时以色列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贫富悬殊，人心沦丧，人们已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把道德约束置诸脑后，对耶和华的戒律熟视无睹。在此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的景象中，阿摩司看到了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对“献祭不诚”、腐败贪婪、欺压民众的统治者进行强烈谴责（《阿摩司书》1: 1-15；2: 1-16；5: 4-27；6: 1-6；8: 4-10），指出其貌似虔敬，所作所为却全是伪善和不义，所以必受耶和华严惩；真正的虔敬，是责任感而非为所欲为，是公义而非盘剥欺诈（Roth 49-50）。他警告：五种灾祸作为神对以色列的惩罚将降临：缺粮、缺水、虫灾、瘟疫、火烧（《阿摩司书》4: 13；7: 1-3）；“主耶和华”将兴起一国以为以色列之敌，以色列人将战败，被掳到异乡（9: 11-15）。在后来称之为《阿摩司书》的经典中，针对以色列对耶和華的不忠，阿摩司高扬耶和華的公义和绝对统治权，一再称他为至高无上的“主”。他不仅向以色列人传达神喻，替其向耶和華请罪，劝其改过自新，也预言，在这一切劫难之后，耶和華将使被掳掠的以色列人归回，使大卫的国得以复兴（9: 11-15）。

阿摩司之后，又有活跃于西元前8世纪下半叶的何西阿作为耶和華的重要预言者。或许因为阿摩司的预言要等到好几十年后才会应验，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共同体南北分裂，以色列人竟然背叛了耶和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巴力神崇拜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何西阿眼中，处处“无诚实、无良善”可言，在在是“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行强暴、杀人流血”的勾当（《何西阿书》4: 1-2）；“女儿淫乱，新妇行淫”，男子与庙妓行苟且之事，淫邪放荡的祭仪甚嚣尘上（4: 13-14）。于是他站出来，声色俱厉地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指出“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耶和華必行惩罚，亚述人必入侵以色列（8: 7），以色列人必遭败绩，背井离乡，“飘流在列国中”（9: 17）。因此，以色列人只有听从耶和華的劝诫，“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12: 6），才能回归故土，过上和平的生活。

以色列对上帝的背叛可谓“现世现报”。前740年，亚述征服北叙利亚，前738年又降服亚兰城邦哈马，强迫周边小国称臣纳贡，以色列便是其中之一，其主权地位难保。前727年亚述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掳走国王，并在对撒玛利亚围城三年后，最终将其攻陷。以色列既摇摇欲坠，不能免于亡国，希伯来民族的重心转移到南国犹大（Roth 50-51）。这多少解释了为何犹大先知以赛亚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先知。以赛亚地位虽然高，但与其他先知相比，其对犹大国民尤其是耶路撒冷人们不敬耶和華、腐化堕落的批评并无不同。他认为耶路撒冷本是信奉耶和華的“忠信的城”，现在却背叛了他，沦为“妓女”，“有凶手居住”（《以赛亚书》1: 21），“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兑换。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做伴，都喜爱贿赂”

(1:22-23)。因此耶和华通过以赛亚告诫耶路撒冷人们,“你们要洗濯、自洁[……]要止住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1:16-17);“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1:19-20)。

五、强烈道德意识形成的宗教社会学原因

犹太—基督宗教之所以开出唯一神信仰和强烈的道德意识,还有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历史早期希伯来民族周边既然有亚述那样的强敌,便随时可能被入侵,甚至遭受灭顶之灾。求生存求发展,就得把一盘散沙的个人和小集团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严格唯一神论及相应的道德激情便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比之多神教松弛的伦理规范和散漫的崇拜形式,这是一种更有效的思想手段和组织形态。但如果既有耶和华礼敬,又有巴力神祭拜与之分庭抗礼,二者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政治势力,则要想社会和谐、政治统一,要分裂,可能吗?今人看来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为了使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以色列人发展了这么一种思维:耶和华像丈夫对妻子那样垄断崇拜者的忠诚,不能容忍其不贞不忠;他不仅是完美的道德代表,更是严厉的道德审判者,对忠贞者报以仁善,对背叛者施以惩罚,且惩罚的目的明确,即道德净化,使不轨者改过自新,弃恶从善(谢桂山 155-60)。

很明显,主耶和华既是宇宙万物的究极原因和归宿,也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神。在先知时代及后来的希伯来共同体中,对神的虔诚敬拜与社会的道德教化、个人的品行合而为一、密不可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伦理道德在希伯来思维中占有如此核心的位置,以至于华夏世界似乎并非那么神圣的伦理准则,在这里竟表现为至为神圣的宗教戒律,即耶和华与摩西所立的神圣盟约“十诫”。十诫是共同体的最高律法、绝对命令。通过十诫,希伯来人确立了上帝即耶和华的唯一绝对的地位和人对上帝的绝对忠诚。通过十诫,神与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被明确界定,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被清晰规范,个人须遵守的伦理准则被赋予严格的宗教形式,即被教义化、律法化、神圣化。相对于其他民族,希伯来人的优越地位几乎不言自明。

六、犹太—基督宗教兴起的地缘自然环境

既然犹太—基督宗教的最突出特征是唯一神信仰与强烈的道德意识,二者又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就得考察一下其所由产生的地缘自然环境。事实上,这是犹太—基督宗教作为一种生命形态所由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其他所有原因的原因。

如我们所知,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最初在两河流域乌尔城周边游居。后来他们辗转迁徙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几百年后,由摩西率领来到迦南即巴勒斯坦。一直以来,迦南被视为“肥沃新月”地带,但与其说这里是“沃土”,毋宁说是点缀着一些绿洲的沙石荒漠。虽然如此,

这里仍是西亚地中海世界交通往来的辐辏之所，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商人、军队的流动乃至整个部落的迁徙，都从这里经过。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历史早期的迦南不仅是商品的交易市场，也是信息和思想的交流之地（埃班 41）。

但迦南的地形、地貌和气候远非宜人：“沃土和荒漠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差别 [……] 气候和地势多变，可按地理特点划分为四十个区，而当时所谓的‘城’，居民数估算到最大，也大约只有：示剑 3000 人，耶路撒冷 3000 人。”（42）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同样糟糕：

较之沙漠，它 [迦南] 毕竟有平原和丘陵，有农业出产，有牧场可以放牧；但与真正宜于定居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或幼发拉底河流域相比，它又是贫瘠的：以色列的土地只有 25% 适宜于耕种，其余的多半是多岩石的丘陵，树木在这些地方不得见缝扎根。如不借助于灌溉，这块土地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以色列境内土壤多岩石，呈褐色，而不是深黑色，在古代肯定生长着质地不佳的作物。水源不足，一年之中只有四五月有雨。（42-43）

另一方面，迦南自然环境虽不理想，但以色列人显然不像北极地区或热带森林的人类那样，必须将所有精力用于寻找食物。就环境的挑战强度而言，以色列人的处境与华夏先民是相似的：虽有必要的生存条件，却得付出巨大精力才能有效利用这种条件。这多少解释了为何犹太人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性格。甚至可以说，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比华夏世界更恶劣。华夏先民虽必须与严寒酷热、洪涝干旱做斗争，其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毕竟还是肥沃平原，而非一个干旱少雨、主要是贫瘠沙土的地方。尤需注意的是，在拓殖迦南之前的历史上，犹太人早已在沙漠地带生活，而在进入迦南后很长一段时间，同样生活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中。

沙漠环境对犹太民族性格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

沙漠地带生物稀疏，无论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较城市稀少；大部分地方差不多没有人类的踪迹，没有壮丽的建筑，没有广大的田庄，没有茂密的森林。沙漠地方的人，面对大自然，目无所障；烈日当空，则脑髓如焚；明月悠悠，则心花怒放；星光灿烂，则心旷神怡；狂飙袭来，则所向立摧。人们在这样强烈的、美丽的和残酷的大自然之下生活，心性未有不驰思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 [……] 寂静笼罩着沙漠，沙漠里面的居民，内心常充满着恐怖与纯洁的情感；因为在沙漠中，除了造物主创造的自然物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在无垠的广漠里，映入眼帘者无非是光耀的烈日，密语的星群，悠悠的明月，狂舞的风儿了。（爱敏 46）

在这种远非惬意的自然条件下，天地之间的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存在论意义的深深的孤苦无告。既然无所依归，唯有将心灵和情感转而托付给一个创造这一切、超越这一切的神，

一个绝对、无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唯一神，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绝对忠贞于他，以他为终极依靠，方可获得精神安宁。但唯一神信仰的产生不可能没有地缘自然上的原因。事实上，三大犹太型宗教均产生于沙漠环境：犹太教产生于西奈沙漠地带，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半沙漠地区，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埃班 46）。这绝非偶然。相似的环境产生相似的思维模式。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唯一神信仰对于维系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显然比分头崇拜多个神祇更有利。此判断也许不太适合现代，但古代情况大不相同。

适应迦南地区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畜牧活动，也应该视为唯一神信仰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畜牧活动与沙漠环境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的心理模式乃至宗教形态。在迦南，人类在放养牲畜的过程中容易将牧人和羊群的关系与神和人的关系进行类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两种关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牧人对动物的看护和支配态度难免折射为神对于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和人对神的绝对顺从，而良知意义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绝对的唯一神里得到了强化和外化，通过一个不仅超越个我，也超越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神而获得表达。

作为一种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独特生命形态，希伯来文明的首要特征是其宗教性，而这种宗教性的核心内涵又在于其唯一神信仰与建基其上的强烈的道德意识。西元前 6 世纪以降，西亚地中海世界的严格唯一神信仰首先在犹太人开出，后来不仅成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核心信仰，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与希腊罗马文明数百年的磨合后，在中世纪乃至近现代成为了地中海世界、西欧、北欧、东欧和美洲的主流精神形态。如果说每个民族有其特定的生命形态，每种宗教有其特定的精神演进历程，那么对于犹太—基督宗教而言，树立一种绝对忠贞的耶和华崇拜，开出一种严格的唯一神信仰，是历史早期人们的最佳选择。这对于形成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高度商业化的今日中国，羡慕犹太人“赚钱智慧”者比比皆是，却鲜有对其智慧的源头及犹太—基督宗教作为一种生命形态本身感兴趣者，更少有人问及一个极有趣、极重要的问题：历史上犹太人通常以“弱势群体”出现，没有征服过其他民族，倒是有很多民族征服并统治过他们，如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可今天，犹太人基督徒仍兴旺繁盛，犹太—基督宗教（以及伊斯兰教）已遍布五大洲，而曾征服过、统治过犹太人基督徒的那些强大民族到哪里找寻？

注释 [Notes]

- [1] 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中，汤因比认为“高级宗教”是成熟农业社会的产物，不仅与之相适应，也充当其上层建筑；“高级宗教”具有发达的伦理体系，是其区别于原始宗教或其他不发达宗教的主要特征。
- [2] 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熙楠先生向笔者推荐并赠送了《耶稣到底如何成为神》一书，笔者在此谨表感谢。
- [3] 文中所引用的《圣经》文本，均出自和合本。
- [4] 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只拜自己的神而拒拜城邦诸神的异类，二者之间并无区别。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8.* Translated by Litian Miao and Kailai Xu. China Renmin UP, 199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载苗力田、徐开来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239页。]
- . *Eudemian Ethics.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8.* Translated by Litian Miao and Kailai Xu. China Renmin UP, 1992. [亚里士多德:《优台谟伦理学》,载苗力田、徐开来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39-456页。]
- Berger, Peter L. *The Sacred Canopy.*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9.
- Bickerman, Elias J. *The Jews in the Greek Age.* HUP(Cambridge), 1988.
- Clemens, Titus Flavius. *Exhortations to the Greeks.* Translated by Laifa W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克萊門:《劝勉希腊人》,王来法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 Eban, Abba. *A History of the Jews. Jewish Culture: A Culture Full of "Paradoxes,"* edited by Xiaoming G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1990, pp. 41-46. [埃班:《犹太史》,载顾晓鸣编《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41-46页。]
- Emin, Ehmed. *A History of Arabic-Islamic Culture.* Translated by Zhong N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Hurtado, Larry W. *How Did Jesus Become God.* Translated by Jing Cao. Taofeng, 2013. [赫塔多:《耶稣到底如何成为神》,曹静译。香港:道风书社,2013。]
- Plato. *The Symposium. Plato's Complete Works, vol. 2,* translated by Xiaochao Wang, People's Press, 2003, pp. 205-69. [柏拉图:《会饮篇》,载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205-69页。]
- Price, Simon.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Cambridge UP, 1999.
- Roth, Cecil. *A History of the Jews.* Schocken Books, 1972.
- Tacitus, Cornelius. *The Annals.* Translated by Yizhu Wang, et al.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塔西陀:《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Toyinbee, Arnold. *A Historian's View on History.* Translated by Kejia Yan and Longhua Zhang. Sichuan People's Press, 1990. [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Translated by Bo Xu, et al.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92.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Yao, Weiqun.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Peking UP, 2006. [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Xie, Guishan.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Judaism." *Dongyue Forum*, no. 1, 2005, pp. 155-60. [谢桂山:《论传统犹太教的伦理向度》,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第155-60页。]
- Zhu, Weilie, and Yingzhong Jin, editor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f Jewish Studies Published in China up to 1990.*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朱威烈、金应忠编:《'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上海:三联书店,1992。]

◇责任编辑:吴晋先

《旧约》与希伯来精神的书写

◎ 唐立新

内容提要: 希伯来精神是犹太民族持久而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旧约》中犹太教的基本观念标志着希伯来精神的发轫: 人神契约、一神论、选民思想、先知论、律法约束下的道德主义和弥赛亚救赎。近世英国思想家阿诺德对希伯来精神有着深刻的洞见, 他指出了希伯来精神的重要构件: 道德主义和行动主义。但是, 阿诺德泛化和挪移了希伯来精神的本质, 错误地以基督教传统来诠释希伯来精神, 完全无视二者在神学思想上的本质区别; 同时, 受英国深厚的道德传统的影响, 阿诺德故意剔除了希伯来精神的理性成分, 将其道德主义绝对化, 彰显出实施道德教化的实用主义倾向。

关键词: 旧约 希伯来精神 道德主义 行动主义 理性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3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阶段性成果(12&ZD172)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Tit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Hebraism

Abstract: Hebraism is the lasting and established ideology and values of the Jewish people, which can find vivid expression and metaphorical embodim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that is, the human-God contract, monotheism, chosen people, prophet, moralism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Judaic laws and Messianic redempti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Judaism in the Old Testament mark the advent of Hebraism. Modern British thinker Matthew Arnold has profound insight into Hebraism and reveals som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it, namely, moralism and activism. However, Arnold misinterprets Hebraism by applying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regardless of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Moreover, Arnold deliberately excludes reason from Hebraism,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eep-rooted moral extremism in Britain and his pragmatic tendency to deliver moral commandments.

Keywords: The Old Testament, Hebraism, moralism, activism, reason

Author: Lixin Tang,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毋庸置疑,犹太教深刻地影响了犹太人的思想历程,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考证犹太教对犹太思想史的意义时,存在一个路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资料恢复以色列宗教某些最重要事件的真实性。当然,同时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些事件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和任务已经根据某种范式被重新塑造,不再可能指出他们原来的‘真实性’了。”(伊利亚德 152)事实上,犹太教的起源缺乏标准和清晰的记载。由于历史久远,任何“科学考据”似乎都是枉然。然而,“在所有关于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启示的独特性质的争论中,实践性的观点将《圣经》定位为信仰的永恒法则和我们全部宗教生活的充分而可靠的指南”(史密斯 78)。《旧约》中有关古犹太教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印证犹太初民时代的历史和犹太教的起源。虽然这些技术带有浓厚的神话和传说成分,人们,特别是犹太人,宁愿这样来考察犹太历史。

犹太精神,或曰希伯来精神,是“犹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张倩红 6)。希伯来精神作为希伯来民族的内在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信仰、道德和理性。希伯来精神千年传承,与世推移。《旧约》不但是犹太教的底本,也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希伯来精神。《旧约》当中有关犹太教的基本思想成为了希伯来精神的源头活水和核心理念。

一、契约观与一神论

据《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与人类订立了第一个非正式的约:亚当和夏娃不能偷食知识树上的禁果。后来,这个约被破坏,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创世纪》中还记载,挪亚是义人,上帝要挪亚、家人和鸟兽昆虫进入“方舟”以便躲避大洪水,尔后他毁灭了地上其他一切生物。上帝在大洪水过后与挪亚立约,使人类获得了新生。这两次订约被视为上帝与人类的约定。在对整个人类失望以后,上帝开始遴选特选子民。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无与伦比的始祖,希伯来人卓越的典范”(埃班 9)。据《旧约》记载,早在初民时代,亚伯拉罕受神的启示,率领其部落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迁徙至巴勒斯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Genesis 12: 1-4)。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亚伯拉罕部族在上帝的应许之地繁衍生息,逐渐人丁兴旺,最终成长为犹太民族。

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订约是犹太历史上的大事。摩西作为犹太教的第一位先知,成为上帝的信使。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至千代”（Exodus 20: 2-6）。言毕，上帝向摩西宣示了十条诫命。摩西把上帝的诫命口授给犹太人。上帝与犹太人立约不只是与摩西之间的承诺，还是与整个犹太民族的承诺，标志着犹太民族的独立和犹太教的初步形成。

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圣约，形成了犹太教原始的契约观。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契约看似简单，但是意义深远。首先，它将约的主体从人与人提升到人与神。“以立约的方式确定人与神的关系表明犹太人不再把人神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宿命安排，而是一种互动关系[……]神需要以色列人作为圣洁的国度、上帝的选民，去实施它在全地的普世性救恩。而人也需要神、效法神，追求圣洁，成为义人，实施救赎”（宋立华、孟振华 58）。另外，犹太人与上帝订约意味着人神契约永远不能废除，而且对每个犹太人都有约束力。犹太人一旦违约，必将遭受相应的责罚。

亚伯拉罕和摩西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废除了多神论和泛神论，孕育和开创了尊奉耶和華的一神论，这是极有意义的壮举。

以色列的历史还在朦胧之初就是反抗，而不是对某种传统的继承。以色列人有一种关于人类的新看法，即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坚决否认当时以诸战神为内容的神殿式的神话。这种唯一的、超验的上帝观念彻底改变了旧有的观念，创造出新的思想。所以人们应将亚伯拉罕从出生地外迁理解成是同异教思想的彻底决裂。代替了异教思想的以色列的宗教提出了一个唯一的、目标明确的、理性的，即上帝的万能统治。（埃班 8）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一神论是对世界的全新定位：从世间万物的千差万别中寻求共性，使无序、分散的世界归于一位神祇的创造，跟古希腊人从哲学高度探求世界的本源一样具有重大意义，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形而上的飞跃。与古希腊从理性出发探求对世界起源的科学解释不同，犹太教一神论强化一神的绝对性和主宰性。同时，崇拜耶和華的一神论是无须证明的。“上帝”这个希伯来文名字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我自有永有”和“我将与你同在”。犹太教中上帝的存在一开始就是先验的、预设的，这一点在《旧约》经文中不断得到强化。《旧约》当中比比皆是上帝自己的陈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之外再没有真神，”“我是真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以赛亚书》44: 6; 47: 9）。这是彻底的一神论，表示上帝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相似或相同的存在。上帝是“单一的”，因为其他神的存在被彻底否定，特别是偶像。因此，“宣称耶和華是以色列所崇拜的唯一神的基础是一场让以色列变成自由民族的解放运动”（史密斯 97）。

唯一神上帝是犹太教所有神学思想的起点，是“犹太教的力量源泉”（Green 18），也是希伯来精神的渊藪所在。上帝在犹太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统一观念：上帝创造世界、统治世界和关爱世界；上帝是永恒的、公正的和仁慈的。上帝的全能、全知和至善，就是上帝的存

在方式。犹太人相信，他们只有在神意和服务于神意中来寻找生存的意义。犹太人信仰上帝，热爱上帝，敬畏上帝，这是希伯来民族精神肇端、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理据。

二、律法与道德主义

犹太教一神论为犹太教的道德传统提供了预设和前提，也是犹太教道德律的必然要求。上帝作为最高存在建立在道德命令之上，因此，上帝成为了自我立法的道德实践理性。在犹太教当中，上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善美的化身。

古犹太教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律法体系。摩西十诫是犹太教律法的源头，也是犹太教的最高律法，在犹太人当中家喻户晓：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和崇拜任何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尊名；当安息日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陷害人；不可贪婪他人的一切（《出埃及记》20: 3-17）。摩西十诫微言大义，规范了犹太民族的伦理，统摄了犹太民族的道德，也赋予了上帝以伦理色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超验的形式规定一个民族的道德范式，可以说，“希伯来精神的主导就是严正的良知”（阿诺德 100）。

在拉比时代，犹太学者确定了犹太经典《托拉》（Torah）——《摩西五经》。犹太教认为，上帝在西奈山启示摩西的《托拉》，是对犹太人的教诲和诫命。此后，拉比们将他们编撰成一部律法规全书《密西拿》（Mishnah）。后来，犹太贤哲组成的学者阶层完成了《塔木德》的著述，确立了 613 条律法，并且对《托拉》和《密西拿》进行诠释，完成了律法的空前构建。三部巨著一起构成了犹太基本法典，博大精深，体全虑周，涵盖犹太教教义、戒律、规章、刑法、民法，成为犹太人千百年来诵读、恪守与尊奉的宝典。律法和戒律规定了犹太教的动物祭祀、性关系、节期、食物、崇拜仪式、祭司制度和婚姻制度等等。“从律法中拉出一张诫命之网，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团团围住，控制其分分秒秒，控制每一次冲动，每一个行动”（99）。

这些律法都是犹太教独特而鲜明的表征，目的无非是保持以色列人的纯洁和崇高。犹太教非常看重道德戒律。“犹太教的伦理本性，即以道德意识来诠释唯一神——上帝，这就决定了犹太教必然是一种伦理一神教”（拜克 8）。伦理一神教的创造是通过变革和创新来完成的。“以色列的伦理一神教是一种被建立起来的宗教。以色列的‘一神’不是旧思维方式的遗留，毋宁说它是新思维方式的第一次表达。就宗教的这些形式而言，它是一种创造，体现着全新的、富有成效的原则”（8）。

律法对于犹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而大多数社会在那种环境中会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在自己的国土家园被剥夺，变为一个少数民族——

而且是散居的少数民族——寄居于外人篱下之后，这个无根的社会找到了在不利条件下维持自身凝聚力和连续性的新手段。此时的维持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汤因比 44）

犹太律法严格要求犹太人在生活当中恪守独特的方式和价值观念。所以，“在一个外来的、不洁净的世界里，一个民族只有确保其种族和精神上的同一性才有可能生存下去”（伊利亚德 645）。

千百年来，绝大多数犹太人和犹太教徒严格奉行犹太教的律法和戒律，忠诚地信奉上帝。他们在信奉上帝的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来热爱上帝。“这种热爱是通过在每日生活中切切实实地遵循上帝的律法来表达的。因此，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犹太人认为，遵守上帝的律法不应看成是一种负担，而应看成是一种欢乐，因为遵守律法的人与上帝更接近了”（黄陵渝 78）。

最能代表犹太教律法的道德主义是犹太教的先知。完美的道德是先知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先知传统是西方文明关于人类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高尚的概念的主要来源。他们响亮的话语一直传递着他们的信仰：要热爱上帝就要热爱公义”（Vaspan and Lipman 9-11）。先知被伦理追求所驱动，被真理所慑服。他们恪守道德戒律，指导和启示人们向善。他们心中的道德律在于倡导公平正义，担负国家兴亡中个人的历史重任，在神学和现世中成长为犹太精神的脊梁。

三、弥赛亚救赎和实践理性

犹太人心目中“未来”的观念十分迫切。在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形下，犹太人寄希望于古老的“弥赛亚”观念。古犹太教弥赛亚的拯救信仰和末世论思想得到了犹太教原教旨的支持。犹太教关于犹太人救赎问题的弥赛亚主义是古代犹太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救赎，既包含了对现实中民族苦难的承认和体察，也包含着犹太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这种民族性的苦难舒张和痛苦排泄，是犹太人面对现世苦难的自我疗救，同时也是犹太教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一种无奈的整合。“这一倾向在犹太人中唤醒了弥赛亚主义，即一种超越过去和现在所有实在，作为真的和完美生活的绝对未来的理念[……]未来一定会到来，每时每刻都在保证它的到来，我们的血脉在保证它——上帝在保证它的到来”（布伯 36）。犹太人对未来的愿景和设计意义非凡。韦伯（Max Webb）指出：

对犹太人而言，救赎许诺与此正好相反。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已经被翻转成相反与将来所被许诺的，但未来势必会再翻转过来，以此，犹太人便将再度回复到其为地上的支配民族的地位。这个世界既非永恒也非不变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

其先下的秩序乃是人类所作所为尤其是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的产物，也是神对其所作所为的的结果，换言之，现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注定要回复到真正为神所喜欢的状态。古代犹太人对人生的整个态度便是取决于这样一种未来由神来领导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14)

《旧约》当中多次提到，末世将会来临，上帝将前来拯救处在苦难和厄运中的犹太人。到时列国灭亡，以色列获救，流亡的和被掳的以色列人重返祖国，在耶路撒冷重逢。国家变得有如天堂，建立上帝的政权，列国列民皈依耶和華。整个世界充满了财富，无比丰饶，无病无疾，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不洁之物永久消失，整个世界恢复到最初完美圣洁的状态，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中心。此外，上帝审判有罪之人，最后的审判将以上帝毁灭整个旧世界，制造大灾难而结束。但是上帝还要创造新世界，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Isaiah 65: 17; 66: 22）。

弥赛亚还要代表上帝复兴犹太王国，恢复重建旧都耶路撒冷，使国家重新回到和平和强大的大卫王时期。正如《旧约》中《以赛亚书》中所言：“在末后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華的言语必出于从耶路撒冷 [……] 他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2: 2-4）

弥赛亚代表上帝耶和華行使绝对的救赎，这种救赎是空前的和彻底的。弥赛亚的末世拯救“事实上放弃了凭个人努力而实现精神完善的任何期望，强化了对全能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对于他救赎之应许的信仰”（伊利亚德 644）。在对弥赛亚未来救赎的设计中放弃个人的努力，并不妨碍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奉行实践理性。“犹太民族在理解世界、解说现实、认知自我时，一个最基本、显著的思维特征就是同时并用了超验与经验、神学信仰与理性辨识等矛盾对立的思想方法”（刘洪一 341）。在犹太教中，上帝是最高的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标准。作为“至善”的上帝，只能来自犹太人先天制定的道德完满性的纯粹理想，它在犹太人心目中是确定的和可靠的，也是他们要付诸实践的。犹太人要证明上帝的“善的意志”的存在，只能通过虔诚的生活体验，或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亲证。上帝不是抽象的纯粹理性和知识的符号，而是人们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在实践中可以得到证明的无处不在的存在。“希伯来精神当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 [……] 希伯来精神一旦抓住了某些有关普遍秩序的朴素的、基本的默示，便以无比的认真和十足的干劲去领悟并遵循其中的道理”（阿诺德 99-100）。即使作为犹太教灵魂的先知们以上帝的代言人和犹太教的道德主体自居，他们也毫无例外地注重思考生活，注重上帝对人的意义。“所以，对先知来说，了解上帝的本质就是要了解上帝是正义的和不朽的 [……] 借助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了解人应该如何生，如何行”（拜克 11）。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

既然道德法则本身是作为自由这种纯粹理性的因果性的演绎原则而被提出来的，由于理论理性曾被迫至少假定一种自由的可能性，道德法则的这种信誉就完全足以一切先天的辩护来补偿理论理性的一种需要。因为道德法则以如下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实在性[……]而且这样一来就第一次能够赋予那在想要思辨地行事时总是以其理念越界的理性以客观的，虽然只是实践的实在性，并把理性的超验的应用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应用。(51)

由此可见，犹太人虽然笃信上帝，相信弥赛亚的救赎，对未来充满希冀，但犹太人从来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很少滑入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犹太人从来就拥有强烈的实践理性。因此，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它接受了这个呼吁通过人族(human nation)，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种族(human race)去实现它自身的真理。这就是它的精神，以色列的精神”(布伯 161)。

四、阿诺德希伯来精神之批判

布伯(Martin Buber)认为，犹太教精神有三个特征：统一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和未来的观念(33)，即统一于唯一神上帝耶和华，用行动主义践行道德和律法，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对希伯来精神非常准确的诠释。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也颇有见地指出了希伯来精神的一些重要特点。正如前文所引，阿诺德对希伯来精神中的行动主义赞赏有加，充分肯定了律法对于犹太人的意义。同时，他也特别强调希伯来精神的道德主义传统。但是，阿诺德不加甄别地将希伯来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挪移和泛化，得出了偏颇的结论。

首先，阿诺德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区别重视不够，模糊了两者的界限。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尊奉耶和华的一神教，但是，两者在基本神学教义上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犹太教不承认基督耶稣，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也拒绝承认基督教所谓的“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历史证明，正是核心神学教义的抵牾，导致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旧约》和《新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圣经》文本中神学意义上的分野。既然犹太人与上帝订立的“旧约”失效，与上帝另立的“新约”就变成基督教一切神学教义的生发点，而“新约”完全源于耶稣替人类受难的故事。由此看来，阿诺德借基督教来证明和诠释希伯来精神是偏颇的。阿诺德说：

那接过了并统治着原先走了邪路、已经一无可取的世界的希伯来精神，正是、而且只可能是后来发展阶段的、更加属灵的、也更加吸引人的希伯来精神，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并不是通过遵循律法的具体条文实现克己制欲，而是通过效法一个舍己的榜样，达到克己自制，摆脱恶念的束缚，从而达到拯救的目的。基督教为道

德颓败的世界提供了神启的献身精神。(105-106)

这种论调，与其说阿诺德泛化了希伯来精神，不如说他歪曲和抹杀了希伯来精神的本质规定性。不从犹太教源头论述希伯来精神，反而以犹太教衍生的基督教来回溯希伯来精神，这说明阿诺德在论证希伯来精神的路径上是舍本逐末。其次，阿诺德还极大提升了基督耶稣对于希伯来精神在道德维度上的决定性意义，这无疑将古犹太教最排斥的异教教义当作它的本质规定，罔顾犹太教道德主义的摩西律法—伦理之源。再者，犹太人典型的因行称义来完成对律法的捍卫。古犹太教律法的力量之大难以估量，并非阿诺德所言，“旧的律法和笼罩人的生活诫命已不够强大”（100），也绝非能用基督教的因信称义轻易替代，“基督教树立了耶稣基督这个克己自制的感人动人的典范，以对基督的无限崇奉来代替原先的律法和诫命”（100）。

阿诺德竭力宣扬的是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差异性，他将希腊精神规约为理性精神，希伯来精神规约为道德主义，这种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

两大精神准绳，一个注重智慧，另一个注重顺从；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则是看到大的光就奋力向前——这两大准绳之中，自然是坚固人类道德力量、铸就必要的人格基础的准则处于优先地位。犹太人承担着宣告神的诫命的职责，强有力地阐明了“良知”“自制”等词语所指向的境界 [……]（107）

阿诺德指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差异，其目的是突出希伯来精神的道德主义取向。其实，他在这层意思上更多的是直白的表述：“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希腊精神以思想清晰、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美为人所能取得的伟大而宝贵的成就，而希伯来精神所提倡的伟大事业，则是对罪恶的清醒意识，是觉悟到人皆有罪”（99，104）。

希伯来精神被阿诺德约减为道德心，与希腊精神的理性形成对照。问题是，阿诺德夸大了两者间的差别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这两股力看成对抗的力量。”（97）他还给人这种印象：世界就只有两种精神，要么是希伯来精神，要么是希腊精神。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阿诺德把英国乃至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大事归结于这两种精神的此消彼长。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亦是。但是，历史果真如阿诺德所说的那样吗？

姑且不论希腊精神是否只有理性而没有道德心，单就希伯来精神来看，其道德传统固然明显，但理性成份同样不可小觑。或可以说，西亚地中海世界理性的开显肇端于古希腊的知性传统。雅典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首倡理智，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阐发，理智主义更加突出，最明显地体现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希腊哲学普遍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理性，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理性。理智是纯粹的思辨，意志和欲望服从于理智，真正

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美德的规定性来自于理性，所以苏格拉底有句名言：“德行就是知识。”希腊哲学的思维秩序遵循从个人思辨到个人实践再到公共实践，实践是思辨的结果和效用，它的确切含义是实践理性。

从希腊哲学的理性模式来看，希伯来精神的道德主义具有实践理性色彩。犹太先知在接受上帝的谕令之后，并没有把它视为纯粹的道德法则而悬置，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先从自己做起，再在广大子民中推行。摩西十诫首先在形式上呈现出简易和易于操作的特点，至少那些以“禁止”（Thou shalt not）开头的诫命便是如此。希伯来道德主义主要由犹太教的众多律法来规范，这些律法大多数是预设的，而非经验的，至少在这一维度上，以律法维系的希伯来精神的道德传统就是实践理性。况且，这种预设是神赐予的，在犹太人心中无可质疑，是真理，真理又是理性的最高原则，所以，希伯来的道德主义和理性不可分割，至少在犹太人看来如此。因此，阿诺德大谈特谈希伯来精神的道德心，殊不知，这种道德心与理性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再加上阿诺德用“自制”“服从”等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字眼来诠释“道德主义”，不正说明理性和道德主义可以通约吗？

阿诺德为什么会在希伯来精神的定性上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这也许跟“那种将知性当作威胁的心理，传承于盎格鲁-萨克逊的古老习俗”（特里林 2）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有关。阿诺德曾明确表示：“我们的强项和令人赞许的特点是活力和干劲，而不是理性。”（96）事实上，近代哲学并没有把典型的理性主义精神赋予英国，相反，当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如火如荼之时，英国哲学仍处于洛克（John Locke）的经验主义哲学的笼罩下。英国人这种思维定式得到了道德主义的支援，因此“必须在善良和知性之间作出取舍；愚蠢是德行的手足兄弟，而智慧则是踏入罪恶之门的第一步，理性与上帝水火不相容”（3）。阿诺德熟知英国的思想传统，因此，在对希伯来精神的阐释中，他果断地剔除了本来就附着其上的理性成分。再者，阿诺德以传统道德的守护者自居，以匡正世道人心，挽道统于不坠为己任。他在遴选说教理论的时候，希伯来精神因为道德主义十分明显，正好是最方便倚仗和借重的理论工具。所以，阿诺德紧紧抓住希伯来精神的道德主义倾向不放，并将其绝对化，借以与希腊精神的理性传统形成强烈对照。但是，当阿诺德回顾和反思英国的道德主义传统时，他发现基督教才是维系英国道统的中枢。所以，出于道德教化的策略考虑，阿诺德不得不极力胶合犹太-基督传统，把两者说成是一脉相承，断言英国人和希伯来人两个民族具有“同样强烈而显著的道德心”，或者说英国人在道德行为方面“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121-22），而忽视了希伯来精神所本有的道德理性成份。尽管科学和理性在阿诺德心中具有中心性的地位（刘锋 30-31），但为了扮演道德救赎的急先锋，他只能这样矫枉过正了。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lated by Minzhong H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 Beck, Leo. *The Essence of Judaism*. Translated by Youjun Fu and Jian Yu. Shangdong UP, 2002. [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有军、于健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 Buber, Martin. *On Judaism*. Translated by Jie Liu, et al. Shangdong UP, 2002. [布伯:《论犹太教》,刘杰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 Eban, Abba.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 Translated by Ruisong Y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86. [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Eliade, Mircea. *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 Translated by Xiaoqun Wu.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吴晓群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 Green, Arthur. *Seek My Face, Speak My Name: A Contemporary Jewish Theology*. Jason Aronson, 1992.
- Holy Bible. New Printed Standard Version.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2000.
- Huang, Lingyu. *Studies of Judaism*. Contemporary World, 2000. [黄陵渝:《犹太教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 Kant, Immanuel. *The Complet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vol. 5*.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iuling Li. Chinese Renmin UP, 2006.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Liu, Feng. *The Hermeneutic of Biblical Literarines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ebraism*. Peking UP, 2007. [刘锋:《〈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Liu, Hongyi. *Jewish Spirit*. Nanjing UP, 1995. [刘洪一:《犹太精神》,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Smith, R. William. *The Prophets of Israel and Their Place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Zenglin Sun. Shanghai Sanlian, 2013. [史密斯:《以色列的先知及其历史地位》,孙增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 Song, Lihong, and Zhenhua Meng, editors. *The Basic Concepts of Judaism*.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13. [宋立宏、孟振华编:《犹太教基本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 Toybin, Arnold. *A Stud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Beicheng Liu and Xiaoling Guo. Shanghai Century, 2005. [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Trilling, Lionel.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Translated by Zhijun Yan and Mo Zhang. Yilin, 2011. [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张沫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Vaspan, Albert, and J. Eugene Lipman. *Justice and Judaism: The Work of Social Action*.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1961.
- Webb, Max. *On Ancient Judaism*. Translated by Le Kang and Huimei Jian. Guangxin Normal UP, 2010. [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Zhang, Qianhong. *Jews and Jewish Spirit*.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1999. [张倩红:《犹太人·犹太精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任海燕

黑人、犹太人、城市人 ——评索尔·贝娄中晚期城市小说中的种族问题

◎ 张甜

内容提要: 贝娄在其中期和后期创作的城市小说中赋予了黑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从《塞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到《拉维尔斯坦》,贝娄不遗余力地将种族问题提上日程。即便贝娄在创作晚期一再强调其犹太身份,他仍然置身于美国的城市形态变迁中思考种族问题,并给予历史和种族问题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本文将以此贝娄中期和晚期的城市小说为例,结合城市社会学对贝娄的种族观念展开讨论,同时挖掘贝娄城市小说中的深层犹太文化内涵,探讨贝娄中晚期小说中对黑人问题的不同立场。

关键词: 索尔·贝娄 种族 黑人 犹太人 城市小说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4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索尔·贝娄城市小说研究”(15FWW011);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CCNU19TD016)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Title: Blacks, Jews, City People: Racial Issues in Saul Bellow's Mid- and Late Urban Fictions

Abstract: Saul Bellow renovated the Black image in the urban fictions of his mid- and late writing career. Discussion of racial issues is offered unsparingly in his novels such as *Mr. Sammler's Planet*, *The Dean's December*, *More Die of Heartbreak* and *Ravelstein*. With repeated affirmation of his Jewish identity in his later career, he meditated on racial issues within a larger American context,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bing into historical and racial issues. An exploration of Bellow's racial attitude from an urb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carried out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vert Jewish culture behind his fiction.

Keywords: Saul Bellow, race, Blacks, Jews, urban fictions

Author: Ti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是二战后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 同时也是创作时间跨度最长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本文主要考察贝娄创作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期城市小说^[1]及创作于八九十年代的晚期城市小说, 将其置于种族和城市发展的语境中, 剖析贝娄种族思想的变化。从《塞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 到《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 贝娄赋予了黑人截然不同的形象, 并不遗余力地将种族问题提上日程。

贝娄中期对黑人问题的态度深深植根于激进主义、城市危机、种族博弈关系等一系列时代背景中, 贝娄的态度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态度。60 年代是一个反主流文化盛行的年代, 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病态的丰裕, 以浓厚的乌托邦情结、不妥协的叛逆姿态, 以及非理性的激情为特点的文化激进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不少美国学者批判美国的 60 年代, 认为这是美国历史 350 年叙述的连贯性被打断的时代。这个被不少知识分子诟病的年代以道德的缺失、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城市暴乱、对权威的蔑视、不公平的战争、政治精英们的不作为等为标志。新保守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波德霍瑞兹 (Norman Podhoretz) 认为 60 年代目睹了一场不可逆转的文化终结 (Podhoretz)。金格里奇 (Newt Gingrich) 也认为美国历史所拥有的长达 350 年之久的叙事连贯性到了 60 年代被打破 (转引自 Barnes 23)。布鲁姆 (Alan Bloom) 还提到“历史不断重演, 60 年代的美国大学经历着和 30 年代德国大学一样的变故, 即: 理性探寻结构的解体”(313)。这一切都浓缩在鲍曼 (Zygmunt Bauman) 称为“被围困的社会”^[2]的图景中。1976 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中贝娄指出了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及他对作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 他提到:

在个人生活方面, 骚动无序或几近恐慌; 在家庭生活方面——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混乱; 在民众行为、个人忠诚、性爱方面 (我不想背诵整个名单; 我们不愿意再听这些了)——更是进一步地混乱着。我们正在努力生活在这样一种个人骚动无序、公众迷惑混乱的环境中。我们随时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焦虑。一切事情都在下降和坠落, 让我们每天都感到畏惧担心; 我们对私人生活兴奋不已, 却备受公众问题的折磨。(*It All Adds Up* 92)

60 年代的美国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人格类型和居民类型不断变化, 种族和经济的纽带问题日益凸显, 城市里的种族问题, 又称“黑人问题”, 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60 年代中期“城市危机”这一短语在媒体上屡见不鲜, 它专门用来指代居住在郊区的白人和集中在市中心的黑人间相互隔离的极端地理分布情况。其背后潜伏着两大强势文化模式的碰撞: “黑人区”文化和有房有社会地位的白种人美国梦文化。城市/郊区、黑人/白人、穷人/富人等, 这种美国人惯有的一分为二思维定势让城市问题永远处于各种质疑声中。到了 70 年代, 关于谋杀、

强奸等的犯罪报道成为了地方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一种手段，这更激化了“城市危机”这一概念，因此，白人逃离中心城区象征着对暴力和不文明的逃避。

有作家记录了1963至1973这11年间纽约的变化，城市犯罪率的迅猛攀升成为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纽约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晚上市民们不敢步行至黑暗的角落，屋顶上随时可能盘踞着小偷，强奸犯露出他们的阳具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夜里警笛长鸣^[3]。妄想症、猥琐、焦虑、恐惧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贝娄中期的城市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里。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以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上西区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三天内的故事。故事开头，二战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赛姆勒先生在公共汽车上亲眼目睹一个衣着体面的黑人扒手行窃。正义的赛姆勒先生起先义愤填膺，给警察打电话要求指证罪犯，之后却被这个小偷尾随进入公寓掏出阳具进行羞辱，变得极力想避开这个小偷。第二天，他去看望一位缠绵病榻的恩人格鲁纳医生，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赛姆勒先生和他女儿苏拉一直受到他的惠助。格鲁纳医生的一双儿女让他心力憔悴：儿子华莱士贪慕财富，在病房外劝说赛姆勒先生去帮忙打听父亲一笔来自黑手党酬劳的钱财的藏匿之处；女儿安吉拉则是一个只用下半身与所处社会沟通的放荡女人。同一天，赛姆勒先生还获悉他的女儿苏拉被怀疑偷窃了一位印度访问学者拉尔博士有关月球研究的手稿，于是他在纽约城里四处寻找苏拉，最终在格鲁纳医生的郊区别墅里找到了苏拉，而手稿被她锁在了市内中央车站的公共橱柜里。其间赛姆勒先生和拉尔博士有过一番畅谈。而华莱士急于搜查秘密现金的时候弄破了水管，致使别墅水漫成灾。第三日，赛姆勒先生搭乘格鲁纳医生的私家车到医院探望格鲁纳。在经过林肯中心的路上，他看到从以色列归来的前女婿艾森用铁器狠狠地击中了黑人小偷的头部。拉尔博士终于找到了手稿，而苏拉无意间发现了秘密现金。在医院里赛姆勒先生劝说安吉拉向医生父亲忏悔自己的过去，却遭到反对。小说结尾，医生死去，赛姆勒在太平间面朝着他，一个人对着上帝说话。

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的名字Sammler与意第绪语Sammlen相似，后者有“收集”(to collect)之意，这暗喻着赛姆勒先生就像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收集着自己的记忆、经历，以及社会的种种现实，并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他是奥匈帝国一个富裕家庭的后代，曾做过记者，深受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参加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活动为傲，并与英国科幻作家威尔士(H. G. Wells)交善。他想把自己的犹太皮囊塑造成英国绅士的形象。来到美国后，他摒弃了对性、金钱、权力的欲望，一心呆在图书馆或房间里。小说还穿插着赛姆勒先生一直以来希望建立理想城市的诉求，但是他屡次被“城市危机”的现实所打败，他躲避不断骚扰自己的小偷，逃避二战中妻子被屠杀时的回忆，希冀逃离充满疯狂与暴力的现实社会^[4]。赛姆勒先生对作家威尔士的研究和对月球的痴迷都体现出对于逃离地球的幻想，他逐渐感受到似乎只有在另外一个星球才可能存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贝娄对黑人这一陌生人形象的刻画也是破费心思，不遗余力，凸显了贝娄此时期鲜明的种族立场。小说中黑人小偷没有名字，他衣着得体，却干着不得体的偷窃行为，所有的一切都影射黑人在60年代的生存状况。同时贝娄借此讽刺当时的非裔和犹太裔关系，犹太人支持黑人，却被黑人“偷窃/覬覦”着他们的财富：犹太人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却被黑人以“住房问题”“商客关系”“帮佣问题”等借口所广泛排挤，黑人还打砸犹太人的店铺甚至拒绝缴纳房租。

对黑人的刻画往往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中内嵌的高下贵贱等级制度的羁绊，而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即是对黑人野蛮、原始、无知、暴力、任性等固有偏见的再现。瑞典自然学家、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奠基人林赖乌斯（Carolus Linnaeus）将对动物和植物的划分上升到对人类的划分上，他将人类划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野人，他称为“无声的”；第二类是美国人，“是受风俗习惯规范的”；第三类是欧洲人，“受法律控制的”；第四类是亚洲人，“受观点左右的”；第五类是非洲人，“受任性控制的”（转引自Goffman 4）。按照上述划分，很显然在所有“有声的”人种中欧洲人居于理性的最高地位，而非洲人在他看来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这无疑暗含着对黑人的歧视。因此将黑人描写成原始、野蛮也就不足为奇了。贝娄笔下的黑人小偷有着强壮的体型、狮子般犀利的眼神、“巨兽的厚颜无耻”（*Mr. Sammler's Planet* 2），即便在小说末尾挨打的时候，贝娄也用“困兽”一词来展现黑人小偷的动物性和他的无助。

除了以动物性来刻画黑人之外，贝娄还以“陌生人”形象对其进行渲染。美国非裔和犹太裔在WASP白种人社会中都会受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但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又让他们互视对方为陌生人，双方暗地博弈着。陌生人视角成为学界对种族问题认识的共识由来已久，美国学者巴蒂克（Emily Budick）曾指出，以美国黑人为中心的犹太作家创作的小说和以美国犹太人为中心的黑人作家创作的小说有一个共性，那便是陌生人的视角（121）。这一视角通过陌生人充满性感的异域情调、主人公猎奇式的迷恋等方式展开。比如小说中很多犹太人对黑人甚至对犯罪有种欲说还休的矛盾感。小说中犹太人物行为堕落，心理变态，比如赛姆勒不止一次地想再次看到黑人小偷盗窃，犹太女性痴迷于黑人男性的阳具，等等，颇具讽刺意味。在无知和想象的互动中，知识的缺位依靠意淫来得以填补。赛姆勒对自己的这种想法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者的陌生感令人生畏但又极具诱惑。这种恐惧和诱惑不仅来自他人，也来自自己内心的躁动不安。弗洛伊德曾指出暗恐式的复杂情感（*uncanny*）：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居住着一个代表着他者的陌生人。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iva）曾说：“陌生性就在我们内心，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181）因此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不仅是对他者，也是对另外一个自我的恐惧，一种对窥探欲的不置可否。

小说中的所有细节均指向贝娄对黑人问题所持有的鲜明立场，也难怪60年代的贝娄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如果仔细考量贝娄所处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贝娄的立场有理有据，这一标签有些言过其实。贝娄对待黑人问题经历了诸多变化，他起初对自由乘车运动

[5] 表示支持，对在密西西比州被杀害的三个年青黑人深表同情，也非常认可黑人的非暴力运动。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不断升级，贝娄一改往日观点，认为非裔太过激进，不仅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和权益采用暴力的方式，而且大肆宣扬反犹主义言论，企图转移矛头的指向。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了贝娄，他觉得有必要在作品中探寻这个问题。60年代初期由美国南方黑人学生成立的旨在帮助黑人进行非暴力运动获取权益的“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得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支持，但是60年代末许多犹太人改变了立场。卡森（Clayborne Carson）专门以SNCC为个案分析了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非裔和犹太裔关系问题。他同时还指出了非裔和犹太裔的激进文化和激进传统都植根于纽约，“是黑人和犹太人长久以来在文化和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时期互动关系的产物”（37）。因此将纽约作为中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地，贝娄的意图不言而喻，黑人和犹太人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你死我活。此外，60年代黑人当中普遍存在着反对白人、抵制白人的强烈情绪，而犹太人作为不是白人的白人也摆脱不了被反对的厄运，纽约甚至出现了黑人反犹主义恐惧（Black Anti-Semitism Scare），二者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Ferretti 645-59）。

随着60年代黑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贝娄有意识地将这一社会问题在其中期创作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进行放大，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索，其政治意味更是被许多评论家们所津津乐道。比如犹太著名评论家卡津（Alfred Kazin）认为这部小说看上去像一部政治小说（3-4），因为它展示出世界的非理性和不公正，反映了贝娄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该小说创作始于1969年，恰逢非裔和犹太裔关系变得剑拔弩张之时，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异让二者互相指责，暗地博弈。因此这一时期受到白人和黑人广泛排挤的犹太人更多地转向于内部的团结与强大，更加侧重于自我身份的构建，以色列国的建立无疑成为他们最为强大的后盾。1967年发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军方压倒性的胜利给美国犹太人打了一剂强心针，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外黑人激进知识分子在二者关系的决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40年代便出现了几篇有关黑人反犹主义的代表性论述，而1967年非裔著名知识分子鲍德温（James Baldwin）撰写的文章《黑人是反犹主义者因为他们反白人的》（“Negroes are Anti-Semitic Because They're Anti-White”）无疑让二者的对立关系更加激化。该文旗帜鲜明地剖析了黑人对犹太人的憎恨：“在美国语境下，黑人反犹太主义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黑人实在是谴责犹太人已成为美国白人——实际上，已变成基督徒。犹太人从他在美国的地位中获利，他必须期待黑人不信任他。犹太人没有意识到他所提供的信任状，他被鄙视和被屠杀的事实，并没有增加黑人的理解。这增加了黑人的愤怒。”（web）来自黑人和白人的双重反犹主义观念让犹太人更加如履薄冰。

随着非裔和犹太裔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政治诉求，二者分歧加剧。城市问题不再是简单的黑人问题，而演变为涉及到城市空间的重构过程和经济地位的问题。60年代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黑人斗士中的反犹主义问题^[6]。早在1942年瑞迪克（Lawrence Dunbar Reddick）就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中的反犹主义主要是一个城市现象”(80),这一提法不仅将40年代的二者关系直接挑明,更是对城市空间再分配这一社会现象的有力佐证,这一矛盾冲突到了60年代达到顶峰。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从南方涌入北方,涌入纽约的哈莱姆区,黑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房租上的盘剥,尤其是犹太房东不应该也没有权力去剥削跟他们一样处于被蔑视地位的黑人同胞。昔日繁华的商业区因白人的逃离而逐渐萧条,城市居住区充斥着穷困的黑人和廉价的商品,城市空间被迫进行重新分配。新的城市空间被建构出来的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人应当享有的空间权益,这带来了一系列非正义现象的出现,比如代表着身份的居住区隔离,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掠夺,以及城市人的社会心理发生异化,等等。靠近黑人聚居区的犹太移民通常生活在半贫困之中,这也意味着犹太人的安全威胁同样来自于城市里居住的黑人。一方面有的黑人基督徒在宗教理念上痛恨犹太人,另一方面对于犹太人取得的各种成就又有着复杂的心理,艳羡和嫉妒的矛盾心理驱使他们去破坏犹太人的地位和成就。《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黑人扒手在公共场合的肆无忌惮及赛姆勒等城市人的社会心理变异便是此时期的一个缩影。

然而60年代当各种运动褪去激进主义的色彩后,随着社会种族矛盾的逐渐缓和,以及黑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贝娄对黑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1973年洛杉矶迎来了第一位黑人市长布莱德利(Thomas Bradley),并且连任五次;1975年詹姆斯(Daniel James)成为第一位黑人四星上将,同年黑人自己拥有并运行的第一个电视台在底特律诞生。1977年哈利(Alex Haley)凭借《根》(*Roots*)斩获普利策奖。1978年莫里尔(Ernest Morial)当选为新奥尔良市第一位黑人市长。《院长的十二月》的出版无疑不能脱离这些事件的影响而单独存在。这部出版于1982年的小说是继贝娄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再一次将种族问题放在读者面前,并颇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刚出版不久便收到了许多否定的评价。博伊尔斯(Robert Boyers)去信告知贝娄,在西北大学的学生们认为此部小说“扭曲事实”(转引自Bellow, *Letters* 393)。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曾发表自己对《院长的十二月》的书评,认为该书是“自我意识的极端”(400)并称这部小说是贝娄的自传。这也激起了具有犹太身份的贝娄极大的不满,他回信道:“我感觉当我读你的评论时,你觉得我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意识到你对我那种异类感远远超过我对你的感受。美国人、犹太人、小说家、现代主义者——当然我的确具备所有这些特征。”(400)由此可见贝娄在创作晚期非常强调自己的身份问题,并置身于美国的大环境中思考种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这部小说展现的种族问题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贝娄对黑人问题的拨乱反正,而有的学者^[7]认为这是贝娄一贯无视非裔的种族倾向。

小说通过一桩杀人案展开对黑人问题的探讨。主人公科尔德所在学院里的一个白人学生莱斯特被洗碗工伊布里和妓女海因斯先割下耳朵,之后再捆绑着抛出三楼的窗外活活摔死,死亡现场惨不忍睹。读者只知道谋杀发生在炎热夏天的一个晚上,莱斯特无所事事地冲进了

黑人聚会的一个酒吧，惹恼了伊布里和海因斯。莱斯特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惹恼了这两位黑人，便邀请他们去自己家做客，结果发生了惨剧。有的读者读到这里就已经按捺不住对贝娄种族倾向的抨击，认为这是实实在在对黑人的控诉。小说始终没有讲到最后庭审的结果如何，但是小说暗示出黑人的这种过激行为有其根源，那就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或者他们铅中毒或者来自边远地区”（Bellow, *The Dean's December* 139），工业社会以底层人民为牺牲品，以及政府对他们生活的不闻不问，这些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正是科尔德的一位科学家同事比契的研究成果，他曾请求院长帮忙把这项研究公诸于众。比契以直接的数据和实验测量向公众说明此问题的实质，并给公众开启了一部新的贫民窟启示录：

成千上万吨难处理的铅残留物毒害着穷人的孩子们，他们最为脆弱。在那些破旧的贫民窟四周，浓度已相当高，在那儿已经堆积了数十年之久。钙吸收了这些铅。如果从临床的角度观察这些孩子的行为，就会看到慢性铅损伤的经典症状。[……]。城市中心人口中的犯罪和社会无序状态都可以追溯为这种铅导致的结果。它最终造成神经疾病和大脑崩溃。（137）

针对黑人的居住问题，美联社曾做过一项不为公众所知晓的政府研究项目并得出结论：“较之美国白人，美国黑人有可能高出 79% 的可能会居住在环境受污染甚至会导致严重健康威胁的区域。”（*The Associate Press* 294）这也正是本文所突显的一个严峻事实。正如贝娄在评价《院长的十二月》时所声称的：“[这部小说] 是对大城市里黑人的去人性化的一种抗议。我代表这些底层黑人阶级发言，并且告诉白人们他们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转引自 Goldman 39）贝娄要让读者们了解这一“芝加哥的真实声音——发自最低音区即社会最底层的时代精神”（*The Dean's December* 42）。他希望能把这种低音区的声音带到高音区，让所有人去聆听。小说里黑人摆脱了之前谋杀者、莽汉或强奸犯的形象，变身为体面的大使或是行善之人。与此同时，1983 年的芝加哥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贝娄发出全力支持的呼声，并声称黑人应该拥有“城市机器”，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贝娄对待黑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这部小说曾一度被认为是贝娄作品的败笔，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热情沉思的推理之作，但是作品对民主制度、种族问题、人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作出终了的判决，略显遗憾。小说主人公科尔德性格过于复杂，对许多问题不置可否，不予回应。科尔德在外人看来是傻瓜、白痴、门外汉，比如教务长韦特认为科尔德是个傻瓜，是不可调教之人。与科尔德一同长大并一起共事过的斯潘格勒认为他过于天真，妹夫扎赫那认为他是位涉世不深的傻瓜，美国的书呆子，外甥梅森认为科尔德是位种族主义者。继发表在《哈珀氏》上的文章之后，科尔德收到编辑的来信，告诉他“自由派认为他反动，保守派说他疯狂。职业城市专家说他太急躁”

(Bellow, *The Dean's December* 187)。但是在妻子米娜眼中，科尔德是位可以将任何事情解释给她听的学者丈夫。然而科尔德对所有这些贬损和褒奖没有自己清晰的见解，他也不去反驳别人对他的恶意攻击。

这种处事态度与贝娄之前诸多主人公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而且也与小说后半部分对城市飘渺的态度相吻合。正如小说中对城市的悖论性描述，科尔德一方面认为城市得了“枯萎病”，但另一方面他对芝加哥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觉得芝加哥不会走向灭亡：

于是，他就针对芝加哥的枯萎病来检验他的真理。绝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患了这种病。芝加哥还有摩天大楼里的商业活动，有雄伟不朽的银行业，有计算机化了的电子联合体。芝加哥还有它的历史，关于这部历史他写过许多奇妙的东西——提到过老邻居、周围的气氛、它们的建筑样式，那个地方的树、土、水以及意想不到的多变的阳光。他整理过来访这里的名人们的观感——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及著名的斯坦德，他的那本《假如基督来到芝加哥》有一些生动而很有价值的章节。科尔德既不直捣枯萎凋零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些方面能引发浪漫的情怀才去写它们，他也没有中产阶级的那种雅颂意识或伤古情绪。他甚至觉得，从这些凋弊之地迁徙出去的人们会在新的环境里更好地提高自己。但是迁徙而去也是害怕的表现。而且，荒凉被留在了身后，那是茫茫无边的废墟。(164)

从这一段我们了解到科尔德鼓励人们“迁移”出去，认为很可能人们到了新环境会有更好的发展，但他又认为人们如果真正迁移出去，肯定是出于恐惧，而且搬迁之后的城市也会变为被荒凉笼罩着的废墟。因此，乔国强评论其中的悖论时指出：

贝娄在小说中花了那么多的笔墨来建构科尔德眼中的城市，即贝娄借科尔德之口对城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怎么到了小说后半部分似乎又把科尔德，其实也是把他的城市观给解构掉了，变成了人应该适应城市，而不是城市适应人的主题。这其实正是贝娄叙事的狡黠之处。贝娄自身对城市是抱有复杂态度的，城市的腐朽令他痛恨城市，但人类不可能和城市割裂开来的现实又使他不能判处城市死刑。(35)

所以如果仅仅只把小说归为对黑人的歧视及对城市的蔑视显然欠妥，毕竟贝娄为黑人摇旗呐喊的姿态不可视而不见，同时贝娄也强调一时的逃离并不可能真正解决城市的根本问题，去正视、面对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才是正道。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出版于1987年，贝娄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探讨黑人问题：“黑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惰性在人权运动中摈弃了，黑人也就加入了觉悟的群体，从而创造出一种‘理想

的语言’。”(8)此外贝娄在收官之作《拉维尔斯坦》中不惜笔墨赞颂黑人为美国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篮球和爵士乐一样,是黑人对于这个国家高尚生活的重要贡献——他独有的美国特色”(56)。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76年欧文·豪(Irving Howe)就在《父辈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中指出了黑人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和引领:“即便这个年代的表演者们毫无疑问都是犹太人,并且以意第绪语文化符号和指称作为自己的部分定义,但是这些表演的早年成功却来自于以黑面孔为载体的戏剧表演中。黑面孔娱乐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早于犹太表演的兴起。”(562)这无疑是在向以“滑稽歌舞剧”为代表的黑人文化的敬礼。黑人作家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一次访谈中也强调美国文化本质上是美国非裔文化:

我们所认为的美国作品中的方言文化受到了美国非裔口头文学的口头传诵故事的极大影响。马克·吐温的作品里有它的印迹;音乐里也有它的印迹。在“滑稽歌舞剧”(minstrel show)这一伟大、原创的音乐艺术形式中也有它的印迹。它出现在流行音乐、密西西比河沿岸牛仔们、船员以及撑筏者们的民谣中。所有这些都有一些旅行者们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而且得到了像马克·吐温这样作家的青睐和认可,他的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尤其关注于美国非裔的言说、迷信以及人性。(转引自 Budick 36-37)

贝娄的晚年作品展现出一个更大的城市共同体,一个集多样化城市社区于一身的结合体,在这个大共同体里不同文化互相补充、互为参照,读者可以看到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甚至还有黑人、印度人、中国人、波多黎各人,等等。与早期《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中不同物种共居的共同体不同,此时的共同体明显具有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这种共同体也是全球化进程(globalization)的一个体现。城市的高度发展走向更为密切的交往与融合,城市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全球框架下的城市交融群和人种混居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地球上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便是全球化,地区间的隔阂、人与人的隔阂、民族间的隔阂、国家间的隔阂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交流的顺畅化和“一体化”,人们越来越期盼着“大同世界”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

正是全球化现象的影响和贝娄晚年心境的改变,使得贝娄在黑人问题、共产主义问题上不再采取过去激进的批判态度或者是站在全盘否定的立场上。从贝娄中期《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里批判黑人的毫无教养,并谴责他们是社会的毒瘤,到《院长的十二月》理性地对待种族问题,主动去描写大都市空间下底层黑人的社会问题和生存状况,贝娄以同情者、理解者、安慰者的立场去创作这部小说,同时小说里黑人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贝娄晚期的城市小说慢慢体现出一种对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去探究这些事物的表象,而不是向自己的‘丰厚’的生长环境不断祈祷,这种哺育环境

坚持向善的成功以及爱的胜利。而我自己的追求是美好与解放。我尽力自己尝试着去坚持这些信仰。”(Roudane 268) 犹太文化中向善、追求美好的“普世主义”在贝娄长达 60 年的创作生涯中便藉此圆满收官。

注释 [Notes]

- [1] 诺贝尔文学奖给贝娄发表的声明中将其创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到第四部长篇小说《抓住时日》(*Seize the Day*)，第二时期则以贝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Augie March*) 为始点。亚德武 (C. S. Yadav) 在其专著《索尔·贝娄》(*Saul Bellow*) 中将贝娄的创作按照主题进行划分，分为四种类型：40 年代的受害者小说、50 年代的冒险小说、60 年代的幸存者小说，以及七八十年代的超越小说。参见 C. S. Yadav, *Saul Bellow*. Printwell, 1991, p. 10。刘兮颖在其专著《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索尔·贝娄小说研究》中将贝娄的创作按照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分成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创作 (1941-1958)、中期创作 (1959-1986)、晚期创作 (1987-2000)。本文将按照贝娄对城市态度的轨迹来进行划分。笔者在 2012 年博士论文《索尔·贝娄城市小说研究》中按照贝娄对城市的动态理解轨迹将其创作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40 年代初至 50 年代末，贝娄极力传达出犹太移民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第二阶段是从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纽约和芝加哥为核心，体现出作者及人物对城市极强的排斥性；第三阶段是从 80 年代至 2000 年，主要体现了贝娄城市再接受的心理过程，批判的笔触不再那么犀利，这一时期的城市主题更加多元化，涉及人生、历史、死亡、友谊等问题，展现后现代语境下城市的国际性、多样性、全球性等特点，并最终在犹太性和犹太身份的强化中收尾。由于本文将族裔问题放置在城市的大背景中考察，不少非裔和犹太裔学者认为黑犹关系在社会学层面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跟城市空间的占有离不开，故本文拟采用此种划分方式。
- [2] 参见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 2 版)，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书中鲍曼指出当前社会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它在两个阵线上遭受攻击：一是全球前沿地带里旧的结构和规则已经无法保留，而新的结构尚未成形；二是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政治领域。二者构成的空间将国家包围起来，而社会则被包围起来。
- [3] 参见 T. J. English, *The Savage City: Race, Murder, and a Generation on the Edge*. Harper Collins, 2011.
- [4] 小说中所有年轻人反主流文化和激进主义的疯狂行为在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的长诗《嚎叫》(“Howl”) 里都有隐或现的投射：“我看到这一代青年精英毁于疯狂，/他们饥饿，歇斯底里，裸露着身子，/在黎明时拖着沉重的躯体，/穿过黑人街巷，寻找疯狂的吸毒机会……他们用香烟蒂焚烧苍白的的手臂，对资本主义喷吐有麻醉品的烟雾表示抗议。”(1-11)
- [5] 1961 年的自由乘车运动 (Freedom Ride) 是为了检验美国最高法院取缔跨州通行时种族隔离制度的执行效果而由黑人发起的一系列公交车之旅。
- [6] 其实美国历史上犹太人和黑人的关系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局面。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犹太人害怕与黑人成为盟友。1934 年爆发了一场反对犹太人剥削的行动，40 年代的二战及 KKK 的极大威胁，使得双方结成暂时的同盟，这种有利关系一直持续到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60 年代美国黑人社会对美国犹太人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一些黑人领袖也承认黑人团体中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黑人的激进主义开始令犹太人感到恐惧，黑人憎恨白人，也憎恨犹太人。进入 80 年代，这种紧张关系相对缓和。贝娄不同创作阶段的黑人形象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政治背景的影响。有关美国历史上的犹太人与黑人关系问题可参考：Cheryl Lynn Greenburg, *Troubling the Waters: Black-Jewish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Princeton UP, 2006; Eric J Sundquist, *Strangers in the Land: Black, Jews, Post-Holocaust America*. The Belknap P of Harvard UP, 2005; Hasia R.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2000*. U of California P, 2004.
- [7] 参见 Martin J. McGuinness, “Invisible Man in Saul Bellow’s *The Dean’s December*.” *Saul Bellow Journal*, vol. 16, no. 2, 2001, pp. 165-85. 文章认为贝娄似乎对美国非裔视而不见，还认为在此小说中，当人的权力被滥用的时候，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丧失了他们的人格尊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rnes, Fred. "The Revenge of the Squares: Newt Gingrich and Pals Rewrite the 1960s." *New Republic*, 13 Mar. 1995, pp. 23-29.
- Baldwin, James. "Negroes are Anti-Semitic Because They're Anti-White." *The New York Times*, 29 Mar. 1998,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98/03/29/specials/baldwin-antisem.html>
- Bellow, Saul. *It All Adds Up: 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Penguin, 1994.
- . *More Die of Heartbreak*. Penguin, 2004.
- . *Mr. Sammler's Planet*. Penguin, 2007.
- . *Ravelstein*.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2008.
- . *The Dean's December*.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2008.
- . *Letters*. Edited by Benjamin Taylor. Viking, 2010.
- 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Students*.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 Budick, Emily. *Black and Jews in Literary Conversation*. Cambridge UP, 1998.
- Carson, Clayborne. "Blacks and Jew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Case of SNCC." *Bridges and Boundaries: Africa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Jews*, edited by Jack Salzman, et al., Braziller, 1992, pp. 36-49.
- Ferretti, Fred. "New York's Black Anti-Semitism Scare." *Strangers and Neighbors: Relations between Blacks and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Maurianne Adams and John Bracey,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9, pp. 645-59.
- Ginsberg, Allen. *Howl, Kaddish and Other Poems*. Penguin, 2009.
- Goffman, Ethan. *Imaging Each Other: Blacks and Jew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0.
- Goldman, Liela H. "The Dean's December: A Companion Piece to Mr. Sammler's Planet." *Saul Bellow Journal*, vol. 5, no. 2, 1986, pp. 36-45.
- Howe, Irving. "Journey Outward." *World of Our Fathers*, by Irving How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562-63.
- Kazin, Alfred. "Though He Slay M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 Dec. 1970, pp. 3-4.
- Kristeva, Julia.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lated by Leon S. Roudiez. Columbia UP, 1991.
- Podhoretz, Norman. "America at War: 'The One Thing Needful'." *Francis Boyer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13 Feb. 2002.
- Qiao, Guoqiang. "'Tale of Two Cities' in Saul Bellow's Writing: A Note on Saul Bellow's *The Dean's Decemb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11, pp. 29-35. [乔国强:《索尔·贝娄笔下的“双城记”——试论索尔·贝娄的〈院长的十二月〉》,载《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第29-35页。]
- Reddick, Lawrence Dunbar. "Anti-Semitism among Negroe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Africa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Jews*, edited by Jack Salzman, et al., Braziller, 1992, pp. 79-85.
- Roudane, Matthew C. "An Interview with Saul Bello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25, no. 3, 1984, pp. 265-80.
- The Associated Press. "More Blacks Live with Polluti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8th edition, edited by Paula S. Rothenberg, Worth, 2005, pp. 294-96.

FLC

文 学 研 究

重返“自然”

——A. S.拜厄特《巴别塔》中的语言与科学

◎ 姚成贺

内容提要: A. S. 拜厄特广泛的阅读兴趣与文本指涉令她跨越了艺术与科学的界线, 在虚构小说和批评作品中都表现出对于自然历史与科学研究的关注。《巴别塔》中的科学知识书写同小说所强调的语言问题发生的关联, 并非仅仅停留在符号化象征、语言与真实之间关系的层面。从“自然”这一视角出发, 在环境诠释学与伽达默尔语言观的启示下, 作品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在科学知识的书写中展现出词与物的重新交织。自然是是否能够言说的问题, 令环境问题与语言问题产生了交集。拜厄特相信语言描述世界的能力, 并以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阐释描述自然与世界的语言。语言已成为人类与世界共同话语的一部分, 关于语言教学理论的书写最终也归结于对人类主体与语法规则的认识上。

关键词: A. S. 拜厄特 《巴别塔》 自然 语言 科学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56-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类青年项目“知识话语与拜厄特小说创作研究”(15CWW017)

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70

Title: Return to “Nature”: Language and Science in A. S. Byatt’s *Babel Tower*

Abstract: A. S. Byatt’s interests cover both art and science and concern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both her fictional and critical works. For instanc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language in *Babel Tower* goes beyond issues of the symbol and the language-reality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e,” with insights from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and Gadamer’s views of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reveals a new interweaving of words and things. In this novel,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have intersec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nature can articulate. Since Byatt believes in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 world, she interprets the descriptive ability of language i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eaching is also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ubjects and grammatical rules.

Keywords: A. S. Byatt, *Babel Tower*, nature, language, science

Author: Chenghe Yao,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英国当代小说家、批评家拜厄特 (A. S. Byatt) 广泛的阅读兴趣与文本指涉令她跨越了艺术与科学的界线, 在虚构小说和批评作品中都表现出对于自然历史与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她发现自己“最关心的作家”都对各自时代的社会状况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并“深深沉醉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Fiction” 294), 例如爱略特与柯勒律治。在书写于理论盛行的时代、探讨语言本质问题的《巴别塔》(*Babel Tower*) 中, 生物学家、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们不断发出科学知识的声音, 甚至令小说充斥了大量的权威性观念。科学知识话语与其他包括宗教、文学、艺术、语言等学科话语的交织, 展现出这些原本看似自足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联, 拜厄特“成功地将她小说中的主题——语言、社会、文学和科学——与一系列优雅连贯的隐喻结合起来”(Alfer and Edwards de Campos 78)。斯特洛克 (June Sturrock) 赞赏拜厄特的小说充满“各种各样复杂、迷人、相互联系的人类知识”(93)。但是, 正如瑟恩森 (Sue Sorenson) 所批评的, 这里的“人类”一词很难让人认同, 因为知识实际上“超越了人类的界限”(183), 作品中的科学知识书写既包含语言结构、教育理念, 也不乏有关自然界物质的思考与讨论。

在 2005 年发表于《自然》(*Nature*) 的文章《科学启示的小说》(“Fiction Informed by Science”) 中, 拜厄特以《巴别塔》为例, 表达了她将科学作为自己创作思想源泉与看待世界新方式的兴趣。在有关蜗牛的遗传学与神经科学研究中, 拜厄特发现了“人类普遍共有的语言, 实际上超越人类, 将所有生物联结在一起的语言, 那就是 DNA 的四字密码”(295)。她也提到了在发现蜗牛、其拉丁名字、背壳形状、DNA 双螺旋结构之间奇妙联系时的喜悦之感。最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科学发现都“可以写进天堂花园意象和现实主义的科学故事”(295), 并且要不忘设计“对语言或文学都不感兴趣”的科学家人物形象(294)。《巴别塔》中的科学知识书写同小说所强调的语言问题发生的关联, 并非仅仅停留在符号化象征、“语言与真实之间关系”的层面 (Wallhead 133)。从“自然”这一视角出发, 在环境诠释学与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语言观的启示下, 作品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将在科学知识的书写中展现出词与物的重新交织。

一、环境意识：自然尚未终结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认为, 自然是“赋予人类知识的导师”, “每个自然物, 如果观察得当, 都展示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22)。并且, 这种精神力量是“无意识的真理, 当人类通过自然物来定义和解释它时, 它就变成了知识领域的一部分”(21)。在谈到《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的创作时, 拜厄特提到, “我将昆虫视为非人类, 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他者, 我们应该去思考非人类, 从而成为完整的人类”(On Histories 115)。这与美国哲学家、生态学者和自然作家艾布拉姆 (David Abram) 提出的“只有在与非人类物种的联结中, 我们才得以成为人类”不谋而合 (ix)。在艾布拉姆看来, 人类的眼睛对非人类的或人类发明的事物变得相当盲目, 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共同的话语中”, 随意评论动物生存的自然界, 乌鸦或蜘蛛的

活动不会被视为一种创造性反应 (Abram and Carey 727)。拜厄特对非人类他者的关注常常集中体现在昆虫身上,在《传记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中,主人公菲尼亚斯随同生态学家、环境主义者、蜜蜂分类学家芙拉观察昆虫之间的争斗,着迷于自然界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与动物种类;在《巴别塔》中,这种关注体现在对蜗牛的观察与研究中。

小说女主人公之一杰奎琳自幼便钟情于动物世界,成年的她以蜗牛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记忆的生理机能。在以“蜗牛种群在其背壳条纹变化中所表现的遗传改变”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研究中,杰奎琳对两个花园蜗牛(*Helix Hortensis*)种群和两个森林蜗牛(*Helix Nemoralis*)种群进行观察实验,并通过探究两类蜗牛外壳的各类带状花纹来研究其中的基因变化。研究的预期结果是验证进化理论,“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发生”(Byatt, *Babel Tower* 357)。画眉是蜗牛和虫子的天敌,自然界中的食物链维持着生物种群的平衡。然而,杀虫剂的滥用令吃下有毒虫子尸体的画眉DNA遭到破坏,基因像辐射一样被改变。最终,它们或中毒而死、或失去繁殖能力、或产生畸变,导致许多地方画眉的绝迹。杰奎琳和同为生物学家的卢克希望找到蜗牛数量因画眉数量的减少而产生的变化。小说的另一位女主人公弗莱德丽卡面对此景则不禁悲从中来:“人为制造的死亡通过空气、水和物质,通过树叶、皮毛和血肉骨骼甚至背壳悄无声息地降临人间。”(358)《巴别塔》中的蜗牛与科学、文学、性、传奇、美相关,同时象征了在难以避免的暴力面前生命的脆弱,“不论是在画眉的铁毡上,还是人类的残忍面前”(Pereira 493)。

小说中的这一信息指向了60年代科学和政治领域的争议话题,即生态研究与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揭示了人类滥用的杀虫剂进入动物的栖居地、鸟类的食物链,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讨论了现代科技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杰奎琳对于生态研究这门新兴科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还送给研究大脑神经科学与记忆机制的友人马库斯一本《寂静的春天》,二人都为之深深着迷。环保主义者大多支持关于自然的浪漫主义观点,即认为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人类曾经适应于这一整体之中,如今却通过在计算和控制方面傲慢的努力而背叛自然。“当人类按照‘自然过程’行事时,他们的行为是有害的和不自然的(并且是不道德的)”,当他们被“傲慢的梦想所束缚,认为人类的行为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实际上是主人的)自然”时,他们带来了技术,“其最终后果是环境灾难”(Cameron 104)。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中总结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眼中强大而可怕的人类形象,因为他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他认为自然是“关于世界和人类在其中位置的一系列想法”,这些想法的终结始于现实世界的具体变化,科学家可以进行测量举证(7)。人们无法将自然视为独立于人类的存在,因为后者无时无刻不在重塑自然。

从自然能否言说并得到聆听的角度出发,自然环境的问题与拜厄特一直关注的语言问题产生了交集。艾布拉姆在《感官的符咒》(*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中提出自然以符合伦理考虑的方式进行“言说”的观点。自然拥有语言,语言是所有生命世界的表现,而不是“人

类独有的财产”(78)。“每一事物所发出的任何声响都可能是一种声音,任何活动都可能是一个姿势,一个有意义的表达;这种表现就是世界自身的一种性能”(Abram and Carey 730)。也即表明,语言并非仅只意味着人类所使用的意指符号,而是任一事物意义表达的方式。《巴别塔》中,杰奎琳和卢克在蜗牛身上看到环境的变化,“粉色的,黄色的,山毛榉树林中不带条纹的蜗牛更多一些,带条纹的则多在灌木树篱,在那里它们能够以条纹伪装逃过画眉的捕食”(357),这可视为自然界的生物面对人类以色彩与样式进行的言说。沃格尔(Steven Vogel)在《自然的沉默》(“The Silence of Nature”)一文中回应认为,“自然在言说,问题是听不到”(145)。他断言,“语言使用中的伦理意义源于其在对话中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非人类实体无法参与对话”(161)。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遭遇人类破坏、又无法参与对话的自然,似乎无路可走,无法避免被终结的命运。

这两种对于自然言说与被聆听的观点,核心问题都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语言作为媒介来阐明其目标。实际上,沃格尔的论点并没有得到热情的回应。环境哲学家卡梅伦(W. S. K. Cameron)在解释沃格尔言论缺乏回应的原因时指出,“笛卡尔二元论的失败和后结构主义的怀疑,令我们无法发展一种没有自然概念的环境哲学”(102)。他继而提出,求助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因为它反对语言与世界之间相互对立的传统观点(103)。正如伽达默尔以“语言”与“世界”的批判性概念所展示的,“自然”以对自身概念不断重构的方式得到充分具体的观察,从而捕捉这些词汇本身呈现世界的方式。换言之,尽管人类与自然实体无法进行有效的言语交流,但一方面,人类提供了“自然的语言”,即在人类群体中分享对自然的描述与阐释;另一方面,对诠释学而言,语言并不仅仅意指人类的语言,而是“一切事物所拥有的任何语言”(Gadamer 470)。在伽达默尔对世界的诠释学说明中,“自然”得以重返。

拜厄特在描述与阐释自然的同时,也以DNA的双螺旋结构、斐波那契数列描写了“一切事物所拥有的任何语言”。在《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中,卢克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测量蜗牛的外壳并将其外壳浸入透明的啫喱中,用高精度钻石垂直切割后得到优美的斐波那契螺旋线。斐波那契数列揭示了广泛的自然现象之规律,从藤蔓植物到根茎,从蜗牛到松塔向日葵,是自然界中最普通的螺旋。植物所显示的数学特征是“一个柏拉图秩序的例子,看不见的数学秩序隐藏于我们的物理偶然世界”(Byatt, “Fiction” 295),也是自然之语言的象征。关于DNA的讨论作为一个语言的隐喻,是一种会产生无限联结可能的字母表(Byatt, *Babel Tower* 357-58),“不只是人类的身体,而是整个感知世界提供了语言的深层结构”(Abram 85)。但进一步思考,语言如何拥有再现自然与世界的可能?小说中对语言结构的直接探讨带来了关于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思考。

二、语言再现自然与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起,拜厄特小说中的后记致谢常常包含科学家与科学著作或论文。她

本人也曾参与科学家的广播对话节目。例如1993年与进化论生物学家琼斯(Steve Jones)的对话,对四部曲和《传记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的创作影响颇深。科学家常常使用抽象与隐喻拓深洞见、交流思想。琼斯甚至认为基因拥有“语法”与“词汇”,呼应了流行的“基因语言”的观点。他进而提出二者更多的相似性,“语言和基因都会进化。每一代都会存在传播的错误,随着时间流逝,足够的差异积累会产生新的语言,或者新的生命形式”(xi)。拜厄特在《巴别塔》中以DNA螺旋比拟语言结构,“试图以记忆术建构有意识的模式、颜色与节奏,以此表现形式的意识”(Hadley 294)。但语言结构所表现的仅仅是形式的意识吗?

小说描写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语言学家维基诺贝尔研究语言与语法的形式,分别热衷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一切语言都具有“区别性特征”,以及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视为象棋游戏,认为词语是任意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形式功能。索绪尔将语言不是人类创造的、不受人类控制的事实,同语言的任意性联系起来,“符号的任意性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深入一步,我们却可以看到,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Saussure 73)。在“任意性”背后,包含着启蒙运动提出的传统与理性的抽象二分。支持能指任意性的,是一种启蒙式的自信,相信意识独立于具体的历史世界(魏因斯海默 109)。索绪尔不仅借助康德式的科学哲学,还求助于形式主义美学。语言独立于言语,必然导致艺术作品独立于其表现的结论。对此,伽达默尔并不认同,他认为,“艺术作品,从其表达到表现的‘境遇’出发,去经验某种对其意义的深层规定[……]每一次演出都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一个与文学作品相脱离的自行出现和消失的事件——作品本身就是那种在演出事件中所发生的事情”(147)。艺术作品与其表现形式同生共息,不可分割。

《巴别塔》中,卢克在描述蜗牛各式各样的外壳时使用的是“充满诗意的语言”:花园蜗牛的嘴唇是白色的,“可爱的、象牙白的、闪耀的唇”;而斑带树叶蜗牛则以“乌黑发亮”的黑唇与之相区别(358)。用艾布拉姆的话说,卢克的描述“保持着感官的清醒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意识”,是一种“与人的感官和人关于世界的直接感觉体验相一致的表达方式”(Abram and Carey 727)。他对世界的感知来自于从语言和文化中继承而来的视角,认同世界经由语言而出现。从他选择的语言,弗莱德丽卡感受到卢克深爱着他所研究的生物。语言已经成为共同话语的一部分,一种深深影响人们看和听、甚至体会周围世界的言说方式。弗莱德丽卡对于卢克所运用诗意语言的惊讶也提醒人们,个体的观点可能并不完整,“没有人怀疑这个世界可以脱离人而存在,[……]这是每个人类语言构成的世界观意义的一部分。在每一种世界观中,世界本身都是有意义的”(Gadamer 447)。卢克的语言消除了弗莱德丽卡对他的误解,让她发现了作为科学家的卢克与擅长语言文字的自己之间的共通之处。

另一方面,拜厄特反对语言仅仅是符号系统的后现代语言观。她提出,“我为文学理论感到忧虑,他们认为语言是自足的符号系统,与事物无关,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我并不是说词与物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就像事物表面之上的花之网一般”(Passions 65-66)。在《静

止的生活》(*Still Life*)中,她曾借小说中剑桥教师、诗人拉斐尔之语,批判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的观点,“词语不再与他们指称的事物相一致,人们对语言的自我意识愈发膨胀,将其视为人化物,与世界逐渐分离,只是一个为掩盖我们只略知一二的事物而织就的网络结构”(218)。拜厄特相信,语言能够描述我们周围的世界,“让‘玫瑰’一词绽放在真实的玫瑰之上,正如绽放在花茎上的玫瑰”(218)。这与伽达默尔语言观的核心观点——语言不是符号相一致。伽达默尔对这一观点的陈述从批判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语言学开始。卡西尔的语言学形式主义认为,语言的领域,包括神话、艺术,以及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是符号性的,即在语言之中不存在实质的内容,所有一切都是意识造就的符号。存在(being)只能在行动(action)中理解,“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存在是本质性主体的表达”(Gadamer 474)。卡西尔将文化的符号系统视为一种科学的符号化实行,在他看来,正是自然科学提供了所有精神活动的典型方式,科学而非艺术,最好地说明了“符号”所意指的内容。

艾布拉姆指出,在最初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与自然世界之间的明显联系,“我们早期的所有书写系统都保持着与超人类世界的神秘事物的联结”(96)。伽达默尔认为现代词语同样不只是符号,而是某种类似图像的事物。正如从洪堡到乔姆斯基的学者们所坚持的,语言的创造性才是它的正常状态。这种创造性属于语言,而不属于任何单独的言说者。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与人类同时出现,因此语言不能被理解为人类的创造物、言说主体的表达。当他提出“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时(412),并不是在通过诉诸言说主体来解释语言的意义,而是在谈论符号。语词所表达的是其意指的事物,因此是“世界制造”的(world-made)。伽达默尔“世界制造”的认识表明,关于自然的观点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具有独特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根据新的经验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重新解释(Cameron 115)。语言不仅预先诠释了自然,也提醒我们,自然是独立于人类想象之外的存在。最终,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自然与世界。

三、语言教育与自然天性

语言成为人类与世界共同话语的一部分,关于语言教学理论的书写最终也归结于对人类主体与语法规则的认识上,尤其体现在儿童的语言教育方面。在小说的内文本《乱语塔:献给我们时代孩子们的故事》中,卡尔沃特一行人期望建立的理想世界里,嫉妒与偏爱不复存在,儿童是所有人关爱的对象。新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将拥有选择适合个人学习进度,以及内容与方式的权利,“强加给学生们清规戒律只会改变与扭曲他们的心灵,如盲从、重复记忆无法理解的诗句或数字、透视法、道德箴言。一切都应该是真正的发现,一切问题都要待孩子们迫切需要时才得到回答”。并且“成年人要向儿童学习,因为儿童是自然的产物,他们带着自然的能量与精力脱离母亲的子宫”(Byatt, *Babel Tower* 205)。

这是《乱语塔》作者裘德描写的乌托邦式教育模式,裘德这一名字暗示了他如哈代(Thomas Hardy)笔下“无名的裘德”般边缘化的人生。在审判《乱语塔》的法庭上,他回忆起儿时的经历,讲述自己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被送到斯温伯尔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他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在学校排演的所有莎剧中都饰演主角,英文教师也认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奖学金、大学、诗人将是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尽管如此,裘德终因学不会察言观色而无法继续在那里的生活,在16岁时不堪忍受学校的严酷制度而逃离学校来到巴黎,从此与父母断绝了联系。于是,在《乱语塔》中,裘德虚构了领导者卡尔沃特起草的《法则备忘录》,这是在理想社会中最优化地进行劳动力分工的基础,教育体系、衣着方式、语言新形式等问题都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分工框架之内予以讨论。卡尔沃特在演讲中质疑机构,认为在他们离弃的现实社会中,“邪恶的等级与压迫来自于我们没有勇气去质疑的机构”。在那里,儿童成长于家庭之中,知识分子、君主制度、基督教、教育地点等都效仿家庭模式而建立,这是“权力、法律、狭隘的忠诚、等级、排他且狭隘的情感与特权的结构”,所有这一切导致压迫、非理性,以及私有财产和个人贪念的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专制关系”,与婚姻、家庭、父权的专制一脉相承。机构的制约危害了人类自然的冲动和天性,而人们对这一“缺乏人性的机构”还缺乏深入的研究。(Byatt, *Babel Tower* 65)教师被冠以“童年时代的暴君”之名,“趁我们既无力量又无知识反抗之时牵引着我们的意图”(284)。

在裘德的意识中,压制人类自然天性最典型的代表是师生之间的教育专制关系,罪魁祸首是机构——学校。而在《巴别塔》的叙事主线中,拜厄特描写了斯蒂尔福思语言教育委员会这一学校监管机构,围绕语言教育展开了一系列思考与论辩。委员们从语言习得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高度出发,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规律,并以此制定学习与方针政策,监管学校的语言教学情况。他们将对中小学英语语言的教学问题提出建议,包括阅读教学运用声音还是视觉,语法教学具有哪些优缺点,针对修正与规则如何进行自由表达等具体问题。哲学家、教育家布伯(Martin Buber)所提出的教师拥有无上权威的观点,令教学问题被提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教师的权威继承自其文化背景,但随着文化权力的逐渐瓦解,这一观点逐渐显露出“权力意志”的弊端。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是过分强调“爱”的力量,权力退化为理想中的师生相互依存、充满慈爱的模式,从专业的教学关系退化为单纯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很难在教师与学生之间长久地保持,因为它依靠的是诚信与耐力。委员们追溯自己孩提时代的学习经历发表各自见解,并分裂为遵循“规训与权威”和崇尚“爱与自由”的两大阵营(188-89)。

布伯对教与学主体关系的论述延伸至教学氛围及语法规则的认识中,认为学生必须学习语法。崇尚爱与自由的一方则认为,语法是一个陷阱,象征着一种压迫。学生应该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顺其自然地学习语言,“一旦明白儿童在造句方面的天赋,我们就不必急于强迫训练”(143)。学生不需要读懂弥尔顿、多恩,他们只需要学会如何写求职信和读政府报告,学习的目的从“理解”演变为“运用”。在解释其教育理念与强调语法重要性的原因时,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维基诺贝尔指出,“如果对如何描绘思想的结构一无所知,我们就无法分析它们

的本质与局限”(186),学校需要讲授语言的形式。

此处似乎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情形:一方面,拜厄特支持儿童是成人之父的浪漫主义观点,亲近自然的他们代表人类美好的天性;另一方面,爱与自由一方却忽视了文学语言的重要,仅仅着重于语言的交流与应用功能,而不是语言内容本身,即在弥尔顿、多恩诗行中的力量。这将视线拉回到前文关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中。维基诺贝尔于6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当时,乔姆斯基的理论仍然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宣称人类已经证实,语言拥有深层普遍结构与语法,这是人类大脑与生俱来的功能,而非后天习得,是人类生物身份的一部分,能够建构起无数嘈杂的声音与思维模式。生成语法、转换描绘拥有与数学演算相类似的精确度,它们的理解也依赖算法及数学结构,这正是曾经研究数学的维基诺贝尔的优势所在。他相信乔姆斯基的正确性,相信人类大脑生来具有产生并转换语言的能力,“如同海狸生来会制作堤坝、蜘蛛会结网一样,人类天生能够以语法形式进行言说与思考”(Byatt, *Babel Tower* 193)。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存在于大脑皮层的褶皱中,大脑神经的树突、突触、轴突中。维基诺贝尔转而相信人类天生具备语法能力,于是,关于学习与语言的理论将兴趣点转为对人类大脑生理机能的探究,思考遗传神经结构与人类语言能力之间的关联。通过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人类语法能力的讨论,小说阐释了语言教育观念的转变。

拜厄特对于科学的兴趣在其作品中展现为一种语言观与世界观,她相信语言拥有描述现实世界的的能力,科学家吸引她是因为“他们不花费时间去解构世界或对价值的抽象概念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含糊其辞”(On *Histories* 79)。在《奇特且迷人》(“Strange and Charmed”)中,拜厄特指出,当代大多数人,至少是那些读书并对周围世界感兴趣的人,更喜欢阅读科学书籍而不是哲学书籍。换言之,科学是当代更为普遍的接近知识的方式,因为“它们提供了现有的解答人类理解的基本需求、以事物的秩序反思我们的地域、一种复杂与神秘的意识、粗浅认识人类之外事物秩序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感觉真实事物的存在——我们属于其中,却不是全部——科学以美和恐惧、秩序和混乱向我们揭示他们的存在,[……]以细胞,基因,群落为单位”(44)。科学书写寄托着作家对于世界、人们认知世界和建构知识方式的好奇。科学知识承认外部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实验和研究不断地接近真理。在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中,无论科学研究抑或艺术作品,都成为知识的建构方式。

此外,以动物和植物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是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不可忽视的传统。“进入中世纪之后,植物逐渐成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浪漫主义时期,植物是与现代化、工业化对抗的代表与象征”(何宁,《动物诗歌》52)。当代诗人的动物诗歌创作,“深入思考当代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颠覆了以往习以为常的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突出在当代生态环境下,动物及其生活方式对人类的启示”(何宁,《植物主题诗歌》85)。动物植物世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也是拜厄特小说创作中的常见主题。在《园中处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中,马库斯第一次目睹作为实验对象的动植物,在学习鱼、畜、禽、植物等物种发展进程的启示下,

他意识到“认识自己”才是应该遵守的最初的戒律。自然世界与自我认识密不可分，帮助人类最终获得全面的认识，成为完整的人类，从而超越后现代主体自我指涉的困境。就此而言，“拜厄特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乔治·爱略特”（Sorenson 189）。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bram, David. *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Vintage Books, 1997.
- Abram, David, and David Carey.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the World of Sense: David Carey's Interview with David Abram." *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7, no. 6, 2015, pp. 725-31. [艾布拉姆、凯里：《科学的世界与感观的世界——大卫·凯里对大卫·艾布拉姆的访谈》，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725-31页。]
- Alfer, Alexa, and Amy J. Edwards de Campos. *A. S. Byatt: Critical Storytelling*. Manchester UP, 2010.
- Byatt, A. S.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 Vintage, 1993.
- . *Still Life*. Simon & Schuster, 1996.
- . *Babel Tower*. Vintage, 1996.
- . "Strange and Charmed." *New Statesman*, vol. 13, no. 600, 2000, pp. 44-46.
- .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Harvard UP, 2002.
- . "Fiction Informed by Science." *Nature*, vol. 434, 2005, pp. 294-97.
- Cameron, W. S. K. "Mu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Relinquish the Concept of Nature? A Hermeneutic Reply to Steven Vogel." *Interpreting Nature: An Emerging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edited by F. Clingerman, et al., Fordham UP, 2014, pp. 102-20.
- Emerson, Ralph Waldo. *Selected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World Publishing, 2010. [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 Weinsheimer and D. G. Marshall. The Crossroad, 2004.
- Hadley, Louisa. *The Fiction of A. S. Byat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He, Ning.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Plant Poet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8, pp. 51-58. [何宁：《论当代英国植物主题诗歌》，载《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2期，第51-58页。]
- .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imal Poet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7, pp. 79-86. [何宁：《论当代英国动物诗歌》，载《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2期，第79-86页。]
- Jones, Steve. *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 Biology, History and the Evolutionary Future*. HarperCollins, 1993.
- McKibben, Bill. *The End of Nature*. Random House, 2006.
- Pereira, Margarida Esteves. "Cell by Cell, Gene by Gene, Galaxy by Galaxy: A. S. Byatt's Scientific Imagination." *XV Colóquio de Outono: As Humanidades e as Ciências*, edited by A. G. Macedo, et al., CEHUM / Húmus, 2014, pp. 489-502.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McGraw-Hill, 1966.
- Sturrock, June. "Angels, Insects, and Analogy: A. S. Byatt's 'Morpho Eugenia'." *Connotations*, vol. 12, no. 1, 2002 / 03, pp. 93-104.
- Sorensen, Sue. "A. S. Byatt and the Life of the Mind: A Response to June Sturrock." *Connotations*, vol. 13, no. 1-2, 2003, pp. 180-90.
- Vogel, Steven. "The Silence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 15, no. 2, 2006, pp. 145-71.
- Wallhead, Celia. "The Un-utopian Babelic Fallenness of Language: A. S. Byatt's *Babel Tower*." *Dreams and Realities: Versions of Utopia in English Fiction from Dickens to Byatt*, edited by Annette Gomis Van Heteren, et al., U of Almeria P, 1997, pp. 133-50.
- Weinsheimer, Joel.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Peng Zheng. China Renmin UP, 2011. [魏因斯海默：《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郑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后殖民创伤研究

◎ 黄然

内容提要: 创伤研究源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以南迪、法农、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学者将创伤研究拓展到后殖民研究领域。后殖民创伤研究探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给白人施暴者和印度受害者带来的双重种族创伤。后殖民创伤研究超越了欧洲白人主导的创伤研究,也将个体创伤延展到了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层面。本文从身体创伤、历史文化创伤、创伤的讲述与治愈三个维度来梳理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中印度人和客居印度的西方人所经历的双重后殖民创伤。

关键词: 种族差异 文化差异 后殖民创伤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65-14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 北京 100049

Title: Post-Colonial Trauma in Ruth Praver Jhabvala's Later Indian Fiction

Abstract: Trauma studies originate from Freudian trauma theory. Post-colonial scholars including Ashis Nandy, Frantz Fan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Homi Bhabha apply the method of trauma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Post-colonial trauma studies examine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colonialism and racism upon both the white perpetrators and the Indian victims. Post-colonial trauma studies transcend traditional trauma studies 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Eurocentric, but also that they have expanded their research objects from the trauma of individuals to the trauma of an entire race and its cul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sychological damage of Westerners and Indians in Ruth Praver Jhabvala's later Indian fic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traumatized body, traumatized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therapy of curing the trauma by telling the stories of traumatic events.

Keywords: racial difference, cultural difference, post-colonial trauma

Author: Ran Huang, Lecture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 (Ruth Praver Jhabvala) 是一位犹太裔流散作家。她 1927 年生于德国, 1939 年随家人逃离纳粹德国, 移居英国, 并接受了正统的英式教育, 1951 年获得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之后随印度丈夫到印度定居。1975 年, 其作品《热与尘》(*Heat and Dust*) 获得布克奖, 从此扬名国际文坛。同年移居纽约。贾布瓦拉横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流散经历, 赋予了她独特的创作视角。她的晚期印度小说描绘了旅居印度的西方人群像, 也刻画了后殖民语境下印度人的生存现状。她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描述印度, 冷静中透着一丝幽默, 爱恨交融的情绪在她轻描淡写的文笔风格之下, 尤其显得飘忽不定。

东西方学者对于贾布瓦拉评价不一。总体来说, 西方学者对她赞扬有加, 而印度学者则对她的作品批评甚多 (Crane 122-27)。对贾布瓦拉作品最激烈的指责来自两位印度诗人: 伊扎基尔 (Nissim Ezekiel) 和索萨 (Eunice de Souza)。他们认为贾布瓦拉的作品是对印度形象的扭曲 (Ezekiel, "A Distorting Mirror?" 10; de Souza 219-24)。伊扎基尔写道: "我觉得《热与尘》毫无文学价值, 叙事结构牵强, 作者观点突兀而扎眼, 创作毫无特色, 人物形象刻板僵化, 作者对印度风景的描述带着恶意的偏见。" ("Cross-Cultural" 5) 在这些印度学者看来, 贾布瓦拉的作品缺乏深度, 人物形象刻板单一, 缺乏深度的人物心理分析。而西方学者正喜欢贾布瓦拉轻描淡写、幽默风趣、飘逸不定的文风。事实上, 贾布瓦拉在作品中鲜少评价和分析人物, 她只是简单几笔勾勒出人物形象的轮廓。

国际上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热与尘》上, 而关于《新领地》(*A New Dominion*) 和《印度经历》("An Experience of India") 的研究较少。在后殖民研究领域, 多数评论家喜欢将贾布瓦拉和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进行对比研究。他们认为《热与尘》是对福斯特《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或者《德维山》(*The Hill of Devi*) 的后殖民反写 (Cronin 142-59; Chew 103-17; Crane 57-92; Sucher 121; Goonetilleke 249-57);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热与尘》体现了作者对帝国时代的怀念 (Crane 7; Lall 145-52);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热与尘》中后殖民哥特主题 (Sucher 61-66; Newman 85-100; Denison 164-70)。目前为止, 国内尚没有学者研究过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中的后殖民创伤问题。

贾布瓦拉的晚期印度小说创作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彼时的印度虽已实现独立, 但殖民主义的阴影仍未散去, 印度人和客居于此的西方人都未从后殖民种族创伤中走出来。创伤研究源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南迪 (Ashis Nandy)、法农 (Frantz Fanon)、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 等学者将创伤研究拓展到后殖民研究领域。后殖民种族创伤研究探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给白人施暴者和印度受害者带来的双重种族创伤。殖民主义话语将欧洲文化凌驾于东方文化之上, 强调其优越性。殖民话语过于强调其文化中阳刚、暴力的一面, 从而导致欧洲文化失去了多样性和异质性, 尤其失去了他们人性中仁慈和善良的一面。这些西方人来到印度, 要么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 对印度不屑一顾; 要么对欧洲物欲横流的世界充满绝望, 来印度寻找精神家园。被殖民者更是深受其害, 他们要么努力变成西化的印度人, 要么努力寻找印度文化的根源。因此, 当西方人和印度人走到一起,

他们眼中的对方都是一些刻板的印象，并不是真实的人物。

后殖民种族创伤研究超越了白人主导的创伤研究，也将个体创伤延展到了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层面。本文将从身体创伤、历史文化创伤、创伤的讲述与治愈三个维度来梳理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中印度人和客居印度的西方人所经历的双重后殖民种族创伤。

一、后殖民身体创伤

法农指出，当黑人走入白人的注视之下，他的身体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白人关于黑人的各种传说、故事和历史——从简单的身体模型（corporeal schema）转变成复杂的种族表皮模型（racial epidermal schema）（Fanon 109-12）。黑人不再是个体，而是三重身份的化身：“我成了三位一体的存在：[……]我同时对我的身体、我的种族和我的祖先负责。”（112）黑人的身体被白人的目光“肢解、切除，全身鲜血淋漓”（112）。白人将黑人的身体困在他们编织的各种虚构故事之中，比如其令人害怕的性能力、野蛮的个性和低下的智力，等等。这些关于黑人的原型抹杀了黑人真正的身体，白人将黑人原型化为阴茎和性能力的象征。

原型化（stereotyping）是殖民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霍米·巴巴运用弗洛伊德恋物癖的概念来解读原型化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原型和恋物癖都具有相通之处。从结构上说，两者都否认差异：恋物癖否认性别差异；而原型否认种族差异。从功能上来看，“恋物癖表现了作为替代的隐喻（掩盖缺失和差异）和转喻（连续地提示着感知到的缺失）的同时并存。恋物癖或者原型创造出一种‘身份’，这一身份基于统治与乐趣，也同样基于焦虑与防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既承认差异又否认差异的对立的多重信仰”（Bhabha 107）。原型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矛盾性。巴巴写道：“可以确定地说，原型意指系列出奇地具有混合性和分裂性，既是多种多样的又是敌对的，是多重信仰的发声文化。黑人既是野蛮的（食人生番），又是最有品格的顺从仆人（食物的供给者）；他既是猖獗性欲的化身，又是最精于世故的老练骗子，还是社会力量的操控者。”（118）黑人形象的不一致体现了殖民话语内在的矛盾：被殖民者既是殖民者欲望的目标，又是殖民者嘲笑的对象。一方面，殖民话语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区分开来，将被殖民者建构为堕落形象，来为其殖民统治辩护；另一方面，殖民话语将被殖民者建构为可以教化的他者，因而便有了他们所谓的“社会使命”。因此，“原型是一个复杂、矛盾、对立的表现模式，自信满满的同时又充满了焦虑”（100）。

贾布瓦拉作品中的后殖民身体创伤主要是由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化体现出来的。

在小说中，殖民者往往将印度人原型化，既视其为野蛮人，又向往和恐惧其性能力。这一原型认知模式体现了殖民者作为施暴者的心理创伤。《热与尘》中，印度人原型化为欲望的对象。在西方人看来，印度男人对白人女人充满了欲望。这也正是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探讨的话题：阿齐兹医生被指控强奸了阿黛拉小姐，而事实上，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错误的指控本身也是建立在这一原型之上的。《热与尘》中，桑德斯夫人悄声对奥莉维亚

讲述了一个住在穆扎法拉巴德的英国女士的故事：“她的男洗衣工 [……] 那会正在熨她的内衣，这对他来说肯定太刺激了。他们很容易兴奋，他们的体格本就如此。我听说这跟他们辛辣的食物有关——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李维斯夫人：他们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和一个白人女人——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119）殖民话语将黑人、印度人的身体呈现得支离破碎，将他们看作阴茎的化身。法农认为，殖民话语将黑人定义为“丛林野人”（5），而将殖民者标榜为文明的化身。相形之下，印度人放纵声色，印度男人的性能力使白人既觊觎又害怕。这正反映了这一原型形成过程中对差异既承认又否认的矛盾心态，也反映了白人的焦虑心理。因此，作为殖民主义的施暴者，西方人焦虑、分裂的心理认知模式体现了他们所经历的后殖民创伤。

值得注意的是，贾布瓦拉的小说中印度人对西方人的原型化现象更多。在印度男人眼中，西方女人个个都是荡妇。印度人的逻辑明显是对西方殖民主义逻辑的复制，这也是印度人后殖民创伤的表现。《新领地》中，西方女孩李和印度男孩戈皮同去一家旅馆欣赏风景，戈皮误以为李想和他发生性关系。当他被李拒绝时，他相当困惑：

她什么意思？一个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他上楼去了旅馆——她却说她在想别的。这又不是一个像他妹妹那样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印度女孩，而是一个独身游历世界的西方女孩。谁都知道西方女孩很小就开始做爱，做爱对她们来说那是家常便饭。她一定一次次地经历过无数个男人。这想法突然使他兴奋起来，他愤怒了。她凭什么推开他？（Jhabvala, *A New Dominion* 53-54）

虽然戈皮的想法相当愚蠢，但是他的想法却印证了印度男人对于西方女孩的原型化理解。《热与尘》中，当现代英国姑娘，把手放在拉尔的手上时，她从他的不知所措中感觉到“他曾经听说过的关于西方女人的传闻一下子涌进他的脑海之中”（127）。贾布瓦拉描述过印度男人在和西方女人做爱时最喜欢问的问题。比如，短篇小说《印度经历》中的西方叙述者回忆说她和印度男人做爱时，他们最喜欢在高潮来临时质问她：“你跟多少男人睡过？ [……] 多少个？到底多少个？ [……] 你不觉得丢人吗？ [……] 婊子！”（128）很多印度男人都认为西方女人淫荡。可以看出的是，印度人试图颠覆西方人对他们的原型化，然而这种颠覆性策略并未走出两极对立的框架，仍未摆脱一方超越另一方的意图，只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简单复制与模仿。由此也可以看出，印度人仍未摆脱想要变成白人的愿望。这种原型认知模式展现了印度人的后殖民创伤。

事实上，贾布瓦拉小说中的人物最终也都意识到了他们将对方原型化的谬误。比如《印度经历》中的西方叙述者在经历过无数印度男人之后意识到，印度男人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

你肯定觉得，他们拥有着那些像《爱经》一样的古老传统，还有那些描绘男女鱼水之欢各种姿势的雕塑——你一定觉得凭着这些传统他们一定床上功夫一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并不怎么样[……]他们迫不及待地跳过来，你还没进入状态，他们已经匆匆忙忙的完事了。而且他们一旦完事了，就真的完了，什么都没有了。(127)

《新领地》中的印度男孩戈皮最终也对西方人的原型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我们听说的关于西方人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宣传。你们根本就不懂得做爱——你们谁都不懂，你们一个个都是性冷淡。”(217)戈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西方人的简单化理解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误传，而正如巴巴所说，更是因为他对殖民话语原型机制结构的理解欠缺。“原型是一种简单化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对现实的错误表现，而是因为原型本身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否认差异的存在（通过他者来否认差异），从而给精神和社会关系意义层面的主体表现带来了问题”（Bhabha 107）。由此可见，不论是西方人还是印度人，虽然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却并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他们心理认知模式的内在机制。他们否定了对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只是将对方他者化：这也是他们后殖民心理创伤的起源。

二、后殖民历史文化创伤

西方人和印度人所经历的后殖民创伤不仅仅是殖民暴力的产物，更是殖民主义话语的衍生产物。如果说贾布瓦拉作品中的身体创伤是通过原型机制展现出来，那么其作品中的后殖民历史文化创伤则是由殖民话语中的文化区分造成的。殖民话语将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了高下和优劣之分，这一意识形态为殖民主义入侵辩护，将殖民征服合法化。与之对应的是，印度历史文化被博物馆化，被界定为落后、愚昧、罪恶的文化，种族文化差异被掩盖和否定，印度文化变成了衬托欧洲文化优越性的他者。南迪在《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一书中详细剖析了殖民主义心理学。为了证实西方人自身的优越性，殖民主义者把被殖民者和女性气质、童年和老年之间画上了等号。首先，殖民者以男性气质自居，以侵略、战绩、支配和权力为傲；却赋予了被殖民者女性气质，以此来彰显自身的种族优越性。其次，殖民主义思想将被殖民者和童年、原始主义联系在一起。殖民者宣称被殖民者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因而他们肩负着推进印度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社会使命。第三，殖民主义将印度文明呈现为一种老态龙钟的古老文明，并宣扬其罪恶性。它宣称“印度后来的没落不是殖民主义带来的[……]而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导致的。印度传统文化虽然有着一定优点，却也为其后来的文化没落埋下了祸根”（Nandy 18）。为了证实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殖民者给印度文化贴上了非西方、野蛮、堕落、落后和女性气质等标签。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中的西方人和印度人都

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西方人一方面享受着他们建构起来的优越感，承担着他们所谓的教化印度人，推进印度文明进程的使命，另一方面却感受到莫名的焦虑和不安。而印度人则内化了殖民话语，仰视并向往西方文化，被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所困扰。

后殖民文化区分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创伤是双向的。英国文化在有了殖民体验之后也受到了重创。为了配合殖民主义征服，英国文化压制了其自身仁慈、善良的一面，否认其女性气质。西方殖民者往往通过强调自身的男子气概和理智来论证其优越性。《热与尘》中的殖民军官道格拉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道格拉斯一直都“沉着而克制”（1）。在奥莉维亚眼中，“他总是坐得笔直；他的鼻梁笔挺，还有他那高高的额头；他的晚装完美得无可挑剔”（16）。道格拉斯几乎具备了所有的男性气质，他的眼睛“十分清澈坚定——从这双眼睛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一个热爱阅读冒险故事的男孩，他在生活中一直坚守这些故事中关于勇气和荣誉的信条”（40）。奥莉维亚的日记中写道：“她一直都爱他，爱着他的这些品质——他的沉着冷静、他那英国人特有的厚重和力量；他的刚毅。”（Jhabvala, *Heat and Dust* 116）殖民主义推崇建功立业、争夺霸权，英国文化变得暴力、冷漠和无情。英国女性群体也深受其害。来到印度之后，道格拉斯每天忙于公务，对奥莉维亚不闻不问。两人每每发生争执，道格拉斯都会将他们之间的矛盾归咎于炎热的印度天气。他总是说：“我跟你说过：都怪这炎热的天气。没有一个英国女人能够忍受它。”（117）道格拉斯压制了性格中温暖、柔情的一面，性格变得冷漠，在处理 and 妻子的矛盾时，总是对她的情感问题避而不谈。他已经丧失了人的情感表达能力。另一位殖民地军官米尼少校和道格拉斯一样，认为英国人就应该充满男子气概，不应该像印度人一样多愁善感：

我们尽可以热爱膜拜印度——不管是冷静地研究她，艺术一样欣赏她，米尼少校没有说和印度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他肯定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我们对印度的爱必须是一种充满男性气概的、冷静审慎的欧洲情感。他警告我们万万不能让自己变得和印度人一样内心柔软，多愁善感；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旦一个欧洲人失去了那份沉着冷静——他就非常危险了，他正在被诱骗到另一边了。（171）

米尼少校的言论表明，殖民话语对于殖民者的阳刚之气的过分强调，让英国文化失去了其柔软、善良的一面。

殖民主义不仅破坏了英国文化，也给印度文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印度人内化了殖民话语的文化高下之分，推崇英国文化，向往欧洲文化。比如《热与尘》中的印度王子就对道格拉斯的男性气质推崇备至。他认为自己的英国同性恋恋人哈利不是一个体面的英国人，而奥莉维亚的丈夫道格拉斯则是“一个体面的英国人”（43）。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英国人都好战且具有侵略性，且都喜欢“能征善战的粗人”（45）。侵略性和好斗性这样的男性气质是殖民话语建构的概念，而印度王子已经内化了这一殖民主义思想。认同侵略者的思想是被殖民者西

化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在殖民话语之下，不仅印度文化被成功抹杀，英国同性恋少数群体文化的也遭到压制。每当奥莉维亚询问哈利和印度王子的关系时，殖民地军官道格拉斯都支支吾吾，羞于启齿。

殖民话语往往将英国和印度解读为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在殖民话语中，童年往往和原始主义是分不开的。南迪写道：“它（童年）就像一块空白的石板，大人们必须写上道德密码——它不够成熟、不那么有益、不那么合乎伦理，深受人性中爱玩、不负责任、随心所欲等方面的毒害。”（Nandy 15）因此，“大人们有责任通过社会化将这个孩子从不知悔改、不道德的罪恶状态中‘拯救’出来，并帮助这个孩子成长为一个有着加尔文教理想的成熟大人。”（15）殖民话语将童年与原始主义联系起来之后，就在殖民地文化差异领域引进了社会进程的理论。殖民话语将印度人看作孩子，宣称印度尚处于不发达历史阶段，从而有了侵略者所谓的社会使命。贾布瓦拉小说中很多西方人都认为印度人单纯而原始，如孩童一般。例如，奥莉维亚就注意到，每当殖民军官们谈论印度人时，他们都会“流露出容忍的、慈爱的微笑，奥莉维亚甚至开始慢慢了解到他们那像慈爱父母一样的快乐：无论印度搞出什么恶作剧，他们都爱印度”（Jhabvala, *Heat and Dust* 58）。而她的丈夫道格拉斯与印度人交谈时就像一个家长教育孩子一般：

奥莉维亚听着他们在外边交谈。道格拉斯的声音坚定而刚毅，比其他人的声音都高。他一开口，其他人都唯唯诺诺，低声赞许。他一定是讲了些笑话，因为外面不时地传来一致的礼貌的笑声。有时他似乎声音更加严厉，低语声变得更低更顺从，直到他又讲了一个笑话，大家才又放松地笑起来了。道格拉斯几乎就像在演奏某种乐器，他对停顿把握得炉火纯青。他也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弹奏最后一个乐章，接下来就是混乱的脚步声，和最后一致的大声的感谢，这感谢是那么的真诚，是那么的发自内心，以至于有些声音都激动得泣不成声。（37）

道格拉斯和印度人交谈就像一场木偶戏，印度人都是他手中的牵线木偶。道格拉斯的声音坚定而刚毅，而印度人则感动得泣不成声。当印度人离开之后，道格拉斯回到屋里，“和蔼而开心地摇摇头”，对奥莉维亚说，这些印度人真是“一群无赖”（37）。英国殖民者将印度看作需要受教导的调皮孩子，这也为他们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此外，殖民话语还将印度文化和原始主义联系在一起。南迪指出，殖民话语将殖民主义定义为“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一步和治疗封建主义的一剂良药”（12）。在一些欧洲殖民者看来，殖民主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罪恶，他们承担着教化那些野蛮未开化之人的文化使命。他们深信殖民主义是“一些社会成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14）。殖民经历因此被书写进“社会进步学说的框架之内”（12）。《热与尘》中提到了一个关于印度妻子殉夫的萨蒂制度（suttee）的争论。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对此看法不一，奥莉维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军官的看法也不一

致。英国殖民军官认为这一做法相当野蛮。而奥莉维亚则表示尊重这一风俗：“这是他们的宗教的一部分，不是吗？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们。[……]而且除了宗教，这也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凭什么去干涉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像他们那么古老的文化？”（58）在殖民时代的印度，英国人禁止这一风俗，将其视为犯罪行为。斯皮瓦克指出，白人通过禁止殉夫成为英雄，白人将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拯救出来（287）。殖民地军官在意的并不是印度女人的生死，而是通过介入殉夫事件来彰显白人的文明和印度的野蛮。在她看来，殉夫的风俗本来是印度内部父权制的问题；但是白人将其定义为犯罪，从而突出强调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教化这些野蛮人的社会使命”（Spivak 290）。白人以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为傲，将印度人描述为野蛮未开化的民族。桑德先生认为殉夫就像印度的其他事情一样，“纯粹是野蛮未开化的”（Jhabvala, *Heat and Dust* 59）。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关系，南迪写道：“大英统治者觉得印度人几乎是野蛮人，需要进行教化。他们认为英国统治是一种进步和使命。而很多印度人也认为他们救赎的希望在于变得更像英国人，不管是与其为友还是与其为敌。”（7）斯皮瓦克写道：“我想说的是英国人忽视了殉夫作为意识形态战场上的空间，他们将女人建构为杀戮的客体，而拯救女人可以铭刻一个文明而美好的社会于混乱中诞生的瞬间。在父权制主体形成和帝国主义客体建构之间，女性作为性别客体的自由意志或者能动性被成功抹杀。”（235）斯皮瓦克在其书中追溯了殉夫传统的渊源，认为湿婆的妻子选择自焚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能动性，而英国殖民统治者则将此作为证明印度人的野蛮和白人的文明的手段，是一种恶意的误读。萨蒂一词是由印地语萨蒂女神（Sati）的名字演变而来的。萨蒂是湿婆神（Shiva）的妻子，因不堪忍受其父亲对其（活着的）丈夫的羞辱而自焚。后来在印度形成了寡妇在其丈夫葬礼上以柴堆自焚的风俗。而殖民者恶意抹杀了印度的历史文化，抹杀了萨蒂女神自焚的历史内涵，将女性自焚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放置到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种族主义文化图谱中，只看到了萨蒂制度残忍的一面，忽视了其历史内涵。

因此，英国和印度所经历的后殖民历史文化创伤都是致命的。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其历史文化都被不同程度地抹杀、重塑。英国文化变得同质化、男性化，而印度文化在欧洲种族主义文化图谱中变成了欧洲文化的注脚，其真正丰富的、异质性的历史文化被抹杀、歪曲。

三、后殖民创伤的讲述与治愈

跨种族性关系是贾布瓦拉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她的作品中常常描绘印度男性对白人女性的追逐和爱恋。后殖民创伤问题在跨种族性关系中显得尤为严重。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当一个英国女人爱上印度男人，并和他发生性关系时，这绝对是一桩丑闻。道格拉斯的英国妻子奥莉维亚和印度王子展开了一段婚外恋并因此怀孕，书中人物均认为孩子的父亲就是印度王子。奥莉维亚堕胎后，和道格拉斯离婚，从此生活在印度，杳无音讯。道格拉斯离婚后，

迅速从英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再次将她带到印度。从此奥莉维亚的名字在道格拉斯家族中成了禁忌。道格拉斯的孙女注意到家族成员“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她的一切记忆，好像在逃避某种黑暗而可怕的事情”（Jhabvala, *Heat and Dust* 2）。事实上，不仅道格拉斯出轨的妻子是家族的黑暗秘密，即使是印度王子的英国同性恋情人哈利，也是道格拉斯不能面对的心理创伤。虽然家族中有人和哈利互赠圣诞卡片，但是哈利在道格拉斯离婚后再也不曾到访过，“直到道格拉斯死后，哈利才再一次登门拜访”（2）。不难看出，不论是幽居印度的奥莉维亚，还是回到英国的哈利，以及离婚再娶的道格拉斯，都悄悄将这件丑闻埋葬在心底。这桩丑闻从此成了不可言说的家族创伤。道格拉斯去世后，他的孙女，也就是小说中现代英国姑娘，出于对奥莉维亚的好奇，踏上了印度之旅。她靠着一些家族信件在印度寻找 20 世纪 20 年代奥莉维亚和印度王子之间的爱情印痕。有趣的是，家族的隐秘与禁忌在这位年轻的英国姑娘身上再次重演：她也爱上了印度人拉尔。两个故事相差半个世纪之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奥莉维亚和现代英国姑娘都游走于英国男人和印度男人之间；奥莉维亚的丈夫是度殖民地军官道格拉斯，而现代英国姑娘虽然未婚，却同时和一位来自欧洲的印度教信徒裘德同居；两位印度男人都已经结婚；两位印度男人都认为他们的妻子精神有问题；奥莉维亚和现代姑娘都有可能怀上了英印混血儿，不同的是，奥莉维亚选择了堕胎，而现代姑娘则决定生下孩子；最终两位英国女人都留在印度。可以说，现代英国姑娘的印度之旅也是对奥莉维亚印度之行的再现。这种家族隐秘的讲述与再现正是家族创伤治愈的方式之一。英国现代姑娘选择生下英印混血儿，而非堕胎，这也见证了英印爱情逐步克服后殖民心理创伤的过程。《热与尘》采取了双线叙事结构，奥莉维亚的故事与现代英国姑娘的印度爱情之旅交叉并置。这种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的叙事结构是创伤叙事常见的叙事特征。

奥莉维亚和印度王子这一桩看似简单的丑闻从侧面展示了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和受害者的印度人的双重心理创伤。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殖民者过于强调英国文化阳刚暴力的一面，英国同性恋、女性等边缘群体文化被压抑、抹杀。这也是《热与尘》中道格拉斯和奥莉维亚婚姻失败的起因。而面对印度王子和奥莉维亚的恋情，道格拉斯选择了掩盖和刻意的遗忘。已婚的印度王子不仅豢养着一位英国同性恋情人哈利，还成功诱骗了奥莉维亚。印度王子和奥莉维亚的恋情，以及印度王子和哈利的恋情，究竟是不是真爱？法农在探讨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跨种族性关系的内在动机时指出，黑人的自卑情结使他们追求白人，而与白人结婚则象征着他们被白人世界和白人文化认可：“当我不安分的双手抚弄着那对白色乳房时，它们将白人文明和尊严捏在掌心，据为己有。”（63）自卑情结之外，黑人男性在与白人女性交往时也拥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当一个黑人把一个欧洲女人娶回家时，“一种成为欧洲女人主宰的满足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某种骄傲的复仇意味”（转引自 Fanon 69）。而这个黑人也不知不觉中“将她的先人们几个世纪以来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所有痛苦报复在一个欧洲女人身上”（70）。贾布瓦拉是一位不愿意评价人物的作家，其作品中很难看出其意图。然而《热与尘》中的很多线索却纷纷指向印度王子的复仇动机。

首先，印度王子希望通过与哈利发生性关系来羞辱英国人。哈利和印度王子的同性恋关系在驻印军官中引起了不安与焦虑。当奥莉维亚询问哈利在印度王子宫中的职位时，道格拉斯支支吾吾、羞于启齿。相反，印度王子则乐于在印度军官面前谈论哈利，其语气神态像谈论孩子一样，正如英国军官谈论印度人一样。印度王子复制了英国人的逻辑，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哈利。无独有偶，印度王子的父亲在世时，也金屋藏娇，在家里养了一个欧洲歌女。而她当时所住的房间正是哈利现在的房间。父子两代同样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和英国人发生恋情的真正动机。哈利本人也表达过这方面的怀疑。在哈利与奥莉维亚的一次谈话中，哈利坦言印度王子虽然在物质馈赠上相当慷慨，在感情上却令人捉摸不透。哈利甚至感觉自己对于印度王子来说只是“某种物件”（Jhabvala, *Heat and Dust* 35）。根据哈利的回忆，印度王子经常因为米尼少校的到访而气恼，并因此对哈利乱发脾气。米尼少校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军官，其到访所包涵的威胁意味令印度王子尊严扫地。每每米尼少校离开之后，印度王子都会把他在殖民军官那里受的气发泄在哈利身上。印度王子怒斥哈利：“米尼少校你们两个都一样。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你明明想和他在一起，想和其他英国人在一起。你只为他们着想，根本不为我考虑。”（144）由此可见，印度王子和哈利发生恋情的动机确实值得怀疑。

其次，印度王子与奥莉维亚的恋情也可能存在报复心理。印度王子像对待哈利一样，每每有英国人挑衅，他也会把气撒在奥莉维亚身上：“奥莉维亚，你是不是也痛恨、瞧不起东方人？[……]你们英国人真是幸运——你们就没有感情！”（144-45）英印双方的言行都暗示了印度王子追求奥莉维亚就是为了报复英国殖民地军官。一方面，印度王子曾坦言他希望通过和奥莉维亚的恋情来羞辱英国人。当奥莉维亚怀孕时，印度王子喜不自胜。哈利告诉奥莉维亚：“你真应该听听他昨晚说的话。他说，等我的儿子一出生，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他说等这个孩子一出生，道格拉斯他们将会经历有生以来的震惊。”（161）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把他的行为解读为报复行为。英国人一致认为“印度王子利用奥莉维亚来报复他们”（170）。

奥莉维亚最终选择堕胎也从侧面说明她认为自己怀了印度王子的孩子。贾布瓦拉对奥莉维亚堕胎的选择呈现得比较微妙。小说并未明确交代孩子生父是谁，但是印度王子和哈利都坚信这孩子是印度王子的。哈利认为印度王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161）。这一想法源于殖民主义思想，将印度人呈现为一种生殖能力的象征；而欧洲殖民者则以文化、文明的形象自居。奥莉维亚在此情况下选择了堕胎，这暗示她更相信孩子是印度王子的，其堕胎行为表明了她为了英国不受羞辱而做出的努力。奥莉维亚和哈利深受殖民主义思想的毒害。她把印度看作生殖能力的化身，认为文明的西方人是性无能的。她怀疑道格拉斯的性能力。法农写道：“白人深信黑鬼就是野兽；要么是阴茎超长，要么是性能力旺盛。”（170）白人最可怕的噩梦就是黑人会诱奸他们的妻子。英国殖民地军官也深恐他们的妻子会和印度人私通。“一个有过黑人情人的白人女人往往很难回到白人身边。”（171）艾田蒲（René Etiemble）便说：“在很多白人看来，黑人就是一把不可思议的宝剑，一旦刺进他们老婆的身体，她们就永远改变了。”

(转引自 Fanon 171) 因而, 奥莉维亚堕胎之后, 还是留在了印度王子身边, “穿着当地人的衣服——一件仆人穿的劣质纱丽”(Jhabvala, *Heat and Dust* 172)。而奥莉维亚之后在印度的生活, 小说没有明确交代。法农认为“黑人和白人女人发生性关系”很明晰地表明他们“希望成为白人”, “报复白人”(14)。印度王子、哈利、奥莉维亚和道格拉斯共同经历了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作为英国人的哈利、奥莉维亚和道格拉斯, 将这段恋情深深埋藏, 视为丑闻。印度王子和英国人发生性关系的动机不纯, 他内化了殖民主义思想, 因而他和英国白人之间的恋情受困于他的自卑情结和报复心理。可见, 这段英印恋情是饱含后殖民创伤的。

半个世纪后, 现代英国姑娘不经意间再次演绎了奥莉维亚曾经经历过的异国恋情。她出于同情, 将一个来自欧洲的印度苦行僧裘德带回家。裘德并不虔诚, 他不仅跟她要吃的, 还要跟她睡觉, 甚至还偷东西。同时, 这位叙述者对她的印度房东拉尔产生了好感。拉尔已经结婚, 但他认为自己的印度妻子瑞秋愚蠢, 甚至精神错乱。拉尔在和这位英国姑娘偷情时毫无愧疚之意。整个故事貌似一个奥莉维亚故事的后现代戏仿。英国军官道格拉斯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欧洲行骗僧人; 印度王子变成了一个卑微而闷闷不乐的政府小科员; 聪明美丽的桑迪变成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害羞的瑞秋; 虚荣高雅的奥莉维亚变成了一个现代嬉皮士姑娘。然而问题是, 半个世纪过去了, 英印恋情故事似乎仍未走出后殖民创伤。

裘德和现代英国姑娘的关系是单纯的性关系。他像索取食物一样向英国姑娘提出性要求: “他总是很饥饿, 他不止向我索取食物。他也相当性饥渴, 他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像给他提供食物一样给他性满足。我从未像现在一样深刻地感到自己被利用。”(Jhabvala, *Heat and Dust* 65) 裘德的性骚扰行为是他情感匮乏的体现, 这也是殖民暴力给英国文化带来的人性上的冷漠与异化。

裘德选择来到印度做苦行僧的动机也值得玩味。殖民暴力使很多欧洲人处于文化迷失的状态, 而印度被视为精神朝圣之地。然而, 他们将印度、东方看作精神救赎的异域空间, 却是一种想象。这一想象还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所以一旦面对真实的印度, 他们先前对印度的幻想便迅速破灭, 态度旋即从痴迷转变成憎恶。裘德刚到印度时, 迅速痴迷于印度文化。他不仅身穿印度苦行僧的服饰, 甚至名字也更换了印度名字。然而, 在经历了一段朝圣之旅后, 他对印度却只有憎恶了。“裘德回来了。他的变化是如此之大, 我一开始竟没有认出他来。他已经不再穿那种橘黄色的苦行僧长袍了。他现在穿着卡其裤子, 衬衣和鞋子。苦行僧特有的串珠和乞讨的碗也已经不在了。他剃光的头发已经开始长出来了, 又硬又短的头发了。”(139) 裘德的变化不仅是外表上的, 也是性格上的。他变得非常安静, 病怏怏的:

他说的话只有一句: “我真受不了那股味道。”(当然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味道——那些和我们生活方式不同、吃不同的食物的人们身上的味道; 我以前在伦敦拥挤的公交车上和地铁上也常常闻到身边印度人身上的这股味道) 裘德再也不愿意吃印度食物了, 他现在只吃水煮的清淡食物。他最喜欢我给他做的英国风味的羹汤。闻到

印度食物他就会痛苦地哭喊着他感到恶心。(139-40)

从裘德的印度之旅来看，他并没有摆脱殖民者的优越情结。在他的理解里，印度只是逃避压抑的欧洲文化的异域空间。他对印度文化的精神内涵并没有深刻的领悟，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也静止不变。同时，他也没能认识到欧洲文化创伤的根源是深深扎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殖民暴力。

裘德的离开并没有带走现代英国姑娘，相反，他的离去反而坚定了她留在印度的决心。她想追寻奥莉维亚的脚步，去理解她留在印度的原因。不同于裘德，也不同于奥莉维亚，她入乡随俗，穿上印度服饰，这让印度人拉尔感到失望不已：

他在房间里东张西望，寻找家具，却一件家具也没有看到。[……] 因德尔·拉尔打量着我的房间里光秃秃的墙壁。或许他希望看到一些绘画或者照片——但是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既然我抬头就能看到窗户下面的露天集市。我可不想在房间里挂一些让我分心的绘画，我更愿意专注地欣赏窗外的风景。所以，我连窗帘都没有安装。(Jhabvala, *Heat and Dust* 6-7)

不难看出，现代英国姑娘希望更多地了解印度文化。不同于祖父道格拉斯，她不以奥莉维亚为耻，反倒对奥莉维亚的生活充满好奇，想去理解她。所以，她的印度之旅也是后殖民创伤的治愈之旅。与奥莉维亚不同的是，现代英国姑娘决定生出英印混血儿。现代英国姑娘也比奥莉维亚更独立，更有主见，这也是一种进步。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英国姑娘在这段恋情中已经从被动走向主动，开始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的恋情中是否还有后殖民创伤的阴影呢？

首先，现代版的英印爱情故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印度男人拉尔，而是现代英国姑娘。这似乎可以排除印度男人报复英国人的动机。然而，阴影并未消失。且看现代故事中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场景。现代英国姑娘和拉尔来到巴巴神坛旁边的小树林野餐，风景宜人。她突然“有了一种欲望，一种强烈的欲望：靠近他”(127)。英国姑娘将手放在他的手上之后，拉尔看她的眼光马上就不一样了：“他现在对我有兴趣了！很难说他在想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手在我手下颤抖，他的嘴唇也在颤抖。或许他想说点什么；或许是欲望和恐惧。他看我的眼睛里明显写满了恐惧。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也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把他怎么样。我能看出——太滑稽了！——他曾经听说过的关于西方女人的传闻一下子涌进他的脑海之中。”(127) 然后她写道：“虽然接下来的几步全看我，然而一旦我有所表示，他的反应一点也不迟钝。”(127) 拉尔对英国姑娘的反应相当矛盾，欲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过去听说过的关于西方女人的传闻与眼前的姑娘交织在一起。从拉尔的内心挣扎来看，他并没有完全走出殖民主义心理创伤，依然被自卑情结所困扰，对白人依然有着欲望与恐惧并存的矛盾心理。

其次，拉尔对英国姑娘的白皮肤的反应有待商榷。拉尔喜欢晚上悄悄地摸进她的房间，他喜欢在黑暗中做爱，因为她的容貌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Jhabvala, *Heat and Dust* 140）。英国姑娘发现，“在黑暗中，他可以忘记这个，他也不用因为被别人看到和我在一起而丢脸。他完全挥洒自如。我并不只是说身体上（虽然身体上也是），他整个人都挥洒自如——他顽皮、幽默，流露出暖暖的爱意。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起孩子般的克利须那神以及他那些胡闹和兴致勃勃的恶作剧”（140）。拉尔喜欢黑暗，不愿意面对她的白皮肤，这一细节是体现了他对白皮肤的向往还是厌恶？他不愿意被别人看到和英国姑娘在一起，以此为耻，是殖民史在作祟还是简单地因为她的不同而感到难堪？她的白皮肤给他带来的障碍是因为这白皮肤让他想起了殖民地的屈辱还是简单地因为差异而觉得不适应？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殖民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而横在他们之间的不只是外表和文化的差异，还有印度的屈辱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对情侣所体验的爱情和印度王子与奥莉维亚的爱情又有所不同。印度王子以能够和英国女人在一起为骄傲，当然还带着挑衅和复仇的快感。而拉尔则以此为耻，他不想被人看到他和英国女人在一起，这在无形中也展现了他的心理创伤。但拉尔也有忘我的时刻，孩子般的克利须那神（Krishna）的形象似乎展现了他忘我的瞬间，忘记了殖民创伤的瞬间。在印度教中，克利须那神既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又是一个热情的爱人。夜幕笼罩之下，英国姑娘眼中的拉尔，是印度文化中克利须那神的形象。拉尔在忘我的瞬间做回了自己，这也预示着后殖民创伤治愈的希望。

殖民主义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后殖民种族创伤却仍然挥之不去。贾布瓦拉的晚期印度小说再现了后殖民语境下白人施暴者和印度受害者所经历的双重后殖民种族创伤。后殖民种族创伤源于后殖民话语错误的文化认知模式和表现模式，否认了英印文化的种族、历史、文化差异。然而，通过贾布瓦拉的文学叙事和再现，我们也看到了后殖民创伤治愈的希望。笔者和后殖民创伤学者法农一样，希望不管是曾经的白人施暴者还是黑人、印度人受害者，都能够“从殖民背景下衍生的各种情节中走出来”（Fanon 30）。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 Chew, S. "Fiction of Princely States and Empire."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no. 3, 1986, pp. 103-17.
- Crane, R. J. *Ruth Praver Jhabvala*.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 Cronin, R. "The Hill of Devi and Heat and Dust." *Essays in Criticism*, vol. 36, no. 2, 1986, pp. 142-59.
- Denison, S. A. *Walking through the Shadows: Ruins, Reflections, and Resistance in the Postcolonial Gothic Novel*.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 de Souza, E. "The Blinds Drawn and the Air Conditioner on: the Novels of Ruth Praver Jhabvala."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no. 17, 1978, pp. 219-24.

- Ezekiel, N. "A Distorting Mirror?" *Times of India*, 4 Jan. 1976.
- .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in Literature." *Indian P. E. N.*, vol. 43, no. 11 and 12, 1977, pp. 4-8.
- Fanon, F.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Grove, 1967.
- Goonetilleke, D. C. R. A. "Disillusionment with More than India: Ruth Praver Jhabvala's *Heat and Dust*." *Towards a Postcolonial Futur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edited by G. Davis, et al., Rodopi, 2005, pp. 249-57.
- Jhabvala, R. P. *Heat and Dust*. John Murray, 1975.
- . *A New Dominion*. Granada, 1983.
- . "An Experience of India." *Out of India*, by Jhabvala, John Murray, 1987, pp. 125-46.
- Lall, S. *Colonial Pageants, Postcolonial Acts: Nostalgia for Empire and Its Discontents in 1980s British Fiction*.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 Nandy, A.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P, 1983.
- Newman, J. "Postcolonial Gothic: Ruth Praver Jhabvala and the Sobhraj Cas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40, no. 1, 1994, pp. 85-100.
- Spivak, G. C.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rvard UP, 1999.
- Sucher, L. *The Fiction of Ruth Praver Jhabvala: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St. Martin's, 1989.

◇责任编辑：吴晋先

民族主义时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边缘人 ——亨利·劳森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研究

◎ 张加生 林宝琪

内容提要: 在澳大利亚作家创造民族文学和书写澳大利亚性过程中, 澳大利亚华人自始至终是边缘化的存在。劳森作品中的华人作为寄居者, 面临种族歧视和远离故土的双重困境; 他们精于业务、吃苦耐劳, 却多以贩毒商人、瘾君子 and 赌徒的负面形象呈现, 成为淘金时期存在共性问题的底层阶级的“替罪羊”, 成为澳大利亚社会臆想中东方入侵的“替罪羊”; 他们被描绘成卑屈的底层阶级、“逆来顺受”的“白色中国人”, 成为民族主义时期白人“自我”追求身份认同的镜像“他者”, 促使以劳森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作家在“文化自卑”下不断界定、建构和确认西方文化和种族优越感。

关键词: 亨利·劳森 华人形象 歧视 替罪羊 他者

中图分类号: I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8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亨利·劳森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研究”(17BWW054);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文化记忆与澳大利亚淘金期华人书写研究”(19YJC752020);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亨利·劳森的自我书写研究”(KYCX18_2393)。

作者单位: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Title: Marginal Men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Perio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in Henry Lawson's Works

Abstract: During the time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Period, Australian intellectuals were creat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seeking Australian-ness.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is time, the Chinese were marginalized. In Henry Lawson's works, the Chinese, the sojourners, were confronted by dual predicamen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being far away from home. Although they were skilled in business and hard workers, they were mostly represented through such negative images as drug traffickers, drug addicts, and gamblers. The Chinese became scapegoats of the lower classes who had the same problems of taking opium and gambling in the Gold Rush Period: "Orientals" were assumed by Australians to be invaders. Images of the Chinese were over-simplified and stereotypical. Some of them became servile and submissive "White Chinese," and the mirror of "the other" that enabled "the self" of whites in the National Period pursue self-identification. These examples pushed Australian writers such as Henry Lawson to define and construct cultural and racial priorities under the Australian "cultural cringe."

Keywords: Henry Lawson, Chinese image, discrimination, scapegoat, the other

Author: Jiasheng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China; Baoqi 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China.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彼时的中国在西方社会是一个富庶、强盛和开明的国家,一个“令人向往的乐园”,一个“上帝创造的新世界”(葛桂录5)。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神化,西方人对之神往和钦佩。彼时的中国人“亲切、善良、勤劳”,是“一流的艺术师”,是“通晓草药”的医师(Mackerras 13)。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大批华人也随之涌入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离散四方,东西方文化开始有了正面的冲突和碰撞,华人形象逐渐由“富裕、勤劳、勇敢”变为“肮脏、慵懒、不守规矩”。劳森(Henry Lawson)笔下的中国人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淘金地上努力工作、艰辛求生的华人。此时的澳大利亚正值民族主义时期,澳大利亚知识分子迫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民族文化和民族自尊,通过自身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的民族本能,来满足本民族需要”(Stephensen 136)。这一时期专门描写华人的作家作品不多,但华人形象却是他们文学创作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群体。

劳森是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经典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备受学界关注。然而,尽管国外学者对劳森的研究颇为深入,成果众多,但对其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的研究比较欠缺,澳籍华人欧阳昱的《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华人,1888—1988》和黄源深的《歧视与歪曲:澳大利亚早期小说中的华人》曾分别从东方主义和早期澳大利亚作家的角度对华人的主观想象有过讨论,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事实上,由于历史和社会因素,劳森是一个有着种族偏见的作家。本文将以此为着眼点,另辟蹊径,从澳大利亚建国初期对自身民族文化不自信和既想脱离英国又想脱离亚洲、建立单纯的澳大利亚白人乌托邦的矛盾心理着手,对劳森笔下的华人形象进行深入探究。

劳森的小说主要以澳大利亚淘金期和民族主义时期为历史背景,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再现早期开拓者们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丛林人的生活风貌。劳森书写淘金期华人的作品屈指可数,华人不是其关注重点。但即使如此,由于华人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无处不在的身影是民族主义作家创作无法绕开的存在,这也是劳森作品华人形象研究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劳森作品华人形象研究的意义所在。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认为:“形象是一个人或团体所持有的观点或看法。但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知觉,观察者具有充分的优先权,(他们持有的观念)冲击(他人的)意识。”(1)研究东

方的西方学者受社会文化和主观偏见影响,他们在研究华人形象时有着不可避免的“近视”和“短视”。“审视着中国的人们似乎都是通过他们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主观偏见和个人经历来过滤他们所看到的东 西,无法避免地有着他们的文化印记”(Mackerras 1)。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劳森在刻画华人形象时,虽然以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淘金期的华人生活,但同样融入了自己的想象和民族主义时期盛行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将西方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人的偏见糅合进他所创造的华人形象中。

一、寄居者:倍受歧视的“中国佬”

杨进发指出:“有人考证,中国人在古代已发现澳洲,但尚未能成为定论。所可确证者,则为十九世纪初,中国海员曾到过这里。”(1)由此可知,早期华人于19世纪初便已有在澳洲大陆生活的印记。最初,澳大利亚因畜牧业的发展决定雇佣勤劳、廉价的华工;之后,随着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大量华人蜂拥而入,形成“淘金热”。到澳后的华人由此成为一群饱受煎熬、身心漂泊的“寄居者”(Sojourner)。如劳森的作品《阿丹》(“Ah Dam”)中,主人公阿丹留着一头不 受理解、被人嘲笑的长辫子,遵从中国儒家思想,不信仰澳大利亚主流宗教。小说叙述者说:“尽管我们以为(阿丹)会因为人口普查和其他(移民)文件方便通过、或有时因为个人原因和商业需要而信仰英国国教,但他却跟我说‘儒教’(才对)。”(Lawson, *A Fantasy of Man* 542)“美国社会学家用‘寄居者’这一词来表示在一个国家生活了多年却没有被它同化的移民者”(Lovejoy 48)。淘金时期华人“寄居者”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怀着在海外发财致富的梦想背井离乡,这个梦想支撑却也牵绊着他们。华人在澳大利亚时始终与祖国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深深地眷恋着家乡的故土和亲人,如阿丹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让阿丹留着辫子,打算有一天带他的儿子回中国”(Lawson, *A Fantasy of Man* 542)。阿丹的父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孝道,强调尊老敬老和传宗接代。和许多华人一样,阿丹的父亲总是定期回国,探望老人、妻子和孩子。大部分来澳大利亚追求财富的华人依旧穷困潦倒,致富成为奢望。在反华浪潮中,他们同时承受着无法被澳大利亚社会认可和不能衣锦还乡的双重心理负担。

到澳后的华人在细木工、烟草种植、烹饪、种菜、果园种植和剪羊毛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得到澳大利亚人的称赞和羡慕。杨进发指出:“[淘金期]澳大利亚人往往称华人菜农为‘约翰中国佬’[……]约翰也许是指一个当代的、有耐心的、不会招摇、恭顺、朴实、庄重、节俭、沉着的典型华人。”(1)特纳(Henry Gyles Turner)也曾说:“19世纪的澳大利亚华裔,由于他们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其同胞的羡慕。由于他们精于业务,待人诚实,认真负责,所以也受到欧洲人的高度尊敬。”(233)澳大利亚社会普遍认为华工的受教育水平低,实际上,“即使来自一个小村庄,中国移民也可能至少接受过基础教育”(Lovejoy 54)。

虽然如此,在劳森的作品中,华人却大多被丑化和歪曲。他们“愚笨无知”,英语讲不好,“口音奇特”。《阿宋》(“Ah Soon”)中的菜农阿宋说着像“wi’art”(white heart)和“vegerbuls”(vegetables)的中式洋泾浜英语(Lawson, *A Fantasy of Man* 500),备受诟病。另外,华人在白人至上的西方文化思维中,被认为“长相丑陋,滑稽可笑”。小说中,阿宋因为风霜辛劳,看上去是“上了年纪、相貌极为平常的中国佬,面容平板松弛,脸色干枯,皱纹累累,好像他自己在干旱季节晾晒在房顶上的萝卜干似的——而且颜色也一样”(Lawson, *A Fantasy of Man* 500)。《他的错误》(“His Mistakes”)中的华人流浪汉也是如此,“他看上去像昨晚刚从中国过来,在尘暴中被吹了一路,他身上的汗水和灰尘使他看起来更像一座古老的佛像”(354);小说中,他们备受澳大利亚人欺压和戏弄,如反华诗歌《好玩》(“To Be Amused”)中,“孩子们从基督教的小道上/跑掉之时,觉得朝一个无助的中国人身上/扔石头倒挺来劲”(270)。他们视羞辱中国人为年轻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转引自欧阳昱,《表现他者》36)。最后,劳森笔下华人的名字也都饱含贬低之意。“阿丹”(Ah Dam)、“阿宋”(Ah Soon)和“阿细”(Ah See)都可以说是劳森嘲讽和揶揄华人的态度,Dam与Damn同音,Soon意为“立刻”,Ah See与Asia的发音也相似,意味着他眼中滑稽可笑的中国人是亚洲的代名词,并借人物取名示意中国人应该离开澳大利亚。

劳森对华人的偏见使他无法理解华人,也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和宗族观念,更无法理解他们远隔重洋却又自身难保、思乡心切却不能得的内心愁苦。这种自身偏见和无法理解却成了劳森塑造华人形象的原始素材,劳森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看到了在澳大利亚大陆生活的华人,但仅凭表面的肤浅了解和自由想象对华人形象进行的负面描写,显然不客观、不真实更不可信。殊不知这些表面上与白人文化格格不入的华人同样善良、和蔼和助人为乐。同样,劳森同时期的民族主义作家想当然地认为华人的恶习皆因种族和肤色所致,却忽视了华人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艰辛和苦楚,更忽视了成千上万华人劳工成天辛劳、夜以继日的勤勉工作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如若没有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殖民者是不可能繁荣起来的,而在其他地区,白人有时(甚至)宣称,他们中间的这些陌生人威胁到了他们来之不易的财富”(Ryan 1)

在《殖民地中的民族》(“Nationality in Colonisation”)中,劳森表示:“阶级、信仰和国籍这些词不应该出现在澳大利亚人的词汇表中,因为它们是与世界和平与幸福对立的一切事物的同义词。”(*A Camp-Fire Yarn* 107)尽管劳森有着明确的反种族歧视观,但他作品中对华人的态度又不自觉地透露了他的无意识。劳森看到了背井离乡的华人在澳洲大陆遭受排挤和欺压的生活处境,但同情华人凄惨生活的背后有着东方主义思维。正如萨义德说:“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他(研究东方的西方人)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15)因而,劳森在塑造华人形象时,他无法不考虑自身所处现实环境。

二、“替罪羊”：“邪恶的”中国贩毒商人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遮蔽下的种族歧视左右了劳森对华人的判断，在种族主义影响下，他无法摆脱思维偏见去客观描写华人。澳大利亚建国之初，东亚也正崛起，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弥漫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黄祸论”甚嚣尘上。白人大肆喧嚷黄种人对澳大利亚经济社会的威胁，煽动白人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黄祸论’最初主要针对中国”（沃克 vi）。1901年澳大利亚通过严格的《移民控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但在此之前，一系列针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法案早已出台，如当时的维多利亚州针对华人劳工强行征收带歧视性质的人头税，1857年南澳大利亚响应维多利亚州通过的排华法案颁布了限制华人入境法案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一系列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更是深深地渗入澳大利亚人骨髓。以劳森为代表的澳大利亚作家，对华人的满心腹诽也会不自觉地流诸笔端。“19世纪末，澳大利亚殖民地对华人的恐惧达到至高点”（Taylor 111），关于中国侵略澳洲的不实小说盛行，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夕，这些虚构小说和想象毫无疑问激起了澳洲人民对中国入侵的恐惧。因而，劳森视他所认为的“愚笨滑稽”的中国人为“不自然的生长”和“巨大的东方问题”（*A Camp-Fire Yarn* 113）。

劳森内心对“亚洲人〔主要指日本人和中国人〕入侵”的恐惧像一把利刃阻断了他对华人的理解和体谅，他戴着“有色眼镜”有选择地将华人描绘成肮脏、粗俗、慵懒的形象，与客观真实的华人形象相距甚远，将少数华人问题放大化、群体化。《一个新的宗教》（“The New Religion”）中，劳森说道：“终有一天，中国佬不是被人杀掉，就是被人医好——很可能是前者”（113），“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华人〕是坏公民，也是坏殖民主义者”（107）。可以说，在《公报》（*Bulletin*）杂志的推波助澜下，劳森及其他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借助文学虚构对华人的负面描写进一步致使华人沦为彼时澳大利亚社会的众矢之的，沦为他们想象中“入侵”的亚洲人的替罪羊。如弗洛伊德所言，“‘投射’是一种心理机制，偏执狂凭借这种心理机制逃避自责和自疑，而指责和怀疑他人”（转引自Lindzey 26）。诺伊曼（Erich Neumann）又提出，“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种族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投射的主要结果是把世界分成好、坏和优、劣的二分法，其特征是否认我们内心的阴影的存在，并把它投射到替罪羊身上，通常是异族人，或种族上处于劣势的人”（8）。按照菲利普斯（A. A. Phillips）的说法，民族主义时期的澳大利亚对于本民族文化常常表现出自卑感，知识分子的反应力和判断力受影响，不可避免地带着偏见看待澳大利亚作家出版的作品（299-302），因而知识分子将建立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的不确定性和对异族的恐惧投射在勤恳善良的异乡人身上。劳森同时期的作家弗菲（Joseph Furphy）便认为，澳大利亚人只有在丛林中才能“完全地意识到自身的国民性”（65），“但他的‘丛林人’理想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澳大利亚是崭新而年轻的，而欧洲和亚洲是不道德的、堕落的”（欧阳昱，《表现他者》31）。劳森也在诗中说道：“我看见黄种人和棕种人统治了/南方的大地和南方的海洋，白人的子弟上异教的学校，/白人与黑

人同为奴隶。”(A Fantasy of Man 270) 他臆想黄种人将入侵,感到恐惧和愤怒,并认为白人上异教学校是一种倒退。由此看来,劳森的“丛林人”理想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体系,劳森捍卫澳大利亚丛林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试图将白人以外的其他族群驱逐出澳大利亚丛林。显然,华人进一步成为文学作品中被边缘化、被驱逐和受迫害的替罪羊。

“19世纪50年代初发现金矿后,来到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移民几乎全是男性[……]19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前往海外的中国人都是男性,这意味着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定居群体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失衡。在这些所谓的‘单身汉’社会中,相对而言,很少有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不能像常人一样与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起”(Bagnall 64-65)。劳森笔下的华人也大多为男性,由于语言障碍,生活方式差异,这些华人离群索居,加之澳大利亚人对黄种人的偏见,华人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同时又受限于当局政府的反华政策,他们只能借助赌博和吸食鸦片等陋习作为消遣来驱散孤独,而这些却给种族主义者和政府的种族歧视性政策提供了所谓依据。诚如华人历史学家巴格诺尔(Kate Bagnall)所言,“即使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许多直接与性别失衡有关的罪行也被指向中国人,包括鸡奸、引诱、放荡、恋童癖、强奸、谋杀、赌博和吸毒”(66),言下之意,华人即便与当地发生的这些罪案无关,也会被扣上罪犯的帽子。澳大利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富有是因为从事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贫穷的中国人大多无恶不作,靠非法手段攫取不义之财。

劳森在《阿丹》中描绘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种子商人阿丹吸食鸦片并非法从事鸦片贩卖活动,最终被警方当场抓捕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上层阶层华人罪犯的形象。劳森对华人有着先入为主的歧视,将所看到的少数中国贩毒商人、鸦片吸食者和赌徒,以偏概全地指向所有华人,从而将中国人归类为“坏公民”(A Fantasy of Man 97)。他在抨击贩卖鸦片的华商时,却一字不提把鸦片带进中国市场的始作俑者。正如欧阳昱所言,劳森与同时代的民族主义作家“从来不写也不提那些同样吸食鸦片、同样进行贩毒的澳大利亚白人,更不提与鸦片吸食和贩运进行不懈斗争的华人领袖”(《表现他者》97)。对华人的误解使他们目之所及的仅有华人的不足,而无视华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华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在种族歧视背景下,华人存在的任何瑕疵和不足都难以遁形,故而贩毒、吸毒、赌博等淘金期民众的共性问题在华人身上会被无限放大,华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成为他们歧视华人的靶子,但这些恶习非华人独有,也不能单纯地被归结为澳大利亚人口中的道德问题。它们却成为民族主义时期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标志,使华人成为吸毒、赌博和偷窃罪犯的替罪羊,成为民众泄愤的替罪羊。

沦为替罪羊的华人成了被抹黑的对象。成立于1880年的《公报》杂志秉持激进的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用稿原则,将驱赶华人视作当时澳大利亚社会最迫切的任务,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华宣传。“在文学领域,作为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的非官方代言人,《公报》可能比任何其他杂志或报纸都更抹黑中国人形象”(Ouyang, “The Chinese” 130)。1886年4月14日,《公报》杂志专门推出“反华特刊”,刊载了系列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文章和漫画,包括六封封面漫画(欧阳昱,《表现他者》26)。在淘金期直到世纪末,大量华人移民从旧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寻

求生机，希冀在那里安巢立屋，却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文学作品中，华人往往以肮脏、丑陋、扎着长辫子、抽着大烟的负面形象呈现在澳大利亚民众面前，与历史史实严重不相符，可谓竭尽歪曲之能事。《公报》杂志对华人移民的到来，更是大放厥词，毫无顾忌地批评说，“华人的邪恶是毁灭性的”，“华人犯罪是对我们国家的威胁”，“他们的勤奋刻苦是对我们社会体制的威胁”（Palmer 6）。劳森作为《公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通过文学创作参与排华，在无意中，充当了澳大利亚反华者的同谋。对此也不乏清醒者，澳大利亚 90 年代文学研究学者帕尔玛（Vance Palmer），就是一个正直的社会和文学评论家，他曾指出：“事实上，对这些‘华人是违反律令的人’的歪曲描写是‘找不到任何证据的’，相反，已有的证据表明他们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被指控的一些所谓罪行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过错而已 [……] 这么做，只不过是华人移民的到来破坏了他们‘孤立而排外’的民主梦想，他们不愿将华人视作他们的兄弟中的一员而已。”（7）因而，他对于澳大利亚政党“将华人赶出澳大利亚作为他们政治运动核心任务之一，并且将这一任务作为他们首要政治问题”的做法更是义愤填膺。“这种对华人的憎恶有些莫名其妙，正如澳大利亚政治家莱恩指出的那样，‘丛林中游荡的东方人是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的威胁这种观点毫无道理可言，试想若成千上万的亚洲人全部撤出澳大利亚，会是什么结果’”（9）？劳森作为一个有着民族理想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在迎合当时澳大利亚读者的阅读预期，他对华人形象的负面书写表明其文学思想有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

三、镜像“他者”：“逆来顺受”的“白色中国人”

“在当时种族歧视政策和思想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作家在观察中国人的时候，会对那些肮脏、无价值、古怪和可笑的东西有选择性地加以观察，并排斥他们所观察到的艺术表现。因此，扭曲是不可避免的”（黄源深 57）。劳森受世纪末“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思维影响，在创作过程中，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新西兰毛利人”“亚洲人”都有着鲜明的歧视。关于华人，劳森有选择性地刻画华人，造成了华人形象的片面化。在他有限的关于华人的作品中，华人大多呈现出“邪恶”与“卑屈”的两极化形象。

在《斯蒂芬与吉姆》（“Stiffner and Jim”）中，酒店主人是一个新西兰毛利人，他看上去“比淘金地的‘中国佬’还要卑劣”，“比下水道的老鼠还尖嘴猴腮”（Lawson, *A Camp-Fire Yarn* 353）。在诗歌《寒忌武之星》（“The Cambaroora Star”）中，中国淘金客更是被描绘为“小偷”和“无业游民”，“从前到来的‘中国佬’总会引起冲突——当掘金者发现金矿，他们就像小偷和无业游民一样蜂拥过去，他们总是尾随在淘金者后面发现金矿，然后偷偷摸摸地淘金”（164）。劳森小说中的另一种华人形象，往往是那些迎合和顺从了白人文化的“白色中国人”，如贩卖“白心”西瓜的“可爱的”阿宋。在诗歌《剪羊毛人》（“The Shearer”）中，他表示：

“不管他是棕种人还是黑种人/不管他是对还是错,/只要他对伙伴诚实/他们就叫他‘白人’。”(*Children of the Bush* ix)通过阿丹这一“负面”的贩毒形象和阿宋这一“正面”的菜贩形象,劳森流露了他固有的将华人“他者化”的思维,他认为“中国上层阶级有犯罪倾向,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他将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爱的、可操纵的下层阶级,另一类是邪恶的、可恨的中国商人”(Ouyang, “Lawson, Gunn” 15)。在劳森眼中,“可爱的、可操控”的华人不过是那些被同化、符合西方文化准则的东方人。这源于“华人涌入澳大利亚时恰逢澳大利亚殖民地自我定义的时期”(Taylor 105),澳大利亚知识分子正在建构民族文化和寻找澳大利亚性,民族主义作家不遗余力地将华人“他者化”。一方面,这是白人通过构建华人“他者”,确立“自我”和身份的方式,正如,“自我意识只有在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满足”(Hegel 173),通过华人这一镜像,西方的“自我”才得以界定。另一方面,正如下文所示,华人是“这个新兴的社会创造民族身份的铁砧[工具]”(Price 260),是他们文化优越感界定和确立的垫脚石。“同样有着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澳洲人认为中国人是现成的替罪羊和必要的对照”(Ouyang, “Australian Invention” 74),他们将华人形象“他者化”甚至“妖魔化”来显示西方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以巩固西方文化霸权。

黄源深认为“任何相互理解的改进(在作者和中国人之间)都会对作者的创作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劳森所说,他‘与中国人的丰富经验’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并对他们做出公正的判断。阿宋,作为一个华人移民的文学形象,也许比与劳森同时代作家的任何澳大利亚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真实,更具代表性”(58)。然而,劳森笔下的“互相理解的改进”和“公正的判断”前提是西方人的支配和东方人的服从,他所谓的“更真实”和“更具代表性”的形象实际上隐藏着扭曲华人形象的意图。在《阿宋》中,阿宋是一个安分守己、踏实本分、沿街叫卖的中国小贩;阿宋的亲戚阿细则是一个重恩情、讲义气的人。他为了替父亲报恩,辗转城市各个角落,替父亲还上了六英镑。在这则小说中,劳森看似对华人形象有所改观,在重新审视中国人的形象,实际上宣传的依旧是其“白人至上”的文化思维。小说开篇,叙事者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我是反华的;我完全赞成白人的澳大利亚;一个人可能会讨厌或者憎恨一个民族,却不会讨厌或憎恨该民族的每个人。因而,个人可以与他们交友,甚至成为好兄弟。”(Lawson, *A Fantasy of Man* 500)这段叙述无不流露出白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阿宋靠贩卖蔬菜谋生,叫卖他的西瓜个个都是“白心”(“wi'art”),长期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阿宋,在备受欺凌冷落的谋生过程中习得了“白人至上”的生活哲学,称其西瓜为“白心”,是不得已向白人献媚,小说中的阿宋不再是备受劳森诟病的华人,被赋予了勤劳善良和知恩图报的品质,因而作者“开始喜欢这个老男人了”(501),并夸赞他有一颗“白心”。在《他的错误》中,一个不知名姓的华人流浪汉在向一个澳大利亚牧场主讨得一份牧羊人工作后,却被发现让人打死在养羊场上,“中国佬”(the Chinaman)是他唯一的称谓(354)。这样一个上午在澳大利亚大陆谋得了一份工作,下午却被打死在荒野的华人,无人知晓,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凄惨命运由此窥豹一斑。

“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多为底层澳大利亚人发声，他对下层阶级的兴趣始终如一”（Ouyang, “Lawson, Gunn” 13）。劳森作品中底层阶级的华人也占大多数，如小贩阿宋、剪羊毛人等，欧阳昱认为《阿宋》“显示了劳森对下层人民的持续关心，也是他惟一次以较为同情的笔触描写中国人”（《表现他者》145）。诚然，劳森善于揭露下层阶级的困境，为广大贫穷困苦的澳大利亚劳动人民发声，但面对下层阶层的中国人时，劳森难以摆脱种族主义思想。这种所谓的“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和东方种族的“低劣性”上。这种白人至上的价值判断贯穿在《阿宋》的字里行间，也贯穿在劳森对华人形象塑造的全过程中。他曾如此论述澳大利亚华人，“我反对中国佬并非因为他们是中国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条与我们不一样——我之所以反对他们，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坏公民，也是坏殖民主义者”（*A Camp-Fire Yarn* 107）。他将中国人臆想为“殖民主义者”，毫无根据地在中国看作一个未开化的民族，自己则是文明的化身，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群“野蛮人”。这正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制裁，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4）。劳森关于华人的小说有着鲜明的东方主义倾向，劳森在东西方之间人为建构了一种不对等的西方权力话语和权力关系，东方成为沉默的“他者”和西方“自我”的镜像。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体系下，东方和西方形成了思维和文化上的天然界限，人为地形成一条带有霸权性质的分界线。

劳森笔下的边缘华人形象既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迫切寻求民族身份和创造民族文学形象的反映。背井离乡、勤恳工作、安分守己的华人是澳大利亚知识分子笔下“入侵”的亚洲人的替罪羊、是殖民精神创伤和种族歧视的“替罪羊”；他们是西方构建“自我”的镜像，是西方凸显种族优越感和霸权话语地位的对立面。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经典作家，给读者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在创作思想方面，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维的侵染，从而塑造了不少被丑化、固化的华人形象。可以说，这既是劳森作为作家的局限性，也是劳森所处创作时代和语境的局限性。具体地说，这是澳大利亚民族心理中对外歧视和对内平等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表现，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自卑心理的外化，这种矛盾和不自信依然反映在他们如今的外交关系和多元文化政策上。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gnall, Kat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amil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2, no. 1, 2011, pp. 62-77.
- Furphy, Joseph. *The Annotated Such is Life: Such is Life, Being Certain Extracts from the Dairy of Tom Collins*. Oxford UP, 1991.
- Ge, Guilu. *Far Away from the Fog: British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Fujian Education, 2015. [葛桂录:《雾外的远音:

- 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UP, 2018.
- Huang, Yuanshen. "Discrimination and Distortion: The Chinese in Early Austral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1995, pp. 55-59. [黄源深: "Discrimination and Distortion: The Chinese in Early Australian Literature," 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55-59页。]
- Lawson, Henry. *Children of the Bush*. Methuen, 1902.
- . *A Camp-Fire Yarn: Henry Lawson Complete Works 1885-1900*. Edited by Leonard Cronin. Lansdowne, 1984.
- . *A Fantasy of Man: Henry Lawson Complete Works 1901-1922*. Edited by Leonard Cronin. Lansdowne, 1984.
- Lindzey, Gardners. *Projective Techniques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1.
- Lovejoy, Valeria. "Chines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endigo: Their Local and Trans-local Lives in 'This Strangers' Count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2, no. 1, 2011, pp. 45-61.
- 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Oxford UP, 2000.
- Neumann, Erich. *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 Translated by Eugene Rolfe. Putnam's, 1969.
- Ouyang, Yu. "Australian Invention of Chinese Invasion: A Century of Paranoia, 1888-1988."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vol. 17, no. 1, 1995, pp. 74-83.
- . "The Chinese in the Bulletin Eyes, 1888-1901." *Southerly*, vol. 55, no. 2, 1995, pp. 130-43.
- . *The Expression of the Other: 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s, 1888-1988*. Xinhua, 2000. [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1988》。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 . "Lawson, Gunn and the 'White Chinaman'." *Literature in North Queensland*, vol. 30, no. 2, 2003, pp. 10-23.
- Palmer, Vance. *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 Currey O'Neil Ross Pty, 1954.
- Phillips, A. A. "The Cultural Cringe." *Meanjin*, vol. 9, no. 4, 1950, pp. 299-302.
- Price, Charles Archibald.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asia, 1836-1888*.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P, 1974.
- Ryan, J. *Ancestors: Chinese in Colonial Australia*. Fremantle Arts Centre, 1995.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Yugen W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7。]
- Stephensen, P. R.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e in Australia: An Essay towards National Self-Respect*. Allen & Unwin, 1936.
- Taylor, Antony.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around 1900: A Re-examination of Australia's 'Great White Walls'." *History Compass*, vol. 11, no. 2, 2013, pp. 104-16.
- Turner, Henry Gyles.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From Its Discovery to Its Absorption into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ol. 1*.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4.
- Wakler, David. *Australia and Asia*. Translated by Yongxian Zhang. China Renmin UP, 2009. [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Yang, Jinfa. *Melbourne: Australian Chinese, 1901-1921*. Translated by Nan Yao and Ligui Chen.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8. [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 1901—1921年》,姚楠、陈立贵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翻 译 研 究

儿童文学翻译中互动性的语域再现 ——以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三个中译本为例

◎ 陈雪梅

内容提要: 本文以吉卜林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为例,探讨儿童文学的语域特征——互动性。本文首先分析了互动性与该书语域的关联,进而分析其在称呼语、语气和口语体等语言层面的体现。最后再从这三个方面比较三个中译本如何再现原文的互动性语域特征。笔者认为互动性是儿童文学的一大语域特征,将其再现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尤为重要。为此,译者可化身原作者创作时的社会角色、模仿他的叙述口吻、效仿吉卜林给儿童大声朗读等方式,来重现原文的互动性。在这种真实的阅读环境中,译者能更好地与儿童“互动”。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语域 互动性 《原来如此的故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089-12

作者单位: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 香港 99907

Titl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gister Feature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Rudyard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ve register feat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ased on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 It first examines how interaction is embodied in the book's register,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inguistic features such as vocatives, tones, and colloquialism, based on which it then compares three Chinese versions. It is argued that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register feat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t is essential for translators to reproduce it in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can imitate the social role and tone of the author, and they can also read the translation aloud to children, by which they can better interact with them.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gister, interaction, *Just So Stories*

Author: Xuemei Chen,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读者是儿童，儿童和成人在心理状态、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语域是区别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典型特征，从语域视角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不过目前相关的研究只有三篇文章（Puurtinen 159-73；曹明伦，《谈翻译中的语言变体》87-88；《语域再现》112-15）。曹明伦指出儿童文学作品的共同语域特征是简洁性、生动性和音乐性（《语域再现》113）。笔者认为除了这三大语域特征以外，互动性也是儿童文学的语域特征之一。本文以吉卜林的儿童文学作品《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为例，具体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互动性在原文的语域上如何体现？如何体现在原文的语言层面？三个中译本又如何再现这种互动性语域特征？

一、语域与儿童文学翻译

语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因情景类型的不同而改变语言使用的语言变体（Halliday 32），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变量。语域分析对于翻译实践和研究的重要性已有众多学者讨论（Borrillo 1-15；Hatim and Mason 55；Baker 17；Hatim and Munday 76-85；Wong 263；侯瑞德 83-86；郭著章 6-7；张美芳 108-116；吴群 44-45；胡壮麟等 348，366；高生文 34-37），也有学者指出语域是翻译质量评估的一个核心参数和分析工具（House 64-65；Liu 1-26；Steiner 292-295）。不过，讨论语域和儿童文学翻译的文章比较有限。据笔者目前统计的资料来看，只有三篇文章专门讨论语域对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芬兰学者普尔蒂宁（Tiina Puurtinen）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分析对话中的静止语旨和动态语旨（static and dynamic tenor）对小说翻译的重要性。作者援用贝尔（R. T. Bell）对语旨的定义和阐释，集中分析和比较原文与译文的正式程度（formality）和礼貌程度（politeness），最后指出语旨在对话中的功能，比如可以反映说话人的年龄和亲密程度，用于塑造角色以及通过意想不到的语言使用方式产生幽默和讽刺的效果（171）。作为《原来如此的故事》的中文译者，曹明伦以其中的故事为例撰写了两篇文章谈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语域分析和再现。他在《谈翻译中的语言变体和语域分析》一文中以该书第四篇故事《豹子身上的黑斑是怎样来的》为例，分析该语篇的语域特点为“亲切自然、通俗晓畅、幽默生动和绘声绘色”（87），并指出译文与原文语域对应进而使语篇得体合度的重要性。他在另一篇文章《语域再现和译者的虚拟社会角色》中以该书第一篇故事《鲸鱼的喉咙为什么很小》为例，指出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都具有简洁性、生动性和音乐性，而这些语言特点也是儿童文学作品的语域特征”（113）。作者然后举例具体说明原文的这三大语域特征并指出译文也应将其再现。

笔者认同儿童文学的语域特征具有简洁性、生动性和音乐性，不过笔者认为互动性也是儿童文学的一大语域特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互动意为“互相作用；互相影响”（550）。

互动性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以及互相作用的关系，这在文本内部体现为叙述人（addresser）和听话人（addressee）之间双向交流和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进而反映在语域层面，构成儿童文学语域特征之一：互动性。这一特征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尤为重要，因为它能让译者翻译时模仿原作者创作时的社会角色，想象和读者进行“互动”。本文将吉卜林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作《原来如此的故事》为例探讨互动性语域特征在该作品的体现以及中译本如何再现这一特征。

二、《原来如此的故事》的互动性语域特征

《原来如此的故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作。撰写吉卜林传记的学者威尔逊（Angus Wilson）称这部书是“第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1]（221）。格林（R. L. Green）也极力称赞吉卜林在书中展现出来的叙述技巧，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富于灵感的故事讲述者（the most inspired teller of tales that we have），让其他作家难以企及（272）。关于这本书的起源，大部分学者（Carrington 270; Wall 29; Mallett 117; Lewis XVI）认为这些故事或其中一部分是吉卜林为自己的大女儿约瑟芬（埃菲是其小名）所写。最明显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吉卜林本人。他曾公开表示第一个关于鲸鱼的故事是送给五岁约瑟芬的生日礼物。这个故事于1897年12月发表于著名的儿童文学杂志《圣尼古拉斯》（*St. Nicolas*），吉卜林在该故事的序言中写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动这些故事，但一到晚上，这些故事是埃菲的睡前故事，你就不可以改动任何一个字眼。这些故事必须以一种“原来如此”的方式讲述，否则埃菲就会醒来，还原它们原来的面目。”（Kipling, *Just So Stories* 1）这也是书名《原来如此的故事》的由来。然而，1899年吉卜林一家在乘船去美国的途中，约瑟芬不幸感染肺炎夭折。爱女的离去差点击垮吉卜林，他自己也勉强从肺炎中死里逃生。从悲痛中慢慢恢复过来之后，他开始将这些之前为女儿讲的故事汇编成书。

上文提到儿童文学的另一大语域特征为互动性，互动性与该书的语域三要素都有关联，与语旨和语式的关联更为密切。首先，语场一般指交谈的主题，即“实际发生了什么”（Halliday 31）。该书的语场是吉卜林创作的儿童文学故事，包括12个故事^[2]和之后的12首诗歌，以及23页带有解释文字的整页插图和书中其余多处小插图。这些故事主要是吉卜林为了回答女儿提出的问题而杜撰或编写的答案，他并没有以严肃的科学家的身份来解答问题，而是充分运用想象力和幽默风趣的叙述方式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书里前面7个故事主要关于动物的进化，即动物为适应环境而做的改变，比如《骆驼为什么有驼峰》、《豹子身上的黑斑是怎样来的》，以及《狢狢的来历》等。最后三个故事的主角也是动物，分别是《玩弄大海的螃蟹》、《独来独往的猫》和《跺脚的蝴蝶》。中间两个故事《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和《字母表是怎样造出来的》的主角是塔菲和她的爸爸特格迈。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也采用了讲故事经常使用的过去时态及经典化的开头“从前”（once upon a time），这有利于将听话人带入听故事的语

境中,增进与叙述人的互动。

其次,语旨具体指互动者(interactants)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Eggins 63),即叙述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权利、社会距离(House 64)和情感释放的程度(Pearce 186)。该书的叙述人和听话人是吉卜林和他的女儿,社会距离亲近、情感亲密,书中多处弥漫着父女间的温情,比如《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和《字母表是怎样造出来的》描述了塔菲和她的爸爸特格迈的有趣故事,有学者认为这对父女其实就是吉卜林和他女儿约瑟芬的折射。克内普夫尔马赫(U. C. Knoepfelmacher)^[3]撰写专文证明约瑟芬不是一个被动的听众,而是吉卜林创作的合作者,并且他认为《字母表》这个故事是吉卜林对塔菲作为故事合著者的悼念(37)。研究叙事学的学者沃尔(Barbara Wall)也提到《原来如此的故事》“虽说目前是吉卜林最受儿童喜爱的故事,但它们都带有最初给特定读者(约瑟芬)讲故事的痕迹,有些故事还带有许多父女私下分享过的笑话”(129)。这进一步说明了叙述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

最后,语式指交际的媒介(medium),一般简单分作口头或书面媒介,也包括更为复杂的类型,比如“为了大声读出来的书面体”(written to be read aloud)(Pearce 186)。该书正是属于这一复杂语式。虽说这些故事以书面的形式呈现,沃尔认为它们是用来大声朗读的(130),威尔逊也认为书中前七个故事主要是用来大声朗读、背诵、表演和吟唱的(229)。书中大量的口语体也有助于大声朗读。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互动性这一语域特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原来如此的故事》最初是由吉卜林讲述给自己孩子的,具体而言是一名慈父(原作者的社会角色)为了回答好奇女儿提出的问题而杜撰的故事。互动性在该书的语旨和语式上体现尤为突出,下文将具体分析中译本是如何再现这一互动性语域特征。

三、互动性语域特征在三个中译本的再现

目前《原来如此的故事》有十多个中译本,为便于比较和分析,本文选取了三个颇受读者欢迎且影响力大的译本:方华文的《原来如此——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冷迪的《原来如此的故事》和曹明伦的《原来如此的故事》(以下简称方译本、冷译本和曹译本)。三个译本均多次再版,方译本最初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冷译本于2012年由新疆少儿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原来如此的故事》中的9个故事和吉卜林另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s*)中的一篇故事,该译本2016年再版。2017年出版的曹译本《原来如此的故事》是对其1986年初译本的全面修订。初译本自1986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以来,先后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再版,多次重版足以说明其译本的受欢迎程度。

本节主要分析三个译本如何再现原文的互动性语域特征。上一节笔者提到互动性在该书语域上的体现,尤其体现在语旨和语式上,而语域最终是通过语言特征实现。首先,就语旨而言,称呼语(包括人称代词)和情态的翻译最容易出现问题(Borrillo 8)。称呼语(vocatives

/ terms of address) 最易体现人物之间的亲疏关系, 比如尊称、头衔和亲昵语的使用。由叙述人使用的称呼语可判断出这些故事的叙述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慈父讲给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比如, 故事的开头经常是 *O my Best Beloved* 和 *Hear and attend and listen*。叙述人为了提醒听话人他的存在或是引起听话人的注意, 讲故事的时候也常用 *Now listen and attend!* 和 *Best Beloved. Do you see?* 等插入语。这些称呼语和插入语有助于增进叙述人和听话人的亲近感, 也更容易让听话人融入文本和角色互动。此外, 称呼语也是一种声音的联系 (aural contact) (Eggins 53), 能很好地拉近与听话人的空间和人际距离 (spatial / interpersonal distance), 模仿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研究吉卜林的学者马利特 (Phillip Mallett) 也认为“以‘原来如此’的方式讲述故事或许能让吉卜林觉得自己心爱的女儿离他不会太遥远了”(117)。因此, 译文可通过称呼语的翻译来还原原作者在书中作为慈父的社会角色和“原来如此”的讲述方式。

其次, 语气是情态 (modality) 的一个方面, 因为这能体现作者对于说话人以及所描述对象的情感态度和人际关系。语气的翻译也能强化叙述人作为慈父的角色, 还原叙述人和听话人亲密的社会角色关系。“语气和情态也可以通过语调, 在音系层得到体现”(胡壮麟等 155)。据当年该书的听众瑟克尔 (Angela Thirkell) [4] 的回忆, 吉卜林风趣幽默的讲述方式为故事增色不少, “他每次讲故事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每个短语都有它特定的语调, 每次都不会改变。如果没有这种语调的话, 这些故事就硬邦邦的, 索然寡味。他讲故事还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节奏感, 他会强调一些词, 会夸张一些短语, 会时不时地吟诵几句, 这些都让我对他的讲述方式记忆深刻”(88)。所以, 吉卜林会给特定语句以特定的语调, 并且每次讲故事保持不变, 这就给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他在书中也通过大写字母和斜体来体现这些副语言因素 (语调、语气、停顿和重音等), 让文本“说话”。

最后, 上文分析过该书的语式是“为了大声读出来的书面体”, 因此书中充盈着大量的口语体。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亨特 (Peter Hunt) 也表示这本书“其实是口语体的完美誊写, 充盈着很多咒语和很有特色的笑话”(82)。书中大量的俚语、错误拼写、省字符和连字符等都能突出该书的口语体特色, 押韵、谐音、连词叠用、反复和排比等修辞手法也有助于大声朗读和吟唱。这些口语体也更利于叙述人和听话人产生互动。

笔者将从称呼语、语气和口语体的翻译来分析三个中译本是如何再现原文的互动性语域特征的。

(一) 称呼语的翻译

承前所述, 该书故事的叙述人是一名慈父, 听众是他最亲爱的孩子。所以很多故事都带有亲切的称呼语。其中, *Best beloved* 出现的次数最多, 共出现 41 次, *O my Best Beloved* 出现 4 次。这些称呼语强化了叙述人作为慈父的形象, 让故事洋溢着浓郁的父女情谊。比如:

- (1) a. IN the sea, once upon a time, **O my Best Beloved** [5], there was a Whale, and he ate fishes. (3)

- b. 在很久以前, **我亲爱的**, 大海里有一条鲸鱼。(方译 10)
- c. **小朋友**, 很久很久以前, 大海里住着一大鲸鱼。(冷译 16)
- d. **啊, 我亲爱的孩子**, 很久很久以前呀, 大海里有头大鲸。(曹译 1)

这是第一个故事《鲸鱼的咽喉为什么很小》的开头。正如上文所述, 这篇故事是吉卜林用来哄女儿睡觉的睡前故事, 并且约瑟芬坚持每晚讲故事的方式必须一样, 必须以“原来如此”的方式讲述。对于译者而言, 再现原作者慈爱的父亲角色和模仿他的语气就显得尤为重要。原文的 *My best Beloved* 很明显直接指向约瑟芬, 一个特定的听众。所以, 方译“我亲爱的”和曹译“我亲爱的孩子”更符合原文的口吻。冷译本的“小朋友”指向很广, 不具有特指性, 这就不利于建立叙述人和听众的亲密关系。曹译本还增加了一个经常在故事开头出现的语气词“啊”, 这立即把小读者带入了一个听故事的情境中。此外, 译者最好把称呼语放在故事的开头, 这更符合中文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所以, 曹译本更符合原文的语域特征, 利于叙述人和听话人的互动。

吉卜林除了在故事的开头加入称呼语以外, 他还通过文中的插入语和听话人互动, 提醒他们叙述人的存在。

- (2) a. The suspenders were left behind, **you see**, to tie the grating with; and that is the end of that tale. (9)
- b. 他的背带没带走, 留下来捆篦子用了。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方译 13)
- c. **我们知道**, 那副背带被捆在栅栏上了。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冷译 20)
- d. **这你知道**, 吊裤带已经捆在那道卡在鲸鱼咽喉中的栅栏上了。这个故事到此也就讲完了。(曹译 5)

这句话是第一个故事的结尾。叙述人在该故事的中间通过加括号的插入语方式四次向听话人提醒千万别忘记水手背带裤的背带, 因为水手最后用背带在鲸鱼的喉咙里面扎栅栏, 这体现了他的足智多谋。此处 *you see* 这个插入语既和前面的四处提示相呼应, 又再次引起听众的注意。此外, 叙述人用 *you* 第二人称称谓直呼听话人, 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增进亲切感。方译本直接将其忽视, 未能很好地呈现原文的互动性。冷译本则把第二人称单数“你”变成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让叙述人现身。曹译还原原作的“你”, 直接指向听众, 利于增进叙述人和听话人的互动性。因此, 曹译本更能再现原文互动性特征。

(二) 语气的翻译

兰德斯 (C. E. Landers) 曾谈及语气翻译的重要性: “感知语域是译者可以掌握的一项非常有用的工具。译者若优先重视语气的话, 他就能避免一些陷阱, 比如过于忠实字面意义而曲解作者意图。语气有助于处理双关、间接用典、文法错误以及俚语等问题。当然, 语气也可以给语域提供重要的线索。我说的语气指的是一段话语、一篇文章或整部作品的整体感觉,

这包括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共鸣。”(67-68) 语气反映了叙述人对听话人的态度以及彼此的亲疏关系, 这对于文本的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尤为重要。译者有时过于注重翻译原文的字面意思而忽略了它的整体语气。比如:

(3) a. And Pau Amma's babies hate being taken out of their little Pusat Taseks and brought home in pickle-bottles. That is why they nip you with their scissors, and **it serves you right!** (146)

b. 保尔·阿玛的子孙后代们不愿意被人从他们的小普萨特塔塞克里拖出来, 装在盐水瓶里带回家。所以, 他们会用小剪刀夹你。**活该!** (方译 225)

c. 保·阿玛的子孙后代们非常不愿意被人从他们小小的普萨塔斯克中掏出来, 再装到盛有海水的瓶子里带回家去。他们自然会用小剪刀夹你, **挨夹活该!** (冷译 78)

d. 小螃蟹最讨厌被小孩子从洞里掏出来, 然后装进瓶子带回家中。这就是它们常常用螯钳夹伤小朋友的原因, **你可千万要记住这点!** (曹译 137)

这部分选自倒数第三个故事《玩弄大海的螃蟹》。保·阿玛是世界上最大的螃蟹, 它非常自负而不愿听从魔术师的指令。他随心所欲地玩弄大海, 导致涨潮退潮。魔术师为了惩罚它, 卸掉其硬壳, 并将其变小。不过, 魔术师出于同情给它一副钳子, 让它好好生存下去。故事的最后, 吉卜林警告听话人不要玩螃蟹, 否则会被夹。此处的 *it serves you right* 的字面意思是指那些玩螃蟹的小孩应该受到惩罚。所以, 方译本的“活该”和冷译本的“挨夹活该”是其本义。然而, 读者很难想象一位慈父会以这种口吻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说话, 这也是兰德斯极力避免的曲解作者意图的直译。曹译本选择了更加灵活的翻译方法, “你可千万要记住这点”不仅表明了叙述人的警告, 而且也流露出他对听话人的关心。译者用副词“可”加以强调, 突出效果。所以, 此处的意译更加适合原文叙述人的身份和语气。

如前文所述, 吉卜林也采用斜体和大写字母来强调或表明特定的语气, 这是利奇 (Geoffrey N. Leech) 所说的语相变异 (graphological deviation)^[6] 的两种形式 (47), 又称作语相突出 (张德禄 1; 徐德荣、姜泽珣 100)。语相变异能反映出作品声音的变化: “由于书写系统在很多方面是再现话语声音模式的系统, 所以语相是进一步反应声音效果的源头, 尤其是在表现人物话语风格的对话中。” (Leech and Short 105) 语相变异主要体现在“拼写, 连字, 大写字母, 斜体和分段” (105)。比如,

(4) a. It was indeed a **Superior Comestible** (*that's magic*), and he put it on the stove because *he* was allowed to cook on that stove, (23)

b. 这可真是**顿饕餮大餐哩** (**这可是魔法**), 他把蛋糕放在炉子上 (因为只有他能在这只炉子上烹饪), (方译 37)

c. 这确实是一个**超级蛋糕** (**那是魔法的作用**)。他把蛋糕放到烤炉上去烘烤 (因为只有他才有权力使用那个火炉), (冷译 27)

d. 那的确是块**很大的蛋糕**（**那可是魔法**）。他把做好的的蛋糕放在火炉上烘烤（因为**他被允许**用那个火炉做饭）。（曹译 16）

选文来自第三个故事《犀牛皮为什么有许多褶皱》，描述了帕西人做的直径半米多、厚度将近一米的大蛋糕。作者将 Superior Comestible 首字母大写，作为语相突出来强调蛋糕之大，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方译本的“饕餮大餐”通过复杂的拼写和相似的偏旁“食”能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不过恐怕小朋友不认识这个有难度的成语。研究可读性的芬兰学者普拉宁指出用儿童熟悉的词汇对他们感受词汇的情感意义十分重要（转引自 Oittinen 33）。冷译和曹译的“超级蛋糕”和“很大的蛋糕”对于儿童来说更易理解，不过缺乏原文的突显效果。汉语虽然不能用大写字母表示强调，但是通常可用着重号（.）或引号以示强调（兰宾汉 187）。此处的另一语相突出——斜体字 *that* 和 *he* 表示一种特殊的语调：“作为一种语相突出形式，斜体可用以强调重要成分，与音素系统的重音有相同的作用。”（张德禄 4）斜体 *that* 可以突出叙述人夸张的语调，进而引起听话人的兴趣。方译和曹译增加副词“可”来强调魔法的作用，还原了叙述人的语调。斜体 *he* 表明只有帕西人才能用火炉，因为叙述人在插图的说明文字中两次提醒听话人不要问有关火炉的事情（Kipling, *Just So Stories* 26, 28），暗示火炉很危险，不能擅自使用。所以，此处的斜体 *he* 除了强调只有帕西人能使用火炉外，还有警惕听话人不能随便使用火炉的用意。冷译的“只有他有权力”与原意有出入，曹译和方译的意义传达更为准确。此外，曹译的被动语态“他被允许”更能突显叙述人的警告口吻。

（三）口语体的翻译

如上文所述，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体，比如俚语、错别拼写、省字符和连字符等。刘易斯（Lisa Lewis）专门指出“书中的错误拼写有言外之意，比如 ‘satiabile curiosity’（正确拼写为 insatiable curiosity），暗示这是和学步小孩的对话，小孩可能会追问缘由直到满意为止”（Kipling, *Just So Stories* xxxviii）。译者除了要传达原意以外，还要尽量反映原文的口语特征（语式）。我们先看一处通过省字符突显口语体的翻译。

(5) a. ‘What is this,’ said the Leopard, ‘that is **so’sclusively dark**, and yet so full of little pieces of light?’ (38)

b. “这是什么呀，**这么阴暗**，却到处有**丝丝缕缕**的光线？”豹子说。（方译 56）

c. 豹子说：“这是什么呀？怎么这里**这么黑暗**却到处都是**细碎的亮光**？”（冷译 35）

d. “这是啥地方？”豹子问，“**里边黑咕隆咚的**，却又有一块块一条条那么多的光亮。”（曹译 25）

省字符是英语口语体的典型标志，用来表明一个或多个英语字母被省去的现象。此处的’sclusively 前有省字符，其正确的拼写是 exclusively。’sclusively 也是利奇提出的语音变异（phonological deviation）中首字母省略（aphesis）的一种形式（47）。此处，作者照顾到口语发音的特征，将 ex 省音变为 s。方译本和冷译本的“这么阴暗”和“这么黑暗”，忽略了原文

的口语体特征。曹译本的“黑咕隆咚”更符合原文口语体的语域特征,且增添了音韵上的趣味。他曾以这一篇故事为例来谈翻译中的语言变体和语域分析,并表示“口语体恰好能表现原文语篇亲切自然、通俗晓畅的语域特征”(《谈翻译中的语言变体》87)。

对话中使用俚语也能突出文本的口语体特征。人物对话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说话主体以儿童为多,即便是大人或拟人化的动物往往也是面对儿童说话,那话语一般浅显明白、直接了当、通俗顺口”(杨实诚 22)。人物对话不仅能彰显原汁原味的口语性,还能增进叙述人与听话人的互动关系:“儿童文学作品常使用大量生动的人物对话以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身临其境,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徐德荣、姜泽珣 101)同时,对话中使用俚语更能突显口语性,比如(冷译本未收入这个故事):

(6) a. 'I say, Daddy, it's an **awful** nuisance that you and **I don't** know how to write, isn't it? If we did we could send a message for the new spear.'

'Taffy,' said Tegumai, 'how often have I told you not to use slang? "**Awful**" isn't a pretty word, -but it could be a convenience, now you mention it, if we could write home.' (93)

b. 只听她说道:“依我看,爸爸,你和我都不会写字,忒耽误事了,是不是?要不就可以叫人送信回家,取长矛来。”

“塔菲,”特古麦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用俚语!‘忒’不是个很好的词。不过,既然你提起来了,如果咱们能给家里写信,倒是挺方便的。”(方译 147)

c. 我说呀,爸爸,悲催就悲催在我俩都不知道怎样写信,你说吧?要是我们会写信,就可以叫人捎个信把新鱼叉取来。”

“塔菲,”特格迈说,“我给你讲过多少次不要用俚语?‘悲催’可不是个规范的字眼儿。不过你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写信回家,那倒挺方便的。”(曹译 71-72)

这段塔菲和他爸爸特格迈的对话来自第十个故事《字母表是怎样造出来的》。塔菲经常和爸爸一起出去叉鱼,不过这次特格迈不小心弄断了鱼叉。此处塔菲抱怨他们不能写字,不然他们就可以捎信让家人送鱼叉了。文中的awful是一个美式口语,意为非常、极度地。方译文将其译为方言“忒”,不仅传达了原文之意,而且再现了原文的非正式程度和口语特征,实现了语旨和语式层面的对等。曹译文把awful和nuisance合译为“悲催”也达到了很好的口语效果。悲催作为一个网络热词普遍用于青少年之间,能很好地引起听话人的共鸣。以上两例可看出译者为再现原作的口语体可谓煞费苦心。

大声朗读是一些儿童文学文类(比如儿歌、童话、绘本等)的本质特征,因为儿童文学脱胎于口头表达的民间文学(江建利,徐德荣 55),深深扎根于口述叙事的传统(Dollerup 83)。吉卜林在写完故事后会大声读给小孩听,以期寻求他们的反馈。译者也可效仿这种把译文朗读给孩子听的方式。早在一百多年前,孙毓修在编译《童话》丛书的过程就已采取这样的方式:“每成一编,辄质诸长乐高子,高子持归,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召诸儿语之,其事之不为儿童所喜,或句调之晦涩者,则更改之。”(118)儿童文学翻译家奥伊蒂宁(Riitta

Oittinen) 也倡导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大声朗读译本以把握故事的节奏、语调和语气”(35)。在这样真实的朗读环境中,译者能更好地把握原文的口语特征(语式),进而再现互动性这一语域特征。

除了大声朗读把握原文的语式以外,译者还需分析原文叙述人和听话人的社会角色关系,进而把握原文的语旨。这也进一步需要译者了解原文的创作背景和叙述对象,从而在翻译时成为“千面人”(余光中 36),随时可“化身为作者创作原作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曹明伦,《语域再现》113)。这种角色意识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读者本就存在不对等的角色关系。这种不对等也会进一步反映在文本内部,比如儿童文学作家和译者需要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对象而调整语言表达和叙述方式。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学者奥沙利文(Emer O'Sullivan)表示这种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的不对称关系(asymmetry)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而解决这种不对称而采取的改写形式在儿童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52)。因此,译者也要灵活采取翻译策略,调整语言表达方式,尽量化身原作者创作时的社会角色以及模仿他的叙述口吻。

本文以《原来如此的故事》三个中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的互动性语域特征,笔者认为互动性在该书的语旨和语式上体现尤为突出,进而反映在称呼语、语气和口语体等语言层面。三位译者在中译本也尽量再现原文的互动性,相较而言,在这三方面的翻译上,曹译本更接近于原作的口吻。笔者认为,互动性是儿童文学的一大语域特征,将其再现对儿童文学翻译尤为重要。为更好地再现原文的语域特征,译者可扮演原作者创作时的社会角色以及模仿他的叙述口吻。此外,译者可效仿吉卜林大声朗读的方式,来重现原文的互动性。在这种真实的朗读环境中,译者能更好地与儿童“互动”。

注释 [Notes]

[1] 所有英语引文皆为笔者翻译,下同。

[2] 1902年该书最初的版本包括12个故事。不过,1903年美国出版社Charels Scribner's Sons增加了《关于禁忌的故事》(“The Tabu Tale”),共13个故事。本文作者选取的源文本是由吉卜林研究会的成员刘易斯所编,含有详细的介绍和注释。该版本收录了14个故事,增加了《关于禁忌的故事》和《火腿和豪猪》(“Ham and Porcupine”)。不过,后来的大多数版本只收录了初版时的12个故事。

[3] 通过严谨细致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论证,克内普夫尔马赫的这篇文章“Kipling's 'Just-So' Partner: The Dead Child as Collaborator and Muse”被儿童文学协会(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评为1997年度最佳文章。

[4] 瑟克尔是吉卜林的侄女,也是约瑟芬的好朋友。她在其回忆录《三间房屋》(Three Houses)回忆了当年和约瑟芬一起听吉卜林讲故事的温馨场景(87-88)。此外,撰写吉卜林传记的学者莱西特(Andrew Lycett)也温情地描述了这两个小女孩聚在吉卜林书房听《原来如此的故事》的场景(302)。

[5] 笔者会把原文和译文比较的具体部分加粗。

[6] 也有学者将利奇提出的诗歌语言变异之一的“graphological variation”译作“书写变异”,并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发音的变异在书写上的体现,另外一种是指在排版、标点以及打印方面的变异”(刘世生、朱瑞青 28)。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Routledge, 2001.
- Borrillo, Josep Marco. "Register Analysi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Babel*, no. 46, 2000, pp. 1-19.
- Cao, Minglun. "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Register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07, pp. 87-88. [曹明伦:《论翻译中的语言变体和语域分析》,载《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第87-88页。]
- . "Register Manifestation and the Virtual Social Role of Translator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6, pp. 112-15. [曹明伦:《语域再现和译者的虚拟社会角色——兼谈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第112-15页。]
- Carrington, Charles.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Penguin Books, 1986.
- Dollerup, Cay. "Translation for Reading Aloud." *Meta*, no. 1-2, 2003, pp. 81-103.
- Eggs, Suzanne.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inter Publishers, 1994.
- Gao, Shengwen. "Register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12, pp. 34-43. [高生文:《语域分析与〈论语〉翻译研究》,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4-43页。]
- Green, Roger Lancelyn, editor.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 Guo, Zhuzhan. "Register and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1989, pp. 4-8. [郭著章:《语域与翻译》,载《中国翻译》1989年第6期,第4-8页。]
-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Edward Arnold, 1978.
-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1.
- Hatim, Basil, and Jeremy Munday. *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Routledge, 2004.
- Hou, Ruide. *Varieties of Englis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988. [侯瑞德:《英语语体》。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 House, Juliane.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Routledge, 2015.
- Hu, Zhuanglin,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P, 2008. [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
- Hunt, Peter. *Children's Literature*. Blackwell, 2001.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6th ed.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Jiang, Jianli, and Derong Xu. "On the Indispensable Making of Translators for Children."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8, 2014, pp. 53-58. [江建利、徐德荣:《论儿童文学译者必备之素养》,载《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8期,第53-58页。]
- Kipling, Rudyard. *Just So Stories*. Translated by Huawen Fa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9. [吉卜林:《原来如此——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方华文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 *Just So 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 Edited by Lisa Lewis. Oxford UP, 2009.
- . *Just So Stories*. Translated by Di Leng. Xinjiang Juvenile, 2016. [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冷迪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 . *Just So Stories*. Translated by Minglun Cao. People's Literature, 2017. [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曹明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Knoepflmacher, U. C. "Kipling's 'Just-So' Partner: The Dead Child as Collaborator and Muse." *Children's Literature*, no. 1, 1997, pp. 24-49.
- Lan, Binhan. *How to Use Punctuation Mark*. Petroleum Industry, 2002. [兰宾汉:《如何使用标点符号》。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
- Landers, C. E. *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8.
- Leech, Geoffrey N.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gmans, 1969.
- Leech, Geoffrey N., and Mick Short.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2nd ed. Pearson

- Longman, 2007.
- Liu, Zequan. "Register Analysis as a Too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ranslation Journal*, vol. 7, no. 3, 2003, pp. 1-26.
- Liu, Shisheng, and Ruiqing Zhu. *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 Beijing UP, 2006. [刘世生, 朱瑞青:《文体学概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Lycett, Andrew. *Rudyard Kipling*. Windenfeld & Nicolson, 1999.
- Mallett, Phillip. *Rudyard Kipling: A Literary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Oittinen, Riitta.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 O'Sullivan, Em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Carmen Millán and Francesca Bartrina. Routledge, 2013.
- Pearce, John. "Varieties in Written English." *Exploring Language*, edited by Peter Doughty et al., Edward Arnold, 1972, pp. 177-87.
- Puurtinen, Tiina. "Ten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vol. 6, no. 2, 1998, pp. 159-73.
- Yu, Guangzhong. *On Translation by Yu Guangzhong*. China Translation Corporation, 2002.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Steiner, Erich. "A Register-based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n Advertisement as a Case in Point." *Target*, vol. 10, no. 2, 1998, pp. 291-318.
- Sun, Yuxiu. "The Preface to *Fairy Tales*." *Collected Papers on Chinese 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edited by Quangen Wa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er, 1989, pp. 17-18. [孙毓修:《〈童话〉序》, 载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学论选》(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第 17-18 页。]
- Thirkell, Angela. *Three Houses*. Oxford UP, 1953.
- Wall, Barbara. *The Narrator's Voice: The Dilemma of Children's Fi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 Wong, Laurence. "Translating Register: With Reference to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Italian Versions of the *Hong lou meng*." *Babel*, vol. 48, no. 3, 2002, pp. 247-66.
- Wilson, Angus. *The Strange Ride of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s*. Secker & Warburg, 1977.
- Wu, Qun. "On Translating with Appropriatenes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egister."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02, pp. 44-47. [吴群:《合意之外, 尚需合宜——在翻译中必须把握语域》, 载《中国翻译》2002 年第 2 期, 第 44-47 页。]
- Xu, Derong, and Zexun Jiang. "On the New Way to Reconstruct the Style of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8, pp. 97-103. [徐德荣、姜泽珣:《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新思路》, 载《中国翻译》2018 年第 1 期, 第 97-103 页。]
- Yang, Shicheng. "On the Langu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1999, pp. 17-22. [杨实诚:《论儿童文学语言》, 载《中国文学研究》1999 年第 2 期, 第 17-22 页。]
- Zhang, Delu. "The Style Effect of Graphological Deviation."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2, 1995, pp. 1-5. [张德禄:《语相突出特征的文体效应》, 载《山东外语教学》1995 年第 2 期, 第 1-5 页。]
- Zhang, Meifang.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5. [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马纳克

《黄帝内经·素问》四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接受

◎ 徐冰 张莹

内容提要:《黄帝内经》因其丰富的内涵很难在翻译中得到完整的传达,各个英译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采用翻译策略描述性对比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译者前言、翻译方法、译文版式等尝试描述《黄帝内经·素问》的四个具有代表性英译本各自独特的翻译策略,并且调查了书评网站和学术引用情况等来研究四译本的读者接受情况。研究发现,注重忠实传达中医内涵的译本反响不大,但是根据读者群体的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翻译策略的译本接受情况较好。作者希望通过本研究探寻能让中医典籍译介在西方读者中更有效传播的方法。

关键词:《黄帝内经·素问》 英译 翻译策略 读者接受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102-12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香港 999077;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上海 200083

Title: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Readers' Reception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bstract: *Huang Di Nei Jing* has value for a range of qualities, e.g. as classic literature, ancient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tc. Translators of the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usually had their particular focuses (such as the book's medical instruction, or original linguistic patterns, etc.) in their translating tasks, becau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nvey the comprehensive contents through translating. Thus, translations of *Su Wen*, the first part of *Huang Di Nei Jing*, varied in typographical design, the form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and so on, because different translating purposes dominated. In this paper, using descriptiv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my focus lies in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format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online translation recep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aders' reaction analysis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I found that translations with preliminarily targeted reader groups and special translating strategies have better reader reception than translations which mainly value fidelity. Through my research, I try to explo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Keywords: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readers' reception

Author: Bing Xu,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Ying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分《素问》《灵枢》两部分,早在1925年便出现了英译本。至今,据笔者整理,上卷《素问》的英译本多达11个,有全译本、节译本,还有漫画本,呈现出迥异的面貌。

不同译本的译者在身份可大概分三类,一类是在中国居住、母语为中文的译者,如李照国、杨明山、罗希文、周春才、韩亚洲、朱明、黄雯等;一类是英语国家的母语为英文的译者,如道森(Dawson Percy M)、威斯(Ilza Veith)、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等;还有一类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居住的华人译者,如吴连胜、吴奇父子、倪茂新等。译者的身份非常影响其翻译策略。第一类译者的翻译出发点往往是为了推广中华医学文化,采用较为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这类译本中李照国译本依托“大中华文库”国家工程,译文质量较高,声誉广受中医界认可,故最具代表性。第二类译者出发点是对中医文化进行研究,其中文树德的译本是最完备的文献式翻译,最具代表性。第三类译者中大部分为在海外行医的中医师,翻译着重传达行医术。其中吴氏父子的译本较为完备,也在海外获奖,较具代表性。除这三本以外,周春才、韩亚洲的漫画译本风格在11种译本中较为独特,以大量幽默插画配合译文,重在趣味性,且销量很好。故本文拟选取文树德、李照国、吴氏父子和周春才的《黄帝内经·素问》(以下简称《素问》)译本作为代表性的译本,尝试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并通过对接读者接受度调查,将翻译策略与接受度联系起来,初步探寻中医典籍译介在西方读者中的有效传播途径。

一、四译本的翻译策略和读者接受情况之分析方法

本文对翻译策略的研究主要基于对译文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译本版式。如文树德的译文适用于医学文化学术研究,注释量非常大,这种特殊的版式也反映其独特的翻译策略。(2)翻译方法。如李照国译文中较多保留了“逐字译”的方式,这种影响意义流畅传达的极端翻译方法是其翻译意图的体现;而与之相反,吴氏父子的译本中,《内经》这样晦涩的文本竟然一条注释也没有,并且采用意译的方法,也是翻译策略中译者重视译文可读性的证明。(3)译者身份和翻译意图。如,李照国依托“大中华文库”项目向世界传播中医文化的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

在分析读者接受情况时,笔者先从译本的译者表明翻译目标、出版社情况、译文分析所得翻译策略等因素中推导出该译本的目标受众,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调查译本的读者反馈,进而推导出译本是否在目标受众群中取得了成功。如,文树德的译本售价高,学术性较强,不适用于大众读者,于是笔者调查了医学文化学术界的读者反馈;而针对周春才的漫画译本,笔者便在Amazon等大众购书网站中去调查读者的普遍反馈。

各种译本因为译本形式、翻译地点、出版状况等差别较大,并不是每个译本的翻译情况中都涵盖以上所有因素。在接下来的对比分析中笔者采用了较灵活的分析方式。

二、文树德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动机和目标读者

文树德不仅是一位译者，还同时是医史学家，尤其擅长医学思想史领域的研究。2003年，他通过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帝内经》的英译本后，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研究和《黄帝内经》研究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著^[1]。文树德的《素问》译本分为上下两册，共1541页，是一部精装本译作。

（一）“文献式”翻译

首先，该译本的注释比别的版本要丰富的多，是“文献式”翻译。这些注释尽可能地集合了历史各时期对《黄帝内经》的不同注释，记录《素问》与其他经书的关联，有时一页纸上注释多达页面篇幅的95%。内容上严格遵循原著章节顺序，甚至古汉语的语序都得以保留。例如，《素问》第五篇《阴阳应象大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王冰40）。这段话在文树德译本中的译文如下：

If one knows these (principles), then one remains strong; if one does not know these (principles), then one turns old⁸⁸. Hence, the origin is identical, but the names are different⁸⁹. Those who know, they investigate the identical; those who are ignorant, they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⁹⁰. (114-15)

书中在每句话对应的页面下方有对这三句话分别的注释：

88 Wang Bing: “‘To know [it]’ is to say: if one know the seven [behaviors leading to] injury and the eight [behaviors leading to] benefit, then this is the Way how to keep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whole and how to preserve one’s nature.”

89 Yu Chang: “出 is to read as 生, ‘come to life.’ The preceding sentence states: ‘those who know them, they are strong;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m, they are old.’ The present sentence continues: ‘[those who knows and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y come to life alike but receive different names [i.e., strong or old] later on.’” The Dao de jing, ch.1, has a parallel statement: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referring to the identity in the origin of having no desires and being able to behold the subtleties of the Way and of having desires and being able to see only its external boundaries. Wu Kun: “They are identical in that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was generated by the qi of heaven and earth; this is called ‘different names.’”

90 2260/33: “That is to say, the knowledgeable, they know that essence and blood are of identical origin; the ignorant, they believe [essence and blood] to be two states: ‘Equal origin and different names.’” (Unschuld 114-15)

可以看出，文树德在译出原文之外，增加了三个注释，可以说其中涉及的每个概念（如“知

之”“出”)，他都单独解释了其文化含义和与中国典籍的关系。例如对“异出同名”进行延展性讨论，既有来自不同医学流派的解读，还尝试解释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

纵观全译本，译者注释最多的主要有两类：(1) 对因直译而显得行文不通的经文进行意译；(2) 对某些涵义复杂或深奥的字词提供相关词源信息或文化背景资料，让英语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素问》中概念的含义和渊源。例如，针对《素问·上古天真论》“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王冰 18)。这一句，文树德在注解中用十几行英文对“登天”这个概念进行阐发，讨论内容涉及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社会观念，还有神话传说等文化因素。

(二) 译者身份和目标读者：海外中医汉学学者

译者在前言中明确了翻译目的：

If these ancient ideas are restored to life by our translation they will serve various useful purposes. First, these ideas will lend themselves to a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tradi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European medicine and may help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medicine.” For us to appreciate the basic differences and parallels between the more than millennia of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al traditions, access t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seminal life science texts of Chinese antiquity, unadulterated by modern biomedical concepts and, is essential. Second, it is only on the basis of such translations that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traced, in particular its recent redefinition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broad. (Unschuld 9-10)

整体来说，其翻译目的为：对中西医学传统进行对比研究，由此加深对“什么是医学”的理解。以及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医，而不是近代以来被西方观念扭曲的“中医”，进而对现代的中医发展趋势更加精准地把握。由此笔者认为文树德译本的目标读者是研究中西医对比的专业读者。

三、李照国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动机和目标读者

李照国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先后出版过中医翻译研究专著 20 余部、译著 30 余部。在 1995 年正式立项的《大中华文库》国家工程中，李教授成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英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译本于 2005 年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

(一) “对照式”翻译

李照国译本的翻译策略可以总结为“对照式”翻译，译文着重传达原文内涵和形式，较

多字对字翻译,保留原有句式。译文中插入了很多括号,里面放着“保持古汉语语序”的逐字翻译。上文提到《阴阳应象大论》中的“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李照国的译文如下:

That is why [it is believed that who] understand [how to cultivate health] enjoy good health [while those who] do not know [how to preserve health cannot escape from premature] aging. (71)

译者声明:“由于古汉语的表达特别简洁,翻译时若不增加字词,有时很难使一句话结构完整。逐字直译均置于‘[]’之中,惟有如此方能保持原文的本意,使读者理解何为原经文之语,何为注解之语,从而防止衍文的出现。”(21)

对于“异出同名”,李照国也加了注释,但与文树德强调概念的中国文化来源不同,李照国强调对概念的不同中医解释:

Note: This sentence is understood differentl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e explanation is that “wise people take measures to cultivate their health when they are still strong while fools pay attention to their health only when they have already fallen ill.” Another explanation is that” (87)

(二) 译者身份和翻译动机

《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我国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标准是“准确传神”。李照国在译本前言中写道:“我们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释’。就方法而言,基本概念以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篇章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译文,读起来虽不十分流畅,但却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19)由此可以看出,李照国的译文和文树德类似,都是追求直译,力图保留原文写作风格。

《大中华文库》的总体目标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笔者由此认为,李照国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专业读者,还希望译本在普通读者中传播,期待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内经》的形与意。

四、文树德译本和李照国译本的接受度对比

在本研究中,文树德译本和李照国译本的翻译策略比较相似,都以直译和大量注释为主,目标读者也比较类似,都包括专业读者。但李照国对目标读者的覆盖面可能更大,还希望吸引

普通读者。笔者先针对专业读者的反馈进行调查,在Project Muse, Cambridge电子期刊数据库, Jstor, ProQuest, Wiley Library, Taylor & Francis等6个英文数据库中以“黄帝内经”的英文名为关键词搜索相关讨论,发现论及文树德译本的论文数量上远远高于对李照国译本的讨论:

表1 数据库中对文树德、李照国英译《内经》的讨论文章数对比

	文树德	李照国
文、李二人分别发表的“中医话题”学术论文数量	7	0
文、李二人各自的“医学话题”著作和译著被其他学者的引用次数	26	1
他人对文、李二人各自“医学话题”著作和译著的书评数量	14	0
他人对文、李二人各自的《素问》译本的书评数量	3	0

这些论文中,虽然也有少量从研究角度提出的改进意见,但对文树德译本及其研究工作表示称赞者居多。可推测,在英语学术圈中,文树德版本的《素问》译本在西方中医学术界中的权威性证明了其目标已基本实现。而李照国在英语的专业读者群中似乎并没得到预想的关注度。

商业书评网站 Amazon 普通读者对李照国译本的评价是“原汁原味”(original)、“西方工业时代之前的中国针灸和东方医学”(pre-r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on Chinese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2]。但是从网站上各《黄帝内经》英译本的销量来看,李照国译本销量排最后一位,虽然销量可能和此译本的高售价有关(在 Amazon 网站上,文树德译本 184 美元,其他译本价格从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但李译本价格高达 250 美元),而文树德译本销量在所有译本中排前三位。作为国家文化输出工程,李照国译本的接受度是不够理想的,既未在专业读者中获得好评,也未在普通读者中获得销量。

五、吴连胜、吴奇父子译本的翻译策略、目标读者和接受

吴连胜、吴奇父子为长期在美国行医的中医师,在 1997 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黄帝内经》的英汉对照译本 *Yellow Emperor's Canon Internal Medicine*。

(一) “解说式”翻译

因为从业医师重视的是中医典籍对实践的操作指导性,故吴氏父子翻译时的着眼点和其他译者颇为不同。吴氏父子重视的是流畅、达意且内容具体的译文,有解说的风格,故笔者归为“解说式”翻译。译文中,译者会在每一段古汉语原文后,将这段内容用英文译成直白的道理和中医行医操作中的流程。全书无注释,风格独特,许多原文中晦涩深奥、至今都无

定论的中医原理，被译者阐释为简单、具体的行医步骤或用药方法。这里还拿上面讨论的那句话为例，“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吴氏父子对这句话的译文如下：

Therefore, when one knows how to regulate the Yin and Yang properly will make his body strong and his body will become decrepit and senile when not knowing how to regulate it. All the people live by drawing support from the energies of heaven and earth, but some of them live a long life and some die early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hievements of health protecting. This is because a wise man can preserve his health before senility while a stupid man can only discover the fact after his senility has occurred. (Liansheng Wu and Qi Wu 39)

划线部分直译为中文为“所有人生命的根本源于从天地汲取能量，但有的人能长寿，有的人却短命，这都归因于他们的养生做的好坏。智者能在衰老之前就保养健康，而庸才总等到衰老发生之后才醒悟过来”。与上面两位译者对同一句话的翻译对比，吴氏的译法不求解释概念来源及可能出现的歧义解读，只求将深奥的古文阐发为简练的养生口诀。译者心中似乎并没有所谓的“翻译忠实原文”的理念，而仅是借经文将自己体味的行医之术传授给读者。

比如，针对“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文树德通过注释强调中国传统医者必须知晓“七伤”（seven injury）和“八益”（eight benefit），而吴氏父子的译文则表达的是“懂得调节阴阳就能保健长寿，反之身体就会虚弱”，这更像是医生对病人的嘱咐，又像行医口诀。

《素问》流传千年，中医流派纷呈，对《黄帝内经》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相信吴氏作为资深的中医从业者，定是了解这一情况，但译者为了实现译文的应用功能，避免众多矛盾的说法让读者踌躇不定，于是用简练清晰的语言，让译本中只存在译者本人的“一家之言”。

（二）译者身份与目标读者：英语世界的大众读者和医者

该译本无译者序，仅将原书《素问》的注释者王冰的序言用英文翻译出来，借王冰之口告知读者此为延年益寿的良书，可见以实现《黄帝内经》的医疗指导功能为重。据此笔者推断，译者的目标读者是希望从书中学到医疗保健之术的英语普通读者。

（三）吴氏父子译本的接受度调查

笔者调查了几个大型书评网站，如Amazon和Goodreads网站。以下摘取几处评论：“容易读懂”（One of the easier versions to work with）；译者的英文略蹩脚，但“译本精美，且中英对照”（The book is a very nice looking hefty paperback which provides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Ling Shu and Su Wen.）；“行文和文树德版本相比较为易读”（The author's make use of brackets [albeit not the typical square bracket] far less liberally than Unschuld to denote

the addition of information not originally found in the translated text which I like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make your own inferences.)^[3]。

从评论可看出,读者十分认可译文的某些特点:(1)中英对照;(2)译文简洁,没有注释,可读性强;(3)适合非专业的读者。不仅如此,在Amazon上出售的《素问》英译本中,吴氏父子译本是销量较好的版本,在Goodreads书评网上也读者反映较好。8位读过此书的读者中有5位评价为4星(满分为5星)。

笔者认为,吴氏父子译本的读者喜爱此译本的原因是“可读性强”“中英对照”等因素,和译者的预期较相符。

六、周春才漫画译本的翻译策略、目标读者和接受

此漫画译本由田文龙、周春才和韩亚洲等人合作完成,田文龙等人编写译文,周春才和韩亚洲主画,本文中简称为“周春才译本”,在1997年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该译本为白话文英汉对照本。汉语为从《黄帝内经》原著缩译、编译而来的白话文,英译从白话文转译。该译本仅选取了《素问》中的少部分章节的内容,以漫画辅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了改编和缩译。《素问》原文每篇平均一两千字,文句精悍,意蕴丰富,而译者翻译单篇时,仅通过翻译原文的一两句话来概括该篇大意,将深奥的中医道理编绘成生动的故事,辅以诙谐幽默的漫画。

(一) 漫画式编译:重在普及和寓教于乐

海豚出版社是中国少儿图书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以出版儿童读物、教育、社会科学等领域图书见长。由此可知,出版社设定的译本功能是:(1)传达给读者养生知识和中国哲学理论;(2)用轻松的漫画形式实现易读的效果。

(二) 特殊的翻译策略:编译和浅化翻译

《素问》本身是严肃的中医经典,既不以娱乐为目的,原文也不含任何视觉形象。但是当《素问》成为海豚出版社目标中的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文本,译者就要进行二次编译,先将原文编译为白话文,然后再编译成图画、对话和英语译文。

例如,翻译《痿论篇第四十四》时,原文有近600字的文言文。译者提取大意后,译为仅100余字的白话文,以及与白话文相当篇幅的英文,译文中每段话都是一个简练的道理,并且译者用漫画表达一个生动的病例。接下来举例说明。

例一《素问》原文为:

皇帝问曰：五脏使人痿何也？

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王冰 63）

漫画译文为：

Weizheng (flaccidity syndrome): an disease symptomized by muscular atrophy caused by chronic slackness and weakness of the body and tendons. It mostly occurs in the lower limbs, but can appear on a single limb or on all four extremities.

痿症：指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日久而致肌肉萎缩的一种病症。以下肢多见，也有单独见于一肢或四肢皆病者。



▲图1 漫画译文一（周春才、韩亚洲 107）

例二《素问》原文为：“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王冰 63）

漫画译文为：

3. When one meets things against his wish or cannot get what he wants, the lung qi may become blocked, resulting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遇有不如意的事情，或个人的要求不能达到，肺气不畅，而发生病变，因此肺热而叶焦。



▲图2 漫画译文二（周春才、韩亚洲 107）

例一中,原文是岐黄二人在讨论“为何五脏都能使人发生痿病?”但译者为了让没有中医知识基础的英语读者能够理解,把那段文字删去,以一幅漫画介绍“什么是痿病?”为开场白,为之后的内容作先验知识。从例一可看出,文字与漫画为一体,漫画的图像生动“翻译”出了原文中岐伯讲解的神态,给文字提供情景,或者说,文字是漫画的辅助,是画中人所说的话。

例二中,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原文中的中医理论,举了一些《素问》原文中没有的病例,画成了漫画小故事。图像旁的中英文是对原文的解释性译文,或是漫画中的中英文对话,而这些文字都是原文中未出现过的。

总的来说,译本包含两种文字,一是对原文某些句子的翻译,一是辅助漫画的文字,都是中英对照;译本包含三种翻译,第一种是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翻译,第二种是中医理论的英文翻译,第三种是将《素问》的部分文字内容翻译为图像(漫画)的符际翻译。

综上,全书主要的翻译方法有两类:(1)编译:翻译时大量增与删,只对某些章节缩写,并将某些中医原理编写成生动的小故事。(2)意译:将晦涩的原文翻译为易于理解的道理,不拘泥于字句。

(三) 漫画译本的接受度调查

结合海豚出版社的出版路线和译本极富特色的插图编译风格可推测,译本面向大众读者,特别是对中医感兴趣,却一无所知的读者,目标是寓教于乐。于是笔者调查了商业书评网站 Goodreads 和 Amazon 上的读者反馈。

读者罗伯森(John Robertson)读过此书后,在 Amazon 网站上打了满分五星,并且评价此书为“不容错过的绝佳版本”(A must read),“此书是经典著作的绝佳编译,任何对针灸、中医、气功和武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来读一读。利用漫画将岐伯和黄帝的故事讲得如此深入浅出的编译方法超越了任何其他版本”(A great version of a classic book, this should be on the reading list of anyone involved with acupuncture, Chinese medicine, qigong and martial arts. It combines the original kanji, simple line drawings and English text to tell the story of Qibo and the Yellow Emperor in an easier way than the pages and pages of text found in other versions.)。他还表示“很遗憾这一系列的其他中国文化典籍译本还未上架”(It is a shame the other illustrated guides are not available on Amazon. TIBO of Rites and TIBO of Changes can be found in a Chinese bookstore if you are patient)^[4]。

读者希南(D. Sion)认为“此版本利用漫画的帮助,简单介绍了中医的原则。严肃、全面的《内经》译本非常难让目前的西方读者接受。”(This edition is a mild introduction to the knowledge and with the help of cartoons will make you understand some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Chinese Medicine. Do not expect a full academic translation.)^[5]

读者考瓦特(Ann Covalt)对此译本的评价是“非常有趣的译本”(What a sweet way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s of Chinese medicine),表达了她对译本的喜爱^[6]。

周春才漫画译本生动易读,和李照国版本相比,漫画版成本低,但在Amazon网站的销量排行榜上,漫画译本却排在李译本之前。从上面对读者反馈的调查来看,读者认为译本实现了读者的期待,读者比较满意。有的读者十分喜欢译本的形式,译本激发了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这里可以看出,此译本在传达原文主旨上基本是成功的。

综上,漫画版在其目标读者中,初步实现了其寓教于乐的目的,十分吸引读者。

通过考察《素问》四个译本的翻译目标、翻译策略和读者接受度,笔者发现文树德、吴氏父子和周春才这几位译者的翻译目标和译本接受度是基本符合译者预期的,而作为国家资助的“大中华文库项目”的李照国译本的接受度却不甚理想,这很令人深思。文树德译本面向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读者,他在翻译策略上尽可能全面地翻译书中内容,追求流畅的语言,而且强调注释资料的丰富和全面,这个译本也在英语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吴氏父子的译本内容上追求简要明了,语言上追求流畅易懂,强调可操作性,在英语的普通读者中也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漫画版周译本追求趣味性和普及性,对原著进行了多维度的改编,也成功吸引了很多读者。这三个译本都定位明确,风格鲜明。

相比之下,李照国的译本看似追求完整传达《黄帝内经》的典籍性,在内容上追求全译,但文树德译本的珠玉在前,专业读者并不愿意转向李译本。同时由于李照国在语言上追求直译,甚至追求符合原句语序的字对字翻译,使得译本成为类似辞典式的著作,虽然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作的语言和风格,但阅读流畅度方面肯定受到影响,加上译本售价太高,在普通英文读者中也没有得到理想中的欢迎。虽然中国期刊网中针对李照国译本的研究很多,盛赞其翻译策略。可中医经典的英译仅仅在中国文化和学者圈受欢迎,总不能算成功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中,《黄帝内经》作为文本内容较为复杂的典籍代表,相对来说,译介较为滞后,译介方法仍在热烈讨论中。在翻译如《黄帝内经》这类文本内容较为多元的中国文化典籍时,“完全翻译”是一个过于宏伟的目标。那么,文本“兼容性”较高,文本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典籍该如何译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Notes]

- [1] 参见 P. U. Unschuld, *A Dictionary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U of California P, 2008; Huang Di Nei Jing Ling Shu: *the Ancient Classic on Needle Therapy, the Complete Chinese Text with an Annot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Bing Wang. U of California P, 2016.
- [2] 参见 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1AOGODJFSJBOL/ref=cm_cr_dp_d_rvw_ttl?ie=UTF8&ASIN=B00116HA6Y.
- [3] 参见 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2XSED7H2W0FVS/ref=cm_cr_dp_d_rvw_ttl?ie=UTF8&ASIN=7504622311.
- [4] 参见 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22XUZWQM2KKPF/ref=cm_cr_ar_p_d_rvw_ttl?ie=UTF8&ASIN=B01F9QDTZC

[5] 参见 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38B7REPPYSFKB/ref=cm_cr_ar_p_d_rvw_ttl?ie=UTF8&ASIN=B01F9QDTZC.

[6] 参见 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141P3SIJ7ZNEY/ref=cm_cr_ar_p_d_rvw_ttl?ie=UTF8&ASIN=B01F9QDTZC.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Zhou, Chuncai, and Yazhou Han, translators. *Huangdi Neijing Health Preservation Pamphlet*. Edited by Bing Wang. CIPG, 1997. [周春才、韩亚洲译:《黄帝内经养生图典》,王冰编。北京:海豚出版社,1997。]

Unschuld, P. U., translator.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Edited by Bing Wang. U of California P, 2003.

Wang, Bing, editor. *Huangdi Neijing: Suwen*. People's Medical, 1956. [王冰编:《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Wu, Liansheng, and Qi Wu, translators.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Edited by Bing Wa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7.

Li, Zhaoguo, translator.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Edited by Bing Wang. World Book, 2005. [李照国译:《黄帝内经·素问》,王冰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马妮娅

论曹译莎剧的演出适应性

◎ 刘云雁

内容提要: 以舞台演出为导向的演出本翻译是戏剧翻译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戏剧翻译理论构建的基石。曹禺翻译的莎剧《柔蜜欧与幽丽叶》演出脚本,在动作性、对话性和空间性上的增译与留白,使这个译本更加适应舞台演出。本文在曹禺译本与徐志摩和朱生豪译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曹译《柔蜜欧与幽丽叶》作为演出本的特征和功能,并基于戏剧冲突的表达效果对曹禺的译文进行了质量评估,为当代新莎剧演出本翻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莎士比亚 戏剧 翻译 《罗密欧与朱丽叶》 曹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11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批评史》(15BWW04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On the Theatrical Quality of Cao Yu's Translation of *Romeo and Juliet*

Abstract: Cao Yu's translation of *Romeo and Juliet*, a typical theatre translation oriented for stage performance instead of personal reading experience, highlights movements, conversational objects, and other stage facilities to boost dramatic conflicts. Compared with Xu Zhimo and Zhu Shenghao's translation, Cao's version is particularly written for the stage. Therefore, a study of Cao'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assessment of its theatrical quality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later stage translation initiatives of Shakespeare's drama.

Keywords: Shakespeare, drama, translation, *Romeo and Juliet*, Cao Yu

Author: Yunyan Liu,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戏剧翻译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怎样把戏剧翻译成适于舞台演出的戏剧，而不是读本或者诗歌，因为莎士比亚戏剧本身就是为舞台演出而作；以舞台演出为导向的戏剧翻译可以称为演出本翻译（theatre translation），从而与强调书面文本和阅读体验的剧本翻译区别开来。中文莎剧译本数量众多，但适宜演出的译本屈指可数，其中曹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译本是完全为舞台演出而译，方平认为学术界对它严重低估（11）。曹禺在本剧译本的1979年出版序言中首次提出了戏剧翻译中“演出本”的中文概念。

曹禺翻译的莎剧《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为演出而作的演出本翻译。他在1979年再版序言中指出：

约在一九四二年，张骏祥同志要在四川的一个剧团演出《柔蜜欧与幽丽叶》，但是没有适当的演出本。因为读莎士比亚是一回事，演出他的脚本，使观众比较听得懂，看得明白，又是一回事了。我斗胆应张骏祥同志这个要求，在匆忙的时间里译出《柔蜜欧与幽丽叶》。我的用意是为演出的，力求读起来上口。（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1）

在序言中，曹禺明确地指出这个版本是“演出本”，并强调“我的用意是为演出的”。也许是出于这个翻译目的，剧本名称没有采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通常译法，而是按照英文发音将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完全拟声翻译成柔蜜欧与幽丽叶，便于演员模拟发音，而不考虑剧名在阅读体验中产生的意义联想。

根据曹禺剧本编排的这部戏1944年在成都首次演出，之后196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时，没有对剧名和脚本进行改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剧本再次印刷出版，仅添加了译者的前言，没有对译本内容作更改。李健吾在的1951年评述莎剧译本的文章中说：“我经常只选曹禺译的那本《柔蜜欧与幽丽叶》，因为他的语言里头有戏。”（620）与充满诗性的志摩遗稿和朱生豪译文相比，曹译中台词的动作性、对话性和对其他戏剧手段的调动，都使这个译本更加适应舞台演出。

一、演出本台词翻译中的动作性

曹译《柔蜜欧与幽丽叶》作为演出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台词翻译对动作性的强调。动作性是西方戏剧的根本属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戏剧定义为“对人的行动的模仿”。因此，演出本翻译必须考虑到舞台演出的动作和台词中的动作。英若诚认为，戏剧翻译首先应该考虑“语言的动作性[……]剧本中的台词不能只是发议论、抒感情，它往往掩盖着行动的要求或冲动，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行动”（莎士比亚，《英若诚译名剧五种》3）。剧本中的

动作主要来自潜台词和舞台提示，用来描述心理动作、动作暗示和实际舞台动作。

心理动作主要是指与演员形体动作、表情、声调和手势等相呼应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以阳台会^[1]为例，原文中蕴含着明显的心理动作提示。当罗密欧突然从窗下出声，打断了朱丽叶的自言自语时，朱丽叶说道：

What man art thou, that thus bescreen'd in night
So stumblest on my counsel? (2.2.848-849)^[2]

曹禺译文：是谁？在黑夜中藏着，偷听了我的话。（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50）

朱生豪译文：你是什么人，在黑夜中躲躲闪闪地偷听人家的话？（莎士比亚，《朱译莎士比亚戏剧 31 种》628）

原文中的“*What man art thou*”带有强烈的斥责情绪。莎士比亚写戏的时候，人称*you*基本上是中性的，而*thou*则一般含有贬义。朱丽叶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询问“你是谁”，而相当于中国戏曲中的“大胆狂徒”，具有鲜明的情感倾向，为后文听出罗密欧的声音而态度突变奠定基础。朱生豪将这句问话翻译为“你是什么人”，这个翻译较为中性，不带有动作趋势和心理活动暗示。相比之下，虽然曹译不一定确切地还原了英文中的舞台动作，但却体现他独特的解读。一句简短的“是谁”，不再是正义凛然的怒斥，而表现出朱丽叶内心的惊恐和退缩，这不仅仅是内心的动作，而且要求演员添加符合台词的舞台动作、声调和表情，来配合朱丽叶表现沉思被打断时的惊讶和戒备。

除了心理动作之外，最容易被忽略的台词动作是动作暗示，也就是已经发生过的动作所产生的印迹和即将发生的动作所带来的行为冲动。莎剧的台词中充满了动作暗示，与实际动作和情节发展交织辉映，既互相推动又相互矛盾，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例如阳台会面中，朱丽叶得知罗密欧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自己楼下后，说道：

The Orchard walls are high, and hard to climbe (2.2.861)

有译者将这句话翻译成“果园的墙又高又滑”，以便和下文押韵。皇莎导演霍斯利（Owen Horsley）在排演中提醒译者不应该将“难爬”这个动作词模糊处理，因为朱丽叶很有可能曾经爬过墙。原文中的“*hard to climbe*”，不仅仅表现了墙高而难爬，同时也很有可能暗示着朱丽叶曾经试图爬墙离家而没有成功所留下的心理印迹。曹禺保留断句，直接翻译成“花园的墙高，不容易过”，事实上强调了后半句“*hard to climbe*”，给演员留出空间来表现朱丽叶曾经爬墙而不得的动作暗示。

三种主要的戏剧动作中最明显的是实际舞台动作，而这也是传统翻译中译者干预最少的部分。然而，随着当代翻译理论不再严格区分翻译与改编，同时翻译工作坊流程日渐成熟，强调将导演、译者和主要演员共同纳入翻译团队，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演出本翻译具有了更大的改编性。莎剧翻译比一般的戏剧翻译更需要改编性增译，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源文本的莎剧本身戏剧舞台提示非常少，我们如今看到的莎剧中的舞台提示，大多是当代西方现代莎剧编者添加，而不是莎剧本身固有的。这些缺失的内容或者后人补充的舞台提示非常重要，因为当代话剧中的实际舞台动作，包括肢体的大动作、精细动作、表情和声调等诸多动作形式，大部分都是通过舞台提示来表现的。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对后来的编者所添加的舞台提示有所取舍，例如阳台会的开场部分：

Romeo: He jeasts at Scarres that never felt a wound,
 But soft, what light th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ne,
 Arise faire Sun and kill the envious Moone,
 Who is already sicke and pale with griefe,
 That thou her Maid art far more faire then she:
 Be not her Maid since she is envious,
 Her Vestal livery is but sicke and greene,
 And none but fooles do weare it, cast it off:
 It is my Lady, O it is my Love, O that she knew she were,
 She speakes, yet she says nothing, what of that? (2.2.795-805)

这一段台词，1623年对开本及其后的几个四开本都没有任何舞台提示。徐志摩的译文也没有提示，当然并不是出于尊重原文的目的，而是对文本的去戏剧化处理，这一点将在后面举例说明。然而，早期的英国湖畔版和牛津版莎剧全集，都在本剧795和796行之间添加了一行表示动作的舞台提示，表明此时朱丽叶从上方的窗户现身。曹禺、梁实秋和朱生豪的译文，按照他们翻译时采用的编辑版原文，也把朱丽叶出场的舞台提示放到这里。当代牛津版（2000）与诺顿版（2016）莎士比亚全集，却将朱丽叶出现的舞台提示挪到了803和804行之间，此时朱丽叶姗姗来迟，罗密欧随之发出了“这是我的姑娘，哦，这是我的爱人”的呼喊。朱丽叶何时从窗台上出现，莎士比亚真正的原文并没有规定，需要译者做出猜测，同时对这个动作发生时机的猜测又会极大地影响后面台词的翻译。大部分译者都按照翻译时所选择的莎剧现代编辑版本（edited version）来翻，但是曹禺大胆地添加了许多舞台提示，比西方当代莎剧新编版本加得更多。上文这一段，曹禺是这样翻译的：

(柔蜜欧走进)

柔蜜欧 (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幽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

但是静静,是甚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幽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妒的月亮;

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

她气你原是她的女侍,为甚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着她吧,因为她嫉妒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

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幽丽叶的脸)

这就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

哦,要她知道了多好!——

(幽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说甚么。

这有甚么? (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47-48)

短短十一行台词,曹禺增加了五行舞台提示,其中只有第一、三行的提示来自翻译所用的英文版本所作的添加,其他三行提示,都是译者的决定,但也不全来自译者本人的选择,有可能受到了导演的指示。导演的莎剧解读对于译者的取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016年皇莎排演的时候,导演霍斯利的观点就与西方学术界莎剧全集编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他把朱丽叶出现的时机改到797和798行之间,他认为罗密欧台词中的“arise”不仅仅是指太阳上升,而且暗示了朱丽叶的出场,因此将朱丽叶出场的动作定在这句话前后。

曹禺在译文中所加舞台提示包括大动作(肢体动作)、小动作(含表情)和布景,上文中,“柔蜜欧走进”是大动作;“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饰演罗密欧的演员通过表情和细微动作,表现了罗密欧听到墨故求的话之后的心理状态,属于小动作;“幽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是朱丽叶的大动作,同时也构成了罗密欧大段台词的背景;“月光照见幽丽叶的脸”,主要是灯光和布景的变化;“幽丽叶仿佛颤了一颤”是典型的小动作。曹禺译文对大动作和小动作的区分,以及大量添加的小动作,都具有个体戏剧风格。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原文,只有少许大动作和大背景有所提示,基本上不到当代添加的舞台提示数量的十分之一;现当代英

文编辑本，增加了大动作，而几乎没有增加小动作和布景提示，主要是为了尊重原作风格；同时莎士比亚没有细致描绘动作和背景，这给了演员和导演极大的空间。哈根（Uta Hagen）和弗兰克尔（Haskel Frankel）指出：“莎士比亚从来不给演员任何形容词。”（135）在这个基础之上，曹禺译文增加了 250 多处舞台提示，不仅增加了很多小动作，而且增加了心理描写，如“惊恐”“简简单单”“兴奋”等，其中得失依然有待时间检验。除此之外，曹译中还增加了“对奶妈”“转对悌暴”等表示语言和动作对象的舞台提示，体现了译者本人对台词对象及其戏剧冲突的解读。许多学者认为这不算翻译，但是译者按照导演的要求在演出本翻译中添加表示大动作的舞台提示，已经成了当代戏剧翻译的现实要求，也是演出本译本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其简单地将其剔除于戏剧翻译之外，不如进一步思考其对于戏剧翻译理论和戏剧语言发展的意义。

二、台词的话语对象

对话性是读本和演出本翻译的根本区别。对于戏剧翻译对话性的研究，许多学者都拘泥于语用学中的会话理论，然而会话理论以日常对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了戏剧中非常重要的话语对象问题。戏剧表演中，观众是对话之外的第三方，如果他们误解台词的话语对象，往往不仅影响信息传递质量，更重要的影响戏剧冲突和审美精神的实现，因此讨论戏剧翻译的对话性，首要任务是确定台词的话语对象。不同于抒情诗长于表达自我，戏剧的台词往往明示或者暗含着话语对象，许多戏剧的冲突依赖于语言的交锋，确定对话的对象至关重要。曹禺的译文中添加了超过五十条指示对话对象的舞台提示，这些都是有着明显话语对象的部分；然而除此之外，台词中还有大量有争议的话语对象。译者需要大胆地猜测，或者结合导演的阐释，做出非此即彼的艰难取舍。例如阳台会中的第 796 句：

But soft, what light th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2.2.796)

其中，“but soft”是什么意思？罗密欧是对谁这样说话？一般有三种猜测：其一，罗密欧自言自语，对着心目中朱丽叶的情影，抒发内心的情感。例如徐志摩翻译的“啊，轻些！什么光在那边窗前透亮。”^[3]他把but翻译成“啊”，消解了这句话的对象转换，具有强烈的个人抒情气质；而“轻些”则抹去了原文中的实际意思，变成了一种复合的心理感觉。其二，早期的英文莎士比亚全集编者，考虑到这句话与上句之间的对象转换，而添加了朱丽叶出现在窗前的舞台提示，从上句话以墨故求为对象转化成此句中因为朱丽叶的出现而启发的隐喻。曹禺和朱生豪据以翻译的就是这样的编辑本：

朱生豪译文：轻声，那边窗户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莎士比亚，《朱译莎士比亚戏剧 31 种》627）

曹禺译文：但是静静，是甚么光从那边窗户透出来？（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48）

“轻声”和“静静”都含有降低音量的意思，那么罗密欧是在叫谁轻点声呢？古英语中，soft一般表示“稍等”的意思，那么罗密欧又是在叫谁稍等呢？这里需要译者来猜测话语对象。朱生豪的翻译似乎是在对周围的环境发声，烘托出太阳初升、万籁俱寂的诗意。在朱译排演的舞台上，罗密欧眼光望着窗台上倩影，说出了后面的台词。其三，也有人认为，这句话的前半句接着上面那一行，是对墨故求的内心回应，而后半句才将目光转上窗台上的朱丽叶。此外，还有第四种可能，那就是与现场观众的对话。也许在某一次演出之中，饰演罗密欧的演员突然看着观众席，要求大家屏息静待，然后目光转向窗台上的灯光，咏叹出华彩的篇章。与此类似的事情不久前发生于伦敦的环球剧场。2016年某一场上演《哈姆雷特》时，观众席十分嘈杂，国王突然将目光转向观众席，严厉地说出了他的台词“坐下”，一时剧场肃静。演员在不改变台词的情况下，通过转换话语对象，事实上构成了与观众的直接互动，成为了舞台演绎中的精彩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生豪和曹禺的译文，固然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但都保留了话语对象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给了演员和导演更多的演绎诠释空间。尤其是曹禺的“静静”，很有可能就是罗密欧转向观众而说的，提示观众演员即将开始咏诵华彩篇章。

在猜测中确定台词的话语对象，是戏剧翻译中的独特现象。与读本翻译不同，演出本译者面临着更多的责任对象。翻译小说也许只需要对原作和读者负责，而演出本翻译，除了尊重原作之外，还需要对观众、导演和演员共同负责。英国皇莎的艺术总监道兰（Greg Doran）对第一对开本演出本翻译提出的基本原则是：“适合戏剧化呈现，便于演员演绎，普及观众欣赏。”^[4]这就扩大了戏剧翻译中需要考虑的对象范畴，译者不仅需要理解原作和原作者，还需要理解戏剧导演、演员和观众，而戏中有许多对话，也许本来就是直接说给观众听的。

确立合适的话语对象不仅仅直接影响观看体验，而且对话对象突然变化，还有可能引发戏剧冲突中的逻辑断层。不同于诗歌内部源于主题转换和搭配错位产生的诗歌跳跃性，戏剧冲突中的断层往往来自对话中主题、对象、性格和态度的突然变化，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损伤戏剧叙事的连贯性，降低戏剧冲突的审美体验。同时，逻辑断层也是译者最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无理解还是表达，都有着巨大的障碍。

三、逻辑断层中的增译与留白

戏剧冲突并非线性发展，戏剧的节奏有松有紧，有时节奏会突然加快，对话中主题、对象、性格和态度发生突变，使前后叙事逻辑显得不够连贯，这就是逻辑断层。莎剧中的逻辑断层非常多，给译者的理解和翻译造成了巨大困难。曹禺作为戏剧家，为了避免突变伤害剧情的流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来弥补逻辑断层。

其一，对于主题和话语对象发生的改变，曹禺一般会添加表示对象或者动作转向的舞台提示。这是编辑和译者们共同的工作。莎剧全集的现代编辑本所添加的舞台提示，都是来自于出现这种转换的地方。例如前文提到，本剧 795-805 行中朱丽叶在舞台上出现的时机，不同版本的莎剧现代编辑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原因就在于 796 行之前发生了话语对象的转变，而 798 行之前发生了台词主题和语言风格的转换，这些突变给了当代编辑添加动作提示的线索。曹禺在原文编辑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逻辑承接关系模糊的地方，增加了诸如“自语”“对柔蜜欧”“手一举”“幽丽叶又忙忙走出凉台上”等各种舞台提示。原文固有的大量逻辑断层，作为特殊的开放空间，成为曹禺添加舞台提示进一步阐释的基础。

其二，对于态度和性格上的突变，曹禺倾向于从周围的舞台空间寻找突变的原因，而在译文中留白。例如，朱丽叶从对罗密欧有好感的“*I joy in thee*”(919行)到“*My Love as deepe*”(937行)，并将罗密欧称为“*My Love*”，短短 18 行诗成就了朱丽叶的态度变化，从矜持的欢喜到深沉的爱情。曹禺虽然非常准确地将前者翻译成“欢喜”，后者翻译成“爱”，从而做出了前后态度的区分，但是罕见地没有添加任何舞台提示来解释这种突变，因为这是导演的工作，而译本只能留白。一般情况下，导演处理这个情况，不能依赖朱丽叶的台词，而要调动舞台上的所有其他因素，包括另一个人物罗密欧，通过他的动作和表情，来解释朱丽叶发生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物进行大段陈述的时候，同一空间中另一个人物的在场，对戏剧情节的推动意义重大。罗密欧存在于舞台上，即使不发一言，对于戏剧舞台来说也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戏剧译者可以对超出职责范围的逻辑断层作留白处理，将解释权交给舞台空间，尤其是空间中沉默的人物。必须承认，演出本作为戏剧脚本，其文字部分只能解释情节发展的部分原因，而语言之外还有更多需要表现的内容，其中舞台空间就是台词译者可以猜测，却难以掌控的部分。动作、对话与空间共同推动着舞台上的人物追随戏剧冲突的节奏往前推进。在戏剧冲突节奏的主导下，情绪、情感和情势迅速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一部分通过台词的内容和韵律体现出来；而当一个人物说台词的同时，更多的变化在整个舞台空间中铺陈，音乐、布景、其他演员的表演共同立体呈现出戏剧冲突的方方面面。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翻译，戏剧译者需要在适当的地方保持沉默，将解释的权力让渡给导演和演员。

四、基于戏剧冲突的翻译质量评估

演出本翻译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看译本是否能够保持戏剧冲突的强度和感染力。过于强调诗性和阅读体验的莎剧翻译，有时可能会消解台词的动作性，或者误解对话中的话语对象，甚至会对逻辑断层做出过度补偿，以至于削弱剧本中戏剧冲突的强度；而演出本翻译却始终需要思考能否激发原剧本中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是什么？广义来说，戏剧冲突是戏剧动作的冲突，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也包括人的内心矛盾；既反映剧情的冲突，也反映性格的冲突。戏剧冲突大多来自于动作的对撞、意志的压抑、观念和文化的差别、信息不对称以及性格的反差等。合格的演出本翻译特别强调对戏剧动作、性格和观念差异的表达，才能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

传统读本翻译不适合舞台演出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戏剧动作和差异的平均化导致戏剧冲突弱化。过去，许多中国莎评对莎剧中的戏剧冲突有所误解，甚至影响了话剧的理论体系，很有可能就在于他们讨论的莎剧脚本是非演出本翻译。例如，有的学者否认《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具有性格反差，甚至进一步认为这部戏剧违反了一般的戏剧冲突原则，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意志对抗。谭霈生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没有冲突 [……] 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既没有意志的争斗，也不存在性格的撞击”（88）。这种观点影响了董健等其他学者，甚至衍生出关于戏剧冲突是否可以不依赖于性格冲突而存在的当代戏剧大讨论。然而，事实上从原文来看，男女主人公之间性格冲突非常显著，其心理动作和形式对抗也特别鲜明。很多莎评家之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就是因为他们看的是非演出本的译文，而不是原文。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直接对话的这一段：

Juliet: What man art thou...?

Romeo: By a name,

I know not how to tell thee who I am...

Juliet: ...Are thou not Romeo, and a Montague?

Romeo: Neither faire Maid, If either thee dislike.

Juliet: How cam'st thou hither...

Romeo: With Loves light wings...

Juliet: By whose direction found'st thou out this place?

Romeo: By Love that first did prompt me to enquire... (2.2.848-883)

这是阳台会中戏剧冲突非常激烈的一段对话，朱丽叶理性地询问了一系列实际问题，包括对方是谁，怎么来到这儿。然而罗密欧却用非常诗意的方式曲解了朱丽叶的问题，并借机抒发了对爱情的向往。对话中的男女仿佛处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对话的错层，性格的强烈反

差，足以使观众怀疑他们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爱情。直到 930 行之后，朱丽叶开始以抒情的方式表达对罗密欧的接受，而罗密欧也通过实际行动，打算去找神父为他们主持婚礼。此时，有着不同性格的这两人才从初见时的好感，上升为了爱情，接受了对方关于爱情的表达方式，实现了意志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契尔（William Archer）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了“意志的融合”（28），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不能因此否认二人的性格差异，正是巨大的性格和处世态度的反差，激起了充沛的戏剧力量，铺垫了后文中的爱情奇迹。

这段对话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理性和感性、现实与抒情的一问一答，要求译文中产生同样的分裂。然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译者不是将朱丽叶的提问抒情化（例如朱生豪），就是将罗密欧的回答去抒情化（例如梁实秋），强调剧本阅读理解和诗性体验的结果，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语言风格进行了统一和平均。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译本中，只有曹禺的译文特意区分了二人的语言风格，将朱丽叶的问话世俗化、口语化，并将罗密欧的回答表现得非常优美而不落实处，甚至一改原文无韵诗不抒情的特征，在罗密欧的答话中大量增添尾韵、对仗和修辞性重复。例如曹禺的译文如下：

幽丽叶：是谁？在黑夜里藏着，偷听了我的话。

柔蜜欧：[……] 这名字，我的神！我自己都恨。

幽丽叶：告诉我你怎么来的？你为甚么？

[……]

柔蜜欧：插上爱的轻轻的翅膀我就跳过了墙，

石头的围栏怎么阻碍了情爱？

爱能做的，爱就敢做，

你的亲族也拦不住我。

幽丽叶：谁指点你找到了这个地方？

柔蜜欧：是“爱”，他先促动我去问；

他教给我主意，我借给他眼。

我不是领海的，并不认得路线，

不过你即使远，远在天外的海边，

为着这样的珍宝，我还怕什么危险。（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50-51）

这三段一问一答之中可以看出，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语言风格与内容都大异其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语言风格差异。曹禺在译作出版前言中指出，他“加了一些‘韵文’，以为这样做增加一点‘诗意’”（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1）。然而细读却不难发现，只

有罗密欧的答话添加了韵律，而朱丽叶的问话并非如此，始终和原文一样直接而平实，因为那是不适合过于抒情的。其二，戏剧动作差异。二人的心理动作差别明显，朱丽叶关心的是对方是谁，怎么来的，是否安全等具体问题；而罗密欧却只顾诗意地表白，这不仅反映了二者完全不同的心理期待，从而导致舞台呈现的身体语言也迥然相异。其三，对话错位。即使从会话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二人的语言无论数量、质量和相关性都难以体现合作，而是自说自话，构成了隐性的话语对抗，不仅深化了戏剧冲突，而且从观众视角产生了喜剧效果。翻译剧本中对戏剧冲突的表达甚至强化，是演出本翻译的主要特征。

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开演出本翻译之先河，重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的性格反差所带来的激烈戏剧冲突，在动作性、对话性、逻辑断层的翻译策略等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尝试，无论增译还是留白，断句还是合句，乃至字词的取舍，都不仅仅是从语言连贯、意义传递或者富有诗意等角度来考虑，而更需要思考如何运用动作、对话及其他戏剧手段，来重现戏剧冲突的节奏与强度，为新的莎剧演出本翻译，以及中国话剧如何从剧本翻译中汲取营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国化过程与中国话剧这一舞台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交相辉映。各种莎剧译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读莎剧，不仅构成了中国人对莎剧内涵的开放性理解，而且也影响了戏剧界对于戏剧动作、戏剧空间、戏剧冲突等关键词的看法。曹禺的莎剧翻译及其后的舞台演出实践，为偏于强调诗性表达的话剧舞台，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中国话剧与西方戏剧越走越远的历史时期，不啻于对戏剧本质的个体反思。曹禺的莎剧翻译研究，不仅对于研究曹禺戏剧思想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反映了莎剧翻译在中国话剧发展历程中独特的作用与介入方式。

注释 [Notes]

- [1] 阳台会的说法循英文莎评旧例。事实上，莎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会的地方并没有阳台，只有窗户。然而多年来以讹传讹，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中产生了 Balcony Scene（阳台会）的说法，这里暂且沿用，代指本剧第二幕第二场男女主人公在窗台下相见的一场。
- [2]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引用的莎剧原文皆来自 1623 年第一对开本影印稿，保留原拼写，添加标点。参见 William Shakespeare, *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and Tragedies*. Edited by John Heminge and Henry Condell. Isaac Jaggard and Ed. Blount, 1623.
- [3] 译本首次发表在诗歌杂志《新月》，可见徐志摩是把莎士比亚戏剧片段当作诗歌来翻的，作为诗歌当然不需要关于动作和布景的提示，同时也就可以把提示言语对象转换的词翻译成抒情诗的感叹词。参见莎士比亚：《罗米欧与朱丽叶》，徐志摩译，载《新月》1932 年第 4 卷第 1 期。原文无页码。
- [4] 道兰的演出本翻译原则，来自 2016 年皇莎中译项目负责人翁世卉发给作者的函件。原文为：Theatrically-viable, actors-friendly, and audience-accessible.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cher, William. *Play-Making*. Translated by Junxie Wu and Wenqi Nie. China Theatre, 1964. [阿契尔:《剧作法》, 吴钧燮、聂文杞译。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年。]
- Fang, Ping. "Translation from a Drama Mater: on Cao Yu's Translation of *Romeo and Julie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8, 1984, pp. 11-14. [方平:《戏剧大师翻译的戏剧——谈曹禺译〈柔蜜欧与幽丽叶〉》, 载《中国翻译》1984年第8期, 第11-14页。]
- Hagen, Uta, and Haskel Frankel. *Respect for Acting*. Translated by Yimeng Hu. Houlang, 2014. [哈根、弗兰克尔:《尊重表演艺术》, 胡因梦译。北京: 后浪出版社, 2014年。]
- Li, Jianwu. "Talks on Translatio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Papers*, edited by Xinzhang Luo,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pp. 617-22. [李健吾:《翻译笔谈》, 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第617-22页。]
- Shakespeare, William. *Romeo and Juliet*. Translated by Yu Cao. People's Literature, 1979. [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 曹禺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 *Five Plays Translated by Ying Ruocheng*. Translated by Ruocheng Ying. Liaoning Education, 2001. [莎士比亚:《英若诚译名剧五种》, 英若诚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 . *31 Plays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Translated by Shenghao Zhu. Zhejiang Gongshang UP, 2011. [莎士比亚:《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 朱生豪译。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1。]
- Tan, Peisheng. *On Theatricality*. Peking UP, 1981. [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罗辉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元思辨理论框架构建与培养原则

◎ 张莎

内容提要:本文在元认知理论和思辨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元思辨的理论框架。元思辨由元思辨知识、元思辨技能、元思辨体验三个要素构成,每个要素由若干子要素构成,元思辨的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元思辨能力,应以学生有思辨机会为前提,以元思辨的构成要素为抓手,以教师的元思辨教学能力为根本保障。

关键词:元思辨 构成要素 培养 英语专业 思辨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125-11

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英语听说课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2016000020124G092);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首都高校英语专业硕士生思辨倾向研究”(SM201610028007)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Title: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Framework and Education Principles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ories of metacogni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CTM). CTM consists of three components, namely, CTM knowledge, CTM skills, and CTM experiences. Each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is further comprised of subcomponents. The three compon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A and MA English students' CTM education relies on the premises that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critically, that CTM components were used well, and that teachers possessed effective CTM teaching ability.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components, education, English majors, critical thinking

Author: Sha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思辨 (critical thinking, 又译作批判性思维) 是人们依据标准, 对事物或看法作出有目的、有理据的判断 (文秋芳, 《思辨能力现状》3)。思辨能力包括思辨的认知技能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思辨的人格特质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1]、元思辨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三个构成要素, 元思辨处于思辨的顶层, 对思辨技能和思辨的人格特质起调控作用 (32)。元思辨, 顾名思义, 是对思辨的自我认知。元思辨使思辨更加具有脱离具体情境的可迁移性, 积极有效的元思辨对正确、灵活、有效地运用思辨技能、对发扬积极正面的思辨倾向 (即人格特质)、对思辨能力的整体发展具有直接的掌控作用, 并通过思辨能力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全面成才。思辨能力是我国外语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内外心理学、教育学、医学、哲学、应用语言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思辨能力的探讨, 主要关注思辨技能和思辨倾向的内涵、重要性和意义、量具的研发、现状和发展、影响因素、培养途径等方面, 而对于元思辨关注甚少。尽管思辨能力的理论框架一般都包含思维的反思、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内容, 但只有少数框架 (Lin and Li 835-36; 文秋芳, 《思辨能力现状》32) 明确将元思辨这一概念独立地作为思辨能力的构成要素提出来, 元思辨的具体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 元思辨评估缺乏可操作的依据。本文借鉴元认知 (metacognition) 和思辨能力的理论, 建构元思辨的理论框架, 明确元思辨的构成要素及其内涵和相互关系, 探讨对英语专业学生开展元思辨培养的原则。

一、元思辨理论框架的构建

思维心理学认为, 人类的认知过程存在两个层面的思维活动, 一个是较低级的客体层面, 另一个是较高级的元层面, 元层面的活动控制并调节客体层面的活动, 客体层面依据元层面的判断和评价进行变化 (Nelson and Narens 126)。认知、思辨是客体层面的思维活动, 元认知、元思辨是较高级层面的元活动。元思辨可以参考借鉴元认知的相关理论。

(一) 元认知理论述评

元认知的概念由弗拉维尔 (John H. Flavell)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 后来概括为“反映或调节认知活动的任一方面的知识或者认知活动”, 即“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知” (Cognitive Development 104, 116)。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后 30 年, 国内的研究自 20 世纪后 10 年至本世纪初比较兴盛。

关于元认知的本质有两种认识取向: 知识取向和过程取向。知识取向认为元认知是关于个人认知及其相关因素的知识体系, 过程取向认为元认知是认知、控制、监测、理解等过程, 过程取向相比知识取向更具动态性。两种取向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分别代表元认知现象的两个方面。元认知既是知识, 又是思维活动的过程 (Flavell, Cognitive Development 104; Brown 453; Brown et al. 106; Patricia 181; Butterfield 725)。

关于元认知的构成要素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二分法。弗拉维尔认为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和元认知体验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两个要素, 并对行动 (策略) (actions / strategies) 进行探讨, 但没有将行动 (策略) 作为构成要素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3-8)。奈尔森 (Thomas O. Nelson) 将元认知的持续监测 (ongoing monitoring) 和持续控制 (ongoing controlling) 统称为元认知体验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1)。笔者认为, 持续监测和持续控制归为元认知监控更为合适。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元认知分别由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两个要素构成 (Brown 453-54; Brown et al. 106; Weinert and Kluwe 17)。三分法认为元认知由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监控技能 (或策略) 三个要素构成 (林崇德, 《心理学观》378; 蒋新莉、吴红云 49; 李美霞 72-73; 陈唐艳、曾洁 45-48; 汪玲、郭德俊 460)。笔者认为, 三分法以监控作为元认知的核心, 比二分法更加关注元认知的动态过程性、元认知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更加符合元思辨作为有目的、有理据的思辨能力组成部分的特征。

元认知知识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陈述性或程序性知识, 包括三类。元认知主体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person variables) 是对自己或他人作为认知加工者的知识, 元认知任务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task variables) 是关于认知对象的知识, 元认知策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strategy variables) 是关于在不同的认知过程中采用何种策略更有效的知识 (Flavell, *Cognitive Development* 105-106)。弗拉维尔对元认知知识的分类和定义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

元认知监控指用于监测和调节认知活动的技能或策略。不同学者对元认知监控的划分不尽相同, 主要有两类视角。一类按照监控流程划分, 如表 1 所示。

表 1 流程视角下的元认知监控子要素

元认知监控 (流程视角)	研究者
监测 (monitoring)、调节 (regulating)、协调 (orchestrating)	Brown (454)
计划 (planning)、监测 (monitoring)、检查 (checking)	Brown et al. (107)
监测 monitoring、控制 controlling、理解 understanding	Butterfield (725-30)
选择注意 (selective attention)、计划 (planning)、监测或复习 (monitoring or reviewing)、检查或评估 (checking or evaluating)	O'Malley & Chamot (44)
确定重点 (centering)、安排和计划 (arranging and planning)、评价 (evaluating)	Oxford (135)
教学监控能力包括课前的计划与准备性、课堂的反馈与评价性、课堂的控制与调节性和课后的反思性	林崇德、胡卫平 (37)
英语学习者的自我管理策略包括计划、评价和错误监控, 核心是自我反思与评价能力	文秋芳 (《成功之路》2-3)

另一种根据监控活动的信息加工基本形式或信息流向划分, 监测活动 (monitoring) 中的信息流从认知层面流向元认知层面, 控制活动 (controlling) 中的信息流方向相反 (Nelson,

“Consciousness and Metacognition” 105; Schek and Nelson 13; 慕德芳、陈英和 113; 汪玲、郭德俊 460)。笔者认为,信息加工视角下的元认知监控子要素划分更加清晰,更能够揭示监控过程的本质,但流程视角下的划分更适合与具体任务相结合,对教育教学实践更具有启发意义。

元认知体验指主体从事元认知活动时伴随产生的即时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如知道感、困难感等,发生在工作记忆中(Flavell, *Cognitive Development* 107; Flavell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5; Efklides, “Metacognition and Affect” 300-301)。元认知体验受到的关注较少,大多数研究只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艾弗克莱兹(Anastasia Efklides)提出,元认知体验由元认知感受(metacognitive feelings)、元认知判断或评估(metacognitive judgments / estimates)、当下任务相关知识(online specific task knowledge)三部分构成(“Metacognition and Affect” 301;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5)。笔者认为,元认知感受、元认知判断或评估分别对应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当下任务的相关知识也是认知体验,但难以与元认知知识明确地区分开来,而认知和情感的区别相对清楚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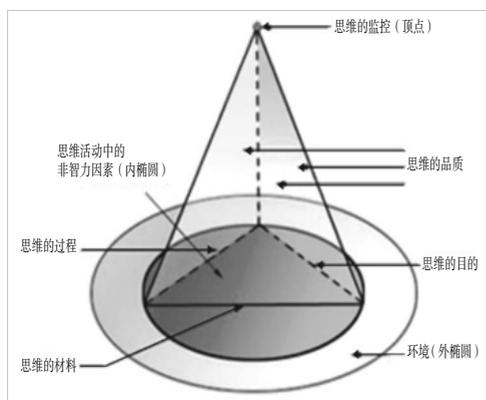
本研究认为,元认知是对思维进行自我认知的知识和活动过程,由知识、技能、体验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元思辨的理论框架可参考元认知的要素结构及其内涵、相互关系,同时应体现出元思辨的目的性、理据性特点。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元思辨理论框架应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二) 元思辨相关理论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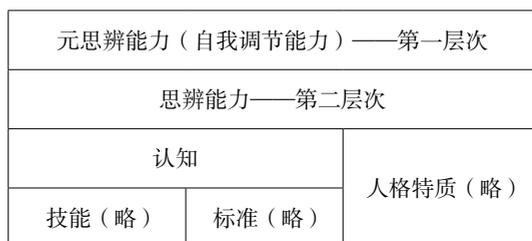
国内外主要的思辨能力的理论框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两个。一个是德尔斐项目(The Delphi Project)提出的“双维结构模型”(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28-29),包含思辨的认知技能(skills)和情感倾向(dispositions)两方面(Facioné 1-19)。认知技能包括阐释(interpretation)、评价(evaluation)、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等6大项及其若干项子技能,自我调节技能与思辨的自我认知直接相关,包括自我评估(self-examination)和自我纠正(self-correction)。在情感倾向的7个维度中,与思辨的自我认知有关的维度包括但不限于:对自身推理能力是否有信心(self-confidence in one's own ability to reason)、对自身的偏见等是否诚实(honesty in facing one's own biases, etc.)、经诚实的思考之后是否愿意改变原来的观点(willingness to reconsider and revise views where honest reflection suggests that change is warranted)。另一个框架是保罗、埃尔德(Richard Paul and Linda Elder)提出的“三元结构模型”(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29-30),包括思维元素(the elements)、思维标准(the standards)、智力特征(intellectual traits)三个部分(*Critical Thinking* 54)。智力特征中与自我认知有关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能否公正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否对理性思考有信心(confidence in reason)、能否独立思考(intellectual autonomy)。这两个框架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了思辨能力的理论框架,为思辨能力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奠定了基础。双维结构模型的思辨技能和思辨倾向、三元结构模型的智力特征,与元思辨的内涵有所重合或有所关联,但两个模型没有将对客体

的认知和对主体的认知进行区分。元思辨是对认知的认知，应当比对客体的认知层次更高。

“思维的三棱结构模型”（以下简称“三棱结构模型”）(Lin and Li 835-40)中，思维包含六个成分，即思维的目的（purpose of thinking）、思维的过程（processes of thinking）、思维的材料（materials of thinking）、思维的品质与结果（qualities and outcomes of thinking）^[2]、思维的自我监控（self-regulation of thinking）、思维的非认知因素（non-cognitive factors of thinking），其中思维的自我监控层次最高（如图1），它不仅监控思维的过程，同时对确定思维的目的、搜索和选择恰当的思维材料和思维策略、评价思维结果发挥重要作用。思维的自我监控包括计划、检验、调节、管理和评价五个方面（林崇德，《心理学观》7）。“思辨能力的层级模型”（以下简称“层级模型”）包含元思辨能力，与认知相关的技能和标准，以及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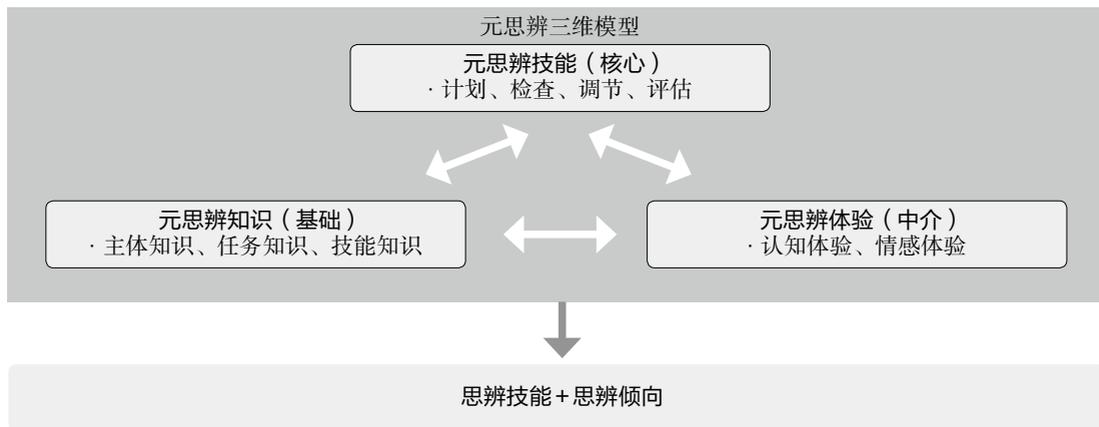
▲图1 思维的三棱结构模型
(林崇德,《心理学观》5)^[3]



▲图2 思辨能力的层级模型简图
(改编自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31)

思辨品质相关的人格特质。元思辨能力处于最高层，指对自己思辨认知技能和情感倾向的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31）（如图2）。与双维结构模型和三元结构模型不同的是，三棱结构模型和层级模型将思维的自我监控置于思维层次的顶端位置，体现了元思辨对思辨整体的认知和控制作用，符合思维活动的层级性特征。在三棱结构模型中，思维的自我监控本质上是一种活动过程。层级模型明确将元思辨能力定义为一种技能。不论是过程还是技能，离开相关的监控知识或体验，元思辨的内涵就不够完整，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

元思辨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为数甚少。濮实通过个案访谈和文本分析发现，英语文献述评写作任务中的元思辨能力包含行为目的、角色定位和知识观三个要素（30-37）。该研究为探讨具体语境下的元思辨内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为元思辨研究提供了更加宏观的视角。该框架如何与元认知、元思辨理论框架展开深层对话，值得进一步关注。



▲图3 元思辨理论框架

（三）元思辨理论框架

本部分旨在吸收借鉴元认知、思辨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元思辨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元思辨是对思辨技能和思辨倾向的自我认知，由相互作用的三个要素构成，分别是元思辨知识、元思辨技能、元思辨体验，每个要素分别由若干子要素构成。元思辨的理论框架包括两部分，一是元思辨的结构模型——“元思辨三维模型”，二是元思辨的认知对象，包括思辨技能、思辨倾向两部分（如图3）。

元思辨知识包括主体知识、任务知识和技能知识三要素。这种三分法既参考了元认知知识的分类，也符合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提出的人类高级心理机能（higher mental functions）的模式，即高级心理机能由主体（agent）运用中介手段（mediators）对客体（object）产生作用，三要素分别是主体、客体、中介手段（Vygotsky 19-30, 38-51）。元思辨知识的三个要素分别对应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三要素，任务知识是关于客体（即元思辨对象）的知识，技能知识是作用于客体的中介手段的知识，主体知识是开展元思辨这一高级心理机能活动的人的知识。元思辨知识三分法符合元思辨作为人类高级思维的客观规律。文献对元思辨技能的要素划分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监控性的根本特点。本研究采取流程取向，根据运用元思辨技能对思辨技能和倾向进行监测的流程，将元思辨技能分为计划、检查、调节、评估四个要素。计划技能用于开始任务之前，检查、调节技能用于执行任务过程中，评估技能用于完成任务之后。元思辨体验既包括认知体验，也包括情感体验，在开始任务之前具有预测性，执行任务过程中具有即时性，完成任务之后具有回顾性。

元思辨知识、元思辨技能、元思辨体验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元思辨的有机整体。元思辨知识是元思辨活动的基础，元思辨技能是元思辨的核心，元思辨体验是连接元思辨知识和技能的中介。元思辨体验激活元思辨知识以备调用，元思辨知识应用于元思辨技能的使用过程，元思辨技能的运用是元思辨体验的来源。反过来，元思辨体验激发元思辨技能的运用，元思

辨技能的发挥为元思辨知识提供反馈,为补充和修正元思辨知识提供支持,元思辨知识加强元思辨体验的广度和深度。

元认知不仅是对认知技能和过程的认知,还应包括对认知过程中伴随的情感倾向的认知(Brown et al. 105; Lin and Li 835-36; 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31; 郑敏 34)。同理,元思辨的对象是思辨技能和思辨倾向两部分。以对思辨倾向的认知为例,元思辨的主体知识是关于个人的思辨倾向内容和程度的知识,任务知识是关于完成任务应当伴随、可能伴随哪些思辨倾向以及这些倾向如何发挥作用的,技能知识是如何积极正面地运用相应的思辨倾向的知识,元思辨计划技能是开展任务之前,运用元思辨知识对将持有的思辨倾向进行预测、对如何正确运用这些倾向进行规划的技能,元思辨检查、调节技能是开展任务过程中,对思辨倾向的情况进行实时自我观察并随时调整的技能,元思辨评估技能是任务结束之后,对已经出现的思辨倾向及其效果进行评价的技能。需要说明的是,任务的前、中、后阶段的划分是动态的,一个大的任务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的任务步骤,几个小任务步骤也可能随时合并为一个大的任务,因此计划、检查、调节、评估4种技能的作用范围根据任务进程即时变化。4种技能的划分尽管按照流程进行命名和排序,但实际使用中并非总是从计划到评估依次出现,而是部分技能局部重复、循环出现,再继续向前推进。

二、英语专业学生元思辨能力的培养

元认知是学科能力的组成部分(林崇德,《学科能力》8),思辨能力是外语专业人才的必备能力,元思辨是外语学科能力的一部分。思辨能力的培养已有不少讨论,保罗、埃尔德提出了将思辨的8个元素融入阅读课程的方法(Paul and Elder, *How to Read a Paragraph* 1-24),刘晓民、阮全友、高瑛和许莹分别构建了以英语学习为载体的思辨能力培养模型(刘晓民 59-66; 阮全友 19-26; 高瑛和许莹 127-32),王艳构建了以思辨能力为目标的英语听力教学模式(80-85),张莎、文秋芳对英语专业硕士生思辨倾向的培养提出了建议(113-14),文秋芳、孙旻总结了外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6-12),王建和李如密、陈振华从教育学视角探讨思辨能力培养的宏观模式(王建、李如密 53-58; 陈振华 59-63)。然而,相关研究或对思辨能力整体的培养进行讨论,或针对思辨技能和思辨倾向展开探讨,元思辨的培养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本研究认为,培养元思辨的前提是给予学生思辨的机会。否则,元思辨就失去了认知的对象,成了无本之木。概括而言,思辨能力应融入专业学习,依托内容开展思辨教学,运用发现式、课题式、研究式、对话式等方式,形成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营造宽松包容的思辨学习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发表见解、敢于提问和质疑。对于英语技能类课程而言,传统课程注重技能要求,思考层次要求较低;普遍对理解、记忆训练较多,而对分析、推理、评价等思辨技能训练较少。语言技能与思辨分别依赖大脑的不同区域,分

属于思考的不同层次,技能课对思辨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但是,两个区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李美霞 109)。如果能够整合不同区域的活动、打通不同层次的思维,语言技能与思辨能够同时得到训练。王艳指出,如果以理解和获取信息为基础,增加思辨性导向的练习,如对信息进行归类、找出依据、评价观点、总结归因等,听力技能和思辨技能能够同时得到发展(83)。在此过程中,元思辨能够有机会发挥作用并得到锻炼,如对推理技能的客观性进行检查并做出调整、对分析技能的全面性进行评估等。对于英语知识类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而言,深度挖掘和利用话题内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思辨能力。以文献评价课程为例,从多角度评论文章的优点和不足,旨在培养学生进行评价的技能(文秋芳,《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33),在此基础上,元思辨得以有机会对文献评价是否客观公正、是否全面深刻进行检查、调节和评估。

培养元思辨的抓手是元思辨的构成要素。元思辨知识的培养分两种情况。关于思辨任务、思辨技能和倾向的知识在思辨的训练中可以获得,关于思辨主体的知识在思辨训练的基础上,通过加强自我评估可以获得。元思辨体验的培养可以从逐步培养反思能力入手。一方面,注重给学生提供反馈,帮助其认知反思的重要性、内容和标准;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引导和督促学生进行反思。元思辨技能的培养重在实践,应当给予学生充分的操练机会,将任务过程进行分解,逐步让学生学会独立运用元思辨技能。元思辨要素作为元思辨培养的抓手,宜将理论框架与其在专业课程中的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不论在操练之前进行元思辨的显性培训,还是在操练之后进行梳理、归纳,都应使学生有机会体验元思辨的具体内容和环节,明确思辨任务过程中的每一步需要怎样的元思辨能力、自己具备怎样的元思辨能力、差距何在。

培养元思辨的根本保障是教师的元思辨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起关键作用(林崇德,《心理学观》427)。教师的思辨意识类似于元思辨能力,包括对思辨的认知标准、认知技能和人格特质的认知,教师的思辨意识对教师认知和教学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作用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冯欣 64-68)。许多外语教师受到自身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局限性,思辨水平不足以应对思辨教学的挑战。从事科研是训练思维的最佳活动,尤其是教学科研活动既提高教学质量,又促进思辨发展(文秋芳,《思辨能力现状》149)。笔者认为,教师作为教育的主导者,其自身思辨能力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决定着学生元思辨的发展程度。教师的元思辨教学能力包括,有关思辨、元思辨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开展相关教学的知识和能力。教师的元思辨教学能力对学生的元思辨发展的作用体现在:教师的元思辨和思辨知识体系、教学中展现的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直接传授、归纳、启发引导等方式直接影响学生,针对提高元思辨的教学设计在内容、方式方法、学习氛围等诸多方面给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

本文在梳理、借鉴元认知和元思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思辨框架中的元思辨概念进行

了深入一步的探究,明确元思辨的三个构成要素(元思辨知识、元思辨技能、元思辨体验)及其具体内涵,阐述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元思辨不仅对思辨技能进行监控,也对思辨倾向进行监控。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元思辨有三个要点。一是给学生创造思辨的机会,将落实思辨训练作为培养元思辨的前提条件;二是将元思辨的构成要素作为培养的抓手;三是加强教师发展,以教师的元思辨教学能力作为发展学生元思辨的根本保障。

元思辨是思辨的顶层部分,掌控思辨发展的全局,对于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次构建了元思辨的理论框架,对今后开展元思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启发作用,为元思辨培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原则方向,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辨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启示。元思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提出的元思辨理论框架是基于文献研究得出的结果,未来可通过实证研究对本框架进行检验和修改,元思辨培养的方式方法有待在教育教学中逐步补充、完善。

注释 [Notes]

- [1] 人格特质也译作思辨倾向、思辨的情感倾向。本文采用“思辨倾向”一词,文献回顾时采用原文术语。
[2][3] “思维的品质与结果”(Lin and Li 835-40)即“思维的品质”(林崇德,《心理学观》5)。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rown, Ann L. “Metacognition, Executive Control, Self-Regulation and Even More Mysterious Mechanism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edited by R. J. Spiro, et al., Routledge, 1980 / 2018, pp. 453-81.
- Brown, Ann L., et al. “Learning, Remembering, and Understanding.”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4th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vol. 3*, edited by John H. Flavell and Ellen M. Markman, John Wiley & Sons, 1983, pp. 77-166.
- Butterfield, Earl C. “Metacognition.” *Encyclopedia of Human Intelligence, vol. 2*, edited by Robert J. Sternburg, Macmillan Publishing, 1994, pp. 725-32.
- Chen, Tangyan, and Jie Zeng. “A Critical Review of Metacognitive Competence Fostering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2, 2007, pp. 45-48. [陈唐艳、曾洁:《外语教学中的元认知能力培养述评》,载《外语界》2007年第2期,第45-48页。]
- Chen, Zhenhua. “The Teaching Mod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35, no. 9, 2014, pp. 56-63. [陈振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模式之争及其启示》,载《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35卷第9期,第56-63页。]
- Efklides, Anastasia.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in Problem Solving: Meta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Motiv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A. Efklides, et al., Kluwer Academic, 2001, pp. 297-323.
- . “Metacognition and Affect: What Can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Tell Us about the Learning Process?”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no. 1, 2006, pp. 3-14.
- Facioné, Peter A.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Executive Summary*.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1990.
- Feng, Xin. “‘Learner-Centered and Teacher-Directed’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 Language Education*, vol. 36, no. 4, 2015, pp. 64-68. [冯欣:《“学生为主体与教师为主导”的英语教学思辨能力发展探究》,载《外语教学》2015年第36卷第4期,第64-68页。]
- Flavell, John H. *Cognitive development* (2nd ed.). Prentice-Hall Inc., 1985.
- .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 Inquiry.” *Metacognition: Core Readings*, edited by Thomas O. Nelson. Allyn and Bacon, 1992, pp. 3-8.
- Gao, Ying, and Ying Xu. “Construct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Critical Thinking.”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2, 2015, pp. 127-32. [高瑛、许莹:《我国外语专业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模式构建》,载《外语学刊》2015年第2期,第127-32页。]
- Jiang, Xinli, and Hongyun Wu. “A Review of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 25, no. 4, 2017, pp. 49-53. [蒋新莉、吴红云:《二语写作元认知体验研究述评》,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25卷第4期,第49-53页。]
- Li, Meixia. *Courses of Language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of English Majors*. World Book, 2016. [李美霞:《高校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与思辨能力培养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 Lin, Chongde. “On Structure of Subject Ability.”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1, 1997, pp. 5-12. [林崇德:《论学科能力的建构》,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12页。]
- . *My Views of Psychology: Intelligence Theory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ink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林崇德:《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Lin, Chongde, and Tsingan Li.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inking.” *Theory & Psychology*, vol. 13, no. 6, 2003, pp. 829-45.
- Lin, Chongde, and Weiping Hu.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inking Type of Classroom Teaching.”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0, pp. 29-35. [林崇德、胡卫平:《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29-35页。]
- Liu, Xiaomin. “On the Mode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5, 2013, pp. 59-66. [刘晓民:《论大学英语教学思辨能力培养模式构建》,载《外语界》2013年第5期,第59-66页。]
- Mu, Defang, and Yinghe Chen. “The Regulative Effec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on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vol. 29, no. 2, 2013, pp. 113-20. [慕德芳、陈英和:《元认知监控的机制: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年第29卷第2期,第113-20页。]
- Nelson, Thomas O. “Introduction to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acognition: Core Readings*, edited by Thomas O. Nelson, Allyn and Bacon, 1992, pp. 1-2.
- . “Consciousness and Meta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1, no. 2, 1996, pp. 102-16.
- Nelson, Thomas O., and Louis Narens. “Metamemor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New Finding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26, 1990, pp. 125-73.
- O’Malley, J. M., and A. U. Chamot.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UP, 1990.
- Oxford, R. L.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Newbury House, 1990.
- Patricia, H. Miller. “Metacognition and Attention.” *Metacognition, Cognition, and Human Performanc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vol. 2, edited by D. L. Forrest-Pressley, et al., Academic, 1985, pp. 181-221.
- Paul, R., and L. Elder.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2nd ed.). Pearson Prentice-Hall, 2006.
- . *How to Read a Paragraph: The Art of Close Read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6.
- Pu, Shi. “Components of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within the Context of Academic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6, 2018, pp. 30-37. [濮实:《学术写作中元思辨能力的构成要素研究》,载《外语界》2018年第6期,第30-37页。]
- Ruan, Quanyou. “Buil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Majors’ Critical Literacy.”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2, pp. 19-26. [阮全友:《构建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载《外语界》2012年第1期,第19-26页。]
- Schek, Peter, and Thomas O. Nelson. “Metacognition.”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 vol. 3, edited by Lynn Nadel.

Nature Publishing, 2003, pp. 11-15.

Vygotsky, Lev Semenovich.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P, 1978.

Wang, Jian, and Rumi Li. "The Analysis and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vol. 38, no. 6., 2018, pp. 53-58. [王建、李如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辨析与培育》,载《课程·教材·教法》2018年第38卷第6期,第53-58页。]

Wang, Ling, and Dejun Guo. "The Nature and Components of Metacogn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sychology*, vol. 32, no. 4, 2000, pp. 458-63. [汪玲、郭德俊:《元认知的本质与要素》,载《心理学报》2000年第32卷第4期,第458-63页。]

Wang, Yan. "Critical Listening: Rationale,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2, no. 2, 2015, pp. 80-85. [王艳:《思辨听力:理据、框架与操作》,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2期,第80-85页。]

Weinert, F. E., and R. H. Kluwe. "Part I." *Meta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edited by F. E. Weinert and R. 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7, pp. 17-18.

Wen, Qiufang. *Way to Success of Learning Englis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3. [文秋芳:《英语学习的成功之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On Develop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cademic Degrees & Graduate Education*, no. 10, 2008, pp. 29-34. [文秋芳:《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10期,第29-34页。]

——. *Critical Thinking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2. [文秋芳:《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Wen, Qiufang, and Min Sun. "On Key Issues about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College EFL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3, 2015, pp. 6-12. [文秋芳、孙旻:《评述高校外语教学中思辨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第6-12页。]

Zhang, Sha, and Qiufang Wen. "Inventory Development and Investigation of MA English Majors' CTD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2, 2017, pp. 110-14. [张莎、文秋芳:《英语专业硕士生思辨倾向的量具构建与实证调查》,载《外语学刊》2017年第2期,第110-14页。]

Zheng, Min. "Some Thoughts about Learning Strategy Typology: A Review on the Plac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y."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12, 2000, pp. 33-35. [郑敏:《对语言学习策略分类框架的质疑——兼评元认知策略的地位》,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12期,第33-35页。]

◇责任编辑:罗辉

美国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对外语教育发展的影响

◎ 罗辉

内容提要: 美国教育的发展是一部北美移民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语言发展史。从北美殖民地到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外语教育都不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因而也没有制定指导外语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宗教文化、政治领导人的意志、教育组织等所体现出的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对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影响至深。

关键词: 隐性外语教育政策 宗教文化 政治领导人 教育组织 美国外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136-09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Implicit Foreign Languages Polic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 is a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 as well as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For a long time, from American colonization to independenc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as not a problem which needed urgent consideration from the Federal or local governments. That is why there has been no specific policy to direct fore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Implici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etc. hav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implicit foreign languages policies, political leader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uthor: Hui Luo,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语言政策是组织、管理和控制语言行为的主要途径,包括若干关于语言及其在社会中运用的决策。语言政策体现在各类官方文件中,比如国家法律、确定某种(或某几种)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声明、语言标准,或者关于语言课程、语言测试的文件等(Shohamy 50)。但语言政策并不总是按以上所说的方式公布出来,有时候是来自规范或指导语言行为的语言实践。这种情况下,语言政策比较隐秘,很难为公众所知。隐性语言政策是含蓄的、非正式的或未明确说明的,是某个特定实体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隐性政策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蔡永良 32)。美国语言文化教授希夫曼(Harold F. Schiffman)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4)。美国并没有出台语言政策明确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然而,毫无疑问,英语是美国的主导语言,这可以从诸多语言实践中得到体现。美国建国前的一百多年,虽然各种语言流行于北美殖民地多种族的社会中,但外语教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也没有形成政府意志下的外语教育政策,更谈不上外语教育体系的建设。美国建国后也很少制定外语教育政策。直到二战后,《国防教育法》的出台,才标志着美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指导外语教育发展的政策。这正如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所说:“就初等教育而言,放任政策处于主宰地位。”(117)虽然美国没有显性的外语教育政策,但在宗教文化、政治领导人的意志、教育组织等的语言实践活动中都体现出了对外语教育的要求,也体现了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对外语教育的重要影响。

一、宗教文化：外语教育发展的原动力

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派之一的清教徒(Puritans)“要求清洗天主教旧制和繁文缛节,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和理性务实的生活”(易红郡 13)。由于与国教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他们来到北美大陆这个新世界,期待在新世界建立理想的宗教之国,实行没有森严等级的教会制度,教徒人人平等,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改善生活环境,又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精神慰藉。来自英国的移民是北美最大的移民团体,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因而成为北美大陆的统治者。殖民地政治经济事务受到英国的控制,一切教育活动也是以英国为蓝本展开。

清教徒认识到教育对于实现宗教和文化共同一致的重要性,着力发展殖民地的教育。除了清教徒,北美殖民地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属于不同教派的移民。由于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教育主要是通过多元化的教区来进行的,并得到慈善家的私人捐助来建立和维持学校。教师也是根据其宗教信仰来进行选择。课程主要有阅读、写作、算术、语法、地理和宗教教育,授课语言为其母语,主要采用记忆和背诵的教学方法。语法课程学习的则是拉丁语而非英语。清教徒牧师规定每个儿童应该有学习《圣经》的机会,一些教材也是依据《圣经》改编而成的故事。反清教徒和英国国教的贵格(Quaker)教会也建立供学习读写初步知识的教区小学,

教材为根据《圣经》改编的《新识字读本》(*New Primer*)。

17世纪,拉丁文法学校被引入殖民地,其特色就是外语教育,它以拉丁语的教学为主,也教授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其他课程包括阅读、写作、算术等。在欧洲,“拉丁文法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为一小群准备成为教会和政府领导角色的人提供一种人文主义教育”(厄本、瓦格纳 32)。而在北美殖民地,拉丁文法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年轻人,为他们上大学做准备。最初的英国清教徒移民中,有一百位接受过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古典式高等教育,为了让子孙后代也能在新大陆接受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学院所使用的教材大部分是用拉丁语编写,授课也是拉丁语,拉丁语占据了课程学习的主导地位。1742年,纽约成立第一所文实学校(The Academy)^[1],提供商业贸易技能课程,也开设古典课程(包括文法、历史、英语、数学)和现代科学、现代外语、哲学和逻辑等。其中现代外语教育提供实用性的外语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拉丁语和希腊语渐渐被淘汰。1734年,美洲殖民地取消了拉丁文的考试,学校教育更多关注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周玉忠 31)。

美国的语言史也是一部民族史。欧洲移民的到来,让美洲大陆成为语言多样化的地区。17世纪末期,在北美大陆欧洲移民中至少使用18种语言,这还不包括印第安部族的语言。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其次为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瑞典语等。新来的移民竭力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坚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学校中教授的也是本民族语言。北美殖民地除了英国移民建立的学校,还有来自欧洲大陆荷兰、德国、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的移民所建立的学校。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但都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性质的学校。这一时期,虽然政府所使用的主要语言都是英语,但一些用荷兰文和德文写成的小册子和书籍也屡见不鲜,甚至宾夕法尼亚的宪法都有德文版。17世纪末,德国移民大量涌入宾夕法尼亚州。德国移民社区基本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他们从德国进口书籍,出版德语报刊,建立德语学校,传授德国文化。到1830年,宾夕法尼亚州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德国裔,宾夕法尼亚宪法也用德语出版。1837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决议允许建立德英双语学校,地位等同英语学校(García 310)。这个时期,“法官、律师、讲道坛和报刊上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但用荷兰文和德文写成的小册子和书籍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很大的地位”(比尔德 145)。德裔在宾夕法尼亚开办学校,发展德国传统和德裔文化,让富兰克林担心德语区的发展会影响以英语为主导的主流社会的发展。1753年,在他的敦促下,政府下令在德裔区设立英语学校,但是德裔移民的德语学校仍然坚持了十几年才渐渐被英语学校取代。19世纪下半叶,很多私立或公立学校都提供双语或非英语教育。

表 1: 使用非英语语言的地区分布情况^[2]

语言	分布地区
德语	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
瑞典语	威斯康辛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华盛顿州
挪威语	
丹麦语	
荷兰语	密歇根州
波兰语	威斯康星州
意大利语	
捷克语	德克萨斯州
法语	路易斯安那州
西班牙语	西南部

1633年,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荷兰语学校,学习荷兰语言及文化传统。在新尼德兰的荷兰移民把教育当作改革教派教义的手段,加强教会与学校的联系。教会强力抵制使用英语,努力保留荷兰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12个荷兰语社区中,有11个开办了荷兰语学校。1674年,荷兰的这块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自此,在英语环境中成长的荷兰裔儿童,无法继续按照传统的荷兰教育模式走下去。1762年,新阿姆斯特丹宣布已拥有10所英语学校、2所荷兰语学校、1所法语学校和1所希腊语学校(韦布 91-92)。

18世纪30至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3],导致基督教、长老会、浸礼会、卫理公会等教派的分裂。1746年,长老会教徒建立普利斯顿学院,目的在于培养有学识的牧师。1766年,荷兰改革派新教徒在新泽西建立皇后学院(现在的鲁杰斯大学)。18世纪50年代建立的费城学院(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则是教派合作建立的。建立之初,这些学院旨在保存和传播创办者看重的宗教和世俗知识。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城市的繁荣,产生了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了解当时的经济环境,需要掌握现代外语、会计学、地理学、力学等新知识,学校的宗教性目的开始慢慢弱化。南部殖民地于1693年建立的威廉·玛丽学院,从18世纪中期开始重视历史、数学、法律、政治和现代外语。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最早居民,有140多个部落,约298种语言(Thomas et al. 311)。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欧洲文化与美洲的土著文化产生了碰撞,两者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彼此间的友好交往因为移民的贪婪而告终。为了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获取资源,移民开始教化他们,最开始就以宗教为突破口,以语言为媒介。传教士在教化印第安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兴办学校,给印第安人传教,教会他们英语。一位叫艾略特的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阿尔贡金语,还用该语言翻译了《圣经》,于1644年出版,这是北美地区第一部用印第安语出版的《圣经》。圣公会海外传播分会和莫拉维亚派等教派也兴办学校,“并试图把英国的宗教观念和文化细化到印第安人最细微的外表和行为之中”(Coleman 37)。

印第安人被迁入保留地，没有与主流社会融合，仅仅靠语言并不能让印第安人成为主流社会的公民，其内心深处还保留自身部落的文化传统。黑人则是以奴隶身份进入美洲，奴隶主不让他们接受宗教教育，因为害怕他们受到教育，尤其是宗教教育而形成反抗意识。为了交流，黑人奴隶会接受来自传教士有限的英语教育。主流社会的宗教让黑人对祖先的历史开始模糊，宗教既是他们英语学习的内容，也是白人控制他们的工具。

二、政治领导人的意志：左右外语教育发展的方向

北美殖民地时期，外语教育无统一管理机构，无统一政策出台。由于种族、文化、宗教等的差异，外语教育也各行其是，自由发展。人们学习外语目的各异，有的因为宗教文化，有的因为日常交流，有的因为商业贸易，有的因为政治。在外语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那样的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影响了外语教育的发展，政治领导人的意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发表的关于外语教育的看法和言论，左右了外语教育发展的走向。

1751年，由于富兰克林的倡议，在费城开设了第一所文实学校，其中文科的主要课程就是英语和现代外语。在倡议中，他写道：

所有想学神学的人都应该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想学物理的，该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愿意当俗人的，学拉丁语和法语；想从商的，学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尽管我们不当逼迫每个人都学拉丁语、希腊语，或是现代的外语，然而我们不当拒绝任何一个热切想要学习这些语言的人。不过他们的英语、数学和其他的必学的科目也同样要给予重视。（Willis et al. 22-23）

尽管他主张人们应该通过不同语言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但在美国建国后，他十分关心英语作为统一国家语言的发展。

18世纪，随着经济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各种族在追求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美利坚民族及其文化，“一种新文明的大致轮廓已被勾画出来”（布尔斯廷2）。种族间出现了融合，这种融合与维护自身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产生了冲突。语言教育与政治产生了联系，非英语种族不再可以为了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不学英语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反英（国）情绪引发了废除英语作为新国家共同语言的行动，有人提出用德语或希伯来语作为共同语言，但是被大陆会议否决。随着建立政治统一体的要求越来越大，英语在各族裔学校逐渐成为授课语言。19世纪之时，美国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政策，外语教育在某些反移民情绪强烈的地区无法实行。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语言在美国的自由发展，富兰克林认为有必要压制他们语言的发展，将他们融入到美利坚大家庭中来。以德裔移民为例，他们数量众多，

集中居住，兴办学校，不断扩大德意志文化的影响。这引起了英语族裔的担忧。面对德裔发展的强劲势头，富兰克林认为“有必要逐步将德国人英国化，否则增多的德国移民会在短时间内把英国移民德国化”（转引自Feagin 18）。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认为同化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他说：“我国公民越是趋同，我国永久统一的希望就越大。”（转引自Kammen 74）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就任总统时，看到语言使用混乱的情况，向国会建议成立规范英语的研究会。他认识到英语将在世界上广为通用，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语言就没有这个重要性。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关心语言统一的问题，他的兴趣在于古典语言，但他也不忘支持英语教育，因为其他语言无法承担民族大融合和大团结的责任。

1839年，美国第八任总统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为一个德语教师研讨会提供资助。当时俄亥俄州也是全美第一个立法实行德语和英语双语教育的州。杰斐逊还是最早认识到学习外语重要性的政治家。他认为年满16岁的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他甚至鼓励自己的孙子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因为“我们（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很重要，将来会变得更重要。除此，美国的早期历史主要用西班牙语撰写”（转引自Schmidt 16）。

1910年左右，美国出现了“美国化”运动^[4]，部分原因是担心移民劳工会发起反政府的暴动。第26任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也认为说外语的移民对美国缺少忠诚。1915年，他在演讲中说：“任何人来到这个国家，都必须接受这个国家的制度，因此，也必须使用我们国家的共同语言，不论我们血管里流淌着哪个民族的血。容许不同语言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犯罪。”（转引自Edwards 166）罗斯福倡导扩大移民学习英语的机会，规定五年内没有学习英语的移民要被驱逐出境。1917年，他又提出：“我们只能共有一面国旗。我们只能说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华盛顿辞职演说时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林肯在葛底斯堡和总统就职演说时所使用的语言。”（转引自Crawford 19）1919年，罗斯福说：“我们这里只能容纳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严峻的考证明我们是美国人，而不是住在一个语言混杂的大寄居屋里的住客。”（转引自Simon 9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反德情绪不仅给德语教育带来麻烦，也影响了所有的双语教育项目。1903到1923之间，规定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从14所增加到34所，包括一些私立学校（Castellanos 31）。有些州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德语。尽管如此，最高法院对此并不认同，法庭认为禁止其他外语的学习有违宪法，学习英语不能采用强制的方式进行。

在美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正是有了政治领导人对语言（外语）教育的关注，作为强势语言的英语才能形成美国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外语教育在经历了最初的自由发展之后才受到诸多限制。在以后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意志也不断反映在外语教育政策中，影响着美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方向。

三、教育组织：外语教育发展的推动力

美国教育组织（包括教育机构、协会和研究机构）是外语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美国外语教育缓慢发展过程中，它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及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外语教育建议和教育政策目标，向公众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引起公众共鸣，并使自己的政策主张能被立法机构采纳，促成外语教育改革，对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移民来到北美殖民地时，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与风俗习惯，也将来源国的学校教育形式移植到了殖民地。殖民地当时的学校形式主要有三种：私立的小学校或主妇学校（petty or dame school）、写作学校及拉丁文法学校。拉丁文法学校是早期新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学校类型，学校里主要教授古典课程，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为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除了古典语言的学习之外，学生还学习宗教教义，阅读和理解圣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贸易的开展，拉丁文法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诸如会计、数学、航海等新兴实用知识的需求。富兰克林于1749年提出了《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倡议建立面向生活实际的新型中等学校，即文实中学。文实学校用英语授课，也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很多与生活实际相关的新课程开始出现。当时纽约州文实学校开设的新课程就达147种之多。在外语学习方面，文实学校提倡学习法语、德语等现代外语。

1857年成立于费城的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代表公立学校和大专院校的教师、教辅人员、退休教师及准备成为教师的大学生的利益。1893年，美国教育协会组建一个10人委员会，每位委员从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其他现代语言、数学、科学、自然历史、社会学，以及地理课程领域各选择10人，研究高中标准化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其中三组语言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学生须学习3年希腊语，4年拉丁语；学生要在五年级选修一门现代外语；学生要在小学开始学习第一门语言，且中学教育的4年要继续学习；在中学学习第二门语言的学生，应当在十年级开始学习，并持续学习3年（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96-97）。委员会的建议表明了外语在中学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早期中等教育在为大学或领导人岗位输送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的建议对这一时期的外语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0年，84%的高中生学习了一门外语。1914年，德语选修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的33.3%，法语的选修率为11%左右（Watzke 9）。外语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及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高选修率使这一时期成为外语学习的黄金时期。

1911年，中等教育重组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ing of Secondary Education）任命一个现代语言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但委员会迟迟拿不出报告，主管委员会于1918年单独发布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该报告没有推荐具体学习课程，认为教育不仅要有学术目的，还要有生活化目的。外语学习被认为具有学术性，因而被边缘化。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发起现代语言研究，发布了关于语言测试实验、语言阅读、

成绩评定、招生、现代语言教学和教师培训等的报告。

1917年,10人委员会报告的主要起草者艾略特(Charles Eliot)宣称拉丁语不应成为高中必修课,因为没有必要学习文学和文化(拉丁语是学习古典文学的必修课程之一)(Tanner 269)。此时,大学对外语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到1922年,30所大学中有15所取消了对外语的要求,10所将外语学习减少到2年。

1929年,科尔曼(Algernon Coleman)发布了《美国现代外语教学》(*The Teaching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报告,针对学校课程变化中现代外语教育出现的问题,从教学法的角度阐述课程改革问题。他提出了现代外语教学方法,将“阅读法”引入现代外语课程教学中,旨在解决语言输入薄弱的问题。这一时期,为大学入学做准备而学习外语这一目的,已经因为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改革受到削弱,外语课程没有得到扩充,课程结构也没有变化。

1940年,美国教育理事会发布《高中应该教什么》(*What the High Schools Ought to Teach*)报告,承认外语教育与通识教育存在冲突,认为需要开设新的语言通识课程取代传统的外语课程,这些通识课程授课语言应为英语,而外语学习则应包括与目标语相关的文学与文化。1945年,哈佛大学也发表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提出要把外语课程从中等教育的核心课程中去掉,用包括外国文学(翻译版)在内的通识课程取而代之。这一时期,通识语言课程成为中学教育的主流。

从欧洲移民抵达北美到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再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外语教育经历了从自由发展到双语教育的开展,再到限制外语教育的过程,体现了独特历史条件下外语教育政策形成机制的嬗变。这一时期没有出台规范外语教育的显性外语教育政策,宗教文化对外语教育的影响体现了移民的文化自觉,政治领导人对外语教育的看法和言论影响着外语教育发展的走向,而教育组织秉承教育使命,积极推动着外语教育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外语教育政策也开始走向前台,但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隐性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

注释 [Notes]

[1] 文实学校是出现于18世纪中期比较自由的学校,其宽泛的课程设置和宽松的入学要求,使不同水平、各种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入学学习。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学科设置重实用课程。各州兴办此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实用的科学教育,以适应当时美国农业、商业和工业发展的需要。

[2] 数据来源于H. Kloss, *The American Bilingual Tradition*. Newbury, 1977, p. 23.

[3] “大觉醒”运动是18世纪北美殖民地以反对宗教专制、争取信仰自由为目的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4] “美国化”指让来到美国的移民抛弃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成为“美国人”的过程。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ard,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Yafen Xu and Qian Yu.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于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Boorstin, Daniel J.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Yinhong Shi,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9.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Cai, Yonglia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S.*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07. [蔡永良:《美国的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Castellanos, D. *The Best of Two Worlds: Bilingual-B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U.S.* New Jersey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83.
- Coleman, M. C. *American Indian Children at School, 1850-1930*. U of Mississippi P, 1993.
- Crawford, James. *Hold Your Tongue: Bilingu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Only."* Addison-Wesley, 1992.
- Edwards, J. *Multilingualism*. Routledge, 1994.
- Feagin, J. "Old Poison in New Bottles: The Deep Roots of Modern Nativism." *Immigrants Out! The New Nativism and the Anti-immigrant Impu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J. F. Perea, New York UP, 1997, pp. 13-43.
- García, Ofelia.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Basil / Blackwell, 2009.
- Kammen, M. *People of Paradox: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intage, 1972.
-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3.
- Kilpatrick, William Heard. *The Dutch schools of New Netherland and Colonial New York*. Hardpress, 2012.
- Schmidt, C. L.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Conflict, Identit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P, 2001.
- Schiffman, Harold F.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Routledge, 1996.
- Shohamy, Elana.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Routledge, 2006.
- Simon, P. *The Tongue-Tied American*. The Continuum Public Corporation, 1980.
- Tanner, D. *Secondary Curriculum: Theory and Development*. Macmillan, 1971.
- Thomas, D. H., et al. *The Native Americans*. Turner, 1993.
- Urban, Wayne J., and Jennings L. Wagoner Jr. *American Education: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Sheng Zhou and Ailei Xie. China Renmin UP, 2009. [厄本、瓦格纳:《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周晟、谢爱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Watzke, John L. *Lasting Chang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 Historical Case for Change of National Policy*. Praeger, 2003.
- Webb, L. Dea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 Translated by Luqian Chen and Zhaoyang Li. Anhui Education, 2010. [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陈露茜、李朝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Willis, G., et al.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A Documentary History*. Greenwood, 1993.
- Yi, Hongju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British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9. [易红郡:《英国教育的文化阐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Zhou, Yuzhong. *Research on American Languages Polici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2. [周玉忠:《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陈忠平

广播情感热线节目中咨询人批评应对的面子管理研究

◎ 彭卓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广播情感热线节目中咨询人应对批评时对自身面子管理的话语, 揭示八种面子策略, 探究咨询人借助这些策略所形成的五类序列组织, 指出主持人对自身知识地位的建构和维护是形成这些序列组织结构的主要原因。此研究能丰富面子管理策略的类别, 并引入知识地位视角来解释面子管理的序列组织形式, 有助于推动面子和热线会话的研究。

关键词: 咨询人 批评应对 面子策略 序列组织 知识地位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3-0145-12

作者单位: 韶关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Title: A Study of Face Management in Consulters' Responses to Criticism in Emotional Phone-in Radio Programs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discourse of consulters' management of their faces when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in emotional phone-in radio programs, which has revealed eight face strategies. The paper has also probed into five kinds of sequence organizations formed by these strategies and shown that the host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ir epistemic statu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se sequence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can enrich the categories of fa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help to explain the forms of sequence organizations in fac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ic status, hence contributing to the research on face and phone-in conversations.

Keywords: consulters, responses to criticism, face strategies, sequence organization, epistemic status

Author: Zhuo Pe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guan College, Shaoguan, Guangdong, China.

批评话语曾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源(Nguyen)、马尔古蒂(Margutti)^[1]、特蕾西和艾森贝格(Tracy and Eisenberg)、朱湘燕等人的研究。总体而言,学者们多聚焦实施批评的策略及跨文化差异,如李和西尔(Li and Seale)^[2]、源、朱湘燕和周健等人的研究,只有少数学者探究了批评应对,如伊拉加和特纳(Hiraga and Turner)、朱湘燕等。但这些学者对批评应对的研究仍略显粗略,如伊拉加和特纳把对批评、建议和请求的回应行为整合在一起研究(605-27),朱湘燕则主要关注批评行为,对批评应对的分析较为简略(《论汉语批评》145-47, 153)。同时,在广播情感热线互动中,批评行为具有多发性,主持人常常对婚姻、工作及学习等方面存在过错的咨询人提出批评,但当前鲜有学者关注此语境下的批评及其应对行为,以及它们所触发的面子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对广播情感热线中咨询人应对批评的面子管理现象展开较系统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

批评可被看作是一种言外行为,其言外用意是对被批评者所负责的行为、抉择、言辞和事件结果施与负面的评价(Nguyen, "Modifying L2 Criticisms" 770)。关于批评的界定,许多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3]。本文认同朱湘燕和周健的观点,认为批评包括责问、抗议、讥讽、辱骂等行为,将批评看作是言者对听者言行做否定评价的言语行为(80)。另外,根据特蕾西等人的研究,批评往往是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实施的一种行为,批评所论及的负面后果一般不影响批评人自身(56),本文也沿用这一观点。

一些学者探究了批评行为与面子的关系。特蕾西和艾森贝格认为批评能实现多种交际目标,如信息清晰度和对他人面子关注两种目标,它们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两者之间的相对权重受批评者的性别和地位的影响;同时,一些言语手段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如直呼姓名、询问他人健康状况、使用积极面子起始语(positive prefatory statement),以及积极面子结束语(positive ending statement)等(40-53)。吴淑琼和樊葳葳运用语篇补全测试,依据布朗和列文森(Brown and Levinson)的面子管理理论^[4],将批评策略分为两大类,研究表明中国人倾向使用暗示策略,而美国人倾向利用原则或哲理来表达批评,策略使用的差异源于两国文化的差异(24-25)。以上研究主要采用测试、问卷及采访方法关注批评话语所处的单一话轮的特征,对话话序列组织(sequence organization)的互动性关注不够。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批评应对中的面子问题。伊拉加和特纳运用语篇补全测试方法,对比了英国和日本大学生对导师辅导课中的批评、建议和请求三种言语行为的面子关注的差异,发现在对批评作出回应时,英国学生更关注自身的积极和消极面子的需求,而日本学生则更关注导师的积极面子需求(625)。朱湘燕借助问卷调查和文献作品检索的方法获得6种批评应答语用策略,并区分了5种交际情形下14种类型的批评会话序列(《论汉语批评》145-47)。同时,朱湘燕还指出批评应对策略的选择受汉语文化的影响(《影响批评语用策略》72-75)。

总的来看, 伊拉加和特纳仅关注单一话轮中的批评应对话语及其面子问题, 而朱湘燕只是对文献作品中的批评应对策略进行概括, 未涉及自然发生的真实会话。

上述研究者们主要依据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管理理论来界定面子, 但此理论曾受到许多学者的挑战^[5]。后来, 斯潘塞-奥泰 (Spencer-Oatey) 修改了面子管理理论的框架, 将积极面子转变为素质面子 (quality face), 并添加身份面子 (social identity face), 同时将消极面子转化为平等权, 并添加交往权 (“Rapport Management” 15; “Face, (Im) Politeness and Rapport” 13)。依据斯潘塞-奥泰的看法, 素质面子指我们希望他人对我们个人素质给予积极评价的基本需求, 它涉及对个人的资格、能力、形象及外表等方面的评价; 身份面子指我们希望他人承认或维护我们的社会身份或角色的基本需求, 如对领导、客户及朋友身份的维护 (“Managing Rapport” 540)。

综上所述, 鉴于学者在批评应对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的不足, 以及这些研究仍未涉及广播情感热线互动这一结构性语境, 本研究试在此语境下探究批评应对所牵涉的咨询人面子管理的策略、序列组织及成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中国境内广播情感热线节目为研究对象, 包括《金山夜话》、《叶文有话要说》和《晨风说》等知名情感节目。这些节目历史悠久, 主持人情感资历深厚, 如金山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会员和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 主持《金山夜话》25年; 叶文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首席主持人, 曾获主持人最高奖项“金话筒”奖, 主持《叶文有话要说》已14年; 晨风是心理咨询师和情感专家, 主持《晨风说》14年。

本研究以主持人与咨询人之间的会话为语料。主持人每次接通一位咨询人的电话后, 后者匿名倾诉自己在婚姻、家庭、工作、学习及日常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或矛盾, 随后前者给后者提供建议或安慰。两人的互动过程一般由招呼、问题或矛盾介绍、对特定问题或矛盾中的行为或观点的协商判定、提供建议、终结互动五个阶段构成。其中在对特定问题或矛盾中的行为或观点协商判定时, 主持人常常对咨询人提出批评,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此互动阶段。我们发现主持人的批评话语在节目中极其凸显, 它们出现频率高, 且批评力度强。

主持人与咨询人的互动过程会对公众全程放送, 属于自然发生的会话, 符合会话分析对语料的选取标准。本研究随机抽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3种节目录音各10个, 并依据杰斐逊 (Jefferson) 的转写标准 (24-31) 将录音转写为文本, 被转写的录音时长约30小时。本研究借助会话分析方法, 以定性研究为主和定量研究为辅, 探究三个问题: 1) 咨询人在应对主持人批评时采用什么面子策略来管理自身的面子? 2) 咨询人在应对批评时所采用的面子策略构建了什么序列组织结构? 3) 这些序列组织结构的成因是什么?

三、批评应对的面子策略及其序列结构

本研究涉及的素质面子是指某人希望另一方对前者在家庭、恋爱或热线会话交际中的行为给予正面评价的需求，身份面子则指某人希望另一方承认前者的家庭、恋爱或热线交际的正面角色的需求。当另一方满足了某人的以上需求，则可认为另一方褒奖(维护)了某人的面子；而当另一方背道而驰，对某人以上行为和角色进行负面评价时，另一方实则贬损了某人的素质或身份面子。

当咨询人对面子贬损作出回应时，在人际层面上就是在管理自身的面子，即维护或放弃自身的面子。他/她往往会采取一些面子策略。面子策略是人际层面的概念，指当主持人贬损咨询人的素质或身份面子时，咨询人用于应对此贬损的面子管理的方式，如接受、缓和、回避以及拒绝面子贬损。咨询人常常会混合使用多种面子策略，形成特定的面子管理序列组织。

(一) 咨询人批评应对的面子策略

本研究中，批评应对话语依据面子管理方式可被分为两类：直接和间接面子策略。前者指咨询人直接对自身面子进行管理，后者指咨询人通过褒奖(维护)或贬损主持人或第三方的面子来间接管理自身的面子。

综观研究语料，主持人批评和咨询人应对的相邻对(adjacency pairs)共255个，其中197个相邻对显示主持人贬损了咨询人的素质面子，其余58个相邻对显示主持人贬损了咨询人的身份面子，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咨询人应对批评的面子策略统计

面子策略	直接面子策略				间接面子策略			
	接受面子贬损	拒绝面子贬损	回避面子贬损	缓和面子贬损	褒奖主持人面子	贬损主持人面子	维护第三方面子	贬损第三方面子
数量	94	33	44	57	1	10	3	13
合计	228				27			

1. 直接面子策略

直接面子策略包括接受、拒绝、回避，以及缓和面子贬损四个子类，咨询人通过这些策略实现对自身面子的直接管理。在使用接受面子贬损的策略时，咨询人对主持人的面子(素质/身份面子)贬损直接作认同性回应，如“是”“嗯”“好的”“我不对”等；当咨询人使用拒绝面子贬损策略时，他/她会作一些否定性回应，如“不是”“不对”“不是这样的”等；当咨询人采用回避面子贬损的策略时，他/她会不对面子贬损作关联回应，如保持沉默或故意转

换话题；而当咨询人采用缓和面子贬损的策略时，她/她会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解释，说明实施此行为是情非得已或在特定情形中此行为已是最明智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被负面评价的行为（部分）合理化，借此缓和主持人对自身面子的贬损。限于文章篇幅，下文仅举两例。

(1) 咨询人先与情人同居，后与丈夫离婚。

01 主持人：自己有丈夫。跟别的男人同居两年。你还一边听叶文有话要

02 说。你这不等于打我的脸一样吗？

03 咨询人：不是。叶老师。[我是-]。

04 主持人： [别管] 我叫老师了。我能教出你这样的学生啊？

05 → 咨询人：好的。

06 主持人：好的什么呀？你觉得自己做得对吗？

07 → 咨询人：不对。

(《叶文有话要说》)

在 01 和 02 行，主持人对咨询人在未离婚的情况下与情人同居的行为提出批评，在 04 行中，主持人对咨询人的身份面子作了贬损，即否定咨询人具有成为自己学生的资格，咨询人在 05 行通过确认来直接接受批评。在 06 行主持人通过质问继续对咨询人的素质面子作贬损，后者在 07 行借助否定性自我判定再次接受批评。就 05 和 07 行而言，咨询人没有进行任何解释或反驳，属于直接接受面子贬损的策略。广播热线最凸显的语境特征就是热线会话属于生活中公共和私人空间领域之间的界面。表面上，热线会话属于主持人与咨询人间的私人会话，但会话过程向公众广播 (Hutchby 18)。同时，咨询人匿名致电，两者在私人层面上属于陌生人关系 (O' Keeffe 12)。加之，两者的交际地位不对等，主持人控制着交际的话题与进程。因此，两者的批评互动混杂了陌生人关系、上下级关系和私人场合的交际特征。在私人场合中，即便批评严厉，被批评人也常会接受批评；下级即便有理也很少对上级的批评进行申辩 (朱湘燕，《影响批评语用策略》76)。因此，咨询人直接接受主持人的批评不足为奇。

(2) 咨询人与婆婆闹矛盾。

01 主持人：你和她动手。是吧？你是君子动手不动嘴。

02 → 咨询人：我(.)我本来是不会讲什么话的。动不了嘴。=

03 主持人：=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人实干能力强啊。你不会讲话只会动

04 手。(0.5) 动手能力强啊。

05 → 咨询人：不是。我真的是逼急了。我跟你讲。我老公有一个儿子。有

06 → 一个儿子嘛。我那边(.)我妈(.)我娘家打电话跟我说。一定要做

07 → 一个好后妈。然后我对他家小孩蛮好的。

(《金山夜话》)

主持人在 01 行借助反讽负面评价了咨询人的行为, 贬损其素质面子。咨询人在 02 行做了解释, 说明受自身习惯和能力的限制, 不懂与他人吵架, 从而将施暴的主观意图降低。在 05 至 07 行, 咨询人再次将自己施暴归因于客观情形的急迫性, 并向主持人呈现好后妈的形象, 从而缓和主持人对自己素质面子的贬损。在热线会话这样一种批评互动中, 被批评人会据理申辩以维护自身面子(朱湘燕,《影响批评语用策略》76-77), 当被批评人考虑到批评人的交际(社会)地位和有求于批评人(如咨询人要寻求主持人的建议)时, 被批评人会尽可能提供解释和理由来缓和批评人对自己的面子贬损。

2. 间接面子策略

如前所述, 咨询人管理自身面子实则就是维护或放弃自身面子, 在管理过程中咨询人会采取一些间接面子策略, 如通过褒奖(维护)/贬损主持人或第三方的面子来管理自身的面子。本研究语料仅显示有咨询人借助间接面子策略来维护自身面子的实例, 暂未发现咨询人放弃自身面子的例子。

间接面子策略包括咨询人通过褒奖/贬损主持人面子和维护/贬损第三方面子来维护自身面子四个子类。在面对面子贬损时, 咨询人可正面评价主持人主持节目的能力、口才或交际能力等, 借此褒奖主持人的素质面子, 以诱导主持人缓和对咨询人的面子贬损, 最终达到维护后者面子的目的; 咨询人还可对主持人的面子展开攻击, 如负面评价主持人的行为、观点和分辨是非的能力, 借此贬损主持人的素质面子, 最终间接性地否定主持人对咨询人的面子贬损, 以达到维护咨询人自身面子的目的; 咨询人有时也会利用话语来与第三方结盟, 将自身与第三方定位为内群体(in-group), 而将主持人定位为外群体(out-group)(Van Dijk 122), 通过正面评价第三方的行为或观点, 即维护第三方的面子, 借此与主持人的面子贬损对抗, 间接地维护自身的面子; 咨询人有时还会将自身行为或观点遭受负面评价的部分或全部责任归咎于第三方(与咨询人有矛盾的一方), 以此使自己的行为或观点(部分地)合理化, 从而达到间接维护自身面子的目的。下面试举两例进行说明。

(3) 咨询人的公公婆婆赠送咨询人房子和汽车, 咨询人仍不满足。

01 主持人: 这是公公婆婆什么时候欠你们的? 他给你的该你的还是欠你

02 的跟你看孩子? 娘家妈 [跟你看孩子应该是-]

03 → 咨询人: [你的孩子谁给你带?] =

04 主持人: =我自己呀。

05 咨询人: 你自己一直带到他小学呃上上学吗?

06 主持人: 呃对呀。我跟我先生。再说 [你的事情跟我的事情有什么事

07 呀?]

08 → 咨询人: [那你带孩子工作还做得这么

- 09 → 好?]
- 10 主持人: 有什么关系呀? 你这样质问我你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 11 → 咨询人: (0.5) 我我只是觉得你没有处身置地地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谈。
- 12 主持人: 那我告诉你姑娘。我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六十万的房子。
- 13 也没有人给我买二十万的车。这样比一比是不是觉得你很幸
- 14 运了?
- 15 咨询人: 我我是觉得我很幸运。如果如果你 =
- 16 主持人: =你觉得你很幸运才怪呢。你这样无礼的姑娘我也不愿意跟你
- 17 多谈了。再见。 (《叶文有话要说》)

在上例 01 和 02 行, 主持人不断地对咨询人实施批评, 认为后者对老人的依赖性过强, 生活的自我支持能力欠缺, 同时过于贪财, 以此贬损后者的素质面子。咨询人在 03 行的非 TRP (转换关联处) 位置发话, 与主持人争夺话语权, 体现其无法忍受此贬损, 并且咨询人质问主持人的抚养能力, 以期揭示后者的生活也有求于老人, 从而发掘拒绝主持人贬损的对抗性证据。随后在 05、08、09 和 11 行咨询人连续威胁或贬损主持人的素质面子, 尤其在 11 行前者使用否定话语表明后者先前的批评是欠妥的, 因此咨询人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否定了主持人对自己面子的贬损, 维护了自己的素质面子。此例表明, 在主持人与咨询人之间的对峙性话语互动中, 双方往往都会使用正面的自我呈现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和负面的他者呈现 (negative other-presentation) 话语, 将自身与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定位为正面的内群体, 而将对方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定位为负面的外群体, 以求在争辩中获得优势地位, 建构自身的正面形象 (Van Dijk 122)。在此例中, 主持人和咨询人都使用了负面的他者呈现话语, 咨询人通过贬损主持人面子来间接地维护自身面子。

- (4) 咨询人总在探讨是否保留腹中小孩, 不考虑男友是否可托付终身的问题。
- 01 主持人: 想想这样的男朋友是否能在一块生活可以托付终生? (.) 咱们
- 02 是不是先想想这个问题啊? 要别等哪天人家明确地跟你讲我
- 03 就不想要这个孩子连你都不想要了。最后你肚子已经七个月
- 04 了。你让我怎么说话?
- 05 咨询人: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要就分手呗。
- 06 主持人: 我现在的想法是你缺心眼。叮嘱你听不明白吗?
- 07 → 咨询人: 他说孩子打了照样结婚。
- 08 主持人: 什么?
- 09 → 咨询人: 他说孩子打了照样结婚。
- 10 主持人: 你真是迷他迷得 (.) 要不要的? 你是真是觉得他对你非常非常

11 的好。

12 咨询人：但他确实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啊。（《叶文有话要说》）

从 01 至 04 行，主持人认为咨询人当前应考虑男友是否可以托付终生，而非是否留下肚里孩子的问题。咨询人似乎对问题的先后缓急毫无意识，因此在 06 行主持人对咨询人作了批评，并且质疑咨询人的理解能力，贬损其素质面子。随后在 07、09 和 12 行，咨询人表明了对男友的信任，对男友的行为作了隐性的正面评价，维护了他的素质面子，因而也使自己谈论是否留住小孩的行为合理化，间接地反驳了主持人 06 行的批评，维护了自身的素质面子。此例说明，咨询人在与主持人出现话语对峙时，会与第三方结盟，形成内群体，并通过维护第三方的面子间接维护自身的面子。

（二）批评应对中面子管理的序列组织结构

上文分析显示，咨询人在应对批评时会采用一系列的面子策略来维护或放弃自身的面子。但是知道这些面子策略是不够的，我们还需知道咨询人在应用这些策略的过程中构建了什么序列组织结构，这样我们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咨询人面子管理的特征。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涉及的批评应对序列一般只包含 2 到 3 个话轮（朱湘燕，《论汉语批评》146-47），但现实中的批评互动过程往往不会只局限于 2、3 个话轮就终结，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完整的批评互动过程中探究批评应对的序列组织结构特征。本研究在选取会话序列时，以话题为导向来界定序列的首尾位置，选择至少由两个批评应对的话轮所组成的单一序列，着眼于面子管理的序列组织结构。

语料显示，咨询人面子管理存在五种序列组织结构：a. 拒绝面子贬损——维护自身面子——接受面子贬损；b. 拒绝面子贬损——维护自身面子——被剥夺社交权；c. 拒绝面子贬损——维护自身面子——话题被转移；d. 接受面子贬损——维护自身面子——接受面子贬损；e. 连续接受面子贬损。本研究将回避面子贬损策略、缓和面子贬损策略以及四种间接面子策略都纳入到“维护自身面子”的步骤中^[6]，虽然这六种策略出现的顺序及搭配会千变万化，但笔者只整体地将它们看作隶属于一个流程步骤。语料统计显示共有 79 个序列组织，其类型分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面子管理序列组织结构的数量统计

序列组织结构类型	a	b	c	d	e
数量	24	6	16	9	24
合计			79		

（注：a、b、c、d、e 分别代表上文提出的五种序列组织结构类型。）

限于篇幅，下文仅以一种序列类型为例进行说明。

(5) 咨询人照顾卧病在床的爷爷, 想向亲戚索要回报。

01 主持人: 他凌晨4点钟起来。当时他饿了。你在干什么?

02 咨询人: 在睡觉。

03 主持人: 所以你就在扯淡。他咋会靠你照顾老人。你照顾什么? 你就

04 是要挣钱。挣钱出去挣去。照顾老人挣什么钱啊? (.) 你那些

05 叔叔大爷姑姑也好。我告诉你不骂你都是对得起你。

06 → 咨询人: 不是。关键是他们没时间(.)所以才要我-。

07 主持人: =谁说没时间了。你不是说你老姑愿意照顾吗? 你不是说你

08 现在就是你三娘在照顾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9 → 咨询人: 我老姑现在都不乐意了。你知道吗?

10 主持人: 废话。有你在能乐意吗? 当初你这么个冲着要钱了。谁乐

11 意啊?

12 → 咨询人: [不是-]

13 → 主持人: [女孩]。闭嘴吧。哪凉快哪呆着去。(挂断咨询人的电话)

(《晨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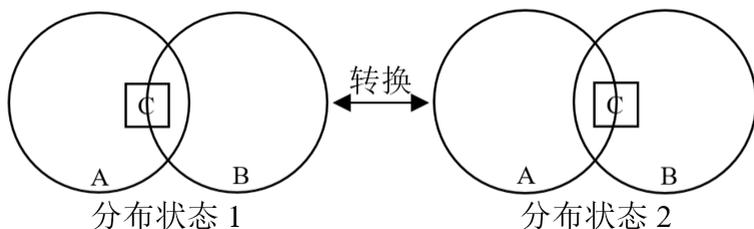
从03至05行, 主持人以陈述句和反问形式明确地对咨询人作出批评, 贬低其照顾老人的能力和向亲人索要回报的行为, 即贬损其素质面子。在06行, 咨询人直接拒绝接受这种面子贬损, 将责任归于第三方, 即“他们没时间所以才要我”照顾, 言下之意亲戚要给咨询人回报。当主持人作出反驳后, 咨询人在09行再次通过贬损第三方面子来维护自身的素质面子, 即“老姑现在都不乐意了”, 而咨询人却能去照顾爷爷, 凸显自身的无私。当主持人再次贬损咨询人的素质面子时, 咨询人在12行欲作反驳, 但主持人在13行争夺话语权, 并明言禁止咨询人发话, 剥夺其社交权, 会话也因此结束。分析显示, 该例体现出的序列类型为: 拒绝面子贬损——维护自身面子——被剥夺社交权。

四、面子管理序列组织结构的知识地位解释

在交际中, 一个话语具有两个层面的功能: 信息层面和人际层面。在信息层面, 话语体现交际者的想法、信念、判断、评价等知识内容; 在人际层面, 话语能体现交际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如面子、礼貌、身份等(Locher and Graham 3)。信息层面的内容会影响人际层面的关系。

前文已指出, 批评是言者对听者否定评价的言语行为, 这种行为是基于一定的知识基础做出的。不同个体拥有相异的经历、概念、想法、信念和判定, 这些因素构筑话语互动者的知识领域, 就如不同国家拥有大小不一的疆域一般, 会话所谈及的某事物的知识会不同程度

地落入相异个体的知识领域之中 (Heritage, “Epistemics in Action” 6; “The Epistemic Engine” 32; “Epistemics in Conversation” 371)。主持人评价咨询人的行为和社会角色是以自身在家庭或交际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 而当咨询人不认同主持人的评价时, 往往会对自身的行为和社会角色做出自我判定, 这种判定也多是以个人的过往经验为基础的。因此, 在交际的信息层面上, 咨询人认同或不认同主持人的评价, 实则是与主持人协商对目标知识 (即对咨询人行为和社会角色的判定) 的支配权。这种信息层面的关系可外化为人际关系: 咨询人认同主持人的评价可体现为在人际层面上接受主持人的面子贬损; 咨询人不认同主持人的评价则体现为人际层面上的拒绝、回避、缓和主持人的面子贬损等直接面子策略, 抑或体现为四种维护自身面子的间接面子策略。因此, 咨询人的面子策略可以归结为信息层面上对主持人评价的认同与否, 即咨询人与主持人协商言行判定上所涉及的知识更多地落入谁的知识领域 (专业知识领域抑或经历性知识领域), 体现为对两种知识分布状态的协商, 如图 1。



▲图 1 知识分布状态转换

(图中 A、B、C 分别代表主持人的专业知识领域、咨询人的经历性知识领域以及评价咨询人行为所涉及的目标知识。)

在面子管理的五种序列中, 序列类型 a、d、e 都以咨询人接受面子贬损而告终, 即序列最终体现图 1 中的知识分布状态 1, 意味着主持人在目标知识上拥有相对于咨询人更高的知识地位。在序列类型 b、c 中, 咨询人最终未接受主持人的面子贬损, 即前者未认同后者的言行评价, 因此, 主持人分别通过剥夺咨询人的交际权和直接转换话题来终止与后者在言行评价上的争辩。这两种行为实则是主持人拒绝进入咨询人知识领域来评价后者言行的外化交际形式 (Heritage,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176)。若主持人进入咨询人的经历性知识领域来判定后者的言行, 那就意味着前者基于后者的知识集合来作出言行判定, 而放弃自身的专业性判定, 即前者认同后者在言行判定上具有知识首要性 (epistemic primacy), 并追随性地做出与后者一致的评价 (Heritage, “The Ubiquity of Epistemics” 33)。但是, 作为情感专家兼会话控制者身份的主持人往往不会在知识地位的争夺中做出让步。在无法通过协商取得目标知识上的更高知识地位的情况下, 主持人会采取强制手段终止与咨询人的争辩, 以免自身的知识地位进一步受到咨询人的威胁。综上所述, 主持人对自身知识地位的建构和维护支配着咨询人应对批评时的面子管理的序列组织结构, 也是维持较高的节目收听率和致电率的关键。

本文探究了广播情感热线会话中咨询人应对主持人批评时的面子管理策略、序列组织结构及其成因。咨询人在应对主持人批评时会使用八种面子策略；这些面子策略在互动中会形成五种序列组织结构；主持人对自身知识地位的建构和维护是形成这些序列组织结构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丰富了面子管理策略的类别，揭示了这些策略的具体应用过程，并从知识地位视角解释了这些过程的成因，为人们在应对批评时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或他人的面子提供了启示。本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关注热线互动中的面子问题，开创热线会话研究的新篇章。

注释 [Notes]

- [1] 参见 P. Margutti, "Teachers' Reproaches and Managing Discipline in the Classroom: When Teachers Tell Students What They Do 'Wro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vol. 22, no. 4, 2011, pp. 310-29.
- [2] 参见 S. Li and C. Seale, "Managing Criticism in Ph.D. Supervision: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vol. 32, no. 4, 2007, pp. 511-26.
- [3] 相关内容参见赵文:《负面评价话语的语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P. Margutti, "Teachers' Reproaches and Managing Discipline in the Classroom: When Teachers Tell Students What They Do 'Wro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vol. 22, no. 4, 2011, pp. 310-29; A. C. Evaldsson and H. Melander, "Managing Disruptive Student Conduct: Negative Emo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in Reproach-response Sequence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vol. 37, 2017, pp. 73-86.
- [4] 参见 P. Brown and S. C.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UP, 1987.
- [5] 相关内容参见 Y. Matsumoto, "Re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Fac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Japa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2, no. 4, 1988, pp. 403-26; S. Ide, "Formal Forms and Discernment: Two Neglected Aspects of Universals of Linguistic Politeness." *Multilingua*, vol. 8, no. 2-3, 1989, pp. 223-48; L. R. Mao,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21, no. 5, 1994, pp. 451-86; Y. G. Gu,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4, no. 2, 1990, pp. 237-57; D. Bousfiel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2008.
- [6] 拒绝面子贬损实则也隶属于维护面子的范畴, 但是为了凸显序列组织的起始、过程和终结, 笔者将拒绝面子贬损独立于维护面子的步骤之外。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Heritage, J.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Territories of Experience: Empathic Moments in Interaction." *The Morality of Knowledge in Conversation*, edited by T. Stivers, et al., CUP, 2011, pp. 159-83.
- .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45, no. 1, 2012, pp. 1-29.
- . "The Epistemic Engine: Sequence Organiz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45, no. 1, 2012, pp. 30-52.
- . "Epistemics in Conversation." *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edited by J. Sidnell and T. Stivers, Wiley-Blackwell, 2013, pp. 370-94.
- . "The Ubiquity of Epistemics: A Rebuttal to the 'Epistemics of Epistemics' Group." *Discourse Studies*, vol. 20, no. 1, 2018, pp. 14-56.
- Hiraga, M. K., and J. M. Turner.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Face in British and Japanese Academic Settings." *Language Sciences*, vol. 18, no. 3-4, 1996, pp. 605-27.
- Hutchby, I. *Media Talk: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Broadcasting*. Oxford UP, 2006.
- Jefferson, G. "Glossary of Transcript Symbols with an Introduction." *Conversation Analysis: Studies from the First*

- Generation*, edited by G. H. Lerner, John Benjamins, 2004, pp. 13-31.
- Locher, M. A., and S. L. Graham. "Introduction to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edited by M. A. Locher and S. L. Graham, De Gruyter Mouton, 2010, pp. 1-13.
- Nguyen, T. T. M. "Criticizing in an L2: Pragmatic Strategies Used by Vietnamese EFL Learner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vol. 5, no. 1, 2008, pp. 41-66.
- . "Modifying L2 Criticisms: How Learners Do It."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0, no. 4, 2008, pp. 768-91.
- O'Keeffe, A. *Investigating Media Discourse*. Routledge, 2006.
-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P, 1969.
- Spencer-Oatey, H. "Rapport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edited by H. Spencer-Oate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0, pp. 11-46.
- . "Managing Rapport in Talk: Using Rapport Sensitive Incident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al Concerns Underlying the Management of Rel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34, no. 5, 2002, pp. 529-45.
- . "Face, (Im)Politeness and Rapport."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edited by H. Spencer-Oate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8, pp. 11-47.
- Tracy, K., et al. "'Good' and 'Bad' Criticism: A Descrip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7, no. 2, 1987, pp. 46-60.
- Tracy, K., and E. Eisenberg. "Giving Criticisms: A Multiple Goal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24, 1990, pp. 37-70.
-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Wu, Shuqiong, and Weiwei Fan. "A Comparison of the Strateg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riticism Speech 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25, no. 2, 2004, pp. 22-25. [吴淑琼、樊葳葳:《英汉批评言语行为策略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2004年第2期,第22-25页。]
- Zhu, Xiangyan. "The Cultu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Criticism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no. 2, 2005, pp. 71-78. [朱湘燕:《影响批评语用策略选择的文化因素》,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1-78页。]
- . "On the Strategies and Types of Chinese Criticism."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 1, 2008, pp. 145-47, 153. [朱湘燕:《论汉语批评的策略与类型》,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45-47, 153页。]
- Zhu, Xiangyan, and Jian Zho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peech Act of Criticism by Chinese and Foreigner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 3, 2004, pp. 80-84. [朱湘燕、周健:《汉语批评言语行为的中外对比研究》,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80-84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方式:Word电子稿请发编辑部邮箱:jflc@hunnu.edu.cn
6. 编辑部电话:0731-88873041 传真:0731-88872636 网址: <http://jflc.hunnu.edu.cn>